

## 继往开来 迎接胜利

（代序）

1947年1月，党中央决定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由于交通困难，各解放区代表团于3月先后到达邯郸地区的武安县。会议开至5月结束。经过约近两个月的讨论，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是一次继往开来、迎接胜利的会议。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开辟的解放区，主要的有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地区、华中地区。此外还有最早建立的东北抗联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只能分散活动，没有形成成片的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抽调山东、华中等地的部队恢复并开辟了东北解放区。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华中地区，新四军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七战七捷，消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后，主力部队撤退到山东地区，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东地区的工作。

在日本投降前，各解放区被日军分割（各条铁路两侧均有一百多里宽的敌占区），交通困难，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在党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领导下，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日本投降后，我军解放了铁路沿线的许多中小城市，各解放区互相接壤，贸易来往逐渐密切，各解放区的货币也需要互相流通，这就需要

调整各解放区的经济关系，总结过去经验，制订新的方针政策。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已改称邯郸中央局，所以华北财经会议常被简称为邯郸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团长白如冰同志；晋绥边区代表团，团长陈希云同志；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同志；华东地区代表团，团长是薛暮桥同志。晋冀鲁豫是东道主，除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外，负责安排会议日常工作的是该区代表团副团长戎子和同志（他当时的名字是戎伍胜）。当时东北解放军仍在松花江两岸作战，与关内很少有经济来往，所以没有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各解放区的代表团团长分别报告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工作，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正在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团长白如冰同志因接管财经工作不久，由前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同志代为报告）。晋冀鲁豫和山东还作了若干专题报告。晋冀鲁豫区的报告最多。所有的报告都历叙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财经工作发展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内容十分丰富。

分组报告和专题讨论完毕后，大会推举薛暮桥同志根据讨论结果起草综合报告。综合报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定稿，全文约有二万三四千字。会议快结束时，党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和随从王学文、刘昂同志前来参加会议。董老听取了薄一波同志和各代表团团长的汇报，并审阅了综合报告后，肯定这次会议是开得很成功的。由于综合报告很长，他要求压缩成为一个四千字的决议，用电报报告中央。这年 10 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过去财政经济工作中的缺点，要求大家坚决执行此次会议的决定。

在会议过程中，大家建议成立华北各解放区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决定



在河北省平山县党中央工作组（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所在地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任命董必武同志为主任，每一个解放区各派一人任副主任。晋冀鲁豫解放区是杨立三同志，晋察冀解放区是南汉宸同志，西北解放区（晋绥、陕甘宁军区合并而成）是汤平同志，华东解放区是薛暮桥同志，并兼任秘书长，王学文同志任研究室主任。

华北财经办事处于 1947 年 6 月开始筹建，10 月各位副主任相继到职，开始工作。当时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仍然各自独立，但因地区间已基本上联成一片，为便于商品交流，金融贸易工作需要互相协调，特别是华北各解放区接壤地区的各区货币需要规定比价，互相兑换，以利于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其次是各地区的物资交流需要取消出入口税，自由流通。当时对外（对国民党统治区）贸易的主要窗口在华东，各解放区需要通过华东解放区向上海等地采购军需民用物资。为此，1948 年 3—5 月间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西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各解放区都派了代表团参加。西北代表团团长是贾拓夫同志，晋察冀代表团团长是姚依林同志，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胡景坛同志，华东代表团团长是陈穆同志。会议由董必武同志主持，薛暮桥任秘书长，南汉宸、杨立三和汤平同志都参加了与各解放区代表团的团长等组成大会的主席团。会上各代表团分别作了报告，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和比较简短的《决定》，规定各解放区货币按协商比价互相兑换。接着中央规定实行固定比价，北海币和冀南币的比价是 1：1，与晋察冀币的比价是 1：10，与西北币的比价是 1：20。当时解放战争尚在继续进行，各地区的物价还难完全稳定，为保持这个比价，各地物价必须同幅度上升。根据邯郸会议总结的经验，稳定物价的关键是控制货币发行。中央决定今后各解放区增发货币，均必须由中

央批准。华北财经办事处每五天通报一次各解放区主要城市的几种主要商品的价格，以便中央据以决定各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数额。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快结束时，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华北财经办事处设在离西柏坡约一公里的夹峪）。周恩来同志在听取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报告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决定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经过半年筹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简称人民币）于 1948 年 12 月 1 日正式发行。开始时人民币与各区货币共同流通，北海币、冀南币每百元兑一元人民币，晋察冀币每千元、西北币每二千元兑一元人民币。这时华中地区已经停发华中币，改用北海币。经过三四个月，各地方货币全部收回，人民币统一占领各解放区市场，只有东北地区的货币仍然单独发行。由于解放战争在关内全面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尚难稳定，东北已经全部解放，有条件稳定物价，所以中央决定东北币仍单独发行，以利于着手进行经济恢复工作，支援关内。1950 年 3 月以后全国物价完全稳定，1951 年 4 月中央决定收回东北币，人民币在全国统一流通。由于连年物价上升，货币面额过大，1955 年 3 月发行了新版人民币，每元新人民币换旧人民币一万元。

1948 年 6 月，中央成立财政经济部，董必武同志任部长，薛暮桥任秘书长。其余的副主任，杨立三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华北财办原有工作人员大部分留在财政经济部工作。与此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西北三个中央局合并成为华北局，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与华东局、东北局同受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中央可以用人民币来支援各解放区、各野战军，货币发行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掌握。由于董必武同志出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薛暮桥、杨立三每天深夜到周恩来同

志的办公室去协助处理各地区的有关财政经济和军需支援方面的问题，财政经济部实际上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

1949年2月初北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移到北平，周恩来同志派薛暮桥去北平，协助南汉宸同志清点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印刷钞票的凹版机和印钞纸张，并向陈云、董必武同志请示今后货币发行方针。当时许多同志认为，大中城市解放后物价可能比较稳定。陈云同志认为战争规模愈来愈大，军费开支愈来愈多，货币发行应当首先服从战争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额是百元，应当立即准备印制五百元、一千元货币。薛暮桥回来报告后，周恩来同志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亲自制订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计划。正如陈云同志预料，此后一年物价四次猛烈上升，每次上升一至二倍。到1950年3月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中央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财政收支基本接近平衡，中央就决定发行三万亿元公债来紧缩货币，一举结束了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完全稳定，而且略有下降。

1949年3月党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中央财政经济部改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由钱之光、曹菊如等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来协助工作。这年6月，华北政府的财经委员会由宋劭文同志率领并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财委改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同志任副主任，薛暮桥任秘书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长。从邯郸会议以来，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财政经济部、中财委不但在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同志领导下协助党中央处理财经工作，而且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财经工作干部，各中央局也培养了大量财经工作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协助政务院处理财政经济工作的骨干力量。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各部门和有关各省、市、自

治区纷纷指定一部分老干部收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国家计委派齐燕铭同志率工作组亲自去中央苏区，收集并编印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资料，已经印成三大册。陕西省委领导档案馆组织一批老干部编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地区财政经济史料汇编》，共有九册，内容十分丰富。其他各解放区也纷纷收集资料，每区编印五六册至十几册。只有邯郸会议、华北财办、财政经济部、中财委这一部分资料没有专职机关来管。而这一部分资料，综合各解放区的历史经验，叙述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从分区管理走向全国统一的历史过程，更有重要意义。直到 1988 年，才由薛暮桥、戎子和、宋劭文、李人俊等发起，并得到当时主持邯郸会议的薄一波同志赞同，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李海、中国财政杂志社李惠贤等同志来负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编辑工作，由杨波同志担任主编，负责审核全部资料，并进行必要的文字修改。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邯郸会议以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和各解放区如何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资料的收集，得到了中央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致谢意。

薛 暮 桥

## 解放战争时期（1947—1949 年） 财政经济工作的回忆

薛 暮 桥

抗日战争时期我先在华中根据地工作，后转山东解放区做财经工作，1947 年 3 月参加邯郸华北财经会议，11 月调华北财经办事处，1948 年转中央财政经济部，1949 年调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始终做财政经济工作。特别是 1947、1948、1949 年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华北财办、中央财经部工作，亲身经历了财经工作的逐步走向统一，支援解放战争的大反攻，直至取得全面胜利的过程。往事，历历在目，可歌可泣，值得回忆，值得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使后来者明白胜利来之不易。如对读者有所启发和鼓舞，则是我的愿望了。

### （一）

日本投降以前，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 19 大块，其中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很接近，但因敌人封锁，切断交通线，而不得分成几块，所有财政经济工作，只能分散管理。日本投降以后，我军攻克几十个小城市和铁路两侧的敌占区，各抗日根据地可以自由来往。山东省胶东、渤海、大鲁南三个地区联成一片了，济南、青岛、徐州仍被蒋军占领。陇海铁路以南的华中地区成立了

苏皖边区政府，津浦铁路以西仍属晋冀鲁豫边区范围。有些抗日根据地已经联成一片，贸易来往频繁，货币需要互相流通，原来对敌占区的经济斗争办法已不适应于新的情况，特别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各解放区各自为政，互不了解，引发了经济交往中的相互封锁和争夺市场的矛盾，有的还非常激烈，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不利于生产发展和支持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急需相应地改变经济管理办法，由分散管理逐步走向统一。

因此，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不久，即 1947 年 1 月 3 日，党中央采纳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决定在晋冀鲁豫地区的邯郸召开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要求统一各区步调，克服本位主义，和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实行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准备长期支持战争。同时，指示各解放区派一个代表团到邯郸中央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镇开会。中央所以选择在晋冀鲁豫开会，不但由于该地区适中，而且由于国民党军已无力量全面进攻，只能改为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东西两端进行重点进攻，晋冀鲁豫地区已经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战争干扰较少。这时华中、山东两区已经合并成为华东解放区，华东局任命我为团长率领华东区的代表十几人在春节前从山东出发前往邯郸。

2 月底我们到达冶陶。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同志正在准备率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进行外线作战，会议由副书记薄一波同志主持。薄一波同志见我时，说：国民党派七十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的负担很重，并问有多少脱产人员？我请他猜猜，他估计有 70 万人，我答有 90 万人。一波同志听了十分惊讶，一个省供应这样多人，如何渡过这个难关？

参加会议的除华东代表团外，还有作为东道主的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杨立三、戎子和同志，戎子和同志实际上也是大会的

秘书长；有晋察冀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同志；晋绥代表团，团长陈希云同志；陕甘宁代表团，团长白如冰同志。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3月10日开始，开十天预备会，主要是交流情况，提出问题，相互了解。我在10日第一次会上，讲了盐的问题，山东盐多，不感到有问题，不了解晋冀鲁豫、晋察冀、西北缺盐，今后应当支援；还有货币、商品流通问题，这次会议应当很好研究，相互支持。晋察冀代表讲了冀中市场、货币乱的问题。晋冀鲁豫代表讲了冀鲁豫、冀南与邻区的问题。大家心平气和地讲了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气氛十分融洽，一片团结景象，给正式会议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阶段是正式会议，从3月25日开到4月14日。各代表团分别做了本地区的财政经济情况的综合报告，有些地区还做了专题报告。我除作《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报告外，还作了《山东的群众生产工作》专题报告。晋冀鲁豫代表团是东道主，除作财政经济工作总报告外，还分别作了五个专题报告。会议分别对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内容十分丰富，集中反映了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第三阶段是起草向中央的报告和讨论定稿。大家公推我起草《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综合报告》的初稿。由于大家等着讨论，我用了三天时间写成，约有24000字。又经过大会多次讨论修改，在5月初大体定稿。不久，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前来领导会议。董老大体同意会议的综合报告。由于全文太长，他要我再起草一个4000字的会议决定，电报中央。会议圆满结束。反映在《综合报告》中的几个要点是：

(1) 此次会议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解放战争中的财粮供给。我们必须动员巨大力量来支持战争，同时也必须保留必要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因为生产如不发展，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很难长久支持；反之，战争如不胜利，生产也就无法保障。所以，我

们必须把战争和生产结合起来，以战争来保障生产，以生产来支持战争。

(2) 在经济工作方面，应当适应战争情况和战争需要，努力发展各种生产，奖励人民发家致富，纠正害怕富农发展，害怕工商业发展的保守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三者所组成，但是在国营经济还不能大量发展并占主要地位的时候，还是应当注意发展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私营经济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是应当扶助的，但在战时的农村环境中，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因受客观条件限制，亦不能有大量发展，所以扶助小生产者的私营经济，便成为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3) 在组织领导方面，为了适应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逐渐从分散走向统一。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如不逐渐从分散走向统一，必将给大兵团的运动战带来许多困难。所以大家一致拥护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来领导和调整各地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在财政上作适当调剂。

(4)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有几个思想问题必须明确解决。第一个是独立自主的思想；第二个是长期战争的思想；第三个是依靠农民和为农民服务的思想；第四个是树立整体思想，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此次会议决定各解放区间的物资交流和贸易往来，应当拆除封锁，自由交易，相互采取同样的政策。邻区货币要互相支持，并在财政上作互相调剂，协助贫穷地区，避免苦乐不均现象。

(5) 贸易工作金融货币工作应为生产服务，为战争服务，同时还应加强对敌经济斗争。贸易工作的方针是“对外管理，对内自由”，办法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这样更有利于对敌经济斗争。对内贸易主要是调剂供求，平稳物价，藉以发展生产，繁



荣市场。货币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为了达到平稳物价的目的，首先必须排挤蒋币（把蒋币逐出我解放区市场），使我本币在市场上取得独占地位。在本币独占市场以后，必须慎重掌握货币的发行数量，以免引起物价的剧烈波动。为此，应当（1）争取财政收支大体平衡；（2）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棉布等重要物资；（3）在秋收以后和春荒时期，货币流通需要数量多少不同，应当作适当调剂。掌握了上述三点，便可以把物价相对稳定下来。

此外，报告还讲了执行城市工商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意见。

1947年10月24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邯郸会议的决定和综合报告，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指示各地：“这些决定应立即坚决执行。”并决定设立“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由董必武同志任主任，各解放区各派一名代表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会议结束后，我回山东向华东局报告会议情况。由于国民党军队正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只能作简要报告，华东局未能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我就随华东局从渤海区转移到胶东区。1947年9月初，华东局接党中央来电指示，由我代表华东局到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并带些干部立即去中央。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很多地方，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等仍在陕甘宁边区指挥作战，另成立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指导各解放区工作。我接电后，随即星夜穿过胶东地区敌军的防线到达胶西，再到渤海区。10月乘敞篷大卡车离开山东。随行的有孙揆一、王耕今、杨波、高星华、尹伯兮等。到达石家庄时，石家庄刚解放，正在指挥作战的朱总

司令接见了。再前进到平山县时，已是 10 月中旬了，我们住在离西柏坡只三四里路的夹峪村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见到了董必武同志。代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杨立三同志，先我们到达。代表晋察冀解放区的南汉宸同志，在参加华东局召开的渤海高干会之后和我同车到达。代表西北解放区（陕甘宁、晋绥已合并）的汤平同志在我们之后到达。这样，华北财经办事处在 10 月下旬正式成立了。杨立三、南汉宸、汤平和我任副主任，我兼任秘书长。此外，王学文同志任研究室主任，申伯纯同志任秘书处处长。办事处的干部大部分是各副主任带来的，有五六十人；此外，还有延安来的吕克白、黄剑拓、黄韦文等同志。董老亲自主持办事处的工作。

## （二）

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组织规程在我们到达平山之前的 8 月已经中央工委批准。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及其工委领导下，统一华北各个解放区（东北解放区不在内）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执行。并规定：除特别重大的问题需经中央及工委会讨论并通过中央局执行外，在一般经常的行政问题上，可直接指挥各解放区的财经办事处。具体任务是：（1）制定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2）审查各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管理与调剂；（3）掌握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4）指导各个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5）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6）审定各个解放区的人民负担；（7）审查各个解放区脱离生产的人数及其编制与供给情况；（8）审核各个解放区的财政预算并作出必要的调剂办法。组织规程规定，华北财经办事处内部办事机构设秘书处、财政组、经济组、军事供给组、

调查研究室，共五个单位。华北财办以后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个组织规程逐步展开的。

在董老领导下，华北财办工作开始时，第一件事是决定各副主任的分工：军事供给组由杨立三兼任组长；经济组由我兼任组长；财政组由南汉宸兼任组长。汤平 1948 年 1 月到任后，亦参与财政组的领导。第二件事是研究制定工作计划。主要有：制定各组的工作计划；召开三个专业工作会议，即 1947 年 12 月召开各解放区参加的军工生产供给会议和交通会议，1948 年 4 月召开各解放区参加的金融贸易会议；并准备召开财政供给会议，研究各种财经工作的统一方案；着手筹备建立统一的银行和盐业公司。

军工生产会议由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主持于 1947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由有兵工生产的华北五个解放区参加。主要是沟通情况，改进管理制度和工资制度，促进兵工生产，保证军队供给。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要求逐步改供给制为独立核算制，增加生产和供给，保证军用。

交通会议在军工会议之后召开，1948 年 1 月 5 日结束，历时半月。会议由董必武同志主持，我也参加了会议，各解放区都派人出席。交通会议是在各解放区基本联成一片之后，适应大规模自卫战争支前的需要和经济发展、市场贸易日益扩大的要求召开的。会议主要讨论交通事业的统一管理和铁路、公路的恢复与建设问题。董老作了总结报告。会议决定立即进行有计划的若干交通建设，把各解放区紧密的联结起来，以适应战争需要及经济发展需要。要求充分运用一切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汽车、木船、大车、小车、毛驴等，都应利用起来；可以建立交通运输公司，也可以组织群众运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开展。同时决定修复德石铁路和正太铁路（通至阳泉），兴修邯郸馆陶铁路；修通四大公路线（两条自西北至山东海边，一条通东北，一条通豫皖苏），加

强各区间的公路联系。开通河道，统一管理卫河、运河。解放区的邮政，应当采取走向企业化、专业化的方针，改善通邮办法，逐渐统一各种通邮制度。除前方部队信件外，一律要贴邮票。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到会同志都能顾大局、识大体，服从统一领导，顺利完成了任务。只是在铁路建设上有个争论，晋冀鲁豫希望兴建邯鄲馆陶铁路，晋察冀、山东偏重于恢复德州石家庄铁路。最后大家认为首先还是迅速恢复德石铁路，应把已有的铁路器材集中用于这条铁路，有条件时再兴办邯鄲路。这次会议之后，各区立即动手进行建设，交通事业发展很快，对支援战争和发展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财经工作的统一，重点是统一金融货币，在华北财经会议时大家就一致建议在 1947 年成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但中央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为此，董老召集华北财办的同志商议，并以董老的名义向中央写了书面汇报，认为 1947 年底发行统一的货币条件的确不够成熟，同意中央意见。时间推迟但准备工作应当抓紧，免得贻误时机。当时，我们最困难的事是缺乏钞票纸，要请东北向苏联订购一万令钞票纸，并希望东北能够代印钞票。由购买钞票纸到印成钞票最快也得半年，再运到华北发行，恐怕至少要等到 1948 年秋季。印制统一的货币得有统一的名称，我们即向中央请示银行用什么名字。其实这都是准备工作，并不是想要立即成立统一的银行。董必武同志是位既认真负责又考虑周到的可尊敬的老同志，他向中央报告提出发行统一货币的五个步骤：

第一步，华北财经办事处必须确实掌握各区的发行额和预算，了解各区票币的互换率，以及粮食、棉花、纱布、油、盐、煤、金银等物资的价格，并基本上完成银行的准备工作。

第二步，发行少量的统一票币，主要作为各区汇兑差额的划拨使用。当然市面也可以流通。统一货币与各区货币固定比价，互

相兑换，并随各区货币的贬值和升值而改变统一货币的比价，保持统一货币的币值。

第三步，逐渐增加统一货币发行数量。

第四步，停止各区票币的发行，完全发行统一货币。这个时候，各区的货币和统一货币同时流通。

第五步，用统一货币收回各区货币形成单一的统一货币市场。

计划分五个步骤，实际上也可视情况变化减并为三、四步。时间也要看情况而定。董老还估计到由于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存在，统一财经工作会有阻力，但相信经过做工作是可以克服的。

在向中央的汇报中，还估计到了各解放区的财政困难：晋冀鲁豫原来财政收支情况是好的，但由于刘邓、陈谢大军南下，陈粟兵团转移到冀鲁豫区，增大了供给，财政也转入困难，需要发行货币解决；晋察冀自从退出张家口后，财政状况很困难，靠发行货币支持；山东受战争破坏很厉害，发行量很大，也需要支持。西北两区原来就靠发行维持，即使有华北的物资支援，仍然要用发行弥补开支。总的看来，1947年、1948年不管是分散还是统一，依靠发行钞票维持的状况是不会改变的。董老在汇报中说：“经济发达的国家，一经卷入长期战争的漩涡，没有不利用发行来弥补其财政亏空的。我解放区经济不发达，又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的损害，现在进行的是我国空前规模的现代化战争，要想完全不依靠发行来解决财政困难，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发得不是太多和太骤，不致引起社会物价的大波动，我区人民还是可以担承的。”

统一发行，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军队转移地区的便利，以及中央领导机关控制发行额和开拓财政统一道路等，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所以，应当从速准备和实施。在准备工作中，还要

相应建立若干财政制度，包括预决算、财粮会计、金库、审计等制度，并确定军政人员的机构编制和供给标准。为此，华北财经办事处拟制了一份 1948 年供给标准的初步意见，经工委审核后试行。

董老向中央的汇报，实际上就成为华北财经办事处此后工作的方针和纲领，我们也就是照这个方针展开工作的。实践证明汇报是符合实际的，同时也取得了成绩。

华北财经会议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解放区的形势发展有了很大变化。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陈谢兵团跃进豫西，陈粟率军进军冀鲁豫，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反攻。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陕甘宁、山东解放区也从敌军进攻转为我军反攻；各解放区日趋稳定，经济往来日渐密切，金融贸易关系必须适应新的情况，逐步建立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实现从分散走向统一。为此，华北财经办事处根据中央批准，于 1948 年 4 月在石家庄召开华北各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制订统一的政策和行动计划。比起军工会议和交通会议来说，这次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更加重要，是继邯郸华北财经会议之后的又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财经会议。

### （三）

石家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是华北财经办事处召开的第三个专业会议，由董必武同志主持。西北解放区代表团由贾拓夫同志率领；晋察冀解放区代表团由宋劭文、姚依林同志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团由林海云、胡景坛同志率领；华东解放区代表团由陈穆同志率领。各代表团团长组成主席团，领导会议，我为秘书长，具体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

石家庄金融贸易会议讨论了支援战争、恢复生产与稳定物价三个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三者的核心是货币的发行问题。首先是各地区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价、自由兑换和统一发行问题；其次是撤除各解放区之间的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问题；最后是随着中小城市的大量解放，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问题。会议于五月结束。董老委托我起草综合报告。八月中央批准了这个综合报告，并要求各解放区遵照执行。

综合报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是：

一、去年邯郸会议以来，各解放区认真执行了党中央批准的方针政策，金融贸易工作已经逐渐从各自为政走向统一。但是，步调还不完全一致，有些问题急待研究解决。第一，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华北解放区已经比较稳定，为了建设华北，支援前线，我们已有可能和必要来更加有计划的进行生产建设。今后的中心工作，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支援战争。华北各解放区除有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战争外，一般应以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第二，石家庄解放后，华北各解放区大体上已经联成一片，各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已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走向统一的国民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扩大和统一，应建立一套适应人民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金融贸易制度，反对各自为政和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第三，既要准备长期的、艰苦的战争，又要准备迎接战争的胜利。如何保证战争供给，不单纯是一个财政问题，金融贸易工作也有责任，我们既不当盲目乐观，也不应当悲观失望，要正视财经工作中的困难，同时更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战争胜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广大乡村和许多城市的陆续解放，我们的金融贸易工作必须快步前进，把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的金融贸易工作，在新解放区迅速

建立起来。

二、关于金融工作，第一个是货币政策。方针是一要稳定，二要统一。不稳定、不统一、会使生产、物资交换和货币流通受到损害，并妨碍战争的胜利进行。在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财政收支很难作到完全平衡，所以，发行政策要照顾到战争，照顾到生产，还要照顾到物价的平稳。如因紧张战争不能阻止物价上升，也应当尽量使它平稳上升，避免剧烈波动。这就要求发行工作有一定的计划性，避免集中的突击发行。货币的统一要有步骤地进行。首先是固定几种货币的比价，自由流通，然后根据各地财政状况，掌握各地区的货币发行，使之逐渐走向统一货币的发行。第二个是货币斗争。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努力扩大本币的阵地(流通范围)，压缩蒋币的阵地，并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而调剂蒋币外汇，掌握蒋币比价。用这些办法来巩固本币，打击蒋币，以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应当设立出入口管理委员会或出入口管理局，来统一管理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以及进出口税等。第三个是信贷工作。信贷工作是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作生产贷款，并且要有计划的重点发放，反对平均分配。生产贷款不应当单纯依靠货币发行，要想办法吸收社会游资，组织民间的互相借贷，指导群众利用自己的游资，来解决群众缺乏生产资金的困难。第四个是城市金融工作。着重扶助各种工业的生产和建设，要把发展工业提高到与发展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关于贸易工作。第一个是物价政策。主要任务是平稳物价。发展生产和保障战争供给都要求物价的平稳。在战争环境中，虽然不能把物价完全稳定下来，但经过努力可以使物价缓缓上升，避免波动，并尽可能减少上升的幅度。因此，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有计划地吞吐调剂，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物



价的相对平稳。第二个问题是对外贸易。所谓对外贸易，是指解放区对区外的输出输入贸易。主要任务是推销各种剩余土产，采购各种军用器材、重要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民用的必需品，争取有利交换。对外贸易必需努力争取出超，出超才能争取贸易中的主动地位，有了主动地位才能获得有利交换。所以我们对外贸易，必须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对外贸易必须步调一致，即必须有统一的税种、税率和共同的进出口计划，并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领导。这次会议决定在天津、济南等地外围，分别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中央的领导下，吸收各地代表参加，掌握出入口的方针，商订出入口的共同斗争计划，调解各地区间的出入口纠纷。在天津外围和胶东地区设立统一的采购公司，在中央和当地财办的双重领导下，商讨采购计划，分配采购物资，保证采购任务的完成。第三个问题是内地贸易。主要任务有三：一是调剂供求，平稳物价；二是组织各地区的物资交换，使各解放区结合而成一个整体；三是保障供销，扶助生产发展。关于组织各地区的物资交换，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地区正在组织合并，货币统一无大困难。山东和西北地区的货币尚未统一，还有一定困难，需要设法解决。第四个问题是私营工商业。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除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外，同时还必须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为此，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制、经营自由权及正当的营业利润。同时，还须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在土地改革中慎重处理有关工商业的问题，坚决保护工商业的财产不受侵犯。第二，要改善新解放城市的接收工作。没收官僚资本应有明确界限，且应当由高级党政机关决定。所有蒋政府的财产和四大家族的财产，一律由政府派员托管，并责令原负责人妥为看管，登记交代，严禁破坏、偷盗、窃掠。第三，慎重处理私营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按照劳

资两利原则来调整劳资关系。第四，适当规定工商业税及其征收办法，应使一般工商业者纳税以后仍然有利可图。第五，组织能得到工商业者信任的商会或工商联合会。商会应当是工商业者的组织，同时又是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的桥梁。它向政府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和各种要求，并把政府的政策法令传达下去，协助政府具体执行。

石家庄金融贸易会议是在解放战争顺利发展，我们即将进入大反攻的前夕召开的，是一次继往开来迎接胜利的会议。中央很快批转了会议的综合报告，要求各地区努力实行。

#### （四）

1948年5月23日，周恩来副主席从陕北来到西柏坡，26日毛主席也来了，这里就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驻地。周恩来同志到来以后，我们就向他报告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指华北财经办事处），要搞统一经济”。此后不久，党中央决定取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同志任部长，我任秘书长。财办的几个副主任，杨立三同志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南汉宸同志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准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周恩来同志这时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习惯于在晚间办公，他规定处理财经、后勤工作的时间是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董老年高，晚间早睡，因此由我和杨立三两个按时到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实际上成了周恩来副主席管理经济（主要是战争供给）工作的秘书。不久中央决定把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董老出任人民政府主席，中央财政经济部实际上由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了。

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设在石家庄，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在这以前，华北地区已经统一发行冀南币（原晋冀鲁豫货币），华东地区已经统一发行北海币，这两种货币等价流通。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靠银行透支，因此物价仍然不能稳定。为了保持两种货币的比价，中央决定各地增发货币须经中央批准，并令中财部五天上报一次各地物价情况。到人民币发行后，停止发行地方货币，冀南币、北海币均按100:1兑换人民币。这样，各根据地、解放军的财政开支，就约有半数由中央用人民币供给了。中央令各地区提出1949年的财政收支预算和要求发行人民币的数额，经中央审查决定。

为了审批各地货币发行和财政预算，我们向周副主席报告了在邯郸会议和石家庄会议中所得出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物价与货币发行数量同步增长；各解放区不论货币发行多少和物价高低，每一解放区人口的平均货币流通量都是30斤小米（约合1个银元）。如果货币增加一倍，物价也上升一倍，仍是30斤小米。按照当时生产和生活水平，每100个居民只能养活2个脱产人员，超过此数就要依靠中央发行货币来供应。我们依靠这些规律和数据来审批各地的货币发行和财政预算，大体上做到了公平合理。周副主席对我们说，做经济工作必须懂得经济规律，掌握各种数据，否则肯定要犯错误。

上面谈的关于每100个居民只能养活2个脱产人员的结论，是我们根据财政供给与人民负担的关系计算得出的。按照当时华北解放区的一般状况，农民年平均收入在400斤小米上下，脱产人员的开支约4000斤小米。根据经验，农民负担最高不能超过20%，过此限度生活就很困难。因而脱产人员不能超过2%，这样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1948年8月，蒋管区的物价已经比抗战爆发时上升了150万

倍，于是决定停发法币，改发金元券，每 1 金元券，兑法币 300 万元。在较短一段时间内，蒋管区物价突然稳定而且略有下落，蒋管区报纸大吹物价如何稳定。一天早晨，周副主席（他尚未睡觉）叫我去，要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晚饭后开会讨论。我与中财部的同志共同研究，看出这是由于蒋管区用高于物价指数一倍的价格兑换法币，使货币流通量减少一半，金元券的币值提高一倍，导致物价暂时稳定。蒋管区每月的财政赤字都靠发行纸币来弥补，三个月后纸币发行量增加一倍，物价必将继续上涨。晚间讨论时，周副主席和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都来参加。讨论结束，周副主席作结论，同意我们的意见，估计蒋管区物价至多只能稳定三个月，并叫新华社按此精神发表评论。结果蒋币只稳定了两个半月，物价就开始不断猛涨，说明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这时周副主席特别重视货币问题，因为不但蒋区的军费开支绝大部分靠增发货币，我区也不能不部分地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人民币发行以后，地方货币停止发行，各地的公粮、税收等都由地方掌握，中央唯一能够支配的是人民币。周副主席亲自掌握人民币的发行权，以此来公平合理地支援各野战军和地方的需要。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同志立即进城接收国民党的金融机构，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周副主席命我于 2 月 2 日赶赴北平，先见南汉宸，协助清查印钞票所需要的凹版机和纸张，计算印刷能力；同时按他的指示去见已先来北平的陈云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 10% 计算。陈云同志说，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按每月上涨 20% 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 30%，并依此安排人民币的印制计划。当时人民币的

最大票面额已为 50 元和 100 元,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准备印制 500 和 1000 元的人民币, 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

我回西柏坡后, 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 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将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由陈云同志任主任。周恩来同志的工作作风向来是认真细致, 根据我所提供的印钞能力, 来具体地规划什么时候开始印制 500—1000 元的大票面额人民币, 各种票面额的印制比例, 以便既满足战争需要, 又不过分刺激物价。我们从晚 10 时工作到次日晨 6 时, 画出各种面额人民币印制进度表, 立即电告南汉宸同志。此后, 周副主席不但决定人民币的印制, 更重要的是由他决定人民币的分配。

周副主席对我们的态度和蔼可亲, 但要求是很严格的, 任何一件事情在决定前都要详细询问, 要我们提出建议, 由他来做决定, 再由我们起草文电, 由他批发, 一天也不能耽误。为着立即答复他的问题, 我把重要事件和数据抄在一个小本子上, 随身携带, 以便随时答复他提出来的问题。

在这同时, 刘少奇同志也常找我去谈经济政策问题, 特别是合作社问题。2 月 8 日, 我请刘少奇同志为中财部的干部(也有其它单位的干部参加)作《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报告除谈了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 特别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外, 还详细地谈了合作社的问题, 这是从我国当时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 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应当互相结合, 建立同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领导小农经济比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困难得多。我国可以用供销合作社把小农经济团结在国营经济的周围, 确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

1949 年 3 月 7 日开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以后,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就由西柏坡村

迁往北平，住在香山。我与中财部的同志也进入北平，住香山慈幼院。这时周副主席的工作更忙，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了，但他一有空就找我去问经济工作情况。不久由陈云同志领导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在东交民巷找到一个办公室，我随即入城办公。这时，陈云同志又调来了曹菊如、钱之光二同志参加工作。这年 7 月 12 日，中财委搬到朝阳门内一个大四合院（九爷府）办公，除原在香山的中财部的干部外，宋劭文、周荣鑫同志等华北财委的干部也并入中财委。中财委搬进九爷府不几天，陈云同志就带领钱之光、宋劭文、曹菊如和秘书周太和等同志去刚解放不久的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帮助上海解决恢复生产、保证供应、稳定物价等困难；同时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方案。会议从 7 月 27 日开始，8 月 15 日结束，历时 20 天。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的重要讲话和《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总结。这是建国前夕中央召开的一次极重要的全国财经会议。会议既具体研究了克服当年财经困难的办法，也讨论了如何争取 1950 年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同时，决定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若干具体措施，如组织全国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土产公司由中财委直接领导，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统一管理税目、税率和食盐分销等等。这次会议实际上为 1950 年 3 月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为 1950 年全国财经状况的基本好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属于党中央军委领导；成立之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即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下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们习惯仍称中财委。当时中财委主任是陈云同志，薄一波、马寅初同志任副主

任，我任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长，周荣鑫同志任副秘书长，宋劭文同志任计划局长。从此，中财委的工作进入了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新阶段，并很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全国财经工作由分散走向统一

### ——回忆建国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

杨 波

薛暮桥、戎子和、宋劭文、李人俊几位过去在几大解放区作财经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倡议，把全国解放前夕中央决定召开的两次带全国性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财经工作会议——华北财经会议和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有关资料收集整理起来，同时请一部分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老同志写些回忆文稿，作为历史资料编印成册，以供研究新中国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参考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华北财经会议（亦称邯郸会议），是 1947 年 3—5 月间在邯郸中央局（即原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冶陶镇召开的。当时我作为以薛暮桥同志为团长的华东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亦称石家庄会议），是 1948 年 4 月在石家庄市召开的。这时我已由山东调到新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是作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的。我有幸参加这两次重要的会议，直接听取了几大解放区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各自地区的财经工作情况和经验，并参加讨论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如何逐步由分散走向统一，以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财经工作的



统一做一些必要准备等问题。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受益匪浅。现在，我又受薛暮桥同志的委托，参加这两次会议文件的编辑工作，重新阅读了全部会议文件和有关报告，阅读了各位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稿。古语说“温故而知新”，是很有道理的。我通过这一段的工作，更加感受到这两次会议的重要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感受到把这两次会议的有关文件编印出来，流传后世，确实很有必要，很有意义。重温历史，就会知道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就会知道新中国财经工作统一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从而更加珍惜我们的胜利成果，珍惜和发展我们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大家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十多年战争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盛行、市场波动的严峻形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能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能不能很快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尽快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稳定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存有疑虑的。陈云同志当时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见《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60—61页）。当时上海的资本家就说过：“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不相信我们能管好财经工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说什么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治天下，断定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

在摇篮里。但事实很快就证明，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能够治天下；不但军事上、政治上合格的，财政经济方面也是胜任的，是能够管好这个国家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即到 1950 年 3 月，我们就实行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从而很快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打击了投机倒把，稳定了市场物价。如以 1950 年 3 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 100，当年 12 月为 85.4，1951 年 12 月为 92.4，1952 年 12 月为 92.6。这就是说，从 1950 年 3 月开始贯彻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的物价不但没有再上涨，而且略有下降，1950 年至 1952 年三年中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不断扩大，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到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全国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或者超过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产量。1952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3278 亿斤，比全国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增加 278 亿斤，增长 9.3%；棉花产量达到 2608 万担，增加 910 万担，增长 53.6%；煤炭产量达到 6600 万吨，增加 400 万吨，增长 6.5%；发电量达到 73 亿度，增加 13 亿度，增长 21.7%；钢产量达到 135 万吨，增加 42.7 万吨，增长 46.3%；棉纱产量达到 65.6 万吨，增加 21.1 万吨，增长 47.4%；棉布产量达到了 8.3 亿米，增加 10.4 亿米，增长 37.3%。工农业总产值比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份增长了 20%。

我们用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制止了延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用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治理了

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百废待举的烂摊子，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开始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普遍称赞。原来对人民政府能否管好经济抱有怀疑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存有某些偏见，承认共产党不但勇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我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也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是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怎么来的？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吗？仔细看看这里汇集的邯郸会议和石家庄会议的文件，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就不难作出正确的回答。事实上，这两次会议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为迎接全国胜利后的财经工作作了必要的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邯郸会议召开的时候，正是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为挽救其垂死统治，采取集中兵力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进行所谓重点进攻的时候，是我华东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英勇反击取得初战胜利的时候，也是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积极准备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强渡黄河，挺进中原，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统治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华东代表团二月初从临沂地区出发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正几路并进、日夜兼程地向泰安方向集中，准备进行莱芜战役。我们到达开会地点后，莱芜战役全歼国民党李仙洲部 56000 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员李仙洲的胜利捷报已到处频传。时隔不久，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于 3 月 25 日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全歼胡宗南部整编 27 师 31 旅一个团的 2900 多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主动撤出延安以后西北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仗。山东战场和陕北战场反击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也

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感受到集中精力、从全局着眼开好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是党中央根据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决定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交流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经验，讨论解放区的生产、财政、金融、贸易工作及有关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统一步调，集中力量保障战争供给，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大兵团作战，保证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邯郸中央局的精心组织，周到安排下，会议后期董必武同志又亲自到会，进行具体指导，使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经过与会同志交流经验，充分讨论，团结合作，集思广益，最后一致通过了会议决议和向中央汇报的《综合报告》。会议明确提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为此，认真研究了经过八年抗战和一年自卫战争后，解放区人民的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要支持长期战争，夺取最后胜利，最低限度需要养多少兵？一个士兵的生活，需要保证多高的水平才能维持？会议根据各解放区介绍的情况和有关资料研究，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 10—15%；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 1—1.5% 一个士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 16 石左右。这三个比例关系，是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以后的财经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要支援战争，就必须发展生产，培养财源。会议深入讨论了如何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指出必须动员巨大力量来支持战争，同时又须保留必要的力量来发展生产，要把战争和生产很好结合起来，以战争来保护生产，以生产来支持战争。必须继续扶助群众生产，从发展经济中来保障供给。财政工作方面，会议要求要掌握“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

方针。要努力开源节流，既要保证战争供给，又不致于过分加重人民负担，更不致于妨碍生产发展。要争取财政收支的相当平衡，尽可能减少财政发行。要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棉布等重要物资，调节市场供求，保持物价的相当稳定。《综合报告》还详细论述了我们的生产建设方针以及贸易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三者组成，指出国营经济应在金融事业、对外贸易、交通事业和重工业生产中占领导地位。国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要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正当利益，取消对贸易自由的各种不必要的限制。会议决议最后提出，鉴于各解放区大多已联成一片，人民、物资交流，军队跨地区机动作战，以及贸易地区间需要适当调剂，均要求华北地区财政经济工作能做到适当的集中统一。一致要求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统一的财经机关，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斗争，调剂贫富有无，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供给标准，统一计划掌握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各种货币兑换比率，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

党中央于 1947 年 10 月 24 日正式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议和《综合报告》，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各地应即坚决执行。同时，决定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任命董必武同志担任主任，并要各解放区各派一名代表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邯郸会议召开前，党中央对整个战争形势的估计，是要求作长期打算，准备打三年到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战局的发展比原来预料的要快、要好。毛主席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

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483 页。）刘邓大军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8 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8 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以后，主力部队于 8 月初挺进鲁西南，9 月下旬进入豫皖苏地区。西北野战军也于 8 月下旬转入反攻。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后勤供应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在董必武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在保证战争供应，协调各解放区的财经、金融、贸易关系，加强兵工、交通建设，以及筹建中央银行、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等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适应形势飞速发展的要求，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研究部署新的任务，华北财经办事处经中央批准，于 1948 年 4 月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会议由董必武同志主持，总结了邯郸会议后一年来的财经工作，肯定成绩，指出不足，着重讨论了进一步做好支援解放战争，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以及相关的金融贸易问题。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建设华北，支援前线，明确提出今后的中心工作，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支援战争；而无力量支援战争，又基本上决定于生产的发展程度。因此，要求金融贸易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并相应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为便于各解放区的物资、贸易往来，会议确定了各地区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价，并准许自由兑换。同时，建议逐步做到发行统一的货币。会议就城市的金融工作、内外贸易、私营工商业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货币政策、货币斗争、信贷工作、物价政策以及改善新解放城市的接收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会

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规定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会议的综合报告，党中央很快就批转各地遵照执行。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随着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以进一步加强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同时，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 1948 年 12 月 1 日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并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这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快实施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邯郸会议和石家庄会议，既为集中力量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逐步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财经政策，克服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状况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为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还应指出，我们接收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财经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政策明确，工作有序，成效显著，也是同这两次会议、特别是石家庄会议所作的思想上、政策上的比较充分的准备分不开的。这两次财经会议的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应当在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中占有应有的位置，并且应当给以科学的论述。

## 华北财经会议的前前后后

李 海

1947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大反攻的时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即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并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除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代表以外，还有华东、晋绥、陕甘宁、中原解放区的代表。这是一次带全国性的重要的财经会议，是为大反攻作准备的财经会议，也是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统一的财经工作作准备的重要会议。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构架雏型，从此一步步地逐渐形成。这次会议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附近武安县的冶陶镇召开，所以大家也称为“邯郸会议”或“冶陶会议”。现在根据已有的资料和有关同志的回忆，将这次会议的情况简要介绍于后，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 （一）

1947年1月，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到中央给各解放区负责同志的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内容是：晋察冀中央局提议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电转告各区。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所有解放区的财经



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认为应立即召集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并由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在会议中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长期性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参加会议者,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区的财经供给机关最好都有负责代表。会议日期由邯郸中央局根据筹备情况电各中央局决定。

接着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财委、边区政府财办负责展开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首先决定在冶陶小学组成华北财经会议筹备处,调配人员进行具体的食宿和会务安排,然后商定会议于3月10日召开,会期约一个月;前半个月各解放区介绍情况,交流经验,3月25日正式开会,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后形成文件报告中央。同时决定,由边区政府财办负责组织有关财经部门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太岳区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起草晋冀鲁豫边区向华北财经会议提出的报告和财经资料。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财办1月18日开了一次会,作了原则部署,要求太行、冀南、冀鲁豫、太岳都作总结的准备工作,2月20日带材料来讨论;边区政府各财经领导单位也作总结准备,2月20日以后共同研究提出向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材料。1月23日边区政府财办再次开会讨论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有杨立三、戎伍胜(戎子和)、刘岱峰、胡景运、徐达本等同志。杨立三同志提出从三个方面作准备:一是总结交流财经工作经验,趁此机会把边区八年抗战和一年自卫战争的财经工作经验认真总结一下,统一内

部认识，提高思想水平，提交华北财经会议同兄弟解放区交流；二是总结统一货币、贸易的经验，也可以将货币与贸易分开准备，货币方面包括货币发行和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方面包括市场物价管理和进出口贸易对敌斗争；三是统一财政工作的经验，这在去年庞村会议时已经总结过了，再结合目前的情况和要求，整理补充一下内容。大家意见还要补充总结农业、工业生产方面的经验，执行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指示的经验。接着作了初步分工：刘岱峰同志负责贸易物价，胡景沅同志负责货币发行，戎伍胜同志负责财政，范若一同志负责农业，徐达本同志负责工业。关于总结材料的要求，大家讨论有五点：第一，总结要全面，成功的不成功的都要讲；第二，交流经验和邻区关系处理中对的、不对的都讲，摆出矛盾来，准备吃亏，帮助人家要有精神准备；第三，多作自我批评，少去批评人家；第四，自己少说，让人家多说；第五，不必主动地给人家送材料小册子，人家要时再给。

2月23日边区政府财办第三次开会，研究提交华北财经会议的材料和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杨立三、戎伍胜、胡景沅、陈希云、刘岱峰、邓肇祥、范若一、吴作民等八人。胡景沅同志讲货币问题，内容有四个：一是货币斗争，二是货币发行，三是生产贷款（即农村贷款），四是信用社工作。刘岱峰同志讲贸易问题，内容也有四个：一是对外贸易和外汇统一管理，二是专卖问题，三是经营任务问题，四是掌握物价问题。戎伍胜同志讲财政问题，内容基本上是庞村会议总结过的那些，加了这几年统一财政的经验，内容有：粮价折合问题，内地贸易自由及进出口烟酒税统一税率问题，税收改革问题，工厂工人、公营商业、合作社、副业的负担问题，整理村财政和战勤问题。范若一同志讲生产问题，内容有：合作社问题，副业手工业问题，生产领导问题。吴作民同志就太行情况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各区贸易封锁问题，二是发展工

商业与发展私人资本问题，三是边区工业与太行工业关系问题，即与地方和群众关系问题。最后，杨立三同志讲了三点意见：第一，所提材料，对内要统一，要互相联系；第二，对内统一还有几个具体问题要注意，一是统一对外采购，二是贸易物资来往，三是货币汇兑，四是税务问题，五是救济物资分配问题，六是邮政航政问题；第三，根据大家所提意见分头再作准备，写出文字材料后再讨论。

这次会后财办又开过几次会反复进行研究，最后定稿并报中央局同意，于三月中提交大会，并分别由戎伍胜、刘岱峰、胡景沄、李一清等同志向大会作了发言。太行、冀南、冀鲁豫、太岳区负责同志也向大会作了专题发言。会后，边区政府将这份总结报告编入《华北财经会议文献》中，发给了有关同志。

## （二）

参加华北财经会议的各解放区代表，3月上旬陆续到达武安县冶陶镇。晋察冀的代表团团长是新从陕甘宁边区调到晋察冀任边委会财政处长的南汉宸同志，代表有栗再温、李敏三、安志诚、王文波、贾一波、李冠慈、杨文汉等同志，列席的有何法章、于寿康、罗抱一、曾凌、尚明、周伯易、刘士远、周健、宋人怀、王雨时、尹承伯、李建华等同志。华东的代表团团长是薛暮桥同志，代表有吕镜符、牟跃东同志，列席的有谭伟、王海丰、许焰、杨波、张应举等同志。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杨立三同志，副团长戎伍胜同志，代表有王任重、李一清、吴作民、裴丽生、华夫等同志，列席的有刘岱峰、郭今吾、胡景沄、陈希云、徐达本、刘济荪、范若一、国玉成、武竞天、赖际发、何幼奇、张廉方、林海云、姚国桐、谭映月、邓肇祥、李友三、张茂甫、韩佩琦、姬

德明等同志。

会议开始以后陆续到达的有：陕甘宁边区的白如冰同志，晋绥边区的陈希云、张烈同志，中原区的刘子久、刘子厚同志，还有从延安来参加会议的准备以后在华北财办工作的黄松龄、吕克等同志。

按照中央指示，会议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召开。由于当时刘、邓首长率大军在冀鲁豫作战，不在邯郸，会议即由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同志主持，杨秀峰等几位边区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经过同各区同志商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从3月10日起到24日止，为预备会议，由各区作情况介绍，相互了解，交流经验，提出问题；第二阶段从3月25日起正式开会，预计到4月中旬结束，并起草向中央的报告，经会议通过后正式报告中央。大会的生活问题统由晋冀鲁豫边区财办负责安排。

这次华北财经会议，人数众多，代表地域广阔，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不但对晋冀鲁豫边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对各解放区来说也是空前的重大盛会。大家都十分重视，希望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薄一波、滕代远、杨秀峰等同志于开会的前一天（3月9日），专门召集本边区有关同志开了一个准备会议，交待大家应当注意的事项，作好东道主，保证开好这个大会。根据现有资料，准备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薄一波同志说，这次财经会议，除东北区外各解放区都来了，他们都很有经验，要向他们学习。过去相互都有些矛盾，晋察冀、山东和我们就有经济矛盾，其实各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开好这个会议。

滕代远同志说，现在山东正在打仗，我们区比较适中，所以中央决定在这里开会。去年我们的财经会议（庞村会议）解决了许多问题，中央将我们的报告转发给各区。这次会议规模很大，对

大家是个学习的好机会，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自我批评精神，好好向各区同志们学习。冀鲁豫过去抵制山东的盐，冀南军区扣冀中订购的煤，后来赔了 800 万元。我们的出口，向南依靠山东，向北必须依靠晋察冀，应当搞好关系。西北与晋绥是近邻，有必要相互支持，搞好关系。各区都有八、九年的经济建设经验，相互交流起来很有好处。山东 3000 万人口养 90 万脱产人员，达到了顶点，很不容易。这些问题很值得好好研究。会外要多利用时间和他们接近，在政策上和具体问题上进行交流，对我们，对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个提高。薛暮桥同志是山东的建设厅长，是经济学家，南汉宸同志干过很久财经工作，很有经验，我们应当虚心向各区来的同志学习。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达到中央所期望的会议目的。各区都派了很重要的干部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要把会议的工作做好，做出贡献。

杨秀峰同志说，要准备好向大会报告的材料，我的意见，第一，内部意见要统一；第二，交流经验；第三，如何统一对敌经济斗争。对别的区，我们第一，要多作自我批评；第二，要准备让步，吃亏；第三，经验介绍要谦逊，应先听人家讲，多向人家学习。正式开会前大家谈问题，正式开会后各区介绍经验，最后大家讨论解决问题。各区都说区内统一财经好搞，问题是究竟如何搞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会议的最大成就。

在这次准备会议上，还决定了边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布置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要求作好服务，组织好记录，准备每天将会议情况电报中央，请求指示。大会主席团的组成，待与各区商量后再定。总起来看，这次准备会议很重要，分析了情况，提出了问题，明确了方向，统一了思想，为开好这次华北财经会议铺平了道路。

## (三)

3月10日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分别由各区代表介绍各自的财经工作情况。薛暮桥同志介绍山东的情况，杨立三同志介绍晋冀鲁豫的情况，晋察冀边区财办秘书长安志诚同志介绍晋察冀的情况，冀中贸易公司经理王文波同志专门介绍了冀中的进出口贸易情况。此后，在会议进行中，华东的吕镜符、牟跃东，晋察冀的栗再温、杨文汉、周伯易，晋冀鲁豫的刘岱峰、林海云、李一清、何幼奇、李友三 etc 同志都作了补充发言，介绍了许多具体情况。接着会议分组讨论金融、贸易、财政、生产等专题，有更多的同志发言，更加具体地说明情况和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建议。

3月25日华北财经会议正式开幕。会议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有：薄一波、杨立三、戎伍胜、南汉宸、栗再温、薛暮桥(西北、中原的代表还未到)。大会秘书长陶希晋、范若一。薄一波首先致开幕词，他说：恰好昨天中央来电报，肯定了我们前一阶段用介绍情况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好的，指示我们除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外，应对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多想办法。另外对我军新到一地如何就地解决粮款供应问题也应研究一些办法。接着他说前几天中央撤出延安是有计划的撤退，吸引蒋军到陕北，各解放区便可以集中兵力打大仗，打胜仗。4月是个关键时刻，估计要连续打两个月的仗。要搞好土地改革，搞好生产，扩充兵源，克服财政困难，搞好供给，支持战争胜利。前一阶段会议交流了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有成绩，下一阶段大家要研究解决问题。我看今天不是谁找谁的便宜问题，而是要准备吃点亏，只有吃点亏才能使整个解放区有利。因此，应当加强统一，互相支持，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的胜利。南汉宸同志接着讲，我们已经一天比一

天互相了解了，能够逐渐为友邻地区想问题，这是个进步。今天各地区还没有联合起来，但联合是趋势。要逐渐加强统一，但还要有一定的自主。现在各解放区内部已经联合统一起来了，今天我们要研究的是各大解放区的更大范围的联合统一问题。中央对我们这次会议希望很大，不仅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还要研究将来的不少大问题，因此要把圈子放大一些，眼光放远一些，大家好好研究解决些大问题。戎伍胜也在会上发了言，提出了两个不好解决但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自由贸易与地区生产的矛盾问题，比如山东的盐、冀中的棉、二是战争供给、群众负担与财政困难问题。解决这些矛盾，最好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统一指挥才行。关于过去我区 and 各区发生的问题，是我们自我批评不够，没有很好解决，今后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认真去做，问题是会解决的。

3月26日开始，各大区正式向大会作报告，系统介绍经验。华东由薛暮桥同志讲；晋察冀由南汉宸同志讲；晋冀鲁豫分别由几个人讲，刘岱峰同志讲贸易问题，戎伍胜同志讲财政问题，李一清同志讲农业生产问题，胡景运同志讲金融货币问题，徐达本同志讲工业生产问题。栗再温同志还专门介绍了张家口的情况。4月初，陕甘宁、晋绥、中原解放区的代表先后到达冶陶。刘子久同志报告了中原区情况，陈希云同志报告了晋绥情况，陕甘宁的情况因南汉宸同志比较熟悉，也由他来介绍。4月14日大会开始讨论问题。薄一波同志就即将讨论的问题作了发言。他提出两点：第一，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目前我们正处在空前规模战争的时候，摆着150万军队，打的是现代化战争，而且是以我们的150万兵力决心在三五年内打败蒋介石200万军队，可想而知我们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既然下决心争取胜利，今天就应该拿出一切力量来支援战争，准备克服困难，用三五年的努力打败蒋介石。这场

战争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比赛克服困难，困难克服了就是胜利。我们现在的矛盾是以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加上手工业经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的运动战，如何取得胜利是个大课题。所以，今天财经工作的建设，首先应解决如何供应战争，因为只有打了胜仗才有其他工作可谈。我们应当把养兵的最小限度和人民的最高负担限度作很好研究。待遇标准要求有个中等水平。还应研究三年财经建设计划，把一系列的东西都研究好。这也就是党目前的方针任务——打败蒋介石，我们要为完成这个总任务而努力。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建设。在目前这种环境条件下，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土地更分散的情况下如何建设？土地改革后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必须认识，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性质，不管形式上怎样、成立不成立中央政府，实质上就是这样，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独立的。因此，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应从独立方面着眼，财经体系也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把以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既照顾了现在又照顾了将来，请大家讨论。

在一个多月会议期间，大家严肃认真，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地摆情况、讲问题，交流思想，检讨缺点，互相了解，共商统一财经大事，气氛十分热烈，一派团结战斗景象。大会所提供的材料和议论的问题十分丰富和新鲜。晋冀鲁豫中央局及时将会议的进行情况报告中央，让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会议进程，其中 4 月 25 日的第 18 号电报，中央还专门作了批示。这份 18 号电报的大意是：（1）财经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准备产生一个决定，已经起出草来，从保证长期战争供给及土地改革与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方面出发，基本上要争取独立自主，完全不依靠的，而且是与美蒋斗争的经济体系。根据十年来的经验，提出财政经济各种不同政策，如财政、华北人民负担政策、整理村财政、财务行政、开



源节流、贸易、税收、金融、货币等均有详细规定，正在讨论中。

(2) 大家根据长期战争供给的观点，拟建议将银行发行、各区脱离生产人数、人民负担标准及可以调剂贫富的几种统税、专卖收益归中央，以便中央斟酌各区财经情况，适时给予指导，又能机动调剂贫富，如补助晋绥、陕北或其他临时开支。

(3) 各区相互关系亦进入解决阶段。办法：自行提出困难和要求，由大会研讨解决办法。如晋绥、陕北提出 70 万匹布、150 万斤棉花，大会认为这数小得很，由太行、北岳完全负担起来，用货换或干脆帮助均可。中央 5 月 4 日的批示电报大意是：(1) 同意你们产生一个正式决定，确定各区财经共同方针和各种政策。今后各区银行发行数，各区脱离生产人员比例，人民负担标准，各区贫富间的调剂等，可由中国解放区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下去统一计划和规定。(2) 由财经办事处直接管理几种统税和专卖收益来调剂贫富区域为好，还是只由财办处统一筹划指定富足区域来协助贫弱区域更为便利，这两种方式尚望再加考虑提出意见。(3) 决议文字和调剂办法望电告。董老不久可到你处，如来得及，最好待他到达后再作最后决定。各战略区应派办事处代表(副主任)，尚未得知各区电告，你们也可考虑应有哪些人参加才便于今后工作，并电告我们及各区，以便作最后决定交由你们通过。这个电报向大会传达后，大家的思想更加明确，积极进行大会的综合报告和决议的起草工作。

#### (四)

华北财经会议的综合报告草稿，几经讨论最后确定下来了，并经主席团会议通过作为起草会议决议时的依据。就在这个时候，董必武同志来到邯郸，他是受中央委派来领导即将成立的华北财经

办事处的。董老看了综合报告后认为太长了，指示起草向中央报告的大会决议要短小精干，以便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于是，会议又着手起草会议决议，6月5日正式报告中央。中央于1947年10月24日批准了这个《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加批语转发各解放区，中央的批示内容主要是：

第一，中央审查《华北财经会议决议草案》和研究这次会议中各种报告材料之后，认为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经验，并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会议是开得好的。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机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第二，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时，认为必须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的存在。许多地方对于发展农业（包括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合作事业，提倡解放区缺少但有可能自己生产和推广的各种生产（如植棉、种蓝…）等，尚缺乏认真的坚决贯彻到底的精神。财经机关在贸易、金融、财政等政策上，对于如何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缺少注意，或者是注意得不够，这就不可能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目的。这种情形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并努力加以改进。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了支援前线工作之外（要注意节约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问题的观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

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第三，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决定，传达财经会议决议，配合当地情形，具体检讨和布置今后的工作。

在我党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华北财经会议，可以说是第一次带全国性的财经会议，圆满地胜利地结束了，统一全国的财经工作从此揭开了序幕，开始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 （五）

华北财经会议之后，在金秋十月，遵照中央指示，由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正式成立，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在华北财办的领导下展开了新的一页。新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是董必武同志，副主任有杨立三、南汉宸、薛暮桥、汤平等同志，并从各解放区调来一些同志参加该处的工作。当时，华北财办在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夹峪村办公。

华北财办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各解放区财经统一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例如，拟定了军队供给标准的初步意见和1948年生产工作建议；1947年底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的交通工作会议和军工生产会议；1948年5月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组织研究统一金融货币工作，由南汉宸负责筹备建立解放区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各区财政工作，调剂物资，相互支援；实行各区货币固定比价，自由流通，统一安排货币发行，等等，都是为实施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要步骤。各解放区都认真执行了华北财经会议和华北财办的各项指示和决定，拨出大量的布匹、棉花支援了晋绥和陕北，大力支援了野战兵团作战的后勤供给，还以财力、物力大力支援了中原解放区。并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大力开展农业、工业、手工业、副业的生产运动，开源节

流，壮大财政力量，扩大贸易市场，倾全力支持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据中央指示，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行政上统一了华北的财经工作。新的更大规模的财政经济工作开始了，进一步对人民解放军向蒋管区的进军给予了财政经济上的全力支援。从此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革命战争的胜利，迅速取得了全国的解放，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晋察冀中央局建议召开华北 经济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1946 年 12 月 30 日)

甲、我们建议召开华北经济会议，理由：

(一) 因平汉、同蒲、津蒲均不通，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区均在冀中采购大批物资，因此，必须统一。

(二) 各区出产不同，必须互相交流，但各区互相征税，不能畅通。

(三) 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

(四) 统一对付国民党。

乙、日期在 1947 年 2 月 1 日，地点以冀中比较适中。

## 中央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

(1947年1月3日)

晋察冀中央局提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电转告各区。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认为应立即召开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并由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在会议中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参加会议者，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区的财经供给机关最好都有负责代表。会议日期由邯郸中央局根据筹备情况电商各中央局决定。

## 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 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

(1947年10月24日)

(一) 中央审查《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草案》和研究该次会议中各种报告材料之后，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且已经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机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二) 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认为必须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尚相当普遍的存在（晋冀鲁豫的情形要好一些），因此，许多地方对于发展农业（包括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合作事业，提倡解放区缺少但有可能自己出产和推广的各种生产（如植棉、种蓝等）等，尚缺乏认真的坚持的贯彻到底的精神。财经机关在贸易、金融、财政等政策上，对于如何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缺少注意，或者是注意得不够，这就不可能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种情形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并努力加以改进。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开支援前线工作之外（要注意节用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他日

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的观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三）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应即坚决实行。各级党委和财经机关应当讨论、传达财经会议决议（参考该会议中的综合报告及各区报告中许多很好的经验），配合当地情形，具体检讨和布置今后的工作。明年的农业生产运动，今冬就当计划和着手进行。



## 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

(1947年6月5日)

中央指示我党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这个反攻是长期的，中间还可能发生某些曲折，不论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要长期打算。因此，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抗战期间，我各解放区在财政工作上即存在有：必须大量养兵，必须保障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准和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基本矛盾。自卫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分散的落后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交通不便与比较近代化的大兵团作战间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必须适当解决，始能支持长期战争。

人民负担能力在八年抗战、一年自卫战争后，究有多大，能支持多久？为了支持长期自卫战争，争取最后胜利，最低限度究竟需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一个士兵的生活标准，究应有多高始能维持？会议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 15—20%；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 1—1.5%；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 16 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其次，应估计到在长期战争中，我解放区某些部分可能暂时沦陷，并受严重摧残，某些地区还可能遭遇灾荒以及黄河泛滥。反攻开始后，我必须支付更多的人力、物力。凡此种种，均会加重我之困难，必须有计划的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过去我各解放区财经建设已有相当基础，人民生产发展，已积蓄了相当多的力量，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土地改革后几千万翻身农民，热烈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这又是我财经工作有利条件。只要军民团结，各解放区团结，共同斗争，一定能克服困难，赢得胜利。会议研究过去经验，目前情况，专作如下决定：

（一）经济建设必须奖励土货，抵制美蒋货，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实行保护政策。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争取自给自足。为着提高生产力，应当改造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奖励互助合作，组织变工组和合作社，扶助群众生产，发展农村副业。土地改革后，更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发家，发放大量贷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缺乏生产资金的困难，调剂耕畜农具，保证生产品的销路。公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公私兼顾，照顾群众利益，照顾社会经济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应使之得到发展的机会，保障其营业和赢利的自由。

（二）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只要保证了部队的必要供给（衣服、粮食、菜金、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及炮兵、工兵的建设费用）及必要的生产建设费用，就算是完成了财政任务。其它工作可不办的不办，可缓办的缓办，降低生活待遇，提倡艰苦奋斗。反对“仁政”观点，也反对铺张门面百废俱兴，以至无限制的加重人民负担。必须拿出已有积蓄，放手使用力量，又必须作长期打算，要从发展经济中去保障战争供给。财政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而必须从一万万九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民富即国富，这是我们与国民党不同之点。

（三）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在战争期间，部队可占脱离生产总人数的  $\frac{3}{4}$ ，地方占  $\frac{1}{4}$ 。军费开支可占财政开支总数的 85%，地方费占 15%。部队要精简后方机

关人员，充实前方，保证野战总队要占部队总人数的 1/2 到 2/3（能集中起来机动作战的）。地方机关和军队后方机关，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

提倡科学的精确的合理计算，细心审核预算决算，核实人数，消灭虚报重领等浪费现象，严格财粮制度，反对漠视制度一切机动处理的有害观点。供给标准，部队高于地方，前方高于后方，野战军高于地方军。后方应特别提倡艰苦奋斗，一切为了前线，向农民生活看齐，切戒继承地主或蹈袭资产阶级的生活。

（四）开源。取之于民者，应改进公粮、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必须改善粮食的征收、保管、运输、调剂工作，反对重财轻粮。负担政策，应扩大征收面，减少累进率，照顾农民生活，不要伤害农民生产情绪，税收工作与对敌经济斗争，管理贸易和奖励生产相结合，做到既保证财政收入，又刺激经济发展。

取之于己者，机关部队生产，应以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为主。反对投机贸易，取消机关部队的商店，归工商管理局统一经营。过去有些机关部队，积累了相当大的资产，应鼓励其捐输归公，支援前线，以减轻人民负担。

取之于敌者，战争缴获物资归公，除武器弹药由部队自己管理（多余部分仍应互相调剂）外，其它如粮食、布棉、金银、货币等，均应交公作为财政收入，严禁私自扣留和破坏行为。出击部队，就地取粮，实现“我们的后方是在前线”的口号。

（五）整理村财政。目前村财政无制度，浪费惊人，必须加以整理，整理村财政，节约开支，应成为村干部为人民立功内容之一。整理办法，最好由政府统一规定，收支标准，由村民民主评议，经区公所核准，自筹自支，并按期结算帐目，送上级审查公布。村财政负担，要求做到每人每年不超过小米 6 斤。整理公产、公款，投资合作生产，以其收益，补助村财政。

(六)调整战勤。由于几年来参军参战,农村劳动力已感缺乏,自卫战争开始后,战勤更加频繁,且有严重浪费现象,如不能尽量节省民力,必致影响生产,因此,要求战斗部队精确计算,科学使用民力,做到平时不超过三兵一夫,战时不超过一兵一夫。支用民夫应有严格制度,除抬送伤病员和运输粮食、弹药等战争必须者外,其它当严厉禁止。战勤负担面,要力求扩大,做到公平合理。改善民兵、民夫的管理工作,建立战勤组织制度,使战勤与生产相结合,与劳动互助、优抗代耕、大变工,实行按期计工算帐办法,要统筹计划,实行村区县大调剂,全区大调剂。

(七)贸易和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对内调剂供求,扶助生产发展。为此,必须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奢侈品消耗品,及妨害我生产发展者应禁止输入),争取进出口平衡或出超。必须改善交通运输工作,组织群众运输。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为此,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我的影响,必须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

为促进群众生产顺利发展,还应采用各种方法来便利土产运销,调剂农村信用。在合作社发展的地区,应即贷款发展运销和信用合作社,组织合作社的联合运销。银行和贸易公司,必须扶助这些合作事业,使之健全发展。

(八)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出击部队的粮食等供给,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借,不应单靠后方补给。新解放区人民(尤其地主富商),也须担负战争供给,反对“仁政”观点,反对“抓一把”的做法。蒋政府的公产和汉奸恶霸财产的接收没收,须有纪律有组织的进行,避免破坏及浪费。有步骤的发行本币,收兑和排挤蒋币。新解放区的奢侈品消耗品不得没收或补税,应当加以

登记管理。逐渐改造市场，使为人民及生产服务。为着保证部队供给，管理接收没收资财，掌握金融货币贸易工作，应当组织财经工作队随军行动，掌握政策指导工作，避免混乱现象。

（九）组织领导。鉴于各解放区多已联成一片，人民物资交流，军队机动作战，和贫富区适当调剂，均要求我华北财政经济做到适当的集中统一。同时又鉴于各区财经工作发展不平衡，交通不便等关系，在集中统一下，又应有很大的机动处理权。会议本此原则，一致要求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统一的财经机关，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敌经济斗争，调剂贫富有无，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供给标准，统一计划掌握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各种货币兑换比率，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其它具体工作则完全由各地机动处理。

各解放区间的货币贸易关系，应即进行适当调整，便利人民物资交流，使我对敌经济斗争力量加强，步调一致。会议决定，邻区物资交流，应与内地贸易采取同样政策（通过敌人封锁时，须有适当措施以免走私偷税），进口出口采用一道税制，邻区已征税的不再重征，各区货币应互相支持，便利兑换，帮助邻区采购必须外货，推销剩余土产，互相调剂，减少对蒋占区的依赖。

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必将更加繁重和困难，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键。建议各级党委亲自掌握财经工作，动员全党全军及群众力量，共同努力渡过目前严重困难，并把我们的财经工作提高一步。

## 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综合报告

(本报告经主席团通过，作为研究决定时之参考材料)

### 第一部分 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它支持了八年抗战和将近一年的爱国自卫战争；它发展了群众的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这些年月中，我们经历着无数艰难困苦，但终于依靠我们自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克服了困难，积蓄了力量，赢得了胜利，并培养了许多干部，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成为今后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

今天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时期：空前大规模的爱国自卫战争经过 10 个月的艰苦奋斗，即将转入全面反攻；土地改革已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有些地区且已大体完成，农村经济正发生根本变化。全国性的民主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之下，仍将顽强挣扎。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使用一切力量，艰苦奋斗，才能取得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伟大胜利。为达上述目的，在我财经工作方面，必须解决下面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如何保证爱国自卫战争中的财粮供给？这次战争在我历史上是空前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斗争空前紧张，消耗空前严重。以我们落后的农村经济和落后的交通运输工具，来支持

供应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近代化的战争，困难自不待言。今天的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很难解决，但是必须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来想办法。战争最少需多少军队，人民最多能够养活多少军队，生活待遇应当怎样规定，怎样保证，如何开源节流，使我既能保证战争供给，又不致于过份加重人民负担，更不致于妨碍生产发展？今天战争虽然日渐接近胜利，但仍要作长期打算。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克服目前困难，且须照顾将来，这就必须继续扶助群众生产，从发展经济中来保障供给。所以保障战争供给不但是个财政问题，而且是个经济问题，必须统盘研究，统盘计划。

第二，土地改革以后我们经济建设应当采取什么新的方针？土地改革使数千万农民抬头翻身，热烈地来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这是我们财经工作上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封建经济制度自必迅速崩溃。但是封建经济制度崩溃以后，新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能否顺利发展，这个问题还要依靠我们主观努力才能解决。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土地改革中间鼓励农民生产发家，如果我们不能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由于土地更加分散和缺乏耕畜农具所引起的困难，那末生产不但不能迅速发展，还有可能暂时减退。同时，由于战争空前紧张，民兵民夫纷纷支援前线，许多地区劳力缺乏，已使生产遭遇严重困难，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在解决了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以后，还必须解决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即自力更生，建设自给经济，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战争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真正实现。

此次会议检讨了过去工作，交换了各地区的工作经验，并讨论了上述两大问题以后，对于我们今后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下列基本方针：

第一，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根据毛主席指示，首先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但有许多同志看重了财政，不懂得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足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没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没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自从毛主席提出这一正确方针以后，各地均已开始重视经济工作，多数地区且已获得显著成绩，如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最近几年是有显著成绩的，因此，财政开支虽然年年增加，人民负担尚未感到严重困难。

当前，战争形势空前紧张，战争中的人力、物力消耗空前巨大，因此如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将比过去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动员巨大力量来支持战争，同时又须保留必要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因为生产如不发展，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很难长久支持，反之，战争如不胜利，则我生产也就毫无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更有计划的来组织广大群众力量，且须更注意于节约人力、物力，想一切办法来解决战争和生产这两大问题。我们要把战争和生产很好结合起来，以战争来保护生产，以生产来支持战争。

第二，在财政工作方面，我们要掌握着“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保障战争供给。国民党的财政政策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军队与政府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己。这是旧统治者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但另外“有些同志不顾抗战需要，单纯的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也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战如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返过来，人民负担虽一时加重，但是渡过了政府与军队的困难，支持了抗战，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与此类



似的是“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问题。单纯的“量出为入”是不顾人民的，“旧统治者的思想”，而单纯的“量入为出”，亦是不顾政府与军队需要的所谓“仁政”观点。两者都是要不得的。

目前战争消耗空前巨大，我们必须采用大刀阔斧手段开源节流，才能渡过目前严重困难。为此首先须按战争需要厉行精简节约，减省财政开支；其次必须尽可能的扩大财政收入：号召人民节衣缩食，全力支援战争，财政工作应有远见，争取主动，如果缩手缩脚被迫着来精简节约，或增加人民负担，那就损失更大，困难更多。不但不能减轻人民负担，且可能影响或延迟战争的胜利，而更增重人民的损失。但在增加人民负担时候，仍须慎重研究人民的负担能力。战争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取得全面胜利，临时应付不作长期打算，同样也是要不得的。

第三，在经济工作方面，应当适合战争情况和战争需要，努力发展生产，奖励人民发家致富，纠正害怕富农发展，害怕工商业家发展的保守思想。应当继续提倡“吴满有方向”，大胆放手让私人资本和私营经济自由发展。我们各解放区现仍处于战时的农村的环境，所以生产建设主要仍是扶助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条件具备时亦应建设小型工厂），争取各种重要生活必需品的自足自给。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发展生产更将成为群众迫切要求，我们更应当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分散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发家致富，这样来完成毛主席所号召的“第二个革命”。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这三者所组成的。在这三种经济形式中，国营经济应在金融事业、对外贸易、交通事业和重工业生产中占领导地位（并非独占地位），但国营经济今天还不能在解放区经济中占主要地位，今天主要还是发展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

作社经济，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利用特殊地位阻碍私营经济的发展。在私营经济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是应当扶助的、奖励的，它在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实现后，将有更广大的发展。但在今天战时的农村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因受客观条件限制，亦不能占主要地位。所以扶助小生产者的私营经济，并把他们逐渐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社经济，便应成为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把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合作社来扶助群众生产，这应当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四，在组织领导方面，为着适应战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逐渐从分散走向统一。抗战时期在敌人分割封锁的严重情况下，分散管理独立自主解决困难，是完全必要的，非此不能克服当时严重困难，保证抗战胜利。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如不渐从分散走向统一，则我部队机动和经济发展必将因此增加许多困难。所以，我们一致拥护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来调整各地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在财政上作适当调剂。统一规定各地区的人民负担和供给标准，统一计划各地区的货币发行，经济建设，以及对敌经济斗争，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

为着贯彻上述方针，有几个思想问题是必须明确解决的。我们检讨过去财经工作，特别是检讨了最近一年半的财经工作，觉得下列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引起我们严重警惕。

第一个是独立自主的思想。我们政治上是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上也必须独立自主。去年政协决议公布后，我们曾经一度把独立自主的思想模糊了。如在生产建设中认为手工生产决不能与机器生产竞争，因而甘心依靠外货，放松了对我手工生产的保护政策；如在贸易政策中放松了对外贸易的强有力的管理，实行自

由贸易，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如在货币政策中准备放弃阵地，不作长期打算，有些地区不下决心驱逐蒋币，不下决心摆脱蒋币对我们的影响；如对美货倾销抱着恐怖态度，认为无力抵抗，有些公营商店不去经营土产，而来推销洋货。不肃清这些错误思想，便不可能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那末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就没有充分保证。

第二个是长期战争的思想。去年停战协定公布以后，我们曾经一度对和平过高估计，部分地抛弃了抗战八年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大搞所谓“和平建设”，妄想百废俱兴，而不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以致财政赤字空前巨大，只好以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去年7、8月后我们虽已打破和平幻想，全力支持战争，但仍未作长期打算。如有些地区不从开源节流上去求得财政收支平衡，而靠发行货币临时应付。战争缴获随便浪费，未能用以保障战争供给。战争中的民力浪费空前巨大，以致妨碍群众生产。这些浪费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则我战争便难长久支持。应当认识这次爱国自卫战争是长期性的，因此必须努力开源节流，争取财政收支上的相当平衡。并应扶助群众生产，从发展经济中来保障战争供给。

第三个是依靠农民和为农民服务的思想。我们八年抗战依靠农民，今天爱国自卫战争仍然依靠农民，将来战争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还要依靠农民。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有些同志进了城市，忘了农村、或对农村、农民、农业生产不感兴趣，这就必然脱离群众，以致到处碰壁，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依靠农民，并为农民服务，掌握群众路线，照顾群众的经济利益。如生产建设的必须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金融贸易工作必须为农民服务，为农业生产和农村手工业服务。如组织变工互助必须由群众自愿参加，民主管理。解决财政困难也要大家负责，依靠群众，特别依靠农民。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努力生产，努

力支援战争，一切困难都能顺利解决。

第四个是照顾整体的思想，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过去有些同志采用对敌斗争的办法对付邻区，如用禁令限制邻区物资交流，并对邻区物资征收出入口税；如没收邻区货币，强压邻区货币比价；如对邻区采购不是采取协助态度，而是采取商人态度企图从中取利。此次会议决定，邻区物资交流应与内地贸易采取同样政策（如须通过敌人封锁，则须采用适当措施以免走私逃税）；邻区货币互相支持；并在财政上作互相调剂，协助贫瘠地区，避免苦乐不均现象，各地领导同志均应负责打通干部思想，使这种精神能够从上到下贯彻下去。

## 第二部分 财政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 一、开辟财源，保障战争供给

保障战争供给首先就要开辟财源。现在各解放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仍是取之于民，而在取之于民中间、农业负担仍占最重要的部分，其它收入（包括各种税捐和专卖统销等类收入）仅占次要甚至不很重要的地位。如在其它收入比较多的山东，农业负担仍占一半以上；晋冀鲁豫占 3/4，其它各地均占 80% 上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绝大部分是农村，军民生活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这负担绝大部分必然落在农民身上，即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业负担仍然不可免的要全部落在农民身上。过去有些地区把农业负担以外的其它税捐当作“苛捐杂税”，而不认真征收，这是不正确的想法，其它税捐虽然也大部分转嫁到农民（农民是主要的消费者）的身上，但对生产发展影响较小，目前仍是我们应开辟的财源。

在其它收入中，包括着各种税捐和统销专卖利润，其中主要的有：进出口货物税，内地产销交易税，烟酒税，契税，营业税

等。进出口货物税不但是个重要收入，且为保护生产，调节输出输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武器，应与对外贸易管理工作配合；内地产销交易税也应当与市集管理工作配合着来进行，防止滥征，应当便利交易而不影响市集繁荣。晋冀鲁豫建立交易所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烟酒可以征收重税，藉以减少消耗，山东等地烧酒限由政府公营，成为财政上的一个巨大收入。我们研究，各地税收尚未达到最高限度，如能好好整理，有些税收尚能增加数倍。某些土特产品的专卖统销（例如山东的食盐），也在财政收入上有部分帮助。将来公营事业日渐发展，公营企业收入也许可能在财政收入上渐占重要地位，这比征收间接税是更合理的办法。

财政收入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取之于己，即机关部队生产自给。过去几年，对于克服财政困难也有相当大的贡献，如陕甘宁边区曾有某些部队作到完全生产自给。但因战争环境，生产自给是有相当困难的，且在掌握不好时候易于产生各种流弊。为了杜绝流弊，纠正投机贸易所造成的市场混乱现象，各地多已开始整理部队机关生产，规定：（1）部队机关生产应以农业，手工业生产及运输为主，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反对投机贸易。为此必须酌量减轻部队机关的生产任务，野战军全部生活均由政府供给。（2）合并部队机关所开设的公营商店，组织生产委员会来统一领导。或者取消这些公营商店，把他们的干部和资金完全交给政府贸易机关，给以一定数额的红利。（3）生产赢利的开支亦应遵守制度，向上报告，向下公布，反对贪污浪费。这些整理办法实行以后，已经收到部分效果，今后仍应本此方针继续贯彻下去。

第三个重要来源是取之于敌，即以战争缴获来解决财粮供给上的部分困难。如在武器弹药方面，过去便主要是依靠战争缴获来解决的，大进军时我们所缴获的粮食等类物资，也在保证供给

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各地战争缴获仍然为数很大，如能用作财政收入，可以大有助于战争供给（如最近晋南战役缴获归公的有粮食 3 万石，食盐 15 万斤，棉花 20 万斤，子弹 180 万发，对于解决财政困难帮助很大）。可惜过去大多未能好好接收，浪费破坏相当严重。最近中央指示，“我们现在的后方是在前线，主要的军火资材取之于敌”。为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组织委员会来负责接收缴获物资，并应当在军队中间进行教育，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第四个是清查资财，动员献粮献物献金，拿出过去的积蓄来渡过战争难关。过去部队机关打埋伏的现象相当严重，至今仍有许多粮食物资（大多数是战争缴获）到处埋藏，不能利用，甚至由于经手人的调动已经无人过问。这些物资必须清查出来，做到物尽其用。机关部队过去所建立的家务应当部分捐献出来，用以解决财政困难，支持战争需要。过去利用贪污中饱等类方法所取得的不义资财，如果自动献出，一律免于处分，否则一经查出，应受纪律制裁。

第五个是增加货币发行，来暂时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在因紧急情况财政困难完全无法解决的时候，用增加发行的办法来暂时救急也是可以采用的，但这只能暂时救急，而不可能长久依靠。因为增加发行如不投资生产，而仅用以弥补财政亏空，必然助长投机屯积，加速货币流通，刺激物价高涨，结果增加财政开支，将使财政困难更加严重。增加发行亦不可能减轻人民负担，因为物价高涨币价低落，损失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且其结果比较加重负担更加危险。在我战争困难、地区缩小时侯，更不宜于滥发货币，否则可能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使我财政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 二、精简节约，服从战争需要

与开源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节流问题，即要厉行精简节约，减

省财政开支。精简一方面要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一方面要照顾战争需要，一般来讲，脱离生产人员如不超过总人数的 2%，我们可以有力量来负担。如果超过 2%，那就比较困难。如果超过 3%，那就很难单靠普通开源节流办法所能完全解决，必须依靠友邻区的援助，或靠其它特殊来源才能克服困难。平原比山区负担能力要大一点，战争时期比和平时困难要多一点。依此计算，现在多数地区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有些地区且已超过，因此精简工作便很重要。

今天的精简工作必须掌握下列几个原则：（1）精减地方人员，充实部队，服从战争需要（部队至少应占 3/4，地方人员不应超过 1/4）。在战争期间，全部财政开支，军费至少应占 85%，地方经费不应超过 15%。（2）部队要精减后方机关，充实前方，提高战斗力量。（3）中心地区要精减县区武装，充实主力（部队中间应当有一半至 2/3 的野战军）。（4）地方机关要精减勤杂人员，减少骡马，保留工作所必需的干部。（5）精简机构，可合并的合并，可裁撤的裁撤；精简业务，可不办的不办，可缓办的缓办。（6）提高干部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补救由于减少数量所引起的困难。（7）在战争情况中，民兵民夫开支浩大，必须努力节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此外还要按插干部家属，以及其它编余人员，自己生产解决困难。适当改变工作作风，少开大会，少说空话，停止一切不必要的活动，这样才能保证精简工作彻底完成。

节约工作也应掌握下列几个原则：（1）严格财粮制度，精确审核预算决算，核实人数，消灭虚报重领等类现象。（2）供给标准，部队优于地方，前方优于后方，野战军优于地方武装，号召后方人员节衣缩食支援前线。（3）减省地方经费，军费主要用于保障部队最低限度生活（吃饭穿衣），弹药供给、医药供给、通讯器材的供给，和必要的炮兵工兵建设，其它开支亦应力求节省。

(4) 提倡同甘共苦，降低特殊待遇，严格纠正超过供给标准的浪费现象。(5) 各地区的供给标准应求相当一致，以免苦乐不均，影响部队团结，但亦应有适当差别，富庶地区生活太低了会影响部队巩固，贫瘠地区生活太高了会脱离群众。(6) 加强管理工作，防止资财损失，克服一切浪费现象。(7) 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节约运动，树立艰苦奋斗思想准备。要向农民生活看齐，而勿羡慕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

抗战胜利以后各地区的供给标准均已相当提高，现又稍稍降低。目前多数地区服装供给是单衣 1 套（县区武装、军队后方及地方人员）至 2 套（野战军部队），鞋子 4 双至 6 双（干部少，战士多，平原少，山区多），棉衣两年一套（每年补充一半）。衣服一律采用土布，并应尽可能的采用土制颜料。菜金是 5 钱油 5 钱盐（地方各减 1 钱），1 斤菜，每月 1 斤（地方机关）至 2 斤（主力部队）猪肉；主力部队全由政府供给，地方机关部分需要自己解决。维持上述生活水准，部队每人每年平均亦需小米 15、16 市石，地方人员 10 市石。按照目前财政状况，这种生活水平已经很难提高，在财政特别困难时候，还应准备必要的降低。

### 三、人民负担与负担政策

在扩大财政收入时候，必须慎重计算人民的负担能力，在今天农业生产的水平下，一个农民每年究竟能够负担多少粮食，很难精确计算，根据晋冀鲁豫研究，一般年景每人每年至多可以负担小米 4 斗 2 升至 5 斗（市斗，柴草在内），约占其农业收入的 15%。如按这个标准计算，那末今天多数地区人民负担尚未达到最高限度，但各地土地多少不同，肥瘠不同，生产条件不同，年景丰歉又有很显著的差异，所以最高负担标准也就应当经过调查研究，因时因地各自规定，按照各地情形研究，农业负担如不超过其农业收入的 15%，一般农民还不致于感到负担过重。在今天



严重的战争情况下，我们应当号召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如果每人每天能够节省半两到 1 两粮食，我们便可多养 20 万到 40 万军队，这对争取战争胜利自然是一巨大贡献。

其次，值得研究的是工商业的负担。乡村中间除有极少数的商店作坊以外，大多数是流动商贩和手工业者，手工业者不应征税(或作副业收入征收)，流动商贩因为过于分散，按照过去经验，也只能征收定额的牌照税。如用太麻烦的计算方法，往往费力多而收税少，得不偿失。城市和重要集镇可以征收工商业税，但按资金征收或按盈利征收的办法均难调查(因为商人均怕人家知道他的资金及赢利数额)，形式上是科学方法，实际上还是不科学的。根据某些地区的经验，最好还是采用分级计分办法，即由政府规定税款总额，而由商人自己民主讨论，按其资金、营业赢利状况评定等级，按级计分，分摊税款。这样既免调查麻烦，且较公平合理，这个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我们农业负担政策应按新的情况大加修改。我们研究结果，认为：(1) 负担面应更加扩大，免征点可考虑取消。因为一般农民均已分到土地，均应负担公粮。(2) 累进率应减少差额，因为地主及部分富农已将多余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今天分得较多较好土地的大多数是抗属烈属，不应加重这些人的负担。(3) 按照各级土地平均产量征收(勿按实际产量征收)，藉以奖励增产。(4) 军属烈属工属和孤儿寡妇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应当酌量减轻负担。

#### 四、加强粮食工作

粮食征收是我财政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各地平均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3/4。在人民的全部生活中，粮食亦占最重要的地位。过去各地均有重财经粮的错误观点，好像粮食损失一点不大重要，这样错误观点必须彻底纠正。战争时期粮食供给是一极重要、而且

极困难的工作，粮食供给不上就会直接影响战争胜利。现在各地多已增设粮食局来改进粮食的征收、保管、运输、调剂工作，这是一个适合战争要求的重要措施。

所谓改进粮食工作，首先是要改进粮食征收工作。为着完成征收任务，且能正确执行负担政策，真正作到公平合理，必须完成土地的清查登记工作。在土地改革中，土地的清查登记可与土地改革以及税契工作结合着来进行。要把亩数、地级，产量分别清查登记，以便正确计算各户负担。清查登记以至公粮征收必须运用群众力量，才能顺利完成。征收工作应在短时期内突击完成，尽可能的做到没有尾欠，边沿地区且须早征、快征，配合武装斗争完成征收任务。

其次是要改进粮食的保管和运输调剂工作。抗战时期各地公粮均由群众分散保存，避免敌伪掠夺；但是很难管理，损失很多。现在中心地区多已建立仓库，集中领导，分散管理；但在边沿地区仍应交给人民分散保存。粮食的保管运输应与调剂工作结合起来，计算各地征粮吃粮多少，有计划的向着缺粮地区输送。粮食贱的地区可备款采购，而在粮食贵的地区出售余粮。战争时期由于部队迅速机动，粮食的运输调剂非常困难，应派坚强干部建立流动粮站，组织运输力量，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更次是要改善粮食开支手续，杜绝多支重领等类贪污浪费现象。在战争期间，如何保证部队灵活机动不感支粮困难，同时又不紊乱支付手续，这也是个困难问题。应当灵活运用平时支粮证、战时支粮证和小额粮票等类办法，克服这一困难。民兵民夫成千成万东西奔跑，所需粮食更难精确计算，应在民兵民夫中间建立供给机关，或归部队及兵站统一供给，消灭混乱现象。负责干部必须亲自掌握，以便及时解决困难，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最后是要与敌人进行粮食斗争。在敌人深入我解放区作战时，

粮食斗争便更重要，应当及时转移粮食，动员群众空室清野。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自己的损失，且可以加重敌人的困难。敌占城市被我完全包围时候，也可以组织力量封锁粮食，使其不易长期坚守。麦收秋收时候，应在边沿地区，动员群众快收快打快晒快藏，防止敌人掠夺，且应领导人民进行反征购的斗争，组织民兵和地方武装打击其抢粮队和征收队。这可大量收购粮食，把它掌握起来，与敌人进行粮食斗争。

#### 五、调整战勤，节约民力

今天大兵团的机动作战，粮食弹药以至伤病员的运输完全依靠民夫，因此，战争勤务便成为战区人民的最重要的负担。过去我们对于数万民兵民夫的组织管理缺乏经验，以致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战争紧张时候往往达到 1 兵 3 夫。这样多的民兵民夫东西奔走，他们的力量有半数以上是白白浪费的。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把民兵民夫的组织管理工作完全做好，那末平时 3 兵 1 夫，战时 1 兵 1 夫，已能完成战争勤务，且能改善运输供应工作。现在有些地区，由于出夫太多，已使生产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战勤负担且已远超过了公粮负担。因此我们要把节约民力，看得同节约粮食资财同样重要，认识这是减轻人民负担之一极重要的部分。

调整战勤节约民力，首先是要改进民兵民夫的使用办法，达到组织化、制度化。(1) 支用民夫应有严格限制，除掉运送伤病员和运输粮食弹药等战争必需者外，一般不应支用民夫。各地兵站应当负责检查来往人员，如有违反规定浪费民力现象，应予批评纠正。(2) 战勤需要和民夫使用应当统盘筹划，精确计算，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浪费。要以指挥部队，使用部队的严肃态度，来指挥民兵民夫，使用民兵民夫。(3) 改善民兵民夫的管理教育工作，照顾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帮助他们家属解决生产上的困难，藉以减少逃跑，提高工作情绪。(4) 在乡村中普遍进行支援前线的

教育，帮助民兵民夫解决困难，对于逃跳回来的民兵民夫耐心教育，使其自愿重上前线。

其次要使战勤负担公平合理。在这方面应当注意的有：(1) 支援战争人人有责，不应当把战勤负担放在少数人的肩上。民兵村干部也要负担战争勤务，妇女可以参加磨面洗衣做鞋等类工作。(2) 战争勤务记分算帐，发给工票，可与劳动互助及优抗代耕互相变工。这样就不致于劳逸不均，且不致因支援前线妨碍家庭生产。(3) 工商业者（包括雇工店员）不能出夫时候，可与别人变工，或以代金代替出夫。(4) 战区与后方，交通要道与偏僻地区战争勤务多寡悬殊，政府应当设法调剂。如规定每人每月应有多少天的义务劳动，后方酌收代金，用以补助战区，或者组织各地地区的人民互相变工，使战勤与生产相结合，具体办法尚待各地创造。

最后是要改善交通运输工作，使战时工作部分的经常化。

(1) 山东用常备民夫或子弟兵团来代替民夫担任前线战勤，比临时动员民夫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2) 野战军可以建立一定数量常备的担架队，运输队，平时加强管理教育，战时便能发挥很大效果。(3) 加强兵站工作，兵站和粮食局应补充交通工具，建立运输队，使战时粮食弹药的运输不必完全依靠民夫。改善担架，也可以使伤病员的运送比较便利。今天我们虽然还不可能建立机械化的交通运输工作，但如完全依靠太落后的工具，和游击战争时期所创造的办法，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战争需要。

## 六、整理村财政

今天财政工作上的最薄弱的环节，便是村财政的管理。现在多数地区对于村财政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因此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太行区是整理村财政较有成绩的地区，但据武安县的调查，村财政开支仍达边区粮款的 40—55%。其它地区可能更多，有些地

区超过农业累进税的总额。因此为着减轻人民负担，保障战争供给，整理村财政与整理粮食工作，调整战争勤务有着同等重要意义。在这准备反攻时，我们更应当把整理村财政当作集中力量支援战争之一重要措施（如太行区提“整理村财政，准备大反攻”，并与村干部立功运动结合起来。）

整理村财政的办法，在新地区要发动群众，改造干部，建立制度，清理财政；要与其它工作密切结合，其它工作做不好时很难单独收效。在老地区则比较容易，主要是在加强领导，只要我们定出办法，大多能够执行。晋冀鲁豫整理村财政的办法是有两种：一种是地方经费（包括村政经费）全由县政府来统筹统支，凡是统筹统支地方，开支一般比较节省；另一种是由县政府统一规定征收和开支的标准。由村自己民主评议，按此标准自筹自支，按期公布帐目，并交区公所去审核。这种由上而下管理监督，由下而上民主评议的办法，是比较简单易行，可以普遍采用的。

村财政的收入，应按各地具体情形规定。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大概每人每年需要负担小米 5 斤、6 斤。除掉依靠群众负担而外，还可整理公产公款，及用投资于合作社等办法，以其收益或红利来补助村政开支。太行有些地区已经做到完全不要群众负担。山东在土地改革时候保留部分学田，以其收益用作小学经费，这些办法也可采用。

村财政的经常开支，主要包括村政经费（干部津贴及办公费），教育费（小学经费及文化娱乐），武装费（民兵开支等）等。去年（和平时期）太行区的调查，村政经费约占 40%，教育费约占 35%，武装费约占 25%。此外还有若干临时开支，如拥军扩军等。这些临时开支掌握不紧时会造成巨大浪费，如拥军扩军费用，往往超过全部经常开支。所以村财政的整理不是财政机关所能单独负责，党政军民均应共同负责，布置任何工作时候均应照顾人

民负担，否则很难收到实际效果。

#### 七、部队出击到蒋占区的财粮供给

由于我们缺乏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所以部队出击到蒋占区的时候，财粮供给便会遇到特殊困难。中原军区突围成功以后所以不能巩固发展，财粮供给困难亦系重要原因之一。将来我们部队胜利反攻，这个问题必须好好解决。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很少，不能提出多少具体办法，只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来供大家参考。

我们部队出击到蒋占区的时候，财粮供给主要是有三个来源：一是战争缴获，二是就地筹措，三是后方补给。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后方补给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粮草的供给，主要只能就地筹措。战争缴获如能好好管理，也能够对战争供给发生重大作用。为着自己解决困难，应当组织一个财经工作队（开始可归军队领导，逐渐改为政府领导），随部队出发，处理战争缴获以及就地筹措等类工作。如果所到之处是我们抗战时期的老游击区，那末由原在该区工作的地方干部来负责处理财经工作，更易迅速收效。

我们新解放区的地区如果接近老解放区，可以长期坚持，那就应当建立较经常的征收制度，应当尽可能的求其公平合理，但亦不能采用老解放区那种很细致的办法，只能够把旧的摊派方式稍稍改善。其次，可以发行本币吸收蒋币，并可部分出售没收物资支持本币币值，一切征收、交易应当逐渐改用本币，以便吸收大量蒋币来供战争需要。此外还可发动群众斗争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部分分给群众，部分用作战争经费。对新解放区人民，我们一方面要反对仁政观点，恩赐观点，不向他们要求财粮供给，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抓一把的殖民地思想。

如果部队深入敌区流动不定，那末一切经常性的财经工作不

易建立起来。除掉战争缴获之外，主要只能依靠摊派没罚。旧有城市中的商会及乡村政权机构如不反对我们，仍可暂时利用为我效劳，但应重征地主富商，适当照顾群众利益，且不妨碍群众斗争贪污土劣。这些地区如果不能行使本币，可以考虑能否由华北财办统一发行流通券，与蒋币等价使用（因为等价可以易被群众接受）。没收物资带不走的迅速拍卖，可以吸收蒋币并支持我流通券。我们相信只要战争胜利，并有充分准备，部队出击中的财粮供给困难是一定可以顺利解决的。

#### 八、财务行政问题

日本投降以前，由于敌伪分割封锁，各地区间均难互相联系，因此，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均只能以行署作为单位（有些环境特别困难地区是以专署或县为单位）独立自主，自己解决困难。边区（或省）仅仅掌握政策方针，并在各地区间按其收支状况进行适当调剂。日本投降以后，这种分割封锁状况大体上已打破，地域上已连接起来，加以野战军的机动作战，必然要求财粮供给上的统一。所以去年 1 月开始，各解放区的财务行政均从分散走上统一的道路，在全边区（或省）的范围以内实行统筹统支。但为便于照顾地方困难，各行署（或县）仍保持部分的机动权。村财政仍由村自己管理。

现在各解放区的财务行政统一程度高低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从省到县完全统一，全部财粮供给完全统筹统支，例如山东（去年胶东渤海还保持着部分的独立性，今年亦已实行统筹统支）。第二种是大部分统筹统支，小部分分散管理，例如晋冀鲁豫，这里几种重要财政收入（如统累税，进出口税、烟酒税、契税）是由边区直接掌握，其它则由行署自己管理。第三种是大部分分散管理，小部分统筹统支，这是晋察冀边区所采用的办法（现在各种税收均归地方征收，边区只保留上解及政府企

业收入)。有些地区在行署与县之间亦不完全统一(如冀中),划出部分税收给县自己掌握。华中苏皖边区则根据大部统一、小部分分散的原则,建立边区专署和县的三级管理制。

统一与分散各有利弊。统一的好处主要的有:(1)便利野战军的机动作战;(2)易于统盘调剂,避免苦乐不均;(3)便利内地物资交流及对外经济斗争。分散的好处主要的有:(1)各地自己负责解决困难,能够积极想法开源节流;(2)能够照顾各地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3)在交通困难地区易于自力更生,坚持工作。根据今天我们所处具体情况,除部分交通困难不易联系的地区外,分散管理是不适合于今天战争要求的,一般应从分散逐渐走向统一。边区必须直接掌握一部分的财政收入,来保证野战军的供给,并须做到人民负担和供给标准的相当统一,以免苦乐不均。各地的预决算应经边区审核,按照各地收支状况进行适当调剂。但完全统一有些地区还有困难。所以在今天的情况下,大部统一小部分分散可能是比较最易执行的办法。

### 第三部分 经济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 一、目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土地改革使我农村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在这土地改革快要完成时候,我们的经济建设应从何处着手?在我们经济工作上有那些问题急需要解决?

土地改革使我们的农业生产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是农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的经济地位是大大的提高了,因而便有兴趣,且有力量来改进自己的生产方法。但这并不是说,今后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已经没有任何困难。



土地改革以后许多贫苦农民虽然获得土地，但无耕畜农具，以及其它生产条件，没有充分的力量来经营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且因土地过分分散，而使经营方法更不合理。这些困难如不迅速解决，也可能使农业生产暂时减退。解决这个困难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组织劳动互助，集体劳动，调剂人力畜力。加上政府贷款，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便能克服困难，保证农业生产更迅速地向前发展。因此，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我们必须用更多的力量来组织劳动互助，改进耕作方法，兴办水利防止水旱灾荒，使我们的农业生产更加提高一步。

其次一个问题是为着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我们必须改造农村的贸易机构和金融机构。旧中国的地主经济是与封建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着的，他们通过运销农产品，调剂信用，而对农民进行封建性的剥削。现在这种封建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已在几年来的减租减息中，或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消声匿迹。我们必须改造旧的贸易金融机构，重建新的贸易金融机构，因为运销农产和调剂信用，仍为农业生产发展之所必需。在合作社已普遍发展的地区，我们可以发展运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事业，予以贷款扶助，组织联合运销。我们的银行和贸易公司必须扶助这些合作事业，使之健全发展。用这种新的合作事业，来代替旧的商业高利贷的活动。

再次一个问题，在消灭旧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设法消灭旧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即消灭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上的依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带着浓厚的半殖民地性，我们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依赖，事实上是间接依赖帝国主义），争取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自主。要完成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必须：（1）自力更生，建立自给经济。（2）发展对外贸易，应当为自己利益打算，为了建设独立自主经济，而非为了加

深经济上的依赖。(3) 保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战争空前紧张，数十万民兵民夫支援前线，有些地区已使群众生产感到严重困难，尤其是在耕种收割时候，劳动力的缺乏更加严重。为着保证生产，我们必须：(1) 农忙时候特别要求节约民力，停止一切不必要的活动，集中力量突击完成耕种收割。(2) 组织妇女儿童参加农业劳动，依靠劳动互助来提高耕作效率，并帮助支援前线的民兵民夫，及时完成生产工作。(3) 动员后方部队和全体机关学校人员努力帮助群众生产（前方部队也可利用战争间隙帮助群众生产），必要时候且应动员后方群众帮助战区群众。(4) 在被蒋军侵占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劳武结合，保护生产。农忙季节应当把突击生产看得与支援战争同样重要，不应藉口战争而放松了突击完成生产工作。

## 二、生产建设方针

目前我们解放区的生产建设，仍应掌握着“战时的”“农村的”这两大特点。因此我们的生产建设不能好高骛远，应从实际出发。虽然我们将来必须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在今天我们还只能以农业为主，虽然将来我们必须采用机器生产，但在今天我们还只能依靠手工生产。今天我们所采取的方针应当是：继续发展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逐渐改进生产方法，争取各种重要生活必需品的自足自给。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也应建设小型工厂，采用半机器的生产（尤其在军需工业方面）；但与群众生产比较起来应占次要地位。“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为了保证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争取各种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完全自给。所谓重要生活必需品，首先就是粮食和布匹。现

在各解放区粮食虽不缺乏，仍应号召增产粮食，积粮备荒。布匹有些地区尚不能够完全自给，因此必须奖励纺织生产，达到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其次是纸张、颜料、火柴等，这些物品也应力求生产自给，或以其它物品代替。在战争时期，军工生产更占首要地位，必须尽力发展。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如西药、电料、汽油等）则应力求节约，以期减少输入。有些物品各解放区有盈有亏（如食盐、棉花等），可以互相调剂。但因交通运输过分困难，所以如能自己生产，仍应争取地方性的自足自给。

在农业生产建设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要组织劳动互助，改进耕作方法。在今天的条件下，组织劳动互助和改进耕作方法还不可能要求过高。在组织劳动互助方面，今天一般还只能是“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集体劳动”。象合作农场等类高度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只能个别试验，不应普遍提倡。它可能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非今天一般农民所能接受。在改进耕作方法方面，今天一般只能要求充分利用现有耕作技术，并在现有基础之上把它逐渐提高。如果妄想采用高度发展的“科学耕作方法”必然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以致到处碰壁。

根据过去经验，组织农业劳动互助必须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个是自愿结合，反对强迫命令。过去有些地区单纯依靠政治动员，而不是由群众自愿结合，结果虽然勉强组织起来，但仍不能巩固，亦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第二个是等价交换，计工算帐，互助变工必须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能获得经济利益。这样才能巩固。如果计工算账不求公平，或在人力牛力互相变工时候仅仅照顾一方面的利益，那就不能长久合作下去。第三个是民主领导，一切经过大家民主讨论，这样才能巩固团结。组织劳动互助必须讲求实际效果，为着增加生产，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反对形式主义，锦标主义。为使变工组能经常保持，农业变工最好要与副

业结合起来，这样农副业的互助合作，最易巩固发展。

在手工业的生产建设方面，我们应从三方面来着手：第一是要实行保护政策。为了保护自己幼稚的手工业生产，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工业品的进口。同时应当开展提倡土货，抵制洋货的运动。如以土布来代替洋布，以土纸来代替洋纸，以土颜料来代替洋颜料，以烟丝或土制卷烟来代替外来卷烟等。第二是要保证供销、保证生产者的应得利益。如由贸易公司通过合作社来供给原料，推销成品，调节原料和成品的价格，而使生产者能获得一定的盈利。在发展群众纺织生产中，这一办法证明是有巨大效果的。第三是要用合作社来组织手工业者，给以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各种帮助。经验证明，合作社可以成为政府与手工业者之间的桥梁，政府通过合作社来扶助手工业者，最易发生效果。

合作社的组织同样必须掌握着自愿参加，民主管理和民办公助的原则，入股退股完全自由，并由群众自己民主管理。合作社与一般商店作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的特点主要的有：（1）合作社是为群众服务的经济组织，是以扶助群众生产为其主要任务，反对唯利是图的单纯营利观点。各地经验均已证明：合作社只有扶助群众生产，才能获得群众拥护，巩固发展，如果唯利是图经营投机贸易，必然脱离群众，以致完全失败。（2）合作社是从个体经济发展到集体经济的桥梁，它使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逐渐的集体化。而在今天，这种合作组织一般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3）合作社是资金与劳力的结合，资金所有者与生产劳动者均有分红的权利。它要照顾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又要照顾资金所有者的利益，因为它还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我们必须掌握新民主主义合作社的这些特点，才能够在发展中间不致迷失方向。

### 三、贸易政

我们的贸易工作和金融货币工作应为生产服务（今天又应当为战争服务），如果脱离生产需要，就会变成投机冒险行为，同时又应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发展生产和对敌斗争，这是我们贸易和金融货币工作的两大任务。如何完成两大任务。具体办法则有不同。

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对外争取有利交换，对内调剂供求，扶助生产发展。其办法则为：对外管理，对内自由。对外贸易要与蒋美进行经济斗争，所以必须管理。对内贸易是为调剂供求，平衡物价，故可自由。所谓管理，并不就是专卖统销。为着加强斗争力量，政府可以掌握某些重要物资，实行专卖统销；但是一般的物资仍可以在依法纳税以后自由贸易。所谓自由，也不就是完全采取放任态度。政府仍应通过公营贸易机关，掌握市场规律，来有计划的调剂供求，平衡物价。无原则的限制，束缚贸易自由，和无限度的放任，任人操纵掠夺，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对外贸易实行管理，目的是在争取有利交换，保护生产，支持货币斗争。今天多数地区外货向我倾销（主要是奢侈品和消耗品），土产输出困难，以致贸易入超，使我对外贸易陷于不利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奢侈品和消耗品可禁止输入），争取贸易出超；只有出超才能争取贸易上的主动地位。同时还要掌握重要输出物资，调整对外贸易机构，这样我们才能争取有利交换，减少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额。

管理对外贸易必须掌握着“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这样更有利于对敌经济斗争。应当善于团结进出口商助我发展对外贸易，尤应善于组织群众性的输出输入。就连专卖统销。也应依靠群众，而不是由公营贸易机关包办（如山东的食盐管理，仍由群众分散输出，换回各种重要物资）。必须运用群众力量，冲破敌

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否则便会招致失败。

对外贸易还应当：（1）用调节输出输入的办法来扶助群众生产。如保证原料供给和剩余生产品的向外销售，便对群众生产发展有着极大帮助。（2）从贸易上来掌握外汇，支持货币斗争。如管理对外贸易争取贸易出超，并掌握若干重要输出物资，随时吸收蒋币，来保证货币斗争的胜利。（3）加强采购工作，保证战争供给。必要时可组织委员会来统一管理采购工作，以免互相争购，给商人以利用的空隙。

对内贸易是要调剂供求，平稳物价，藉以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要求物价平稳，不应轻易采取限价限购等类强制办法，而应当从供求调剂上去根本解决。调剂办法，主要是在掌握市场规律，即掌握农产产销的季节性，及某些物产（如食盐煤炭等）产销的地域性，有计划的实行季节间和地域间的调剂。如粮食棉花等类农产品的季节性的调剂，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均有好处。山果土产和若干剩余农产品的向外运销，也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着很大的利益。贸易机关应当扶助商贩，同来完成供求调剂工作。

贸易工作中的另一重要工作，便是组织运输。由于交通运输过分困难，使我内地供求调剂和土产输出受到巨大阻碍，须用大力组织运输，才能克服这个困难。组织运输一方面可采取晋冀鲁豫经验，组织运输公司，掌握交通工具，修理河道公路，经营水陆运输。另一方面又应组织群众运输，掌握价格差额，保证运输利益，并以此为解决运输困难的主要办法。如陕北和山东的食盐运销，均以大力组织群众运输，因而获得显著成绩。所以建立农村运输供销机构，通过合作社来组织群众运输，也应成为我们贸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贸易公司应与合作社的供销业务结合起来，组织各地合作社的联合运销，在这方面山东去年所创造的经验，也可以供各地参考。

邻区的物资交流，应与对内贸易采取同样的政策。各区必须互相照顾，互相帮助，联合起来才能争取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为此必须：（1）帮助邻区采购必需外货，推销剩余土产，互相调剂有无，减少我们对于蒋占区的依赖。（2）一般物资来往自由贸易，出境入境均不征税；特殊物资必须管理或限制出入者，必须征求邻区同意。（3）便利邻区货币兑换，适当规定兑换牌价，不得强压邻区货币，双方牌价应求相当一致，兑出兑入减少差额。（4）各地税率尽可能的做到相当统一。在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后，还应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求其根本解决。

#### 四、金融货币政策

我们金融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二：一为发行货币，进行货币斗争；一为发放生产贷款，调剂农村金融。

货币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因为只有物价相当平稳，我们才能发展生产，繁荣市场，否则市场混乱，生产贸易均会受到严重影响。为要达到平稳物价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排挤蒋币（把蒋币逐出我解放区市场），使我本币取得市场上的独占地位。如任蒋币在我市场自由流通，则我无法调节货币流通数量，因而也就不能平稳物价，不能摆脱蒋币对我们的影响。反之，如果本币取得市场上的独占地位，那末我们就有可能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保持物价平稳，这样就能摆脱蒋币，使我本币完全独立自主。各地经验均可证明，在我没有排挤蒋币以前，本币币值总是跟着蒋币币值的跌落而跌落，我区物价总是跟着蒋区物价的高涨而高涨。但在排挤蒋币以后，蒋币对我们的影响也就大大缩小。

在我排挤蒋币，本币取得市场上的独占地位以后，必须慎重掌握货币的发行数量，以免引起物价的剧烈波动。我们必须：（1）争取财政收支大体上的平衡，以免为着弥补财政亏空而无节

制地增发货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2) 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布棉等重要物资，以便随时调节发行数量，平稳物价。(3) 在解放区扩大或缩小时候，应即灵活调剂发行数量，以免物价波动，在秋收以后和春荒时期，货币流通需要多少不同，也应当作适当调剂。货币发行应与财政征收及贸易工作（物资吞吐）相结合，使货币有经常回笼的机会。如能掌握上述三点，便可能把物价相当稳定下来。当然，在这战争时期，财政收支很难做到完全平衡，亏空数额不得不仍部分依靠发行，因此物价很难做到完全稳定，我们所要求的是物价的相当平稳，避免剧烈波动，这样对生产贸易也不致有重大影响。

货币斗争有阵地的斗争和比价的斗争。阵地斗争是要在我地区扩大时候，动员人民迅速排挤蒋币，建立本币市场。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调剂各种重要物资，保持物价平稳，以提高我本币在群众中的信仰。只要本币信仰高于蒋币，则我货币斗争便能迅速胜利。在我地区缩小时候，同样应当注意组织退却，这比扩张阵地更加困难。因为这时物价可能剧烈波动，本币信仰降落，蒋币便会乘机扩张它的流通范围。我们应把退却地区所积存的物资部分抛售，平稳物价，巩固本币信仰，这样就能阻止蒋币阵地的继续扩张。经验证明，如果本币信仰动摇，人民就会摆脱本币抢购物资，甚至收存蒋币；反之，如果本币信仰巩固，人民仍愿收存本币，物价不致剧烈波动。在前一场合本币就会更加动摇，而在后一场合则能继续稳定。

比价斗争是要跟着蒋币币值的跌落，而灵活压低蒋币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解放区物价的稳定。两种货币的比价，是由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高低（两种地区物价的高低），以及进出口状况和由此引起的货币供求状况来决定的。所以比价高低是要根据物价变化和进出口的变化，不应主观压价。如把蒋币比价压得太低，



便会刺激输入,阻碍输出,结果蒋币供不应求,比价必然回涨。反之,如在蒋区物价高涨时候不能及时压低蒋币比价,则我解放区的物价就会跟着波动。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物价决定比价,而非比价决定物价。但如掌握不好,比价变动亦有可能影响物价。

最后谈到贷款工作。我们的银行要为生产服务,要为农民服务,负责调剂农村信用,亦即吸收社会游资,扶助生产发展。现在我们吸收社会游资大多尚未做到,完全依靠发行来作生产贷款,因此贷款数额便有一定限制,很难完全满足生产需要。所以除掉增加发行(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发行不致引起通货膨胀),尽可能的增加贷款数额以外,基本办法还在建立存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存放利息不应太低,否则无法吸收游资,没有存款也就无力增加放款。在物价的上涨中,即使利息提高一点,获得贷款的人还是有利可图;机械限制存放利息是对借贷双方均不利的。

更重要的工作,是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过去政府发放贷款,不但数额太少,而且办法过分机械,决不可能适合群众生产需要。现虽大多改由银行发放,但因银行无力普遍建立农村金融机构,仍不能与群众生产密切结合。晋冀鲁豫开始建立合作社的信用业务,银行贷款逐渐通过合作社来发放,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今后在合作社已普遍发展且已相当巩固的地区,应当开始建立信用业务,利用合作社来吸收农村游资,银行贷款通过合作社来发放。这样把银行与合作社也结合起来,灵活农村金融,使我农村经济更快繁荣起来。

##### 五、城市工商业政策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进占许多中小城市,因此如何管理城市,恢复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也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一年半中,我们所解放的城市,部分地呈现着萧条景象,比较

大的商号大多生意清淡，只有集市空前繁荣，小商贩和小手工业特别活跃。因此有些同志对于我们的城市政策表示怀疑，对于如何繁荣城市，如何扶助工商业的发展，感到束手无策。我们认为今天城市工商业的所以呈现这种萧条景象，部分由于我们政策掌握上有偏差，部分是由客观条件所造成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条件，第一个是战争环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发动内战和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把我们与各大城市间的联系几乎完全切断。今天能在敌我之间往来贸易的，只有那些流动的小商贩，因此集市空前繁荣。而比较大的洋货铺，土产行等，则痛感到采购和销售的困难，致其营业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应当帮助它们改变经营方式，组织内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运输调剂，同时扶助流动商贩开展对外贸易，使它们能适应战争环境，在我经济发展中起一部分的作用，一旦战争胜利，交通恢复，它们便能迅速繁荣起来。

第二个是官僚豪绅地主等旧统治者的没落。我们这些城市工商业本不很发达（只有少数城市除外），它们过去的“繁荣”，原是建筑在官僚豪绅地主等旧统治者的奢侈享受上的，是一种病态的繁荣。这些旧统治者没落了，这种病态的繁荣自然也就跟着消逝了。过去那些荒淫无耻的“繁华景象”，现在已经一去不回。代之而起的是为农民服务的市集，它因农民的抬头翻身，生活改善而呈现着空前的繁荣。我们应当改造那些旧社会的寄生虫，扶助他们参加生产解决生活困难，并走上健康发展的新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许多显著的成功）。我们的城市是应当为农村服务的，为农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官僚豪绅地主服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城市是在新旧交替之中，它虽然有萧条的一面，象征着旧社会的没落，同时还有繁荣的一面，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

虽然有着上述两种客观原因，但我们仍不应当忽视我们主观的政策掌握上的偏差。例如：（1）某一地区以领导乡村斗争的经验去领导城市斗争，个别同志甚至要求工人管理工厂，店员管理商店（工人有其厂，店员有其店）。有些工商业家不了解我们土地政策与工商业政策的区别，便在土地改革影响之下退却逃跑。（2）另一地区过“左”的劳动政策，过高的增资要求，及在反奸诉苦中间伤害技术人员，以致有些工厂不能恢复生产。（3）亦有地区对贸易自由的各种不必要的限制，不正确的货币政策增加输出输入困难，以及公营企业依靠特殊地位排挤私营企业，有些商店因此不愿继续营业。这些错误政策虽是个别地区各自采取的，如不迅速纠正，我们便不可能团结工商业家，同来繁荣城市经济。

应当明白指出，我们的工商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要采取扶助的、奖励的政策，因此我们对于工商业家也要采取争取的团结的态度。我们的劳动政策是要照顾劳资双方利益，调整劳资关系共同发展生产。我们的贸易政策，也应保障营业和赢利的自由，取消一切不必要的限制。我们的革命目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推翻买办官僚资本的统治，这一切都是大有助于工商业的自由发展的。就连土地改革本身，也能发展农业生产，并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建立工商业的繁荣基础。我们必须明确掌握这些政策，使我们的城市工商业能在一定条件之下，跑上新的繁荣道路。

## 六、新解放区的经济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如何掌握新解放区，曾经一度在我经济工作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在我爱国自卫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时候，我们又将抽出部分力量，去作新解放区经济工作。因此我们需要利用过去工作经验，来对今后新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提出几点简单意见。

新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首先应当掌握接收没收工作，在这方面必须慎重处理。因为这件工作如果做得不好，是会影响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威信，增加今后军事政治斗争中的困难的。所以接收没收工作一定要由高级政治机关亲自掌握，或由军政负责同志组织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决定。不应当把接收没收权力轻易交给供给机关，严密防止乱没收的现象；也不应当放任民兵民夫及部队战士损毁公私财产。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公营企业，应派负责干部迅速接收，免被破坏（可令比较好的旧有职工负责看管），且应争取旧有职工迅速恢复生产，逐渐整理改造。对于私营企业应当负责保护。战争罪犯的财产应经政府或政治机关审查方能宣布没收。

其次应当审慎处理货币问题，以免引起市场混乱现象。新解放区，均系蒋币市场，在我本币尚未通行市场以前，可准蒋币暂时流通。应即发行本币收兑蒋币，按照物价对比适当规定兑换比率（禁止部队机关强压蒋币抢购物资），然后逐渐压低蒋币比价，并压缩其流通范围。同时应当设法调剂人民所急需之各种物资，限用本币购买，一切税捐也用本币缴纳（募捐摊派可以缴纳蒋币），藉以提高本币信仰。到本币已在市场上占相当地位时候，政府可即宣布市场物价及票据账目均应改用本币计算，并出布告定期停止蒋币流通。劝告收存蒋币的人迅速兑换本币，或者持向敌区换回各种物资。在开始停用蒋币时候，更应动员全部力量检查市集，并须调剂各种物资防止物价高涨。经过上述程序，我们可在短时期内排挤蒋币，且使市场不致发生剧烈波动。

更次是要慎重管理市场，有步骤的逐渐进行改造。新解放区市场都是洋货充斥，奢侈品和消耗品在市场上占重要地位。这些商品如果马上禁止出售，或者采用补税办法，许多商店便会纷纷停业，以致市场萧条。我们应当放宽尺度，照顾新解放区城市人

民的生活需要，勿以管理农村办法机械用以管理城市。我们可以登记商店已存奢侈品和消耗品，限期销售后禁止再输入，并以解放区的土货代替洋货，使这洋货市场逐渐变为土货市场。同时应当扶助手工业生产，使城市失业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改善生活。如有工厂作坊，更应扶助它们迅速恢复生产，以免工人失业。在新解放的乡村中，应当一面进行土地改革，一面恢复生产，尽可能的做到没有一块耕地荒废。

（以上各点均只适用于邻近老解放区，而且易于巩固的地区。在远离老解放区，只能暂时占领的地区，那就更不能作过高要求。这时我们只能够以全力保证军队供给，并使市场安定，扩大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

##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

南 汉 宸

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陕甘宁边区在敌顽重重封锁下，以那样穷的地区，供给那样多脱离生产的人员，不仅渡过困难，且能达到丰衣足食，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过依靠了毛主席的方针，加上大家的两双手而已。

白如冰同志是在晋绥接到延安电报来参加会议，所以没有带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现在只能就我们的记忆，分别将自卫战争爆发前的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作简略介绍。现在敌人 10 余万已占延安，十年和平建设，经不住敌人的破坏，目前情况如何还不知道。

### 一、财 政

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环境：（1）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全区面积 4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50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三个半人；耕地 1500 余万亩。大车路很少，交通依靠小毛驴。抗战前旧治 23 县中，有不少的县，其收入不足本身每月仅 360 元的政费开支，尚需省方协济，其贫穷可想而知。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划为五个专区，辖 32 县市。（2）生产落后，进出口不平衡。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地每垧（3 亩）亦仅收谷 6 斗，平均每亩可收小米 1 斗至 1 斗 2

升。种麦子产量较多。战前根本谈不到工业，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除粮食羊毛外，其它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的碗，均靠外来。植棉纺织虽几年来已有很大发展，但目前尚不能自给，还需要半数以上的进口。抗战以来，在敌顽的严密封锁下，曾进行了复杂、激烈而残酷的经济斗争，由于缺乏出口物资，严重入超。对敌贸易，经常在被动中，即使换回一些，也不能等价，吃亏很大。所换之货质量很差，关中所产较好的布被西安蒋军征收，次布上蒋区市场，最差的经过层层封锁方能进入边区。如果别的解放区用的是三等货，我们是欲求三等货而不易得。因为买不到棉花，曾穿过一年羊毛装的衣服和被子，所谓白天一身毛，晚上一嘴毛，气味很臭。（3）战时的总后方，庞大的财政开支与落后的经济条件，极不相称，以 140 余万人口，最多时负担脱离生产人员 12 万，牲口 8666 匹，如每一牲口合三人消耗，则脱离生产人数超过总人口的 10%。日寇投降后，曾一度减少，现在又有增加。在这些人数中，学校及机关干部占多数，供给标准不同于战士，事业费大。这样庞大的开支，远非群众所能全部负担。

十年来的光景是怎样渡过的呢？

1937 年和平实现，财政政策是休养民力争取外援。当时长期内战方告结束，农村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必须给人民以适当的休养，1937、1938 两年均只向人民征募公粮 1 万石，此外再无任何负担。1939 年征粮 5 万石，向商人募寒衣捐 10 万元，粮款所需，大都靠八路军分给后方的军饷及国内外各地的援助，1939 年的财政开支中外援占 87.5%。1940 年，国民党封锁加紧，外援很难进来，八路军每月仅 50 万元的军饷亦曾一度停发，我方开始建立税局，但收入仅 10 万余元，年终总结，全部开支中外援仍占 70% 强。

1941 年，人民经济经过几年休养，已由恢复而有所发展。皖

南事变后，外援完全断绝，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这三条道路，其严重可想而知。为克服这一严重困难，曾采取如下措施：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钞，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方针。发给各部队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其经费开支。当时为应急需，各部门除投入一小部分资金于工农业外，大都从事商业。虽解决了问题，渡过了困难，建立了生产基础，但不可避免的互相竞争，各自为政，苦乐不均，走私漏税的毛病也就产生了，致使财政贸易金融都陷于很混乱状态，如不很快克服，则财政不能上轨道，一切制度无法建立，其混乱将不堪设想，因之要求统筹统支。如果当时银行不是那样保守，能在发行上更多的投入生产，改变当时四人合用一把镢头、几个人合用一架纺车，因无钱买工具，致使劳动力浪费的不合理现象，虽可能稍微提高物价于一时，但对以后的生产与财政基础当大有裨益。

在粮食上，1940年对军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没有改变单纯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仅征公粮九万石。1941年春，人数增加，缺粮太多，4月初即闹粮荒，又无通盘计划，曾被迫下令，两次借粮，一次征购，个别地区如延安鄜县，借粮有达八九次的，扰民太甚，但粮食供给，仍不能保证，有的部队两天没有能吃上饭。

为弥补财政急需，夏初，发行救国公债，原定500万元，实收618万元。但群众不了解公债为何物，亦不知政府要归还，大都将债券毁弃，待还本时，仅收回十之一、二。这说明目前我们所处之农村情况，推行公债还是很困难的。

为了争取出入口平衡，增加财政收入，曾采取政治动员方式，发动群众运盐出口，并为政府运公盐6万驮，很多的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动手，带领群众，往返奔走，但由于缺乏经济力量的扶



持，与出入口贸易未获胜利，结果费力很大，其所收效果远逊于我们所花的力量。

经过一年的实践，充分的证明，财政上狭隘的“仁政”观点，主观上企图减轻人民负担，而实际却大大扰了民，最后还不得不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种不顾抗战需要，不公私兼顾，而片面的宋襄公之仁，实际是大不仁政。

本年开支，共 2447 万，银行透支 1054 万，其余靠公债、税收，及企业经营的收入。

秋收时提出征收公粮 20 万石，公草 2600 万斤，政府经过很慎重的考虑，最后方获通过，我们坚持了这一方针，向群众说明，过去借粮一律归还，明年不再借，再不官价买粮，望群众能予以帮助。在我们广大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拥护下，终于胜利完成，这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由此使边区粮食工作得喘过一口气，并成为粮草工作保证供给的一个转折点。

1942 年的财政方针是统筹统支为主，生产自给为辅，保证粮食、草料、被服、食盐、纸张、书报六大实物供给。这就加重了财政任务，减轻机关负担，一方面是为克服各自为政，苦乐不均，混乱的现象，同时，为培养各单位生产能力，以充实其自给力量。当时经费来源，税收很少，银行又不能透支，主要靠企业经营盈利。但年度开始就无资本，路线亦不明，必需依靠商人密切结合，出奇制胜，以顽区之货，售予顽区，赚得顽币，购回布棉、进行了胜利的对顽贸易斗争。打了几个胜仗，才解决了夏衣，渡过了上半年难关。待秋后，自己积蓄了力量，方逐渐摆脱财政上被动，喘过一口气来。

经过一年的努力，混乱的毛病有部分的克服，逐渐建立起一套财政制度，各机关部队专心一意搞生产也打下一些基础。但在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过分集中，解决问题不及时，照顾

下级具体困难不够是其缺点。

本年收入 27000 万，开支 18000 万，节余 9700 万，银行透支 1181 万，并不是现款，而且上年留守兵团借银行之款，转到财政厅，占全部财政收入中的 4%。财政上发出生产贷款 1800 万，超过银行透支。企业盈利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全部的 70% 以上。节余的是物资非现款，所以尚不能偿还银行透支。

秋征公粮 16 万石，公草 1600 百万斤，较之上年度减少粮 4 万石，草 1000 万斤。

年冬高干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3 年为改进统筹统支过于集中的缺点，确定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方针。在统一的政策标准制度下，分区为单位进行统筹，根据各区脱离生产人员的多寡，生产基础的强弱，地方税收收入情况，边区给以一定的补助，包给各分区。特别重要的是这一年中晋绥予我们的莫大援助，两区步调一致，取得对顽贸易的胜利。这是生产最发展，日子最好过的一年。

7 月，胡宗南亲到洛川布置进攻边区，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对外贸易一时因战局而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运出，法币来源断绝，现存少数法币又必须储待急用，财政上没有积蓄，为支付战争的庞大开支，准备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后公家所需冬装的布棉，而东三县棉花上市，政府不准人民自由出口，财政厅就必须收购，以保证冬装及纺织之用，因之被迫大量发行，犯了盲目乐观，没有照顾全局的错误。8、9、10 三个月中透支 10 亿，购置物资，金融波动很大，边币从 6 元涨至 13 元方能兑 1 元蒋币。直至 11 月反共高潮过去，遂停止发行，停发经费，积极组织出口，方才稳定下来。

这年不仅群众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部队机关生产亦获得伟大成果。仅粮食一项，就交公 86000 余石，大公所给少数奖金，但

铺张浪费也大有增加。有的部队每人每月吃肉 8 斤，本来供给标准已经有点高，机关部队又从生产上补助一些，成为比赛享受的高低；各种开支都放手了，没有注意到节约储蓄。

这年为统一领导陕甘宁及晋绥两区的财经工作，与加强对外斗争的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贺司令员亲自负责。这就进一步的达到对外贸易的统一，便利于我之价格斗争，增加了财政收入，并确定仅以企业收入的 20% 交财政任务，其余作家务之积累。财经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了雄厚的大公家务。岁末劳英大会上提出争取耕三余一的号召。

这年度开支共 61 亿，银行透支 10 亿，收入中生产自给第一，其次为企业收入，取之于民的各种税收，加上 10 万驮公盐共达全部财政收入的 11%，而财政上支付的生产贷款，即占全部的 13%，超过了取之于民的比例。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正确的发展方针的具体表现。有一绅士曾对我说：你们很费力的向人民要到东西，又给与人民，何不也不要也不给，公私都省事呢？这种地主阶级立场的办法，我们是不能采取的，应该要的必须要，应该给的必须给，是我们阶级的立场，也是我们的任务。

1944 年的方针是节约储蓄，克服浪费，增加生产自给，减少财政开支，以积蓄力量备战备荒。取消对各分区补助，只把牲畜交易费斗佣，划给地方，增加部队机关自给任务，分别具体情况，确定生产计划，普遍的降低供给标准，较之上年伙食部分减少 52%，办公费减少 49%。但在后一个时期领导放松，各机关又都大事建筑与购置器具，铺张浪费又抬头了。几个月中浪费了不少。全年收支约 100 亿元，银行没有透支，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上年储存物资，在被服供给及物价稳定上，起了很大作用。银行发行完全用于生产，共放出生产贷款 17 余亿，内农贷 1 亿，工贷 2 亿，纺织 4 亿 8 千万，新回部队生产资金 7 亿，前方回延部队路过延

安时，每人发给衣服、镢头及生产资金，由生产上担负一定开支。在对外贸易上，用盐及其它土产换回金子、法币、物资交给银行，已逐渐把银行家务建立起来，其准备金达其总发行量的 90% 以上。

本年度公粮征收 16 万石，公草 1600 万斤。

1945 年提出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由于几年来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而工业远远落后于农业，农工业品剪刀差加大，谷贱伤农，春耕时农民生产情绪低落。当时企图在工业品价格压不下去的情况下，用人为的方法去提高粮价，利用迟雨机会，强调防旱备荒，虽刺激了粮价于一时，但收效不大，不能持久。贸易公司用棉花与群众换粮，以帮助纺织，提高粮价。当时机关部队供给标准减低了，生产增加了，各机关都挖苦菜，准备荒年到来的食物，这在节约上起的作用很大，但到日本投降以后又放松了，开支又逐日增加起来。

日寇投降时，大公所有家务足用一年，各小公所皆有积蓄，大批干部人员出发，有力量发给必要的路费和衣服牲口的补充。本年度征收公粮 125000 石，公草 1200 万斤，公盐 8 万驮。由于食盐销路减少，盐税收入锐减，财政感到困难，动用一部分家务，尚能做到收支平衡。

1946 年的方针是复员生产、和平建设。当时财政感到很大困难，其原因是部队出发，生产者减少，留下老弱妇女儿童难于从事生产，尚需大公增加供给。食盐销路减少，使仅次于企业经营之盐税收入大大减少。自给工业部分停工或减产，日寇投降物价暴跌，工业无利无销路，银行没有给以必要的扶持。物价暴跌时，公私商店及合作社低价抛售物资，市场混乱，交易部分停顿，银行没有乘机掌握物资，稳定物价，反而紧缩货币，致物价更惨跌，不久又回涨，大小公家都吃了亏。加上和平思想，机关部队生产

放松，要求生活标准提高，开支加大，这就大大的削弱了各小公的家务。继之时局开展，事业费开支有很大的增加。

为克服困难曾采用如下办法：

(1) 宣布部分的停发经费。实际并未停止，仅办到没有新的增加。(2) 大力推销土产，组织出口，成绩很好。(3) 10 月后备战，贸易公司利用时机，一月内争取 80 万斤棉花的任务胜利完成。物价平稳，供给得到保证。(4) 坚持制度励行节约，首先由中央机关开始，负责同志以身作则，收效很大。过去积累家务现尚部分存在。

现在讲粮食工作，粮食供给是我们保证军需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的粮食来源有三：取之于外援的采购，取之于民的征收，取之于己的生产。从 1937 至 1939 年主要的依靠外援，从武汉、西安、洛川等地采买。当时不应当也不可能向老百姓多要。1940 年以后直到 1942 年军需增加，粮食来源不得不主要的绝大部分的取之于民；向老百姓征收。我们对人民的帮助，从组织变工、按户计划等组织方面的多，资力帮助较少。1942 年后，取之于己的粮食生产大大增加，向人民要的逐渐减少，资力上对群众的帮助也有了增加。1943 年提出耕三余一的号召，经过数年来的努力虽未完全达到，但已做到家家有余粮。目前全区共有余粮 62 万石，在和平时期若遇荒年，可勉强渡过一年。但自卫战争爆发后，除供给我大军需要外，再加上敌人的掠夺、抢劫，全区粮食的困难还是存在着。

根据财政厅调查，历年粮食产量与公粮征收列表如下：（实际的生产量可能比此数多些）

表 1

单位：万石

时间	粮食产量	公粮数目	征收占产量百分比
1937	126	1	0.79
1938	127	1	0.78
1939	137	5	3.63
1940	143	9	6.29
1941	147	20	13.33
1942	150	16	10.69
1943	160	18	11.25
1944	175	16	9
1945	160	12.5	7.8
1946	183	16.3	8.9

地方附加粮不超过公粮的 1/10，但不是平均的附加，而是按各地具体情况，先由各县提出计划，经边府财政厅审核批准后方可征收，总数由财厅掌握，公粮与附加粮一次征收，统一入仓。各地在地方粮内，在一定的标准制度下，可自由处理，事后呈报备案。

截至去年年底，除所征收的 16 万 3 千石粮食外，尚有一些余粮，在和平时可供备荒之用。自卫战争爆发后，人数增加，只能补助战时之急需，但需粮区与储粮区之不一致的矛盾，因交通不便而困难解决。

在征收政策上，1937 年 10 月曾颁布救国公粮征收条例，规定每人全年收入不足小米 300 斤者免征，收入 300 至 450 斤者征 1%，451 至 750 斤者征 2%，751 至 1050 斤者征 3%，1051 至 1500 斤者征 4%，1501 以上者征 5%，但当时并未按此条例严格执行。由于征收量很少，大都采用动员劝募方式，负担面很小，多偏重在极少数的富有者。直到 1940 年仍是一种劝募性的摊派，负担

主要在中农以上各阶层，“抓大头”“瞅目标”的现象，相当普遍。

到 1941 年，为完成 20 万石公粮，2600 万斤公草的庞大任务，在征收政策上改订条例，降低起征点，为每人平均收入 5 斗以下者免征（关中陇东两分区免征点为每人 8 斗），用以扩大负担面至人口的 80%，强调深入调查，执行条例，粒米入仓，斤草入站。当时税率为每人收入 5 斗者起征税率为 5%，收入六斗者征 6%，7 斗者征 7%，每收入加 1 斗，税率即增 1%，直至每人收入 30 斗征 30% 为止，再不累进，照此条例与民主评议相结合。执行二年，发现有如下问题急待改进。历年公粮征收均为自上而下的分配，自下而上的调查，只能在执行征收任务上起各阶级公平合理的作用，但分配数字难于精确，不尽符合各地情况。因之仅能作到一村内各阶层负担的公平合理，而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专区与专区间，负担很难平衡，按农业实际收入计税，多打多出，少打少出，负担量不能相对固定，不足以鼓励农民生产情绪。其次，新富农吴满有与地主常友文，人口相同，收入亦同，累进相同，征收量相等，但无视其勤劳所得与不劳而获，总收益与地主纯收益的区别。虽于实际征收中，群众的民主评议，曾加以改变，但救国公粮条例本身确有此缺点，及税率上不太合理之全额累进与不能相对固定，每年需用大力调查等均急待改进。

1942 年冬，高干会上即提出准备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1943 年起着手进行研究，经数年来的试行，已获得初步经验，以常年产量较之按实际收入计税，更能刺激生产。征收土地税，用以调剂农民与地主间的负担。免税点在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财政任务庞大的情况下，暂不能除（因如每人平均减去 6 斗的免税点，则全边区将除去 80 余万石，再除新开荒地、抗属荣军、移难民及植棉、种蓝等特种作物奖励之减免，将超过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全

额累进虽不甚合理，但干部人民文化水平低，超额累进计算不便，其推行尚待时日。

我们虽曾以相当力量从事于农业统一累进税的研究；并亦获得一些成果，且在数县试行，但毕竟由于干部条件及其它原因，至今犹感不简便未能普遍推行。

× × × ×

我们的粮食保管仓库工作，八九年来发展，是由分散的小仓库走向集中的大仓库。仓库的设置也是由按征收分散的就地设库入仓，改变到适应供给需要，有重点的在供给区或交通沿线建立粮仓、草站。粮仓的管理，是由各地分管走向集中粮食局直接垂直领导统一管理。在八年的保管工作中，曾涌现了不少优秀模范工作者，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延安蟠龙仓库主任何崇高，在一年经过 2 万石粮食的进出中，损耗仅 8 石，占总数的 4‰，同时他与群众关系很好，每次老百姓交公粮时洒落在地上的粮食，他都为之簸净还给群众，所以他不仅能做到损耗极少，且获得群众的拥护。

过斗员阎麻子，经过长征，作过斗员七八年，积极、负责、认真，众口同声都说他公道，从不马虎、循私。清仓清账是检查保管工作的重要方法，经过几年来对各个仓库逐一清理，粮食局已能做到掌握大部分存粮较大的仓库，定旬报制度，粮食的管理较有成绩。而草的保管几年来虽有改善，但依然很差，每年仍有不少损失。这一套保管办法，在和平时期是较合适的。目前大规模的战争下需要有所改变。

× × × ×

1941 年后，全边区粮食供需总的收支是平衡而且有余的，但延属分区需供给人数占全部的 57%，牲口占 63%，需要量占全部的 66%，而征收量仅占全部的 2/5，这就产生供需上极大的不平



衡，特别是延安市周围需粮 54000 余石，而延安县、延安市、安塞县三地全部公粮共计仅有 26450 石，相差达 1 倍以上。因之，调剂供需便是供给上的中心工作，为此，曾采取如下办法：

(1) 征收与供给结合。公粮征收量的分配，不仅要根据政治经济诸条件，同时应十分注意，照顾需要。1941 年仅按经济条件普遍的征收公草，所引起的不需草区公草的很大浪费的教训，促使我们对这一点加以改变。

(2) 建立据点仓库，公粮向需要方向集中。在距延安 60 至 90 里一站路的交通线上，甘谷驿、永坪、蟠龙、拾安等地设据点仓库，成为供给中心的外围组织，它可打破行政区划，接受距其一站路半径内之公粮，及二站以内的转运粮，以节省群众及机关的运输力。

(3) 合理的分配，尽量的减少民力运输。组织部队机关运输，发展粮食局运输队，规定一站路以内由机关自运，二、三站者动员群众在农闲时集体运送至据点仓库，使粮食局运输队成为机动突击的力量，以备远道及应急之用。运输队的管理，一改过去对一部分人的供给制，与另一部分人的雇佣制为合作分红后，有很大的改进，按运输之斤数计登运费，将运输力提高了一大步，达到增加 45%，运费反而降低了 8%。同时运输队建立骡马店，木铺，铁铺，皮麻绳铺等一套，与保证其供给的作坊，除解决其本身的需要，供其价廉物美的东西外，尚有盈利。

(4) 实行麦收时征夏，用以保证供给，调剂麦食及便于于人民的交纳。

(5) 余粮区卖粮或征收代金，在缺粮区购粮，并可在高价有利时组织余粮出口、用以部分的弥补一买一卖间价格的差额。

(6) 群众兑交公粮，在粮价较高而非我之需粮区，群众为节省其转运劳力，请求在我需粮区购粮缴纳，甚至有愿以 1 石 2 斗

交作 1 石者。此办法未普遍采用，如经我们很好的组织，似可便民利公。

(7) 发给各机关草料代金，划定市场，分头采购。此一办法，由于大家多不遵守既定市场，形成延安市上争购，毛病甚多。

(8) 由粮食局收买各单位的生产粮、节约粮，并限制各机关不得私自出卖。

(9) 动员组织各机关割草，自给马草三个月，行之数年，均收成效。

(10) 以人就食，以马就草，调剂被供给人员、牲口，就食有余粮地区。

(11) 粮食供给上，按季审批，按月拨付，以防超支，与作粮食投机，部队移动，又保证其支用方便。

历年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的粮食供给标准曾经如下的变化：

均以每人每日为标准计（小米，老秤）

表 2

时间	1941 年以前	1942	1943	1945 年 6 月备荒	1945 年 7 月	1946	现在
军队	1 斤半	1 斤半	1 斤半	1 斤 5 两		1 斤半	1 斤半
地方	1 斤半	1 斤 4 两	1 斤 3 两	1 斤	15 两	1 斤 2 两	1 斤

当 1945 年 6、7 月备荒时，地方人员粮食标准曾降至每人每日 1.5 斤，并未影响大家吃不饱饭。据我们调查，西北局每人一天吃粮 1 斤至 1 斤 1 两，延大（延安抗大）1 斤 2 两，中央党校 1 斤至 1 斤三两。杨家岭全年节约 800 石，边府（边区政府）节约 600 石，其原因主要是管理改善的结果，同时蔬菜增加亦是重要原因，如 359 旅为完成交公粮的任务就吃了三个月的山药蛋。我们对伤病员、老弱妇孺的照顾，一直是没有放松的。

预决算审计制度之中心工作，是掌握人员马匹的确数，废除

一切吃双份粮的漏洞。1942年废止开会、住医院、客饭、训练班超支等领双份粮现象，实行粮票（实即饭票）制度，一年之中即较前节省粮达 19000 余石。

为避免粮票满天飞的缺点，在拨粮上均统一的采用支付令，搭配发少数粮票，只供小额客饭之用。

×            ×            ×            ×

再讲税务，1940年成立边区税局，开始征收货物税与商业税。货物税的征收分进出口税及过境税两种，其方针为保护生产，配合贸易，增加财政收入。用税收以保护生产，虽属必需，但仍有一定限度，必需发展自己生产，能做到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方能奏效。如边（区）炼铁成功后，我则初以禁入，继改重税加以保护。当时外铁入口，价仅每斤 400 元，税率 100%，政府又津贴铁厂每斤 300 元，结果依然竞争不过，最后取消。边区虽至今尚缺布近一半，但布匹进口仍定税率活动于 5% 至 30% 之间，目的是为配合贸易、金融、生产及各地需要量的季节性。自我定入口纸烟一律没收后，边（区）产纸烟有很大发展，仅陇东板桥一村，即有纸烟作坊 60 余家，一时曾获大利，随即大都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我税收虽用不分优劣同样征税的办法，期以刺激提高其质量，但由于无计划盲目的生产，去年外来纸烟的解禁，纸烟大量进口，外汇的供给增加，边（区）产纸烟受到打击，国民经济受到损失，致使一时期的纸烟业繁荣，昙花一现，不久之后，大都垮台。

在我全部入口货物中，主要是布匹棉花，其占入口总数之比例，1943 年为 75%，1944 年为 68%，1945 上半年是淡月为 45.7%，若与下半年旺月相平均，估计在 60%，1946 年为 55%，从这比例渐减的数字中，可以看出生产的发展，对外的依赖已日益减少。

延安市上所见之非必需品与半必需品之入境，是由于为了掩护各项主要必需品的入口，我们规定在不超过 15% 的比例下，准予搭配进入。

营业税：分固定与临时两种，原定条例固定的营业税，按纯收益累进，税率由 4% 至 35%，以期作到农商负担平衡。但由于账簿凭证缺乏，调查困难，按条例征收很难执行。我们感到过去各城市由商会按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不公道，主观主义地企图按纯收益用百分比累进征收，作了几年行不通，征收办法又返回过去商人所采之厘股，加以改进，使自上而下的分配征收任务，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评议相结合，以三三制精神改组商会，使大、中、小商人均参加商会领导，发扬商人民主评论，并组征收评议委员会以协助之，收数增加，商人反而称便。商人负担据我们初步统计，占其收益的 13%，由于调查之不够深入，实际负担恐尚不达此比例。临时营业税是对人口流动商人按交易额征税，由二万元起征，税率为 5% 到 25%，累进到 30% 停止。营业税的收入占全部税收之比例：1942 年占总数的 13% 弱，1943 年占 37%，1944 年占 40%，其比例逐渐增加，原因是敌人的封锁更严，入口困难。我之生产及内地商业发展，如安塞真武洞战前只有摊贩四五家，现已增至座商百余家，加上我们的税收工作也有了进步。

牲畜买卖手续费税率按 5%，斗佣 3% 征收，均由税局代收，交当地政府，作为地方财政收入。

三边花马池一带年可产盐 60 余万驮（每驮 150 斤）。我设盐务局，负责组织生产，征收盐税，运销由盐业公司管理，从 1941 到 1944，几年中曾先后动员群众运输食盐出口，并为政府运送公盐，共 30 余万驮，费力很大收效很小。证明只依靠政治动员，没有经济力量的辅助，把运盐与群众本身利益结合起来，并加以组织管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以后改变为收公盐代金，人民交款

或由合作社组织运输队前往驮运，这实际上是人民用货币以支付的劳力负担。

日本投降后，由于食盐外消大减，盐务局合并于税局，公盐取消，盐业公司亦取消对外统销。

## 二、金融工作

### （一）边区银行的历史概况

边区银行的前身，是苏维埃中央银行西北办事处。当时发行了很少的苏票，双十二事变，国内和平以后，把苏票收回。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改为边区银行，当时未发行边币，市场上流通的是法币。市场上的困难是小票太缺，“找零”在交易上成为问题，向国民党领回的八路军军费，经很多交涉，小票也只能给1/10。所以市场上多用邮票找零。为适应这种情况，银行于1938年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光华商店是银行的一个商店），票面分为5分、1角、2角5、5角、7角5五种，作为法币的辅币。开始只发行10万元，至1940年12月发到310万元。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议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边币法币比值规定为1:1。因为当时没有准备，不能满足入口商人对法币的需要，所以发行不久，边法就产生了差价，开始差价还不大，由9角8、9角6、9角5慢慢降低下来，但降低的速度还不快。因为陕甘宁边区需要外货多，除粮食外，穿衣及一切日用品全靠入口货，没有法币就不能供给入口商以外汇，换回必需品以解决公家及人民的必需品需要问题。而本区出口货很少，对外贸易是极大的入超。那时能出口的只有食盐，即三边花马池的盐。所谓三边（定边、安边、靖边）的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除盐外其他“两宝”均出不去。运城的潞盐，敌人封锁过不去，国

民党非依靠花马池的盐不行，在过去盐政史上陕西渭河以北，也是花马池盐的“引地”。但陕甘宁边区交通不便，从产盐地的三边到销盐地的关中，陇东，路程很远，只能用驴子驮，利润很低；又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抵制压价，它宁可不惜动员民力，人民费几倍于盐价的运费到青海运盐，或高价购买敌占区的淮盐，而对边区盐非逼不得已时不买。所以外汇问题，还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边币总是发行的多，“回龙”的少，而那时银行曾经用了大城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发行“有奖储蓄券”，1941年发50万元，1942年发100万元，但在落后的农村里，农民没有这些习惯，也不幻想发这样的洋财，所以不能接受这种东西，结果到了乡村，变为行政上的摊派，农民对此视为一般的负担，如抽了签，公布出头奖的号数，但却找不到得奖的人，经过多少日子，据说在关中找到了。对于工业贷款，也是旧的一套，要监督生产，所以贷款时要有复杂的资产负债报告，使借款者感到不胜其烦。因之也就借不到款，虽有计划有劳力而由于没有资本，不能进行生产。机关生产没有镢头纺车，致使劳力空闲着，要求多发一些给机关作生产贷款，银行就不干。农贷不经过政府，银行直接到乡下建立农贷办事处、农贷所，要把贷款折成实物归还，而且手续繁杂，农民不愿要。财政透支也很困难，如财政厅死了人，借5万元买棺材都借不出，结果还是拿货物作抵押，以每千元日息3元行息才借到。

1943年银行归财政厅领导，6月发行到8亿元，7月反共高潮到来，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战爆发后冬衣及各种必需品不至困难到影响作战，同时东三县棉花上市，政府既不准棉花出口，如又不买，影响棉农生产情绪，晋绥大量的出口货已送到关中，于是我们犯了如“花子拾金”的盲目乐观毛病，因此三个月大发了10亿，结果引起物价金融的大波动，财政经济、人民生活都受到了

影响。

1944 年想用调换的办法，把旧边币收回来，就发行了贸易公司的流通券，每元顶 20 元边币，预计过一年后发行新边币再把流通券收回，这样就把发行的票面减小了。以后没有改变新边币，现在把流通券作为本位币使用。当 1944 年改印流通券时，一个月发行额超过以前几个月的数量，物价并未波动，其原因：（1）主要是出口货推销出去，外汇问题解决了；（2）1943 年物价涨的猛。从这时起，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保持在 8 元 5 角（边币）比 1 元（法币）左右，即流通券 1 元比法币 2 元至 2.5 元左右。为什么规定这个比价呢？就是过去所收回的法币均价是 8 元 5 角，如要把牌价定高了，银行要赔钱，同时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外汇，也无须定价太低。

在出入口方面，边币发行以前，也是极大的入超。但那时是在流通同一货币（法币）加上外援的补偿，就把出入口的真实情况掩盖了。发行边币以后，这种情况就明显了。假如不能保证外汇供给，就不能稳定比价，因为我们一天不能不要人家的东西，就不能一天不供给外汇，1943 年后财政上不向银行透支，银行慢慢建立起家务，外汇的积累需要发行边币换回，所以形成外汇多要发行，外汇少也要发行的特点。因为贸易公司交回的外汇多，必须给它相等价值的边币，以支持财政开支与收买内地物资；贸易公司出不了货物，也要借给贸易公司以边币去囤积物资，以便市场上的周转。当日寇投降前银行准备金已达发行总额的 90% 以上，日寇投降时因物价暴跌曾降为 70%，银行曾以流通券 1:2（法币）的比价抛出法币，收缩边币，银行准备增多了。但当时因物价暴落，市场销货困难，商人及合作社周转不灵交易部分停滞，工厂部分停工，生产减少，财政上无力吸收大量物资以保证供给。不久物价回涨，第二年财政供给上受到极大困难。发行总额至日

寇投降时还不到流通券 8 亿元。现在银行准备金在发行总数的 130% 以上，但还要被迫发行，因要用边币接换贸易公司所交回的外汇。外汇中法币是必不可缺的，在需用上是占第一位，在数量上并不占第一位。数量上占 2/3 的是黄金。边区农村环境，黄金没有市场，去年银行曾制成很多首饰向外抛售，但四天以后就无人问津了，这是目前银行存在的一个特殊问题，金子在财政上不能直接支付，国民党实行“黄金国有”后，金子不能给出口商作外汇，还要通过秘密路线换成法币，所以曾想摆脱这一准备充实而不能紧缩边币的现象，还没有良法。

以上就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展的概况。下面再讲讲银行的工作。

## （二）银行的两个主要工作

第一，外汇工作。从发行边币起，就开始和法币进行斗争。这个工作就成为银行的主要工作，也是很头痛的工作，当时的方针是争夺物资，稳定金融，但斗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生产条件与交换条件。

边区的经济情况，除粮食外所有穿衣日用品甚至吃饭的碗、缝衣的针线均须依靠外来货，尤其是占极大比例的公家人所需更是绝大部分靠进口货。而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是很严密的，因而进口货的办理，必须有很大部分依靠商人。外汇需由银行充分供给，否则就不能解决军需民用。要保证外汇的充足来源，出口货必须由公家统销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陕甘宁边区翻了身，还不是仅仅依靠本区的一般出口货，主要还是 1943 年由晋绥边区的帮助才翻了身，直到现在还是处在晋绥帮助的特殊情况中。

对比价的要求，不是要求边币币值高，也不是要求低，主要的是要求稳。但应稳在什么东西上呢？陕甘宁在执行上是相对的稳定在比价上，由比价的调整企图稳定或调剂物价，既然是在比



价上求稳定，所以实际上边区的物价是随着蒋占区的物价上涨而上涨，也就是边币随着法币的跌价而跌价，只能在上涨与跌落的速度上，用牌价起相当的调剂作用，而没有根本改变这一不利形势。这种情况能否改变呢？我们认为可以改变的，但不是短时期就能彻底改变了的。其关键主要是发展生产，减少对外依赖。几年来从需要外来布棉 100% 的进口，已逐渐降低为布 50%~60%，棉 40%，就说明这种情况在改变着。用什么东西来稳定金融呢？银行准备金中有三种东西，即法币、物资、金子。因为要稳定比价，离开法币是不行的，但在准备金中，法币的比例只是保持在 10%~15% 左右。稳定物价，主要是布棉，这些都是外来货，由于封锁入口很困难，只在准备金中占 20% 左右。金子在陕甘宁边区内部市场上作用不大，但在口境上又不能不接收。掌握它还是再转出口，换回物资，才能在市场上起作用。而且还要绕得快绕得好，问题才能解决。这在银行与贸易公司均是一个很费力很困难，到现在还不能掌握主动的一个问题。

过去法币的兑换是在内地市场，1946 年实行了口境兑换，这比过去进了一步。即把换回的法币在口境上实行兑换，入口商带回货物需要法币，由银行开支票到口境上去兑换法币。比如说，入口商人要在内地银行买法币就不卖，只能在口境上兑换。这个办法有两个好处：一是免除法币侵入内地市场的机会。二是商人与我们都省却携带运输法币的麻烦。在黄金的吸收上，去年也采取了新的办法，去年看到金子的趋势是要上涨，而且物资进来困难，金子进来的多，就决定了大量吸收。即在口境上与内地实行以经济力量统制的办法，在内地市场上把金价压低，使带进黄金的人无利。比如说从口境上带进金子只 5% 的利润，带进布棉就有 20% 以上的利润，这样可刺激物资多进口，而我们公家在口境上就能掌握金价，无人争购，就便于达到预期的效果，使贸易上金融上

都得到了利益。

关于对法币的问题，有过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边币与法币只能稳定在相对的比价上，为了争取物资必须要充分供给外汇；一种主张边币应稳在物价上，法币不能充分供给。但在 1944 年以来，实际工作中所执行的是前者，不是后者。关于这个问题还未作结论，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贷款工作。银行在市场上一般存放款的活动较少，所谓贷款，主要是生产贷款，即工业贷款与农业贷款。机关部队生产贷款，则归财政厅。

1941 年至 1942 年的贷款，是由银行自己经手办的，银行派干部直接到乡村掌握，放款要折实，手续繁杂，不便于民，老百姓不愿借，所以作用不大。1943 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放款由政府去办，由各级政府与合作社去办，否定了过去银行认为放款吃亏的说法。当时决定就是大公家赔些钱，只要发展了生产，群众收入增加就是好的，利息规定为月息一分，群众得到实惠。但这样贷出的款有收不回来的，所以规定只要有正当的理由，经当地政府证明确实无力偿还者，不还也可以。这样曾经发生过毛病，这个毛病不是发展生产的原则错了，而是有些贷款经过县区政府时，没有完全放给农民，或者县扣除了区的欠款，区扣除了乡的欠款，贷款农民得不到，或者有的作了机关生产。1944 年纺织又改经合作社贷款，但也发生了县联社扣了区联社的欠款，而纺织户得不到实惠。如延安县乌阳区就发生这样的毛病。1945 年的情况与此差不多。1946 年决定 1947 年的贷款办法，国营工业由工业局掌握调剂，政府不放款，也不提工业局盈利，银行扶持农村手工业作坊合作社及农贷，所以明确的提出，农贷的对象，以劳力需要及生产需要为准则。放款原则：经过政府，依靠区乡，群众评议，银行领导。比一般利息低 60%。执行的如何，还要待今年总

结。

过去我们讨论银行的工作时，曾确定边区银行带有农民银行的性质，但如何深入农村，真正体现出农民银行的特点，还很模糊，没有摸到像太行那样正确的真正为农民服务的贷款路线。还多是在旧的办法中转圈子，银行工作从自己本身盈亏上计算的多，对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应起的根本作用上注意的不够。

在开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方面曾经试验进行过，但不广泛，用力量较少，所以成绩不大。但也证明了凡是信用事业开展的地方，可以组织休息的资本投入生产的道理，例如延安县乌阳区一个老太婆存多年的几元白洋，就存到合作社信用部。在这方面太行是摸出一些经验，应很好研究推广。

### 三、贸易工作

边区原来有贸易局，1942年前归银行领导，1942年归财政厅领导，它的任务主要负责采购工作。1943年把禁烟督察局（该局1941年底成立）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与盐业公司，分区设分公司。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盐业两公司未变。日寇投降后，土产公司与盐业公司合并到贸易公司。

土产公司的任务是专经营土产，有计划的销出，以物价政策争取必需品（布棉、军工、电讯、医药等器材），法币金子。我们在口境上用土货来换东西，什么东西对我有利，我们就换什么东西，如我们想要棉花，就把棉花与土货交换的价格，比与法币黄金交换价格提高。在这方面我们曾收到很大效果，不仅保证物资的供给，争取了出入口平衡，而且也保证了财政上的供给及财政收支上的平衡，建立了大小公家的家务，发展了生产。起了从敌

人要困死我们的难关过渡到丰衣足食的桥梁作用。

盐业公司的业务，就是统销食盐，其方针对外统销，对内自由。所谓统销实际就是对外专卖。要专卖仅靠公家的几万驮公盐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群众运输。怎么样组织呢？这就是以经济的方法为主，行政的方法为辅。盐业公司在边境买卖，是平价进出，即卖给国民党区什么价钱，收买脚户的盐也是什么价钱，虽然会因损失赔些钱，但我们也坚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假如买卖价不一致，必定会有群众走私，国民党也正在用各种办法引诱群众走私，这就会使盐业公司与群众形成对立。盐业公司的目的是要换取外汇及物资，是不是就不赚钱呢？不！钱是要赚的，不是盐业公司赚脚户的钱，而是替边区人民赚国民党的钱，这就要保持高价出售。1941、1942年在这方面的斗争是失败的，那时盐业公司无资本囤盐，国民党抓住我们囤不起盐的弱点，在出盐多的时候，他们就低价收买，我们积压不起，就得贱价出卖，驮盐的脚户不赚钱甚至赔钱就不驮了。我们曾用很大力量动员运盐，但收的效果不大，群众很不满意。

1943年改变了方针，我们在边境上囤积起来，脚户驮盐就收买下，保证脚户有一定利润，但力量还不足，也不能囤的数量太大与时间太长，在交换上只能作到少吃亏，还不能使公私都有利。1944年河南战役，汤恩伯一退千里，敌人兵逼潼关，西安搬迁，人心惶惶，国民党把经常保存的10万担盐急速卖出了。我们乃于6月6日决定把盐价提高一倍，那时准备囤它半年。阎锡山经过了23天就坚持不住，来按我们价买盐了，胜利的结束了战斗。西安坚持了一个多月至7月28日进来了二千头牲口买盐，我们又加价，就这样一直加到十几倍。这个斗争胜利了。胜利的果实怎样分配呢？第一是分给驮盐的，第二是产盐的盐户，第三是盐务局收税增加。盐业公司仍不要差价，实行了利国利民的方针，产运

者均有利，盐务局多收税。如过去运盐时期，县长县委书记委去跟着老百姓驮盐，老百姓还不满意。实行了利民方针后，用经济力量动员驮盐，群众情绪很高，正月初一还不停止。也没有群众走私，保证了统销价格的一致。群众不肯走私，群众非到盐务局驮不到盐，也无法走私。在公家说，除得到外汇物资外，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从这里，我们体验到，经济工作，必须以经济力量为主，行政（法令）为辅。同时也证明了：只有本着“公私合作”，“利益均沾”的方针，先让群众得到利益，然后公家才能得到利。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得到河东的盐，我们盐的销路减少了。1946年财政收入减少这也是原因之一。1945年冬把盐务局取消，合并到税务局里。

贸易政策是“对外管理，对内自由”八个字。所谓管理，即管住土产食盐。管的方法：经营入口的还是商人，而是以价格的高低，汇价的升降，税率的轻重来管理。其重点在于贸易公司、银行、税局三方面的结合，这点过去作的还好。出口的主要物资是统销，由贸易公司掌握。在管理上主要着重用经济力量，行政力量只是配合的。我们的管理并不是统制。同时事实上证明，绝对自由的政策是有害的。

内部市场的方针是调剂物资，调整物价。但作的不够。具体的作法，是掌握生产与消费的季节性。掌握几个主要市场，其余不关紧要的市场，就可以不管，因为这些小市场对物价无大影响。要稳定物价，主观的去压价或限价，是行不通的。贸易公司的力量主要是对外。内部市场上反对垄断，扶助中小商人，在陕甘宁边区已无大商人了。例如延安的十大家，因为社会上失掉他们销货的顾主（上中层人物的消费），加上我们货币政策，对外汇的限制，贸易上对出入口的管理，旧的带封建性的大商业资本在新社

会的市场上不好活动，只有搬走，现在剩下的只有中小商人。繁荣内部市场，就是依靠他们。对他们扶助的办法是负担上较轻，银行贷款帮助。在稳定物价方面，过去还用过南昌公司（机关生产的联合商店）去调剂，主要是贸易公司支持中小商人去作，例如1943年延安市举行骡马大会，有些较大的商店，想在会上抬高物价，结果贸易公司把货供给中小商人，抛售很多，使想垄断的商人吃了大亏。

贸易公司与合作社方面，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一方面是贸易公司集中力量对外，在合作社上花的力量较小。另一方面合作社本身的业务还多属于商业性质，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公（贸易公司）私（私人股金的合作社）矛盾还没有统一起来。听了太行的报告后，过去思想上在这方面的模糊认识就比较清楚了。去年底决定一九四七年的方针，在对内市场上贸易公司应大力扶助，但仍强调本身经营。准备把工业局改为实业公司，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市场，外来货物由贸易公司供给，再结合银行与合作社的力量，进行内部市场供求的调剂与物价的稳定。至于做的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从计划上看，还是自己集中经营多，扶植合作社以至生产者的方面较少，这是旧的作风还未完全改变。

× × × ×

根据上面三个问题的叙述，陕甘宁是渡过了困难，也多少建立起一些家务来，如何渡过的呢？概括说来，就是下面几点：

第一，贯彻了毛主席“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因此人民负担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机关部队由于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财政上负担减轻，机关部队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小公家务建立起来。

第二，出入口用土产和食盐统销达到平衡，甚至出超增加了财政税收，吸收了大量外汇，稳定了金融和物价，因之也就稳定

了财政预算。

第三，财政逐渐摆脱对发行的依赖，收支平衡，建立起大公家务。截至 1945 年底，财政透支仅占银行发行额的 3.5%。就开源方面说，正常的税收增加了，生产自给部分增加了。从节流方面说，保证必要开支，作到肃清浪费，有了长期打算，公私都有储蓄，胜利后干部出发能有路费。

第四，银行发行都能用到发展生产、建立家务上，贸易公司掌握了实物，有力量稳定物价，保证了供给，银行建立了有相当发行数字或甚至超过的准备金。

## 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

### 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

#### 一、财经工作的简单历史

##### （一）抗战开始到 1939 年

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溃退南撤，我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8 年 7 月敌陷武汉后回师华北，交通线及城市大部为敌占领，我深入乡村，要求建立根据地。

当时我已大部建立地方抗日政权，但不统一，金融方面，法币通行，还有各省省钞及县地方流通券，货币很紊乱；市场方面，有很大一批商品，从城市撤到农村，洋货充斥；生产方面，1938 年是普遍丰收，1939 年除冀南有大水灾以外，收成也不错。但由于国民党军的溃退，敌人的南下，再加上土匪和地方团队趁火打劫，负担差役繁重，民力消耗很大。敌回师华北扫荡作战，我们准备不够，空室清野做得较差，烧杀破坏损失奇重，多年积蓄损毁大半。较大之地主绅商除少数外，多逃至蒋区或投往敌区，我区之大商业全部垮台，原有少数小型工厂、或被敌破坏或被迫停业。群众生产情绪低落，但在抗日动员下，群众有初步发动。

这时期，我军供给上极紊乱，山地实行阎锡山定的合理负担，也开始设立税局，但所得很少。军队供给主要是法币外援，粮食是就地取给或代购。在冀南依靠各县供给，一部分为商会摊派，一



部分为乡村摊派，还搞了一部分富户捐。军队到那里由那里供给，人民负担苦乐不均，菜金无法供应。对敌占区游击区是“殖民地”观点，乱抓一把。山地平原都曾发行过一些流通券，对军队供给很少，财政来源很困难，开支也很浪费。

在经济工作方面，开始对敌实行经济绝交的方针，禁止各种货物资敌，结果大量走私，产生了乱没收现象，外货大量侵入，限制也不严格。1939年开始公营商店大部分称为合作社，有专署组织的，有部队组织的，也有各县摊派股金成立起来的，名目很多。

这个时期财政上很混乱，经济上缺乏明确政策。

#### （二）1939年冬冀钞发行到1943年秋灾荒渡过

1939年夏敌回师华北进行扫荡，边区形势日益严重，敌我斗争日益紧张频繁，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展开了一系列的长期斗争。敌寇一连串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在经济上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各省县伪合作社，物资对策委员会，及各种经济特务组织；伪钞已在华北各城市占领市场，并大批发行夺取物资，对我进行了极残酷的掠夺与封锁。

根据地内部，没有及时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发展生产。1942、1943两年发生全区性的大灾荒，平原最严重的地方死亡达15%，逃亡达60%，敌占区有许多无人区，物资缺乏，人民贫困，财政经济非常困难。

在财政方面，自1939年10月冀南及太行同时发行冀钞，1940年3月冀鲁豫发行鲁西票，1939年秋，冀南部分地区实行公平负担屯集了公粮。1940年4月黎城会议提出了统筹统支，反对浪费。1940年9月北方局高干会议又提出了“量入为出”。财政工作开始有些规模，但用力很大，无论山地平原1940年、1941年都是一再突击屯粮工作。除了春耕运动，大半年中进行财粮征收检查，但军队供给，仍未很好得到保证。实现了统筹统支，预决算制度建

立起来，粮食行政漏洞很大，重款轻粮，浪费损坏很大。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年年费很大力量检查黑瞒地，检查屯粮。在负担政策方面，实行了公平负担（平原）及合理负担（山地）平原并废止了田赋。在保护与奖励生产上，负担政策方面开始起了很多作用，群众从负担法令中了解我党对生产的政策。在山地贯彻合理负担评议及反隐瞒斗争，当时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斗争。1942年以后，平原根据地变质，游击性扩大，统筹统支制度受到阻碍，改以专署为财政分治单位，灾荒中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平原减去一半人员，减少 2/3 的负担，山地减少负担 1/3。1942 年秋，中央提出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辅而行的财政方针，山地实行统一累进税。以后从 1943 年也把田赋取消了。负担政策的贯彻，财务行政的执行，公粮的保管，都有了成熟的办法。

贸易工作方面，1940 年起明确了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而且确定了对进出口贸易的奖励、限制、禁止等三项具体方针，税务局、贸易局普遍建立了起来。当时情况，除通过统一市场，巩固冀钞以外，对敌经济斗争不能不用很大力量去搞。在平原是一连串的反资敌斗争，反对抓丁，反对灌仓，反对抢耕牛等等斗争；在山地则建立了对敌封锁与反敌封锁的斗争。

由于敌我形势的差别，山地平原创造了两套不同的办法，平原以组织群众性的各种反掠夺斗争，以抵制运动为主，山地则以比较整齐的对敌封锁地带，实行管制，并以公营力量等组织对敌斗争。

经过 1940 年、1941 年两年的努力，进出口贸易大体上平衡，保护贸易及减少对敌依赖一年比一年有进步。山地的造纸、毛巾、纺织、肥皂等工业做到自给，印刷上军工上许多材料以土产代替了外货。1942 年粮食斗争，贸易斗争，货币斗争相结合，取得很好成绩。这期间产生了投机思想，1943 年 7 月太行分局会议得到

了纠正。

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1942 年贸易局、税务局合并为工商管理总局，1943 年冀南冀鲁豫把银行与工商局也统一起来，统一力量，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掌握季节性的发行与贸易相结合，支持生产，克服灾荒。

灾荒当中贸易局工作在调剂粮食种籽，组织运输，扶植建立合作社，帮助各种副业生产，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经过灾荒与群众共患难，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改造了贸易工作，开始知道贸易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为生产服务。

在对内地市场管理方面，平原创造了交易所的办法，山地则组织了商联会。

金融方面，冀钞发行后，第一个问题是扫清土杂钞，有的兑收有的禁止流通，经过行政力量，也经过经济斗争逐渐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法币问题，当时在敌占区也是法币与伪钞的联合市场，我们在思想上认为法币有外汇，是国币，冀钞要以法币为准备，实际上不承认冀钞的独立性。1940 年宣布保护法币政策，禁止以法币做交易，但承认法币可以交款纳税，仍然暗有流通。1941 年 2 月中央对法币指示，才对法币实行了排除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法币的态度也改变，因不能再套取外汇，停止了掌握法币掠夺物资的办法，采取了彻底排除法币的政策。我们和敌人的交易，才抛弃了法币的中介，冀钞伪钞发生了直接关系。但在边区南部是国民党地区，法币和我们的关系仍很大。平原内地法币力量很雄厚，由于我之发行额太少，也由于历史传统，没有占领市场，对我损失很大。山地在 1941 年后半年已大体肃清。平原到 1943 年才用很大力量组织交易所，经过它的作用，用行政强迫把法币排走，斗争是很剧烈的。到 1942 年中条战役后，太岳南

部的法币也肃清了。

与伪钞的关系问题，开始时是很天真的，为保持政治上的纯洁和尊严，不接收伪钞，宁愿通过法币与伪钞发生间接关系。山地 1941 年把法币肃清后，不得不和伪钞发生关系，才产生了本区的外汇问题。在这以前，国民党夺取我们的外汇，利用我区之出口换取他们荒淫奢侈的物品，并向大后方走私，对我损害很大。我把法币清除以后，这种现象才停止了。太行从 1941 年起实行了外汇管理，对敌贸易斗争和货币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并开始利用不同地区外汇差额打击了敌人。随着对外贸易管理的日益完善，外汇的掌握运用减少了盲目性，增加了主动性，逐渐比较有计划可以使用外汇力量了。

在生产方面，口号是提的很早，但由于没有把农民发动起来，没有找到领导人民生产的道路。生产运动是“仁政”观点，给群众办好事，每年有一次春耕运动，组织送粪耕种，提倡养鸡喂猪，下半年又忙于其他财政、参军工作了，因之收效很小。1942 年灾荒开始也是以救济为主，一方面减少负担，一方面大量贷粮，并领导了群众的粮食斗争。这个救济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空前地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1943 年更进一步的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针，救灾工作深入群众，这算是首次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因此在生产救灾上有丰富的群众创造，使党的各种工作在作风上都有很大改造，经济工作从此才进一步接近了群众。经过生产救灾，手工业副业有很大发展，在山地，纺织运动有飞跃的发展，准备了布匹自给的基础。

工业生产方面，军工工业有很大进步；政府国营工厂在 1940 年时，太岳区因敌人扫荡大半已停业，冀南有生建局，太行有生产总社，都经营着许多工厂。由于机关化，不讲成本，脱离市场，多数赔钱，以后都并入工商局，几次扫荡损失很大，1942 年后，太

行各工厂转变路线，改为职工合作社，或公家投资私人经营，情形方开始好转。

合作事业有很大发展，主要是山地，为 1944 年组织起来大生产准备了基础。生产贷款工作，经过生产救灾运动也有很多进步，生产贷款的数目有很大增加，1941 年 1200 万元，1942 年增至 7000 万元，1943 年增至 19500 万元（商业贷款不在内）表现发行政策上也有进步。

整个这一时期，财经工作有系统的建立了起来，在国民党断绝供给下也保证了供给。平原在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也进行了各种必要的措施。抗战期间，财经工作的各项基本经验，这一阶段中大体粗具了规模，找到了门路。但是由于农民没有发动，大生产运动没有起来，在财经工作上重财政轻经济，强调对敌经济斗争，忽视扶植生产。财政供给工作一般的也可说接近成熟了。平原不说了，即山地收支也逐渐快达平衡。

经济工作一切以发展扶植生产为主，在这一时期末了已经明确了。经过救灾，在生产问题上已经指出了只有人民大众自觉的生产运动，才能把生产搞好，以群众丰富的创造，可以克服困难，创造财富。“仁政”观点的领导生产、领导救灾，都不是基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 （三）1943 年秋到 1945 年反攻胜利

这一个时期，是在生产救灾运动以后，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发展着的二年，减租减息全区各地都在进行，在重点上略有不同，生产运动是贯串全年全区的。这个期间的财政问题，在既有的基础上组织开源厉行节流，困难减少，一直到反攻时期，才有透支。

在生产方面，1943 年秋的中心问题，是组织扩大种麦，贷出了极大数目的麦种，冬季生产比往年也有发展，提出了冬季准备

工作，从冬季起就为明年生产做准备，反对了农暇松气的说法，生产贷款也提早在冬季发放，贷款总数增加到 34490 万元。全区规模的纺织运动，在这一年冬季发展的很好，山地许多向无纺织习惯的地区也发展了起来。

1944 年春耕，对灾民的支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耕牛卖了，没有吃的。冬季生产特别是纺织得到些粮食，一部分由互助组劳动中解决了，但仍有许多青壮年不能劳动，也用了很大力量予以支持，冀南曾贷出六百万斤粮食，支持灾民春耕，太行贷出粮食三百万斤，快到麦收时候，严重的蝗灾来了，接着组织了打蝗运动，这个运动把一切人民都组织起来了，动员的范围是空前的，群众的组织力也是一次最大的考验，蝗虫消灭了，保证了麦收秋苗、灾荒才算基本上渡过去。互助运动全区有发展，太行区在等价交换自愿结合及折工记工问题上，大体上在群众中得到解决。金黄后玉菱推广成功，这一年年底的劳英大会，推进了 1945 年的生产工作。

1945 年平原重点是减租，对生产运动没有用很大力量。太行区继续生产运动，副业生产提高，并以提高副业生产保证耕三余一。小型合作社开始发展，种棉面积有很大增加，这一年生产贷款较上年增加 1 倍，全区共 69978 万元。

合作事业全区有很大发展，太行小型合作社发展起来以后，对大合作社由商业消费为主，转向扶植生产，为生产服务的方向，有很大影响。单纯营利的合作社逐渐得不到群众拥护。

工商工作在扶植生产上继续有进步，太岳贸易资金 60% 以上投入生产，开设小型工厂，扶助合作社，组织山货出口。开始时着重于自己经营，以后很快纠正，扶植群众生产，为群众服务。太行除大力解决食盐供给外，主要工作是吸收棉花，以支持灾荒当中发展起来的纺织运动。1945 年组织造纸、运输、纺织三大公司。

平原工商局组织了很大的力量调剂耕牛种籽，组织发展养蚕，发展小型工厂，提出多样性生产，1945年在冀鲁豫发展种靛给予多方面支持。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灾荒物资贫困，仍继续贯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如太行提倡以火链代替火柴，火柴入口由每年4800箱减到600箱，平原自1941年灾荒党政民普遍倡用火链。其次是大量组织输出，太岳太行均有成绩，在个别商品上因过分强调价格斗争吃了亏，但山货出口数量均有很大增加。各战略区间的外汇调动和对敌伪洋行的直接的物资兑换，也有不少成效。

在金融方面，提出了经常的货币收缩，明确了贷款的生产观念，深入下层组织贷款工作。在发行方面，为避免各战略区间物价的互相影响及各区便于掌握货币的市场情况，实行了通货管理，即各区不同的版样，互不流通。为适应农村生产季节的需要，平原于1943年开始发行限期流通的本票。

这一个时期当中，发展生产为生产服务的指导观念是明确的，群众生产运动有很大进步，而且群众自己也有了总结；公营工商业及银行贷款工作，在为生产服务上也是有成绩的，但由于1945年秋反攻胜利进入城市，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提高。这期间的财政供给工作，不只保证改善了军政的供给，以及经济文化建设费用，而且为反攻作了应有的准备，如没这一着，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供给是不堪设想的。

#### （四）反攻胜利到现在

日寇宣布投降以后，当时最大的任务是集中部队收复失地，军费骤增。接着上党平汉两个战役，全部工作面向敌区及战争勤务，发行骤然增加几倍于抗战期间的总发行。但因地区扩大，财富增加，又增加不少中小城市，物价反而大跌。公粮卖不出，财政上

困难很大，农产品跌落最大，与工业品差额增大，农民也吃亏很多。货币发行赶不上胜利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军事胜利时货币发行的充分准备，这一次给了我们很大教训。

1945年、1946年的秋收种麦，由于战争勤务，在大多数地区是由老弱妇女劳动完成的，区村的以至于几个村的大变工解决秋收种麦问题。冬季副业手工业及运输都受抗日战争胜利的刺激，有很大发展。太行区在1946年提出了农副业结合贯穿全年的生产方针，全区生产贷款1946年春增加为14万万元，1946年秋又增加到27亿元。解放区广大的结果，使许多抗战期间衰落了的手工业发展了起来，商品的交流，得到很大解放，运输业发展了。经济情况有很大的改善，全区自给能力提高了。一年来从全区的反奸复仇运动到土地改革运动，使全区人民经济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中。

在财经工作的指导上因对和平估计过高，犯了错误，吃了大亏，把已经宣布的预算减轻了一次负担，在最不利的季节来了一个屯集性的发行，使物价发生破坏性的上涨。

发行和财政统一，这是胜利后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这个统一使得自卫战争得到有力的支持而减少若干困难。但在集中统一上也有些问题，到九月财经会议才从财政方针和财务行政上解决了。

在经济工作方面，解除了武装，除冀鲁豫、太岳及少数城市外，工商局机构大部取消，强干部集中城市，对外贸易管理单纯的依靠税收政策；对内因忙于建立党的家务掌握物资，争相购买互相管理限制。幸而在7月临崖勒马，停止了发行，才重整旗鼓恢复旧制，准备对国民党的经济斗争。这一年当中经济工作走了一段弯路，工作损失很大，物价上涨平均5倍，群众损失也很大。1947年开始才完全结束了这种工作上及干部思想上的混乱，重新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道路。财政供给工作由于爱国自卫战争爆发，开支浩大，目前又处于困难的关头。今后将是一



段艰苦斗争的局面，仅仅根据旧的经验已不能应付今后的局面，还须有很大的努力和创造，把工作再提高推进一步，才能减轻困难，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

## 二、贸易工作

抗战期间，贸易工作是建设根据地与坚持根据地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在山地贫乡僻壤中建立了市场，在平原广大而且众多的集镇中，建立了我们的控制力量，以对付敌人。它支持了抗日的货币，而对抗了敌寇的伪币。它刺激并保护了根据地的生产，支持了根据地独立自主的经济秩序。它又帮助了财政军需上的供给，克服了灾荒的困难。但由于贸易工作是我党比较生疏的一项工作，我们对这方面的实际知识是很缺乏的，曾经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很多错误，才摸索到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还不是很成熟的。在反攻胜利以后，我们占领了不少中小城市，我党又贯彻了土地革命，解放区经济发展开始了一条新的道路。抗战期间的经验已经很不够满足新的要求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些贸易工作的问题和经验，以抗战期间的为多，反攻胜利以后的较少。

### （一）对敌贸易斗争

1. 首先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不能不和敌人进行交易。开始我们和敌人在经济上的接触是天真而幼稚的，一方面怕资敌，什么东西也不愿卖给敌人，这受两种思想的支配，一是怕为敌所利用，二是供给我战争需用，因而，对敌方来的东西，什么也要。另一方面是强调政治的尊严，鄙视和硬不承认伪钞外汇，这种脱离现实不敢与敌人接触的情形很快就克服了。因为，有些物资，敌方有，我们无，非买回不行；有些东西，我们很多，即使非敌必需，也非卖给敌方不行，而且这种交易，为我边区人民生活所必需，

为长期战争所必需，为生产所必需（有些物资卖不出去，就不再生产了。）

在对敌贸易斗争中争取有利交换，就要进行价格斗争。因敌强我弱，又不能不与之交易，有利只是少吃亏的意思，价格斗争亦有一定限度，以我之农村，对敌之城市，难做到等价交换，在适当利益上，就应当多出快出，迅速进行交换，否则，便会失掉机会，造成损害，如 1944 年太行桃仁，太岳药材，就是因等待高价未出了口。因此即使在出口极端不利时，也要藕断丝连，少出慢出，保持一定联系，待机而动，否则，也会失掉机会。

某些禁止出口的物资，有时也不能采取绝对封锁。当敌抬高物价大量吸收时，如单纯封锁，会造成走私，和群众对立，而我一无所得。应该特许出口，征适当的税，把这个出口力量组织起来，换取我之必需品，或换取外汇，以之打击敌人，这样，就会少吃些亏，否则，物资外流，税也收不上，群众还反对。

敌人和我们也一样，不能不和我交易，这就创造了我们能够进行贸易斗争的前提。忽视这一点，不看重对敌人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会犯错误，无组织的放任的出口也会变成资敌。

2. 对外贸易斗争，由于经济的敌强我弱，对外贸易的形势是入超。战略上我们是防御的，但战术上必须是进攻的，这就是争取主动少挨打。战略上的防御，表现在我们保护生产的出入口税收，限制入口，管理外汇诸政策。违反战略防御的原则就会犯错误（如太行区 1942 年的粮食斗争，在西线有很大胜利，但东线出口不慎，倾全力以进攻伪钞，1943 年春的打倒伪钞之提出，结果损失了力量，伪钞不但未打倒，反而又抬了些头）。但如只有防御，便会形成死挨打的情况，还必须组织进攻，争取主动少挨打。这方面主要是组织出入口，提高出入口的计划性，平衡出入口贸易。具体的说：

(1) 要咬紧牙关，少用外货。这样才能减少对敌依赖，机动使用外汇，才能把出口力量集中解决我主要困难，减轻外汇的被迫性；(2) 要做到入口严，出口宽。单纯限制入口不行，主要是大胆组织奖励输出，对敌所迫切需要不可少的争取高价，其它出口物资则争取数量上多出；(3) 组织群众性的点滴出口，细水长流。这是以群众路线，创造大量外汇，点滴换入必需品，以对付敌人集中的封锁管制，打破敌人的封锁。在入口上我们是缩短战线的办法，在出口上是扩大战线；(4) 单纯以分散对集中也不易进行，因我之入口需要集中，出口分散时当然也有困难，必须掌握主要物资（出口顺利，有相当数量的）集中管理，起拳头作用，对抗敌人集中管制，支持货币斗争，保护点滴出口。

3. 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基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增加物资力量。这样，才能逐年增加主动，减少挨打。单纯注意对敌斗争，即使工作做好，还是被动挨打，对敌斗争的胜利，最易使我们麻痹，造成过高估计对敌斗争，忽视生产，发展投机思想。

同时，对敌经济斗争，也正是为了发展生产。从工业方面看，对外贸易的保护，是一切自给工业的必须保护，抵制外来品，组织对外输出，才能保护市场，扩大市场。为了刺激自给工业迅速发展，还须忍受一时的痛苦，坚持保护政策才行。另一方面，只有自给工业质量上提高，数量上增加，并减低成本，才能有效的实行贸易保护。否则，外货还会走私进来。从农业上看，对敌贸易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减少剪刀差额，一方面保护自给工业，减少外来必需品，一方面是支持货币斗争，平稳物价，进行有利交换。

4. 敌我贸易斗争很剧烈，且结合着军事、政治及货币斗争，斗争方式必须机动灵活，不能死守成规。

出入口经常是不平衡的状态，但又经常向平衡发展，绝无固

定平稳的时候，这种运动灵敏的表现，在两种货币的比值上。入超时以降低币值，物资外流来偿付，出超时，我之币值提高，非必需品挤进来。但当敌人高价吸收我物资时，我之币值虽提高，物资仍大批外流。

由于变化复杂而迅速，有时可以运用货币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来支持贸易斗争的要求，但人为的制造物价或制造汇价，只能起短促的兴奋作用，不能持久。

由于斗争的复杂，单纯的兑货办法或单纯的要敌钞外汇，都不能进行斗争；单纯的封锁或不封锁，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产生了多样性的办法，如特许入口，定量入口，临时停止进出口等等。行政力量，在贸易斗争上，只能是次要作用。

5. 对敌贸易斗争指导思想发展上有几个阶段：最初是单纯货币斗争，以行政力量禁止使用伪钞，不晓得以贸易手段占领市场，驱逐伪币。单纯封锁出口（怕资敌观点），对入口管理较松（把奢侈品当做必需品的城市观点）。以后重视了对敌贸易斗争，着重实行税务管理，重视限制入口，忽视组织出口。以后重视了出口，但在组织对敌斗争力量上忽视了群众力量，着重公营力量。公营力量不大，就提倡行政、经营相结合，愈发展力量愈集中，就产生了大投机思想。再以后重视了群众性的点滴出口，并组织群众性的走敌人的私。最后才认识到单纯对敌斗争不行，必须发展生产。

## （二）物价问题上的几点经验

在物价问题上，我们的思想变化的经过是这样：在 1943 年以前，是平抑物价的政策，实际上是低物价思想。这种思想受两种影响，一种是受发行货币的教条的影响，怕物价高，一种是敌人低物价政策的影响。以后物价陆续上涨不止，平抑不了，对物价问题曾有长期的苦闷，平稳物价的工作在经常进行，但思想上有很大的盲目性或神秘性，在估计上恍惚而无把握。1943 年夏才明

确提出了平稳的物价政策，但由于发展生产的思想仍未打通，单从抽象的物价问题上打圈子，把物价问题过分当做一个独立的范畴去考虑，仍没有解决问题，以致到 1943 年冬季太行区发生暴涨，1944 年夏又发生暴跌，都很严重的打击了各种手工业生产。平原在 1942 年以后，物价一般是平稳上涨的。

根据几年工作体验，提出以下几点经验：

1. 平稳政策。战争期间，物价总的趋势是上涨的，但中间也是有涨有落，不是笔直上升的。平稳政策是可以做到的，历史上的几次大波动，都是我们在工作上有缺点，有错误。

2. 发展生产是平稳物价的基础。解放区的物价运动，除了天灾和军事的影响以外，基本上受两种主要影响。一个是财政赤字，一个是物资缺乏（战争损失消耗，敌人掠夺封销，生产不能自给等）。这两个问题只能由发展生产解决。因之，发展生产是平稳物价的基本环节，认真的贷款投资发展生产，减少财政上的被动，减轻对外的依赖，才能有独立自主的物价政策。除此以外，其他都是技术性质的。物价来自财政方面的影响，就是货币发行问题，因为财政发行最容易被动，对物价影响极大。经验证明在发展生产上，适时适当的投出货币，一切财政发行要适应生产运动与市场要求，对物价的刺激就小。

3. 组织圆滑的物资周转。除了发展生产外，通过贸易工作平稳物价是主要的日常工作，但不能单纯靠贸易工作解决问题。全区性的物资掌握和调整，贸易机关和公营商店要负一定责任，因为只有他们掌握全区情况与大量物资。公营商店如果能以适当的力量，经常掌握并周转少数重要物资，物价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稳定。但这只能在物价发生波动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力量。经常的物价平稳，要靠市场的自然的物资运动。抗战期间，私商少，机关商店规模也小，这个自然的物资运动不大，胜利以后，这个力

量发展了，须引起重视。当物价发生大波动的时候，这些力量如不组织会变成破坏性的力量，所以要以大公经营力量为主。

4. 解决物价上的几个主要矛盾。(1) 季节性的矛盾。物价的季节性是农村自然经济的特点，土地问题解决后，季节性的物价差额可能缩小，但仍须加以调剂和注意，使其一定缩小。解决的办法是：第一，财政上征收货币时，要在春季和秋季以前举行；第二，国营商店必要的吸收调剂。(2) 地域性的差额。这是由生产分布的不平衡产生的。解决的方法是实行自由的贸易政策，发展运输。(3) 不同种商品的价格差额。第一种是减少剪刀差额，即外来品与土产品的差额，解决的方法是调整出入口税，努力打开土产输出，而以组织输出为主。第二种是保证手工业的利润，即合理的调整，土产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差额，积极的办法是放手发动手工业生产（当然要有计划性），并积极推广销路，实行保护贸易。

5. 市场管理。经过市场管理平稳物价的办法，不能有过高估计，在应付暴涨上有一时的效果，但也须继以物资力量。通过商联会及商人支部等群众路线，比强制的行政命令更有实际效果。

### （三）公营商店

#### 1. 公营商店发展的历史。

游击战争一开始，财政上要求独立自主自找办法。敌后局面形成后，整个经济上要求有自己的一套才行，公营商店就出现了。开始是军队先有，其用意在于弥补财政开支，政权统一后，归了政府，任务就扩大了。首先是恢复与建立集市，团结商人，调剂内地物资，推行本币，扫清法币杂钞。市场巩固后，就发展对外贸易，进行山地平原的物资交换。通过公营商店直接的对外贸易经营，发现了问题，创造了经验，配合行政管理，领导了群众的出入口经营。1942年后，又逐渐发展了敌我区间公开的物资交换协

定，与敌进行交易。救灾运动中公营商店用经济力量帮助生产，调剂粮食，起了很大作用。1944年以后，山地提出了扶植合作社的中心工作，平原提出了多样的发展生产多样的支持生产，公营商店的力量，有重点的放在发展生产上。

## 2. 公营商店的任务与性质。

在整个抗战期间，公营商店在支持本币平稳物价上有重要的功绩（因为这方面经济力量为主，行政是次要的）。这就直接间接的保证了供给，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生产。从总的方面讲，公营商店的任务是刺激生产，平稳物价，保证供给。但就公营商店的岗位上看，他的主要的工作，还是平稳物价，把这一项做好，其他也能做好。因此公营商店的具体工作应当是：（1）调剂季节性较大的物资，起全区生产上总的吞吐作用。（2）对保证供给有关的若干重要商品的经营调剂。

从公营商店的性质上看，它是一种国家经济，是国家经营的事业。国家事业是对私人而言，对敌人而言，从这个性质上讲，公营商店必须从长期建设着眼，从全体利益着眼，简单的说就是对外要敌我分明，对内要不与民争利，这才能区别于私商。

## 3. 经营与行政相结合，是几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

但这很容易产生错觉，在对外贸易方面，容易了解为公营商店与行政力量相结合，实际上有此偏向。对外贸易的行政就是管制，经营就是群众物资力量，应该说是公私经营力量与管制相结合。在对内贸易方面，经营与行政相结合，等于公营商店加上工商行政，对付群众，这种结合，一般的说来有害，在物价不稳时，结合以对投机商人是可以的。

## 4. 公营商店在经营上的几个问题。

（1）赚钱问题。因为对公营商店要求财政任务，又要求扶植生产，而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为群众服务与赚钱之间的矛盾。曾

经有过恩赐观点，也曾经有过单纯营利观点。一般的说，强调财政任务，会影响投机赚钱思想的滋长，因而公营商店最好不给财政任务，如能在平稳物价上做好，掩护发行，保持预算水平，利益也是很大的。但这并不是说公营商店不应当对财政上有所补助，同时在物价平稳的情况下，公营商店愈能为生产服务，就愈能赚钱。除了救灾等特殊情形以外，以公营商店的赔钱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不一定能发展起生产来，因商店无利润时，群众也不会有利润。在平稳物价的工作上，也不会赔钱，所谓平稳物价，无非是贱时买贵时卖，或低地买高地卖。这却是合乎市场要求，又都是赚钱的办法，而且又完成了平稳任务。因此公营商店赔钱是毫无理由的，公营商店的资金还应该按实物计算其盈亏量，不能单从货币上要求保证资本。这样才能保存其力量。领导上应该强调扶植生产，平稳物价，政治任务能完成的好，就不仅不可能赔钱，而且应该赚钱。

(2) 资金及周转问题。分散的农村经济及小手工业生产，在生产规模（小）和生产的季节（长）上，要求有较大的商业资本做支持，这是目前商业资本比例较大的原因，表现在公营商店上更是如此。这就在客观上给了公营商店一个资金大、周转慢、利润小的原因。造成资金大，周转慢的还有主观上的原因，即宜于分散经营的，我们把它过分集中了。如太岳之铁货、蚕丝，太行之竹器，可以让群众经营的，公营了，再如太行之山货。

(3) 组织路线问题。机构变动太大，一年三变，干部不安心。党的工作弱，一般要求技术好，政治上帮助不够，对党的关系很淡，有半年不过组织生活的。政治上的进步赶不上业务上的进步，尤其去年转变后，从别系统调来一些负责干部，更使原有贸易干部感到无前途，所以现在还存在一些意见。

(四) 商人政策问题



1. 商人的变化。老解放区，当抗战开始后，从敌占城市移到根据地的商人少，而由根据地搬走的多，根据地只留下些中小商人。又由于负担政策及游击战争环境，坐商铺商大大减少，小商贩大大增加，同时，资本有很大分散，这些商人大半是战前作店员的。抗战期间，极少数商人，积蓄了些资本，大都拉些机关公股做保护，或分散投资分散经营，不敢大胆发展，许多商人变成公营商店、合作社及机关生产的干部了。抗战期间，也产生了一部分新的私商，就是荣退军人，也大部分是中小商人，他们在思想上是无拘束的。总的特点是私商由大而小，荣退军人是由小而大。

新解放区，主要是城市，这里的商业经我们收复后，一般是萧条的。因为城市中的商业，大部分是卖解放区禁止入口的货，这些货，现在没有来源，同时也没有主顾了。市场性质基本上起了变化，过去是殖民地市场，是买办的封建的市场，现在要成为农村的市场。“隔行如隔山”改业困难，有些连资本跑到天津等较大城市去了。这部分一般的是斗争对象。有些关门歇业，改为摊贩。今天新的顾主，是广大农民，他们需要的是手工业品，城市商人和这个新的顾主及手工业品暂时还建立不起联系来，而本身还不能一下变成手工业经营，所以表现萧条。但有些商人已经改营手工业的，以铁工厂、肥皂厂、纺织厂、纸烟厂为最多，这些都是欣欣向荣，利润很高，这是一个发展的方面。经营出口山货土产及解放区奖励入口的货物的商业，也是欣欣向荣，利润很大。这也是一个发展的方面。从这两个发展的方面看，今后城市工商业者必须适合解放区经济发展的方向才能发展。过去买办的封建的道路必定消灭。

2. 目前党内对商人的看法，普遍存在着极大的偏见，妨害着党的事业。什么偏向呢？（1）怕商人赚钱。一看见商人赚钱就眼

红了，这种思想，从抗战以来一直存在着，因此商人自己也怕有钱。(2)认为商人赚的钱都是不合理的。商业是一种低级行当，对商人还是过去那种农工商的看法，有的地方合作社卖山货，就说合作社搞商业走弯路了。这种偏见的结果，就是不能给商人以一种正当的政治地位，对商人在抗战期间的贡献未给适当的评价，而只看到他的缺点，对商人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未加估计，没有把商业当做解放区建设中的一部分。

3. 商业政策，特别是商业行政，我们从来是由主观要求出发的，很少听取过商人的意见，对商人的意见及商人的民主要求考虑不够。目前存在着对商人的重重束缚，最大的问题是贸易不自由，行动也不方便。去年建立了一些公营企业，因以私人面貌出现，普遍感到存在困难。这些困难即是妨碍正当商人发展的因素，而帮助投机捣鬼商人更加活跃。

4. 对商人政策，必须注意解决。在群众运动中牵连到商业问题，邢台提出了对于旧的商业是打垮后再改造呢？还是在旧有基础上改造呢？如打，是打垮那些？不打垮那些？改造又怎样改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说对商人一般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如何团结改造？对各种大中小商人又有何种不同的具体政策？如果节制资本，节制到甚么程度？大中小商人又如何区别才合理？如果说小商人是我党的基本群众，商人联合会是否与农工团体一样，为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之一？以小商人为骨干的自卫队武委会，是否与农村武委会采取一样的活动方式？如何照顾这些团体活动与营业上的矛盾？

#### (五)贸易工作上的几个问题

##### 1. 贸易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由于抗战期间一切为了战争，及长期的财经困难，各种工作从抗战需要出发的多，从人民生活出发的少，造成长期的重财政

轻经济，贸易工作也是如此。贸易工作在抗战期间的两个任务，一个是保证供给，一个是刺激生产，对前者的要求多责备多，对后者的鼓励少总结少。

由于群众未发动，不能造成大规模群众自觉的生产运动，因此贸易工作在刺激生产方面，也是从上而下主观要求出发的多，根据群众要求从群众中来的少。单纯运用公营力量结合行政指挥群众方面的多，启发群众力量，组织群众力量为群众服务方面的少。

1942、1943 年的生产救灾，及 1944 年的生产运动以来，贸易工作有基本的改造，但还是不完全的群众路线，只是从上而下的配合作用，是和生产运动的接头，还没有产生出新经济的、从生产运动发展出来的贸易工作路线。今后的领导任务在于有意识的创造这一条道路。

## 2. 贸易工作和各方面的关联。

(1) 贸易工作为生产服务，基本上是两个工作，即平稳物价和打开销路。

物价问题中包括三个问题，第一是调整季节性的差额。第二是调整外来货及土产品的差额。目前对这两个差额，还没有绝对的控制力量。第三是保障手工业的利润，办法是保护税，减轻负担，贷款等。除此以外，还须有经常的平稳物价的努力，平稳就是为了刺激生产。

销路方面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改善运输，一个是组织出口。销路打不开，不能增加生产。在群众发动以前，生产的发展以贸易刺激为主，贷款的作用不大。手工业方面，保护贸易为主，贷款的作用也不大，群众发动以后，贷款会有很大的作用。

(2) 对于货币，贸易工作是后盾。对敌经济斗争以贸易斗争为主，对内平稳物价，保护货币以及掩护本币的发行，以贸易工作为后盾。在解放区发展的前一段，对内对外支持货币，均以贸

易工作为主。后一阶段生产发展起来以后，支持货币就以生产为主，前一段也有生产，但因为是自发的，没有积极的力量，表现在物价工作方面，前期靠贸易工作方面下力多，后期是靠生产运动。

扩大货币阵地，也须有贸易工作才能打开，并坚持下去。在新地区为巩固本币信用，短期内发放商业贷款很重要，经过一定阶段后，以生产贷款为主。

### 3. 贸易上的三种经济。

(1) 抗日战争前期，地区被分割，扫荡频繁，私人资本逃亡削弱，合作经济一时发展不起来，公营资本在维持根据地经济上起很大作用，说是骨干和支柱，并不过分（太行区 1942 年灾荒时，公营商店有四五处粮食调剂所还不算）。在坚持敌后根据地当中，我们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秩序，在这个建设工作中，公营商店是不可少的，在今后发展经济上还不可少。

(2) 合作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小范围的生产自给，物资调剂，成品推销，平稳物价等任务，合作社都可以负担起来，而且是从生产者群众的要求出发的。这时公营商店就逐渐让出这个位置来，把它的力量集中经营一些有关国计民生业务，即调剂季节性较大的物资，在全区生产上起一总的吞吐作用。这个任务，私人商店和群众合作社以至机关生产一般的是担负不起来。

(3) 与合作社发展同时，私商仍没有得到发展，但发展了一大批机关生产商店，这些商店资本是公的，但无组织无领导，在社会上发生的作用是私商的作用，而且大都是坏的私商作用（在保证供给上功劳很大，不能抹杀），从它的资本看，它的力量不少于公营商店，他们几年来受的机关教育多，真实的商业经验本领少，如果我们在平稳物价上做的好，无机可投时，这个力量也将被迫成为一个有积极作用的贸易力量。

(4) 私商在抗战期间发展很慢,以小商人为主,占领城市以后,私商力量仍是萎缩状况。土地运动未结束,生产运动没有搞起前,私商还没有发展的可能,以后也可能赶上合作经济。为农民服务,为独立自主的经济服务,对城市商人还是一门新学问,合作社却是直接参加生产运动的。因此,如何领导私商适应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来发展他们的事业,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合作社及机关生产都有党的直接领导,私商也可经过商联、工商行政机关进行一定程度的领导。因此这些力量,如加以正确的领导和组织,都不是盲目的,都可以在刺激生产平稳物价上起一定的作用。同时因为胜利后,交通大开,市场范围扩大,物资周转在数量上速度上有很大增加,在平稳物价调剂物资上,公营以外的社会力量将成为主要的力量,与抗战期间已不可比拟。

#### 4. 胜利以后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

胜利以后,打开了长期的分割局面,财政实行了统一,货币发行统一,于是产生了两个矛盾,第一个是生产贸易上全区的计划性与各区的盲目性的矛盾,第二个是在货币物价上全区的计划性与各区的盲目性的矛盾。解决这两个矛盾,就必须集中领导。否则,整个工作都成为盲目的。为适应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及敌友区情况的复杂变化,经营上必须分散。集中领导要组织全区性的物资调剂,分散经营须服从全区的计划性,并贯彻境内自由贸易。

### 三、金融货币工作

#### (一)发行工作

##### 1. 发行目的。

本区银行成立较晚(冀行成立于1939年10月,鲁行成立于1940年3月),当时发行货币的目的,虽然曾有军事透支与生产贸

易货币斗争等各占一半的规定，而主要还是解决军费的困难。这在初期政权不统一，军费筹措困难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也确实解决了不少的困难，不过在 1943 年以前的发行一般是被动缺乏长远计划。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的紧缩不发是使工作上受到了相当的影响，如开辟市场无筹码，土杂钞、法币未能及时驱逐，以及发展经济方面用的力量小，等等。

这种未能及早的建立银行及未能主动适时适当发行的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及旧的教条主义之束缚外（每人三元），主要原因在于不懂得货币斗争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的作用，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所必要的东西，因此在我们军事政治早已占领的地区远受着敌顽及地方封建势力货币的支配，未能及时摆脱这些影响，是一件憾事。

直至 1942 年后，由对敌贸易斗争中才逐渐认识到货币对保护物资及对敌争夺物资的作用。经过 1943 年的生产救灾，逐渐了解到货币对发展生产的作用，但当时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贸易去刺激生产。

## 2. 发行用途。

本区过去情况，发行偏重于保障供给，我们认为是对的；发行采取谨慎的态度也是对的。用于透支是越少越好，但如能把不可避免的透支尽可能在有利时机通过贸易周转部分、用之于供给更好。根据我们的体验：

（1）在有利条件下（地区扩大、人口增多、大丰收、物价下跌等等）即应争取时机发行一批，用以生产贷款及掌握物资，这样可使透支比例相对降低。

（2）在不利条件下（地区缩小，灾荒、季节不适合等等）除尽量减少透支外，应把生产贸易物资等各方面力量拿出一部分以抵透支（即不新发行而从旧存力量中拨付），这样虽然账面上透支

数增加，对市场则影响不大。

以上各点是在于把透支款先经过生产贸易之周转，再去供应军政费，这对季节、地区等之照顾及争取主动与发行紧缩之配合有极大好处。

### 3. 发行与紧缩。

过去由于主观的紧缩方针，处于被动，有时又不免来一下突然大发（如 1943 年秋冬季为掌握物资大发了一下，1946 年的大发），而紧缩工作也是被迫不得已时才进行的。因之，不免造成物价暴涨暴跌，这对市场及生产者是有大的影响。所以不仅发行要有计划，紧缩也更应有计划。大发行时同时即应计划紧缩，这不仅可调节物价突涨，且可使市场走上平稳。

(1) 在发行方法上，①应根据市场的季节与需要程度。②地区上应分散，不应集中于少数点线上。③时间要拉长线，不可用突击方式。④军政费透支应尽可能的经过贸易周转，减少对市场刺激。⑤发行应与货币斗争相结合，如地区扩大，形势有利，这时应有计划的发一部分，争取占领市场，逐出敌币。⑥票额大小，应适合市场情况，过大会刺激物价，过小也脱离市场。

(2) 紧缩方法。①紧缩通货是控制物价最有效办法之一，应经常注意发行和紧缩的结合，突击性的发行与紧缩均不宜常用。②紧缩必须要有充分物资抛售，作用很大。此外，还应动员所有力量，公营商店主要是起带头作用，各方力量之动员对市场心理影响很大。③大量透支应与贸易上抛售物资相结合。吸收物资及发放贷款时应与财政上的征收相结合。④收回贷款，提高利率吸收存款，也可配合紧缩工作。此种作法效用在城市大，农村小。⑤发行与紧缩的比例，根据 1943、1946 两年的经验，紧缩新发行额之  $\frac{1}{10}$  到  $\frac{3}{10}$  物价即可稳定甚至下降。

### 4. 统一发行权的问题。

冀南票发行于 1939 年，流通于冀南、太行、太岳三地。鲁西票于 1940 年发行，流通于冀鲁豫区。1944 年夏因对敌斗争便利，冀南行署与冀鲁豫行署合并，冀南区冀行之发行也与鲁行合并。1945 年 12 月全区全面发行权才统一于冀行。根据几年来的经验，统一发行是非常正确的原则。在行政统一的条件下，统一的发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行政虽统一而财政不统一，只要能照顾各地情况，发行也可统一的，反之，如财政统一，发行权必须统一。

发行统一的好处：发行权统一，便于物资交流，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虽然开始统一等值流通时，物资多物价低的地区吃点亏，这也是暂时的现象。发行统一，可更好调整物价，统一对敌斗争，尤其易于掌握用途及减少不必要的透支，加强开源节流。

但在被敌分割封锁，财政不彻底统一的情况下，发行统一必须照顾以下几点：

①生产的需要；②对敌货币斗争的情况，如争夺货币市场等；③印刷厂应按情况集中领导分散设立；④总行应经常准备相当数量印好的票子，以资急时应用。

不照顾以上各点会影响工作，在本区历史上已有经验。

在封锁分割的情况下，实行通货管理的经验是：各战略区票子分别地名互不流通，易于使各地保持一定筹码，不受满天飞票子的影响，并可防止敌伪奸商的投机捣乱。

##### 5. 发行指数与物价指数的关系。

一般的说，货币数量的增多与币值的降低是反比例的，也就是说，发行指数的上升与物价指数的上升是成正比例的发展。虽然如此，如果发行政策掌握正确，发行方法运用适当，控制物价工作作的好，则物价的上升会低于发行指数的，这是我们应努力争取的。反之，物价指数有时比发行指数上升的更快，这是应努



力克服的一面。

根据本区经验，物价之变动基本上决定于发行情况，因我区经济条件尚能自力更生，受顽区之影响不严重。

## （二）货币斗争

### 1. 货币的作用。

它是建立解放区独立自主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其主要作用在于保护与争夺物资，发展生产。所以在对敌货币斗争上，应该是打击敌人，巩固自己，但打击不是无条件的主观的硬打硬压，巩固自己也不是不照顾客观需要的高币值办法。同时，我们货币的政治性很大，所以在对敌进行斗争上，必须结合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各种不同货币比值的变化，多依从军事政治经济整个工作的变化而变化，单纯货币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 2. 坚持统一的本位币市场。

不同的货币随其发行者之阶级派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只有坚决的驱逐打击敌顽的货币，才能建立巩固我之本位币市场。对敌货币不进行斗争，采取妥协态度容忍其存在，对我们是很大损害；但只从主观愿望出发，没有足够力量及不合实际情况的硬打硬压的高币值办法，也会使自己吃亏。我们几年来的体验，在开展市场方面：

货币工作要看情况，跟着军事政治力量的发展，斟酌发行去占领市场，尤其在我军事政治力量已占优势（即立住脚）的地区，必须用大力去开辟本币市场。根据经验，只要经济条件具备（即老区物资可以去靠近的地区）是可以开辟的，即使开始本币可能发生贬值，群众不愿要，也应坚定不移的去进行，因为这是在经济上摆脱敌人影响的首要工作。

### 3. 巩固与扩大本币市场，缩小敌伪币市场。

既经开辟了本币市场，就应努力驱逐敌伪币及土杂钞，由混

合的市场变为统一的本位币市场（除非我之力量尚不占优势之游击区，才能允许混合市场之存在）。

驱逐伪钞土杂钞的办法是：（1）内地贬值兑换，向外压挤；（2）制造差额，以敌伪钞打击敌伪钞；（3）组织群众到敌区换回物资。向敌区不断扩大本币市场，基本办法是靠组织物资力量支持，其他还有（1）以市场对付市场，在边沿区要有计划的进行这一工作，逐渐使混合市场变成本位币市场，使敌伪钞市场变为混合市场；（2）开辟地下市场，积极组织游击区商店及小贩深入敌后，从事贩卖，支持本币；（3）通过交易所，掌握经纪人也很有作用。

#### 4. 对友邻区的货币。

原则上双方货币应是互不流通，互相支持，公平兑换。过去在互相支持上是很差的，总是想把自己的货币币值提高，今后应实行（1）划一定地区为混合市场，以利群众性的交易，实际上也有此地区，我们应使之合法走上公开；（2）互相代为兑换，兑换时不应人为压价，应按市场自然价格。经验证明，过去的压低办法，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兑出兑入的差额亦应降低到最低程度；（3）汇兑过去作了点，但因贸易上的关系还作的很差，今后应按贸易需要来建立。

#### 5. 对法币的斗争。

本区对法币的斗争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39年10月到1942年）开始时对法币的认识不明确，因为口号是“保护”，所以有的地区及干部就认为法币是国币，有合法地位，有外汇基础，我们是地方币，因之，认为本币高于法币是不可能的。同时又加上有吸收法币的任务，所以在排挤上是很迟慢犹豫的，直至1943年才算完全肃清。没有及早摆脱法币使本币与伪钞直接交锋，吃亏不少。第二个时期（反攻胜利之后），因对法币斗争的轻视，放

松了管理，又重复了第一个时期的毛病，其原因是，第一，抱和平幻想，觉得统一了，两种货币一样可以流通。这在上边较严重，以致形成“上松下紧”，“内宽外严”的现象。第二，反攻开始本币力量不够，不能很快占领市场，给法币以空子钻。第三，又因我们当时需要法币，大量吸收，致使法币币值抬头，造成内高外低的现象，尤其在秋后，因进出口关系，法币已大跌价，而本币与法币的比值仍维持在 1:5 左右，吃亏也不小。

#### 6. 对外汇管理。

外汇的管理及汇价的调整，应服从生产与贸易的需要，不能单纯为提高比值出发，只有管理贸易工作作的好，外汇管理才能作的好。当然适当的调整汇价，对进出口贸易也有支持作用。

(1) 掌握汇价。汇价高低首先应从进出口具体情况及我之需要与敌我区物价情况来决定。适当的提高与压低，对出口的要求有一定的作用，对内地物价的平稳也有其相当作用。(2) 掌握外汇用途。这在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必须一方面组织点滴输出创造外汇来源，另方面咬紧牙关减少输入。对外贸易尽可能的换回我之必需品，出口换回之外汇应尽量掌握，只有土票才可允许自由买卖。使用外汇要有统一计划，公家机关商店使用，必须经过一定领导机关之批准，以免浪费。私商之外汇，必须在外汇交易所中买卖。经审查合格之银号或汇兑商人，在必要时可允许他们购买或保存一部分外汇，但出售时也必须经过外汇交易所。以上外汇系指汇票汇条等而言。至于法币，在内地要坚决肃清，在边境上只准经过银行公平兑换。(3) 外汇交易所是管理外汇较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但交易所应在接近边境进出口繁盛之城镇设立，内地一般不设，如设立只限于有特种出口货，便于管理的地方。交易所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公开的外汇交易市场，买卖价格公平自由，对商人方便且适合他们的习惯，对银行也便于掌握吞吐。

必须善于团结改造经纪人，了解他们的特点：首先，照顾其利益，给他们一定的手续费，使其有利可图。其次，要不断的开会说服教育，使其了解我们的政策，遵守交易员的规则，肯为交易所服务。再则，要注意缉私及检举工作，利用合法经纪人监督非法经纪人，团结大多数，清洗坏分子，团结正派分子，改造落后分子。

(4) 掌握挂牌价打击黑市。首先，与各地交易所及银行要建立经常交换情报制度，了解内外行情。其次，银行应准备足够力量支持交易所，灵活吞吐以平稳价格。另外，应严格取缔坏经纪人利用机会暗作行市的行为。交易所牌价掌握适当，就增多交易，提高信用，黑市就自然减少，即使不能彻底消灭，至少也会使其价格跟着交易所价格走。只有交易所成为外汇市场领导的力量，才能避免使黑市操纵市场。

### (三) 生产贷款与信用合作

生产贷款的发展与发行是一样的，初期发行时虽也进行一些贷款，但因群众未发动及对于发展生产的观念不明确，进行中虽然数目不大，但也发生过不少的毛病，不仅有许多收不回来，对生产帮助也不大。

经过 1942、1943 两年的组织生产救灾，才摸到贷款对生产的真正作用，也教育了干部与群众，从此，贷款数量逐年增加。去年土地改革，群众翻身运动大开展后，贷款工作也随之开展，数目就更加增大。

#### 历年生产贷款数字（商业在外）

1940 年	1216 万元	1941 年	2569 万元
1942 年	7028 万元	1943 年	19518 万元
1944 年	34492 万元	1945 年	69978 万元
1946 年由春季之 14 亿元到秋季 27 亿元。			

1947 年春决定增加为 51 亿元。

#### 1. 生产贷款工作的经验。

(1) 总的经验。第一，信贷是扶持生产工作的一部分，无论贷放目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用途保证，利息政策，如脱离开生产，不适合实际的需要，一定做不好。所以信贷工作需紧密的结合生产，才能顺利的发展。第二，信贷的干部必须懂得群众生产情况，参加组织生产，才能作好工作。必须纳入一元化生产领导之中，才能起更好配合作用。第三，合作社普遍发展起来以后，农村信用合作业务也会随之开展。生产贷款可通过合作社进行，这较之政府银行定期直接贷收，有利于农村金融的活动，这是今后生产贷款应走的道路。

在群众彻底翻身，土地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贷款对发展生产，将起重大的作用，必须用大力去进行这一工作。群众未发动之前，贷款对生产上起的作用是不大的。

#### (2) 生产贷款的几点具体经验。

①群众未发动起来，政权未经改造，基本群众得不到贷款，贷款有被某些干部贪污及平均分散，用途不当，信用无保证等现象。

②贷款对象应集中于贫苦农民，贷款期限应根据贷款户的生产过程自愿订定。分配方法，应采取民主评议，手续越简越好。

③贷款用途应适合农村“靠山吃山”，“会啥干啥”等情况，由群众自己确定，不能从我们要求出发，规定死科目，限制活动。贷款科目一般只可有两种，一种是农村生产贷款，一种是专业贷款。但为眉目清楚，便于研究生产统计，仍可按群众实用情况分科统计。

④利息。科目既单一，利息也应单一。农村生产贷款只定一种利息，为了群众计算方便应定成整数。

⑤新解放区不是贷款的重点，因群众问题不是生产，而是翻

身，贷款多是浪费。但货币斗争上需要本币占领市场，饥饿群众亦需要生产自救，在这种情况下，为政治上争取群众，安定秩序，一定的贷款是必要的。这种贷款工作应在对敌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量少利低为原则，信用从指导生产获利中保证。此外，再作点小商贷款也可以。

⑥土地正在改革区，也不是贷款重点，勉强进行会形成浪费。但群众运动的发展，村与村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平衡的空隙中，也应根据运动情况，进行一些少量贷款。这种贷款应在群众运动的一元化领导下有重点的发放，同时贷款一定要结合斗争果实，投入生产。

⑦开始组织生产的区域，贷款数量要大，周转要快，借还可由双方自愿灵活商定。因之，应和劳力组织相辅而行，集体贷集体用或轮流用，比较适当，互助组小型合作社产生后，贷款即应以他们为对象集中发放，分散了会减少贷款作用。在组织领导上，可设区村信用业务员，以便于检查用途，掌握手续，了解情况。区可由建设助理员兼，村由生产委员兼，使贷款工作在组织领导上和生产合作一致。

⑧已经组织起来的老区，劳力互助要求资力合作。劳力互助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剩余劳力，资力合作的初步形式是合作社和小型合作社。剩余劳力找出路，必然要有资金扶助，在副业上打主意。因之，小型合作社就成为农副业结合，劳资结合，以及与技术结合的农民生产组织形式。合作社也必然产生信用活动，初是在“劳力互助，等价交换，定期算账”要求下的“工票无利贴现”与贷款，然后发展到存款与生产组织之间的往来透支。这时对贷款的要求就提高了，群众要求由自己掌握“款不离村，随收随放”，“量大期短周转快”，长年收放“借还及时”，“用途随便”，妇女儿童要求零星借贷节约储蓄。

根据以上经验和群众要求，贷款工作即应确定为：扶持群众信用活动，开展合作社的信用业务。作法上改变直接发放的办法，将贷款与合作社的一部分资金结合起来，由合作社去发放。银行应与合作社建立经常的借贷往来透支关系，并专门去指导合作社的信用业务，这不但适合群众的要求，还可解决合作社与小型合作社的业务矛盾。

有些合作社方向不正，怕不怕把贷款用到商业投机上去呢？根据经验，只要我们干部懂得合作社工作，不脱离合作运动，信用业务反而能使合作社走上正规。

## 2. 农村信用合作。

去年提出试办信用合作社，经一年的摸索，目前已有六十个独立的信用合作社和混合业务合作社的信用部（主要在太行区）。在一年中初步体验到以下几点：

（1）信用合作社必须在组织生产中建立，必须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若脱离生产或者不是组织生产，搞起来也会垮。太行涉县河南店，邢台宋家庄，与四分区（新区）的信用社就是证明。

（2）信用合作的推行，应随合作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特别应在合作社与群众创造的信用业务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提高业务和增加社数。首先是农村贷款通过合作社发放，普遍建立合作社的信用业务。根据经验，首先是“劳力互助，等价交换，工票制度”下的“工票无利贴现”，其次是实物借贷。副业手工业发展，小型合作社产生后，即需以放款投资业务，与小型合作社建立来往透支关系非常重要。在生产需要和合作社资金发生矛盾时，即应建立存款业务。生产发展到组织庞杂，资金大，信用关系错综时，应建立“资金独立，业务专营”的信用部（分红还是整体的），以便掌握。如太行黎城北流村，除合作社直接经营的山货部、煤站消费部、卫生部外，还有 11 个小型合作社，17 个工场作坊，

连合作社资金约 200 万元，再加全年不分散的资金共有 500 万元。信用关系上除合作社经常有放款投资业务外，互相之间也经常有投资往来等关系。这种合作社就应建立“统一收股，整体分红，资金独立，业务专营”的信用部。

(3) 存款是非常重要的业务，这在农村是可能的，主要是农民的待用款项和归女儿儿童的体己。这几项游资，生产越发展越多，如太行武乡马村 120 几个妇女，由于纺织发展的结果，除有足够棉花布匹外，尚有余款 10 余万元，到区上开会一次，每人平均花 200 元。这些钱在“组织起来死钱变活钱”，“富人得利穷人得助”（现在土地革命后这一口号已不适用）的口号下，是可以成为存款的。但最好是适合农村资金零星分散，用途不定，及利息低于合作利润等条件，用入股和存款结合的办法，把合作社股额降低，随时收股，到分红期则分红，不到期提取者，按活存出息。为了奖励节约储蓄与组织游资，可实行按日期累进利率。这样能把全村大小游资组织起来，投入生产。在物价相当稳定时，并可组织实物存款，如太行昔阳郝家村合作社 1945 年粮食存款即达 200 石，这种存款不但对农村金融有很大好处，而且也是解决工业资本的一个很好办法。

(4) 在农村中，一般的说信用合作应成为混合业务合作社的一个部，其原因有三：

一是不能当成企业经营，因为今天钱业利息低于工商业利润，在利润上如不能满足投资者的要求，便没有人投资，合作社就不能持久下来。若属混合社它可以“整体分红”调剂利润，维持业务。一是生产要求“资金组织起来，死钱变活钱”，组织起来和劳力互助相辅而行，在生产混合社一元化的领导，密切结合，扶持穷人发家致富。另外，混合社已成为全村组织生产，组织资金，甚至于组织劳力的群众机构。脱离它不但干部浪费，且业务矛盾。



(5) 在商业发达或副业和专业特别发达市镇上，如群众需要可以组织独立的信用合作社，或以信用为主兼营作坊运输，这种合作社应强调为社员服务。如太行武安阳邑裕丰信用合作社银号，去年 4 月建立集股仅 567900 元，为了追逐利润，曾搞商业，忽视农业与小商贷款，因农贷期限过长，贷出收不回来，群众反映不好。后来重开理监事会，决定为社员服务的方针，将贷款期限缩短，到 10 月份资金扩大到 1421900 元，社员到 2000 多户，几乎等于全村户数。到年底 8 个月共吸收存款 2134315 元，银行共透支 17100000 元（连私营瑞华银行 500 万元在内），共放款 50061700 元，其中商业最多占 84%，工农副业占 16%。

太行陵川平城利民信用银号，是一个全区性的信用为主兼营工商业的合作社，他们在“入股当东家，借款方便”（实即为社员服务）的口号下，动员到股金 2741500 元，社员 4171 户，占全区户口 5992 户的 69.31%。成立时锣鼓喧天全区 13000 多人参加庆祝，都说“自己成立的钱铺，可要高兴一番”。这当然是由历史上群众受过银号钱铺剥削（过去阎锡山、张荫梧、范汉杰等的陵川县银号对群众剥削很深）的仇恨所致，但在商业、运输、铁业、编制等需要与入股贷款发家致富的号召下，也取得群众很大拥护。

太行壶关黄山也是一个很分散的山沟村庄，发展铁煤编制等副业手工业需要资本，区干部认识一致、又有群众路线的作风，建立了以信用为主的合作社，且由它的影响全壶关于半年中又建立了七个信用合作社，目前看来效果还算不错。

(6) 银行与信用社的关系，这在一般合作社发展信用业务后，提到很重要地位，有时就成为信用合作社或信用业务巩固与否的主要因素。如榆社城关信用合作社，因存款过多，银行不管，赔钱垮了台，这是值得注意的。最需要的是撑腰，具体说，必须和它建立往来透支关系，在它存款过多或资金闲余时，银行吸收它

的存款，在周转不灵时，给以透支，这都是为了扶持它的信用，不是为了讨它的便宜。只有在关系上处理好，对它有利时我们也可通过它的实物存款吸收农村资本发展工业。

要忌讳的是把它当成银行下层机构的利用观点，或不尊重其群众性，不发动群众自己干，而采取代替包办的作法。如邢台宋家庄由于公资代私资，包赔亏损的作法使合作社垮台。

因之，银行委托它的业务是越少越好，一般说在自愿原则下，委托为群众服务识别假票、兑换破票是可以的，很多地方是乐于接受的。正当关系是国家银行扶持群众的私人的银钱业的关系。

#### 四、财 政 工 作

财政工作内容很多，这里只讲三个问题。

##### (一) 财务行政

首先讲统一集中与分区而治的问题。本区在 1940 年联办成立以前，财政上完全是分区而治的，那时不只以今天行署区为单位分治，专县也多是独立自主的。1940 年 4 月黎城会议，决定太行、太岳、冀南、在行政上成立联办，财政上提出三区的统筹统支。1941 年三区财政即统一了，联办直接管理太行、太岳、冀南、除上解一定军费外，地方收支基本上是分治的。5 月冀鲁豫亦划入本区，然只在大的方针下是一般行政领导，财政是独立的。8 月，边府成立，冀鲁豫也以行署为单位，宣布财政统一。冀南、太行、太岳统一了一年，因敌人封割严重，不仅上解粮布困难，款项调拨亦成问题。1942 年起又决定四区完全分治，北局、前总、师直、边府、依托太行。情况更严重了，平原基本变成游击区，只有不大的几块游击根据地。冀南于 1943 年起宣布以专区为单位分治，行署、军区就所在区取给。冀鲁豫环境较好，从 1944 年起才分治，

行署、军区由各专区解上供给，这个办法直到敌人投降，未加改变。这一阶段的经验，由各自为政分散的财政局面，走上统一集中，往往会遇到对军费不负责任的本位主义的抵抗，因之，多是先把困难统一，收入是集中不起来的。经过思想说服，制度的范围，干部的互相调动，逐渐好起来。但统一之后，又往往对下级照顾不够，限制太严，使专县失掉机动余地，上边灵活了，下边又困难，此路不通，又逐步给专县一定审计支付职权，集中里有机动，这样，比较合理了。另一方面，分治时，上级直属机关、部队驻扎所在地区负担往往重于一般区，调剂不易，这是很苦闷的事。

1945年敌人投降，蒋伪联合向我进攻，大规模的自卫战争爆发，战略与战争形势要求非统一财政不能应付新的局面。11月中央局召集会议决定自1946年起，统一全区财务行政，除地方村粮款外，其他均实行统筹统支，人民负担、人员编制及待遇，均由中央局规定，银行发行也由中央局统一掌握。今天检查这次决定是对的，但由于对各区了解的不够，给的机动太小了。执行中有的区除了上解外，实际仍有机动，有的则恪守命令，一人之增，一款之支，均事先请求，颇感困难。在部队方面，大军区审核严格，有向行署走私解决问题的。去年2月因闹和平有减轻人民负担增加透支之举，再加3、4月间大发行，预算不能维持，军队与政府、上级与下级之间矛盾严重化。5、6月间召开财政供给会，对统一意见很多，困难地区拥护统一，优裕地区主张分治，不富不穷地区，犹豫两者之间，领导方面也有分治意思。7月美蒋反动派向我晋南陇海线进攻，激烈的爱国自卫战争二次揭开，在军事上要求集中更大兵力作战，在财政上要求充足物力供应，分区而治的局面不存在了。9月中央局财经会议，检讨了上半年的工作，在大家意见一致之下，决定了大项统一小项机动的财务行政方针。

为什么要集中呢？

(1) 战争要求。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军队指挥必须统一集中，供应只有是全区性的，调度才能有大的活动范围，单靠分区供给不行了。

(2) 各区经济条件，人口多少不同，所处战略地位也不一样，为平衡人民负担，保证战争供给，亦须统一以便调剂。

(3) 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必须集中力量，分散对敌，会被各个击破。

(4) 为适应群众要求，繁荣经济，促进内地物资交流，全区必须是一个经济单元，才能发挥效力，各自为政会妨害贸易自由，影响发展生产。

为什么给各区以机动呢？

(1) 地区广大，交通不便，财政上欲求完全统一，样样集中，亦非情况所允许，既放手大家工作，亦应在财政上给以部分机动权。

(2) 各区工作发展不平衡，财政工作亦不一致，完全统一，困难殊多。

(3) 给各区以机动，大家负责，可加强工作效能。

(4) 各区特殊情况，均应分别给予照顾，有了机动，便于及时解决问題。

根据以上原则，其职权划分是：

(1) 人民负担，脱离生产总人数，由中央局确定，但各区在完成上解任务后，和在确定总人数范围之内，剩余粮款可以机动处理，各系统编制亦可自行调整。

(2) 基本供给待遇及经费标准，如菜金、食粮、津贴、服装、旅费、医药、办公费，均统一规定；其他如女干部婴儿保育，一般保健，技术人员津贴，在一定标准上，各区可以适当增减。

(3) 军费（包括野战军、地方军、武工队、基干队在内），全由中央局统一规定，由大军区审核，经边府划拨。边区级党政民学费用，由中央局决定，由边府统一核发。各区党政民学经济文教社会等事业费用，统由各区党委行署核发。

(4) 发行及各区银行资金，贷款数额，由中央局确定，但党和行政归地方领导，资金贷款分配亦由各区负责。

(5) 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总方针，税则税率有关全区性的，由中央局统一确定。属于区域性的，各区可以请求批准作适当变更。对内贸易实行自由，不能私自设卡征税或封锁。

以上决定经三个月实行，感觉尚好，惟有三个问题，仍未解决：

(1) 以粮食为标准的预算，战争中比货币较好，可是折价有问题、公粮折经费，系以主要市场平均粮价指数而定，公粮有时低于市价，政府赔钱无处出。又打仗地区物价平均指数高，部队领了粮款不足开支。4月份起我们又规定油盐按实物供给，保证部队食用方面是好的，可是保管领发手续上又有困难。

(2) 打仗地区需用集中。粮食保存都是分散的，供应上势必依赖调剂周转，又是一大难题。

(3) 战勤方面民力负担极不平衡，作战地区民力消耗大，负担重，如何调剂，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财务行政又有一些变更，即为进一步统一对敌经济斗争，促进内地物资交流，决定烟酒税、酒专卖利润出入境税、契税九成解上，一成留地方。超过计划之部分，由边府统一分配，三成归地方，七成解上。

总之，财务行政的统一与分治，主要看战略要求，其次是战争形势。如战略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就必须统一集中，如战略是分散的游击战，即可分治。统一集中之范围内，一定要给下级一

些机动；同时，在分治的情况下，对某些重要的如人民负担，养活人数，货币发行，亦应尽可能的请上级审查考虑，机械的集中和绝对的分治，是不易实行的。

边区地方粮款的划分。军队及所有脱离生产之武装，与边区以上党政民和中等以上学校之开支，为边区粮款。其收入为：统累税（平原为公平负担或合理负担）、工商营业税、出入境税、烟酒税及酒专卖利润，县以上公营公产收入，行政司法罚金等。地方粮款平原与山地不同，平原在地方款之外，另划村粮款。地方粮款，包括高初小教育、优抗、民兵集训、弹药等开支。村粮款，包括村公所经费及一切零星开支。山地地方粮款，除平原所列各项外，连村经费亦包在内。现山地大部县也把地方与村粮款分开，地方粮款预算一般是由县决定统筹，由专区批准调剂。村粮款多是县规定范围，由村民议定，经区公所审核。地方村粮款除随统累税一并征收外，粮食、牲畜交易手续费，县以下公产收入均属之。抗战期间规定地方及村粮款不能超过各区解上粮款 10%~15%，现在有的地区增到 19%，现山地仍按此比例执行。平原规定地方村粮款每一标准亩（冀鲁豫合小米 133 市斤，冀南合 100 斤）不超过 7 斤，实际有些地方开支不只此数。对村粮筹支，一是负责任的态度，由县统筹统支，虽也有限制过严之毛病，但经过一定期间就合理了。太行有些县经过三个步骤，初期完全由村自定，后改由县统筹统支，最后群众发动，村政权经过改造，才改为现在办法。二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今还没定办法，由村自定（多属新区），有的虽定了办法，并不加以掌握及检查，仍等于放任自流。经验证明，只要县区政府掌握的紧，地方及村粮款有 15%~18% 足够了。

其次，讲几个基本经验。从混乱的局面，走向轨道，第一是要确定编制，决定党政军民学的脱离生产的人数。没有编制，没

有人数的光景是不好过的。1941年前，我们整个人数因无一定编制，谁也弄不清楚，仅政民人数一个县有一千几的，不用说军队了。一般是打仗作事的人少，吃饭领东西的人多。一确定编制，限定开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编制要根据国民经济，人口多寡，政治任务 and 战争情况而定。一开头不会完全合理，经过一个时期就好起来，精简是使编制合理的很好办法。1942年以来几次精简，是有相当成绩的，人数上减去 1/3 到 2/3。那时规定很严格，一人之增都需经北方局批准，这个决定起了很大作用，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工作还未受影响。但掌握重点不够，安置干部也有不周到的地方，这是缺点。

第二是建立一套制度，首先是确定供给和预算标准。标准应依照实际需要及人民生活水平而定，过高过低均不好。关于作战及基本需用一定力求保证，只要不影响战争进行，使战士吃饱穿暖，其他也可缩减。定预算一定要预见到形势与物价变化，不能太紧，要有一定机动力量，以备意外开支。也不能太宽，使大家感觉轻松，便易滋长浪费。预算确定后，可分别在一定干部中进行传达，使大家了解家务，知所惕励，克服困难。把预算当成军机大事，神秘化的作法，是不必的。其次是审会计制度，审计职权要尽可能提高，在制度范围之内，它应有全部支配之权，超过制度开支，一定要经过会议解决。如是下级，应向上请求批准；首长说情，乱批条子的作风，必须废止，否则审会计制度永远建立不起来。金库制度，有银行者由银行兼，无银行者设专人办理，初行时很严，引起好多磨擦。财政走上轨道后，慢慢放松，无银行的在财政科设出纳经理之，虽还有不依手续动支粮款的现象，比较初期少的多了。粮食的支付，仓库制度要很好的建立起来。1941年前，我们曾实行过粮户认缴自存办法，结果赶到用时，老百姓往往把公粮吃掉了，冀南名曰“观念征粮”，以致军队沿门讨要。

后改为“集中缴粮”分户保管，情况好转后，又建立仓库制度，一部分配合县区行政设立，一部分打破县区范围，根据战争环境设立，直归专署或行署掌握。这种仓库是采取“集中领导，分散保管”办法，实行以来感到极大方便。去年以为和平了，一度建立大仓库，的确是好，惟战争一来易受损失，今天已改变。在游击区征收的粮食，除留一少部分供当地军政坚持吃用外，绝大部分要运回根据地保存。粮票及支粮证，一定要经过法定手续，有平时和战争两种办法，做到既适应军事要求，又不至于浪费。总之，严格的财政制度，是必要建立的，特别在财政困难时更为重要。初建立制度，无论怎样合情合理，总会遭到一些困难及反抗，何况制度又难以完全合理，把所有困难都解决。所以初执行时，总会有人感到不舒服，什么“制度制死人”，“妨碍工作”等怨声都来了。当然一些以特殊者眼光看待制度，就感到不方便了，但从整体说来，制度恰是保证供给的，不严不行，少数人的方便即是大公家之不便。当然，在战争情况及技术条件限制下，各种制度应力求简便合理，太复杂了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财政工作应建立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且应与其他工作联系。中央指出，发动群众土地改革，为一切工作的关键，在财政工作上感觉尤切。1940年到1942年，每年大批干部大部时间，都在闹粮闹款，真是“常年要粮，季季突击”，把其他工作都搅的不能干了。弄的干部疲惫，群众怨恨，结果还是完不成任务。几次派参观团到晋察冀“取经”，总是取不回人家减租减息这部真经来。1942年土地指示下来，各地群众有些初步发动，秋后屯粮即按期完成。由此可见，只要使群众在经济上减除压迫，得到实际利益，认识党、军队和政府是他们的一家人，事情就好办了。其次，还要进一步明确认识从经济到财政的道理，过去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只知向群众要东西，不知帮助群众生产过光景。1942年



前，我们曾体验到群众冬季死沉，对我们不好，春季活跃，对我们好，后来研究才知春季是给予群众的多（贷款、号召生产），冬天向群众要的多（要粮，要款，要兵），但对帮助群众发家致富、认识还不明确。1942年冬到1944年的春天，两年的救灾生产，再加上毛主席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启示，才领会了只要在危难关头救活老百姓，使他们有吃有穿，党政军民是不会饿饭的，财政工作也一定能够作好。1942、1943两年，那样严重灾荒得以渡过，如没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生产自救，是不能设想的。再是财政与贸易结合问题，过去我们常这样想，大量公粮与其长期屯积，不如拿出周转生利，1942年底，试了一下，赔了钱，从此打消了这个念头。全区财政统一后，平原又提出财政与经营结合，未敢决定。经过两年经验，结果还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财政上，每年冬春间总有一段难以转湾时期，这时，军队需预支大批现款购买实物，政府是有粮食一时变不成钱，这就要事先有计划的瞄准季节物价关系，预支一部粮食交与贸易部门换取实物，贸易部门就可慢慢出售粮食收缩资金归还垫款。但要注意由粮食变货币易行（公粮→货币→军需物资），以公粮当资本作买卖难办（公粮→货币→公粮）。至于运用公粮公款作资本活动，投入生产发展经济，不误开支，所谓“经财结合”，地方上还有，我们不敢试验。

第四，搞好财政，必须有一元化强有力领导，而且要有一主事的当家人。没有一元化的领导，党政军民共同负责，单靠财经部门是不行的。因今天财政工作是十分困难，易招人骂，没有大家负责及一位领导人出来定是非做靠山，那是很困难支撑下去的。本区历来总有一位当家人，我们感觉十分痛快。但共同负责不是乱口当家，同时当家人也要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一个人是办不好的，财政工作的本身，一定要实行调查研究，精确计算，因

为他是关系人民军政人员生活，稍有不慎，不是损伤群众便是影响战争。因此，必须实行周密调查，深入研究，既算战争的大账，又算人民的私账，算生产的账，也算消耗的账，越算的周到，工作的准确性越强，越有把握，盲目的主观主义的搞是很危险的。

## （二）开源与节流

我们财政上从过去到现在对开源有三种错误认识：一种是“重财政轻经济”，只知在财政上打圈子，不知在经济上找出路，认为财源是在能收粮款的富庶地方，不懂得富庶是从生产来的。因此，越努力向人民要，财政越困难，白费力气收不到效果。又加1942年以前，财政政策是“量入为出”，这在照顾人民节约方面曾起过好作用，惟从积极方面“量出为入”开辟财源作的就太少了。1942到1944两年救灾生产运动后，人民时光好转过来，征收就更好办了。经过1945、1946两年，凡是生产好的县、区、村庄、民户，不只按期缴齐公粮，还有额外献粮献款的。有些群众缴粮后，剩下3升5升的，就说：“今年收成好，算啦，多缴几颗吧”！就倒在仓库里了。由此可见只要老百姓富了。财源就会兴旺起来的。

另一种是“仁政观点”，“清高思想”，只晓得抗战革命，不晓得革命是要花钱的，片面强调群众观点，不仔细考察军事需要，看小不看大，见近不见远，清高自持，把为革命开支所征的必不可少的税收，也视为“苛捐杂税”。既不准向人民要，也不让向其他方面想办法，究竟怎么办呢？还有一种人订预算时扣的很紧，只怕人民负担重了，到平常支出时，却又放的很松，两面讨好，叫做“公私兼顾”。由于这种“仁政观点”的妨碍，少收很多税，表面是爱护人民，结果是苦了人民。

再一种是只知一个眼的向农民直接要粮、要款、要鞋、要草、要棉、要布，不知或忽视从其他方面开辟财源。抗战初期间接税收很少，那时土地还未改革，战争环境又严重，着重统一累进直

接的一项税收是可以的，惟忽视其他税收就不对了。1941年前，部分地区禁止纸烟，造成走私现象；工商、税务局合并后，出入境税收大多减少了；再就是不管天年丰欠、敌情如何，机械的一律禁酒，都是不妥的。

上述各种倾向，是在逐渐克服着，然而直到现在还没完全改过来，这是应该加以检讨的。

兹将本区抗战以来到现在直接与间接税比例略述于下：1941年前农业税约占财政总收入 90%~95%，间接收入（出入境税、烟税、契税、公营事业收入、公产收益等）约占 5%~7%。1942年实行纸烟专卖，税收大增，达到 10%。1944年酒专卖，间接收入到 15%。去年又增加工商营业税，到 20%。今年预算提高至 25%。两年来各种间接税收比例：

	1946年（结算）各税占	1947年（概算）各税占
间接税收百分比： 间接税收百分比：		
出入境税	18.5	7.9
酒 税	25.9	26.3
纸 烟税	18.5	15.8
交 易费	20.3	15.6
工商营业税	9.3	10.5
其他（契税等）	7.5	15.8
公营收益		7.9

依上述情形看，间接税收一年比一年大，特别是去年一跃而达总收入的 20%。但如抓的再紧一点，成绩比此还大。就济宁市说，每日来本能收入 60 余万，因注意不够，用人太少，只收到 30 万。邯郸 1 月到 4 月只收了 66 万，9 月一个月即收入 571 万。其他各种税收，因忽视及“仁政”观点的反对，不是减收，便是停止。这说明去年漏纳还很多，收入仍有增加之可能，问题只在于提高认识及如何去努力组织而已。

就地取给，这是今后开辟财源道路之一。去年已提出，随着军事情况发展，今天更加必要了。过去收复城市后往往几个月不征收，一切需用还多由老区供应，商人感觉很奇怪，认为不把他们看成自家人，有的吓跑了，营业税公布后，才安起心来。由此说明不去及时适当组织新收复城市的征收，也是错误的。去年 8 月陇海战役曾就地筹了一些粮食，但还不多。今年 1 月出击，就地取给粮食、菜金，即达 40%~50%。可是这些地区与中原军区在豫鄂陕的地区不同，差不多过去都是我们的地区或边沿区，比较易于办理，其征收办法由随军办事处（由部队地方干部组成）以政府名义进行，一般是由我们原来的专员县长出面。乡一级有干部可派即派，没有，最好派工作队直接向大户征借，非到不得已时不利用旧乡长、保长。对我关系比较好的地区，主要是征，必要时亦可以借，关系较差的地区，征借捐可同时并进。捐借的面，要看财富集中情形定，财富集中的要多向大户借，分散借的面就可以适当宽一些。借捐都带强制性，必要时要依靠我们民兵去收要。战勤方面的动员，往我们的后方或比较安全地区送东西可以，往前线或战场一般不行。出击缴获，有时很多，把这一项做成财政收入，是很可观的。

今天人民负担是相当重了，为减轻农民直接负担，在不影响生产贸易发展条件下，多向其他方面开辟财源是很重要的。

节约，我区历来做的较好。1942、1943 两年灾荒严重时，军队的菜金、津贴、办公、杂支全部自给，战士每日吃的粮食减到 1 市斤，地方人员是 13 两，野菜吃到 100 多种。灾难民每日吃不到 4 两粮食，当时生活虽苦，军政民关系却很好，因那时没有别的说法，只有战胜敌人克服灾荒一个念头。1944 年丰收后，逐渐恢复过去制度。反攻后，特别进入城市闹和平时，铺张浪费享乐主义得到抬头，贪污腐化之事亦层出不穷，生产节约精神松懈下

去了，军政民之间关系也日渐不好起来。爱国自卫战争开始，生产节约逐渐开展，从去年 8 月起，军队地方津贴、办公费等又自动减少，并有献金的。今年 1 月中央局提出生产节约运动，确定实行新编制，再次，精兵简政，核实人数，缩小上层，加强下层，减少后方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军队供给、参谋、政治三部的人数也逐渐达到一致。党政民连荣誉军人在内，将近军队的 1/4。强调严格制度，节省弹药；降低干部生活水平，改小灶为中灶；减少服装、食粮，后方机关生产也蓬蓬勃勃搞起来了。军队的缴获归公，从 3 月开始大有进步，这是好现象。

目前节约的三个中心环节是：节省民力，整顿地方村财政，与粮食管理。

自反攻以来，民力耗费很大，自卫战争开始后，更加严重，陇海线战争开始是 1 兵 4 夫，现在大多做到 1 兵 1 夫，8 兵 1 个牲口。据武安等 16 个村调查，民力负担占同时期财粮负担 34%~250% 平均在 55% 左右。

由此可见民力浪费，约在 50%~60%。浪费之中，非法支差和村勤务占的比例亦不小。根据 8 个月经验，解决办法是：

1. 精确计算。战勤、支差运输、村勤，究竟需要多少民力畜力，能担任各种勤务的男女老弱、全劳力、半劳力、畜力共有多少？要做出精确计算，根据计算使用民力。

2. 要建立经常的战勤组织。每一纵队可设常备担架 200 副，运输大车 100 辆，随同部队行走。地方和村都要依照劳力情况及战勤类别，成立各种各样组织，做到不耽误生产，保证战勤。

3. 要有干部及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起带头作用。在领导上尤要注意解决：群众恐惧，怕损失，怕吃苦以及有关生活等问题，并要在战争空隙中，经常进行时事、军事、文化娱乐教育。遇有逃亡也不能用斗争处罚解决，惟必须让其补服勤务。战争初期，逃

亡占参战的 60%，现已减至 20%，今后如能继续改进，更可减少。

其次是整理村财政。过去山地规定地方村粮食每年开支，不得超过解上粮款 10%~15%，平原是每一负担亩，收 5 斤到 7 斤。现在老区一般尚好，新区就差了。根据武安等 6 个县 7 个区 9 个村调查，村负担平均占边区负担 40%~60%，村开支中扩军、民兵、优抗开支最大，南宫、鸡泽两个村扩兵一项占村开支 65%。村开支约有 20 余种，一小部分是合理的，大部是不合理的，如能好好整理一下，可减少 3/4 到 2/3。做法主要是深入思想动员，使县区村同志，大家都了解当前困难与整理村财政之重要意义，从上而下的检查，从下而上的实行民主监督。在新区应从发动群众，改造干部，建立制度着手清理财政。老区可配合解决干群关系立功运动，整顿一下。整理办法由县统筹统支，或县规定范围，由村民民主评议，经区批准，或是严格限制一定开支额，在范围内由村活动。整顿村公产，把整理出的粮款投入生产，做为村经费基金，但不可投入商业。实行地方与村财政划分办法，民兵开支最好由县统筹。要时常审查公布帐目，冀鲁豫按期分别好坏在市镇公布村开支，效果很大。

再次是粮食斗争管理。抗战时期我们对敌粮食斗争，总是胜利的，不仅使根据地粮食不致损失，且还能保护敌占区粮食。去年由于麻痹和对战争形势认识不够，损失很大，全区约在 6000 万斤左右。今后要随着军事斗争把粮食斗争认真组织起来。粮食保管好的，损耗约占存粮的 1.5%，太岳 9 个大仓库，已有 8 个损失降到 3%。不好的有到 7% 的。粮食支付，平时好办，战时就不好干了，又加民夫吃粮更不易掌握。现实行粮食战时支票，无论部队民兵，都须凭证支粮，浪费减少。

我们处在落后的农村，节约备荒要经常进行。过去我们办理义仓，作用很大，土地改革后，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倡耕三余一，

定要与备荒结合起来。节约运动，一面在行政上要规定一些办法和制度，从上到下贯彻执行，同时还要自下而上启发自愿自觉的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使制度与自愿结合起来，节约运动才能深入开展。

### （三）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

今天我们所处的是农村环境，负担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但进行的却是大规模的比较现代化的战争，战争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巨大，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究能出多少，是一重要问题。

据太行 1945 年春赞皇等 12 个县 13 个村国民经济调查，1944 年国民总收入，每个人平均为 6 石 2 斗零 8 合谷子（副业及其他收入占总收入 18%），平均生活消耗每年是 4 石 5 斗 1，再生产费 5 斗零 7，当年负担每人是 4 斗 2 升 4，负担占总收入的 6.5%。除负担外，每人尚剩余 6 斗 2 升 3。1944 年太行九成年景，如按八成计，只能收入 5 石 5 斗 9，除去生活消耗，再生产等费用 5 石 1 斗 7 外，只余 5 斗零 2 合，以六成合小米只剩 3 斗零 1 合。太岳农业收入可能比太行多，但副业收入少，平均起来也差不多。

冀鲁豫、冀南估计，平常年景（七成一八成），每人连副业可收入小米 535 斤，到 565 斤。平原人生活程度较高，除生活和再生产费用外，所余也比山地不会太多。

据抗战几年来的经验，一般年景人民负担占其总收入 10% 左右就负担得起，如到 14%~15%，即感到勉强，16%~17% 就很重了。在抗战时期我们提出人民负担平均最高不超过小米 2 斗 8 升到 3 斗，就是这个道理。

去年 9 月财经会议，由于进行爱国自卫战争，提出最高不超过 4 斗到 4 斗 2 升，这是根据战争需要及人民现实负担能力估计而言。就山地说，人民负担已到 12.1%，平原也到 11.9%，再加上村摊派及一切非法负担，山地实际超过 16%，平原也超过 15%，

这样重的负担，如再增加，实有困难。今天进行的是爱国自卫战争，人民为了保卫土地果实，是应咬紧牙关多负担一点的，但如超过其一定范围，就很难支持下去。

抗战时期，军队方面每个人连一切经费在内，每人平均约 7 石到 9 石小米，1945 年春曾增加到 14 石 5，到今年每个战士平均是 26 石，个人生活费用即到 15 石，生活费增加 2 倍，经费增加 4 倍。地方党政民连建设教育等费在内，过去每人是 6 石到 7 石，现在平均是 21 石，个人生活是 10 石零 3 斗，生活费用增加了 1 倍，其它增加 5 倍。如以服从前线为原则，除野战军外，其它后方机关人员生活，还有降低的可能，其它费用更可以减少。

1941 年时，我区每百人养活脱离生产人员 425 个，1942 年精兵简政减到 4 个，1943 年 3 个，1944 年 2 个半，1945 年 2 个，1946 年 1.9，现在是 2 个。如按现在供给标准，每人负担 2 斗 8 到 3 斗，可以养活脱离生产人员 1%，最高 1.25%，按 4 斗 2 升计，可养活 1.5，养活  $\times$  个，就十分困难。养活 1 个野战军，在战争时就要附带养活 1 个民夫，每日以 3 斤半说，全年还需米  $\times\times\times$  万斤，这也是不得了的一笔开支。

民力负担共分战勤，平时支差、粮食转运、村勤务、一般动员五种。现在战争性质改变了，民力需用很大，比抗战时超过 10 倍以上。相反，农村青壮年减少了，我区一般老区参军参加工作人员达全人口的 4% 以上，新区在 2%~3%，个别村有达 10% 的。根据各地调查，男子全劳力约占全人口之 18%~22%，除参军参加工作外，真正可服战勤的约占 16%，牲口平均 13 个半人约有 1 个可支差的。按照战时 1 兵 1 夫，8 兵 1 个牲口，平时 4 兵 1 夫，11 兵 1 个牲口，再加平时军运、粮食转运、村勤务、一般动员，每一男全劳力，每年有 25 天工足够，每一牲口亦顶多用 34 天。但今天实际支差，每一男全劳力，平均是 40 天到 60 天，浪费主要



由于缺乏组织及制度。按今天状况，如实行战勤与生产结合，互助变工，组织半劳力、辅助劳力，担任各种勤务，则人的劳动力是能够解决的。畜力最感困难，我们牲畜比战前平均约减少 1/2，以现在情况，畜力已感不够，如每个牲口再支 34 天差，更无法解决。畜力缺乏，是今天生产战勤中的最大困难。

负担政策，过去山地实行过一三累进率合理负担办法，碰了很多钉子，但从中也取得好多经验。1942 年开始实行统累税，成绩尚好，办法与晋察冀大同小异，平原的是公平负担、合理负担，基本精神与统累税亦大体一致。田赋在 1942、1943 年即取消，冀南取消的更早。实行合理负担统累税后，负担面约占全人口 70%~85%，各阶层负担大体上是公平合理的，地主负担约占其收入 25%到 40%，富农 15%到 25%，中农 8%到 15%，贫农 3%到 8%。统累税好处很多，缺点是太复杂，不易实行。土地改革后，我们的负担政策应有所改变，总的精神须照顾农民负担。负担办法，要力求简便合理，我们拟将负担面扩大到 95%左右，免征点可减的很小或取消；累进率及级距要缩到最小限度，负担额要尽可能求其固定。农村方面主要副业，亦拟负担，但须比农业轻一点。

商业负担。从抗战到现在是最轻的，特别是小商小贩，几乎没有负担，今后要与农业取得一致，工业负担可以比农商业轻一点，一些重要必需工业，为奖励可减免税收。商业性的合作社仍要负担，村级合作社是否负担，尚未确定。公营工商业（除军工外）一律负担，为手续简便，可由行署按情况分配数目征收。去年颁布的工商营业税办法，不合实际，已决定废止。新办法要利用旧习惯由商人根据资金营业状况，民主评定等级分数征收。

战勤负担，旧的支差雇脚办法已不适用，现在拟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办法着重解决几个问题：

(1) 负担面要宽。所有村中劳力畜力，均可按其劳力强度，担

任各种不同差务。村干部一律支差，但其出外开会误工，可折顶差工。现在支差面太窄了，太岳沁源下庄有 93 个男全劳力，除参军出外工作者外，就有 59 人免差，支差的仅 17 人，整顿后仍有 13 个人不支差的。太行黎城东阳关有 129 个人不支差，如不整顿不仅影响战勤工作，且要脱离群众。

(2) 支差战勤内容要明确规定，范围可宽一些，应把公粮运输、一般动员，村中代耕均包括在内。不合法之非法差务，当一律禁止。

(3) 现在民力负担极不平衡，战区及沿交通大道，军工后勤部驻地附近重，其它就轻。冀鲁豫观城一个村，从去年 8 月 7 日到 12 月 15 日，每一男全劳力支差 89 天，太行个别村庄还有全年支 12 天的，武安冶陶每一劳动力平均到 119 天，今后非从民力财力的负担加以调剂，不能达到平衡。

(4) 普遍实行战勤与生产变工互助。参战支差代耕计工折工，应有一原则规定，在不影响生产条件下，实行“死分活计”奖励支差。产业工人、商店店员可不支差，但工厂工人应出一定战勤费，店员差费由商店负担。

今年我们财政方针是：

(1) 服从战争，保障供给。一切开支以支援前线为第一，只要能保障前线工作，其他即使做得不好也受到奖励。

(2) 科学组织，精确计算，节约民力，做好战勤工作。每一男全劳力做到每年支差不超过 25 天，每一畜力不超过 34 天。

(3) 大力组织开源，厉行节约，完成征收任务，使农民直接负担不至太重。

(4) 整理村财政，做到地方村粮款每人负担不超过 15 斤。

(5) 加强粮食斗争管理，使粮食损失减到 1.5% 以下。

(6) 改善负担战勤支差办法，平衡人民财力人力负担。

## 五、太行区生产工作与合作运动

### (1) 关于生产运动

1. 生产运动发展的历史。12月政变以前，主要是抗日发动，在生产方面，只是官办一些军事工厂和其它小型工厂，除解决武器需要的目的明确外，为办工厂而办工厂的盲目性，还普遍存在。12月政变以后，至1942年以前开始注意了群众生产，但是因为群众没有减租减息的发动，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不会是群众性的。领导生产是由上而下的恩赐，当时认为下半年是向群众要，粮、兵两项压得很重，每年占去70%—80%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任务还是不能完成；春天是给与群众，放贷款（有放帐思想）、解决土地问题（局限性大，顾虑多，不能很好解决问题）。1942年春，提出精确计算，计划要从计算出发，结果群众没有发动，无法贯彻，只能在技术上着眼。武乡有“春耕春耕，地里无人，打下一斗，要了五升”的流言，也说明政府派负担，群众怕负担的情况，还很严重。经过1942年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后，情况才逐渐有所变化，生产运动走上了新的阶段。当时太行区有一半地区遭受灾荒，经过生产自救，组织起来渡过了灾荒，发展了农业、运输、纺织；还有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开始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边沿地区则开始创造了劳武结合的经验。经过1942年下半年的群众运动，1943年是开始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一年，但在认识上还不十分明确，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发表后，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1944年战胜蝗灾得到丰收，是大生产运动普遍开展的一年，这时认识了大生产运动是贯串全年的运动，克服了过去认为春耕运动就是生产运动的季节局限性，1945年冬季副业生产普遍大发展，1946年农副业结合贯串全年。

以上所述，是几年来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概况，从实际经验中明确了三个问题：

(1) 大生产运动是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土地改革（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的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才能开展起来，否则陷于形式主义。经验也证明，由上而下的领导，必须与由下而上群众觉悟相结合。

(2) 大生产运动，是由农业到副业，因为组织起来发展农业，有了剩余劳力和剩余资本，一定会发展副业，而且会发展成为全面生产运动。但是全面生产运动的开展，仍是以农业为基础。

(3) 大生产运动是贯串全年，农业如此，副业也如此。冬季是农村经济活跃的时候，过去地主剥削农民取之于冬，现在翻了身的农民，则在冬季准备一切，冬季生产搞不好，春耕运动就要受影响。

2. 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教训。几年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有三条重要的经验，即组织起来，提高技术，改良品种与农副业结合。

组织起来又有三条经验，即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领导。等价交换是组织起来，巩固与发展的重要关键。随着生产运动的开展，组织起来的发展，变工的范围更加广泛，如各种劳力之间，人畜力之间，各种生产之间，如何做到等价，是很复杂的事情。在一个互助组内，因为参加互助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土地劳力的不等，有包工的、有长工的，开始组织起来的阶段，强调涵厚，不计较吃亏讨便宜，但这只能是一时的现象，日子久了，就会垮台。最近一年来经验，做到等价，除了精确合理的评定折工计工标准以外，如何公道的确定工资，便成为经常影响互助巩固团结及坚持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相互之间以及农民和其他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在互助互利原则下，合理的照顾有剩余

劳力的贫农利害的问题。如果工资不合适，即使折工公平，也使等价难以贯彻，尤其在目前劳力不足，副业日渐发展的条件下，这一问题更成为巩固互助的中心一环。由于过去计算工资太低，所以有些有剩余劳力的农民（主要是贫农）便感到吃了亏。如黎城同会村，在整顿互助组时，贫农就反映“减租减息翻了身，组织起来吃了亏”，因而在互助中，他的情绪不高，有的甚至要求退组。但如何规定工资标准？高了有些中农，特别是缺乏劳力的农民，感到不满，影响精耕细作；低了，富有剩余劳力的农民，感到不满，影响互助巩固，尤其在某种意义上说，便利了富农对农民劳力的剥削。1945年曾提出“高于长工，低于短工”的标准，也不一定完全妥善，这一问题还须在运动中寻求适当解决的途径。

在自愿结合方面，坚持了“入组自由，退组自由”的原则，克服了由上而下编组的偏向，检讨互助和回想互助利益相结合。为了做到自愿结合，有些劳动英雄还召开了家庭会议，对结合的农户，征求家人，特别是妇女的意见，做到全家同意。这就打下了以户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基础，通过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自愿结合小组，同时领导上也要有适当的调剂，使有牲口与有劳力的能配搭好。

民主领导方面，主要是倾听群众意见，严格自我批评，遇事大家商量解决。

关于提高技术和改良品种，组织起来有了相当基础，必须注意改进与提高技术，在领导上要组织起来与技术指导并重，开展广泛的尊敬老农运动，使科学与经验相结合。关于技术指导，一般由干部、英雄、能手组成技术委员会。干部起组织作用，劳动英雄起带头示范作用，能手起研究与直接指导作用，这样即形成一个领导集团。

开展广泛的群众的技术创造与选种育种运动，农业试验机关

与群众相结合。由于落后农村与落后技术，只有依靠群众组织起来，发挥最大的创造性，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相信农民能创造。经过救灾、打蝗与组织起来生产，干部有了这种认识。去年发现潞城刘聚宝在技术上有很大创造，如改变以往“巧做造，不如多上粪”的历史传统，为“巧作造还要巧上粪”；在选种方面一共选了30多种优良品种，如5叶北瓜，60天玉茭，早稻。

提高技术与推广优良品种中英雄能手的作用，他们有思想领导，组织活动，带头示范。如推广金黄后，群众说不好吃，不能做粉条，石寸金就蒸成窝窝做成粉条，让大家吃，大家看。金黄后每亩种800株，群众怕伤产量，一个英雄就说不一定800株，总之要做到“光棍玉茭寡妇豆”，保证玉茭根粗茎大收的多。推广一种东西，总要先自己实验成功，才向群众推广，这是向群众负责的态度。黎城王同会说：“如果自己还不敢相信，无把握，别人提出疑问，连答覆也没办法，不要说推广”，并说“应将特种作物种到路旁，这样过路人看见好，很自然的就推广了，那个种地的不愿多打粮呢？”另外，英雄能手，以自己为主，带徒弟，研究技术，收效很大。

太行区地瘠民贫，石厚土薄，要想多打粮食，改善生活，只有提高技术，推广优良品种。有些优良品种，可以增加1/4的产量，做造好也能多打粮食。1945年国民经济调查，凡是地多的地方，每亩地打粮少，地少的地方每亩打粮多，除土质外，下工夫做造是很大原因。

关于农副业结合，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有四种情况：一种是组织起来，可以精耕细作，并有剩余劳力，全年都可从事于副业生产，冬季更能组织多数劳力，进行副业生产。一种是组织起来，可以精耕细作，只能在冬季组织多数劳力，进行副业生产。一种是组织起来，可以不荒地，但不能精耕细作，只能

浅耕粗作，冬季也能组织一些劳力进行副业生产。一种是劳力过于缺乏，组织起来也不能保证不荒地。后两种地区，应在农业生产上组织其他村庄的剩余劳力，实行村与村的包工互助，副业则四种村庄，都应该发展，而且都能发展。

在大生产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开始不了解农副业结合，可以互相推动，互相发展，因而片面强调精耕细作，忽视与副业结合，硬要把地少人多的剩余劳力，也束缚于土地上，使群众受损失不小，某些地区还因此垮了互助。这种做法特别对基本群众不利，实际起了便利剥削剩余劳力的作用，这点贫苦群众是不满意的。邢台水门的贫苦群众说：“一直叫深耕细作，有些地就耕锄十次，上粪百驮，谷穗也长不到碗口粗”。左权一区原庄一个互助组长说：“一直叫把剩余劳力用到精耕细作上，不能出外干副业生产，干一年过来还是那点地，年年努力生产，年年还是这样，因没牲口，剩余劳力都还了驴工，如果能出去，赚下钱，买个毛驴，添上几亩地，粪地牲口都有了。由于人民现实生活需要，组织起来，发展了农业，一定要及时组织副业生产，农业为主，并不是农业为唯一。

发展副业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如冬季发展运输是因时制宜，“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是因地制宜，谁会啥干啥，有啥技术干啥是因人制宜。发展副业，一方面可以打破历史上的传统习惯，一方面还要适当照顾历史的传统习惯。

经验证明，达到耕三余一，必须发展副业。副业收入一般占全部收入 30%，部分地区还有超过农业收入的。有的由一只鸡发展到一只猪，以至一条牛的。开始我们认为副业生产只有在农闲季节才能进行，把它做为一种捎带或者认为只有在冬季才可以干的。经验证明，副业是可以贯串全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农副业结合的方针，与精确的计算，科学的安排。

从副业发展的前途看，有剩余劳力的村庄，会逐渐脱离农业，成立一些独立经营的手工业作坊。还有一部分是有季节性的，农忙上地，农闲作坊。在这个基础上，为了推销生产成品，及吸收原料，很自然的发展了运输业，繁荣了商业。发展过程是在农业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发展了副业，副业的发展，又提高巩固了互助。

关于耕三余一，经验证明以上三个问题解决了，能够做到耕三余一。要根据人民经济生活和当地的生产条件，作精确的计算。与此相反的，曾发生过两种偏向，一是不明了耕三余一的意义，有消极的思想，单纯为余一而计算余一，让群众束紧裤带来完成。另一种是片面的从改善人民生活出发，脱离实际，结果，怎样算也是达不到，丧失或降低实现的信心。太行区实现耕三余一，一般是穿衣问题，如果穿衣不能解决，有些地方打下的粮食，吃了挨冻，穿了挨饿。有些地方耕三余一，多注意副业生产，从副业方面增加收入，对农业增产有些忽视，这会影晌防旱备荒。达到余一的地方，一般是三分之一投入扩大再生产，三分之一防旱备荒，三分之一改善生活。

## （二）关于合作运动

1. 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抗战开始后，1938、1939年，由上而下的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集资开办合作社，多在我们掌握的城市集镇，雇人开杂货铺，也有搞小型工厂的。这些“合作社”，是“民资官办”，群众只知道摊派过一次合作款，根本没有分过红，也不知道自己是股东，应享什么权利。虽然这些“合作社”，在私人商号停业的情况下，也起过一些供给消费品的作用，但是是因为是由上而下搞起来的，和群众没有什么连系（按当时工作发展的情况，也不可能有真正是群众自己的合作社），所以慢慢为一部分干部和雇用的商人营私舞弊，得利肥己，以致“合作社”逐渐先后



垮台，没有垮台的部分，1940年为贸易局所接收，改为公营商店，这是第一个阶段。1942、1943年连续灾荒，在政府救灾与群众求生相结合，以及群众互助自救的要求下，灾区比较普遍的组织运输小组与纺织小组，工商局派了大批合作工作队，深入乡村，一面贷款，一面组织生产自救合作社，在渡荒上确曾起了很大作用。渡荒中成立起来的合作社，灾荒过去以后，有三种不同的发展情况，一种是不嫌纺织运输利润小，一直老老实实的搞生产，也有转向商业投机碰了钉子，又很快回头搞生产的，这一种为数很少；一种是嫌纺织运输利润小，赚钱慢，灾荒一过疮疤落了忘了疼，马上转向商业投机，有些开始还赚了几个钱，大多数因为投机，赔累很多，一蹶不振；一种是赈济做法，存货存款无条件无限期的给与群众，资本越耗越少，最后只得垮台。这是第二个阶段。当时组织合作社虽然也结合了群众的需要，但是一般还是由上而下建立的灾区，群众还没有经过比较充分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所以合作社还不能和他们建立血肉相关的密切连系。干部比较好的，一直能正常发展，与群众利益相结合，如干部比较差的，合作社就逐渐成为他们捣鬼营利的场所，也有的地主暗中把持，成为变相剥削群众的机关。一般说，合作社还没有真正成为群众参加，群众支持，群众监督的经济组织。1945年冬季，抗战胜利了，解放区扩大，内地贸易有所发展，老解放区的群众，也有了恢复家业，改善生活的要求，因此担挑运输以及各种副业，各地热火朝天的普遍发展起来，组织形式差不多都是小型的，以互助小组为单位进行冬季生产，群众觉得这样自由，合套，不受拘束，群众自己创造了结合剩余劳力和剩余资本的最好的形式，这为整顿大合作社找到了门径，也为进一步开展合作运动打下了基础。以后小型合作社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不定型的，农忙农业，农闲副业，经营业务，不限于一种，资本和劳力的结

合比较灵活。一种是由不定型的逐渐发展为定型的。一部分剩余劳力，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专从事于各种副业，如各种小型作坊。有些大合作社，与小型合作社分工明确，结合得很好，彼此都得到了发展。有些与小型合作社争利，想整垮小型合作社，想并吞小型合作社，结果两受其害。但这时有了比较充分的群众运动，老区更有了两三年的大生产运动的基础，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觉得需要组织合作社，而且是自己起来组织，合作运动比较普遍的开展起来。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群众能自觉起来反对，老合作社一般得到了改造。这是第三个阶段。经验证明，有了群众翻身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才能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合作社。

## 2. 几年来开展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

几年来发展合作社，经过两起两落，第三次才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基础。经验说明，唯有经过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以至彻底改变，生产力得到自由发展的途径，大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合作社，才能成为群众运动。有了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合作社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产。处在农村环境，以农业为主，首先有了农业互助，发展组织全面生产的合作社，才能少走弯路。经验证明农业生产运动，没有开展起来，组织合作社很容易从事于消费性的商业经营，走向投机的道路。而凡是单纯经营商业，只从本身赚钱着想，不为群众打算的合作社，几乎没有不垮台的。

处处为群众着想，因时因地制宜，经过不同道路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合作社。边沿地区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的经济斗争，并组织点滴出口，换回日用必需品。贫苦的山庄，提出“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由于我们处在落后的农村，各种业务分工，不能成为独立系统，所以一般合作社都是混合业务，只有适合于专业发展的条件，才成立专业合作社。农业是贯串全年的，但又有季节性，所

以在劳力资金的组织与业务经营上也有变化，冬季是农村经济最活跃的时期，合作社组织小型社分散生产，春季以后，即吸收小型社的资金与剩余劳力，统一经营。经验又证明，合作社组织生产有了成绩和基础，才能组织群众生活，否则一定走不通，不会有所成就。另一方面生产有了基础，一定要注意组织生活，如医药卫生文化事业等，否则也会脱离群众。

适应农村分散，技术落后，市场狭小的环境，做到人尽其材，财尽其用。小型合作社是最好的副业生产组织形式，基本以劳力为主组织起来，结合少数资本进行生产，可以吸收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各种各样的业务，它的特点是“谁会啥就干啥”。“啥有利就干啥”；“本钱小靠翻腾”。等价分红，是小型社巩固发展的主要环节，一般应掌握如下原则：（1）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与特点，适当的照顾劳畜力。如某地牲口少，就必须把牲口项分略为提高，以奖励养牲口户的积极性。（2）适当的照顾普通劳力与技术人材，有些地方把技术人材和普通劳力一样支付工资是不对的。（3）适当的照顾劳资，劳资分红标准应看当地具体条件，务须做到公平合理，劳资两利，既能鼓励剩余劳力，又能鼓励剩余资本。（4）分红结帐期要短，适应农民口用杂支随时要钱，但还要奖励农民随时入股。小型社普遍发展以后，与大合作社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两者分工明确，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做到了相辅而成，相互发展，一种是互相争利，矛盾颇深。一般说，大合作社走组织生产道路的，容易和小型社搞好，大合作社走单纯营利投机道路的，一定和小合作社不能相容。根据经验，小型社人少钱少，在业务经营上有其灵活性，也有其局限性，大合作社应根据具体情况，解决小型社的困难，如资金周转，大社应起信用贷款的作用，调剂劳力，大社制统一工票，使各小型社能等价互助，指挥各小型社有计划的进行生产，克服盲目性，避免相互间的矛

盾。完成这些任务，必须首先改造大合作社，端正大合作社的业务方向。

建立信用组织，发展资力互助，吸收游资，做到财尽其用。劳力互助有了基础，以及副业生产开始之后，农民逐渐感到资力互助的重要。由于劳力互助与资力互助的结合，解决了“有人无钱闲人，有钱无人，闲钱”的问题，也解除了农民过去因青黄不接与家庭事故，“一文钱逼倒英雄汉”，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痛苦。这就是说，由于资力互助既解决了生产上的需要，又解决了生活上的痛苦，使新的生产关系，得到稳定，繁荣农村经济，有了保障。合作社的信用工作，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搞起来的。巩固农村信用工作，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调剂利息与工商业利润的不平衡。为此，各地创造了统一收股，整体分红的经验。第二，存款、放款、提款、不受时间数量的限制。一切从便利农民，便利生产着想。第三，放款必须投入生产，不能从事商业投机。一般发展过程与组织形式，先是有信用业务，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逐渐发展为合作社成立信用部，独立的信用合作社还很少，有些城镇采取此种形式。但是因为战争环境，币值不稳定，利息与工商业利润无法平衡，很困难发展。

不管大小合作社都须建立一套民主的、健全的领导制度和经济制度，正如农业互助解决计工折工一套办法一样，这样才能巩固与发展组织。合作社发展了，必须注意业务的提高与改进，正如农业互助发展了，必须注意技术的提高与改进一样。合作社干部必须全心全意的为群众服务，为社员服务。有些合作社干部，称社员为大主人，自己为小主人。有些合作社因为道路没有走对，业务遭受损失，干部倾听群众意见，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亲自动手，不辞辛劳的加以整顿，社员的欠款，从组织社员生产中逐渐归还，不但能顶起帐来，还有剩余，没有“逼债”的现象。为

了保证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相结合，为了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并能真正负起监督的责任，须有健全的代表会（合作委员会）社员大会，并定期开会；还须帐目清楚，完全向社员公开；按经营业务之不同情形，定期分红。经验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合作社，就能整顿好，并能发展壮大。

## 六、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在紧张的游击战争中，也艰苦地创造了一些工业，今天的军事工业与印刷业成绩不小，都是从抗日战争那个时期的不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总起来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游击环境，举办工业困难太多，工业是少的而且规模都不大。

边区的工业多起来，而且有像样的工厂，是在反攻以后，由于军事上的胜利，缴获了许多敌伪军的军火工厂，收复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工业区，其中有或多或少的工厂，还收复了全国有名的焦作，六河沟，峰峰几个大矿山。

由于我们搞工业没有经验，同时“和平”以后，和平思想作怪，在工业建设上走了很大的弯路，碰了很多钉子。如果把这个时期所经历的东西，研究一下，作为教训，或者对今后工业建设上有好处，因此只谈谈反攻以后工业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在这里谈。

首先为什么办工厂？

反攻以后有了许多机器工业，这些机器工业是进步的东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落后的农村里想都想不来的，又认为这些工业都是财源，再加好胜心支配着我们，不服气，敌伪占领区的工业被解放后，当然应该办的更好。于是很热情的抓这些工厂，想把这

些工厂都恢复起来，兴盛起来，那时对工业的态度从建设思想上来说，大体上可以说是为工业而工业，或是为繁荣城市而办工业。

“和平”以后，和平思想作怪，想的更大更远了，为参加全国工业化而办工业。这样我们办工业，不但不是着眼服务于农村，也不是着眼服务于边区。而是脱离了边区实际，幻想参加全国工业化。这就是我们走弯路，碰钉子的根源。

边区的实际现在很明显了，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边区依然是农村，城市只占极次要的地位。农村的交通是落后的，新收复的交通线，因为战争的关系都被破坏无遗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不顾战争的威胁，不是战争所必需，又不是农村生产群众生活所必需，而举办的工厂是失败的。不顾交通不便，而举办过分集中的现代化的工厂，是失败的。比如六河沟、焦作两个矿山，既处于战争威胁的地区，产品主要是向蒋占区销，销本地只是很小一部分，又是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工厂，工人不足，动力浪费，运费昂贵，原料供给不易，产品成本加大了，成品由于军事对立，相互封锁，不易向蒋占区推销，在边区销，本地销不了多少，而需要煤的平原出不了，结果煤在厂子里堆成山，工厂周转不灵。去年由于和平思想支配，没有找到病根，贸易公司固定购煤的办法帮助其周转，是从技术上解决问题，结果解决不了，当蒋军进攻时，焦作、六河沟都被侵占了，丢了很多煤，损失很大。

这个时期，还有适合实际要求的工业，都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军事工业是大大地发展了，制革业发展了，是由于战争需要它；机器制造业和农具厂是发展了，是由于边区小型的机器工业增多和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工具的制修和改良需要它；印刷厂发展了，是由于宣传扩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和提高需要它；小型煤窑发展了，是由于群众需要燃料的供给（采煤供给群众燃料比群众打柴节省人力很多），其他供给群众日用必需品的小型工业也都在

增长。

就是那个大矿山，碰了钉子很多，损失不小。但是在备战以后，把修理厂转移出来或改制军火，或改为制修工业、交通等所需的机器，也都成了边区有所作为的工厂了。采煤的人员和机器，针对需要设置的小煤矿也有了顺畅的前途了。

综合以上两种类型两种情况，我们可看出工业建设如果是着眼在全国工业化或为工业而工业，为繁荣城市而工业是错误的，是失败的，只有从边区实际出发，适合边区需要的工业，才有发展的前途。因此工业建设方针，应该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举办下列一些工业：（1）服务与供应战争，必须扩大与提高军火生产，以及有关军火生产的炼铁业和化学工业；（2）服务与提高农业手工业、工业生产、必须发展机器和工具制造业，以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或节省民力，建立与发展对于剩余产品加工制造的工业以争取有利出口；（3）供给农民及其他群众生活必需品，必须建立与发展农业手工业所不能解决，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自给工业，结合手工业争取边区日用必需品逐渐自制自给自足。

今后战争是向着与我有利发展，现在开始局部战役反攻，已经解放了许多地区，将来进入全面战略反攻，地区必更加扩大，城市增多，工业也必然增多。对于新解放区的工厂，属于蒋伪的或四大家族的应没收，但是私人资本及私资经营的工厂，应该加以保护，如果是符合我们建设方针，应该加以扶植，如因仍受战争威胁，或是暂停，或设法动员向内地转移，并帮助其重建。如果是与我建设方针相背的，帮助其改造，当前无条件改造的，暂时停办者听之。

土地改革后，给予工业广泛发展的道路，今后应放手发展私资经营和合作经营工业，除了军火工业，较大重工业，和私资难以经营的工业，由公家举办外，凡是群众能办的，奖励私资经营，

特别是扶植合作经营工业，只有如此，工业才有广阔发展的可能。在反攻以后，特别是和平以后，曾发生凡是工业都想抓到手由公家办的观念，怕私人办工厂赚钱。

过去增加工资的情形，那是堵塞发展工业道路的作法，是于解放区发展经济不利的，应该加以克服。

其次，开展职工运动，改善职工与厂方的关系。

这里只谈新区工厂的职工运动，因为新区工厂改造，职工运动就是改造工厂的前提。

去年在新收复区工厂里，开始的一个时期，一般的是错误的了解公私两利，劳资合作两利政策，过分的从厂方片面出发，强调生产和有利可图，忽视职工的发动，结果生产搞不起来。敌伪占领区的工厂，在我们解放后，如果原封不动，不破坏其旧的关系，工厂的职工不从敌伪残余势力的压迫和威协下解放出来，则职工会气愤不平，正气起不来，邪气压不下去，因而在公营工厂里表现了变天思想严重，在私营工厂里表现劳资对立态度，对生产当然是搞不好的。经过这一段的摸索，逐渐的了解到只有发动职工起来，在职工自觉的基础上，公私两利政策，或是劳资合作两利政策，才能贯彻实现和有保证。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职工才会发挥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否则一切都要落空。

新区工厂之职工运动，反奸反恶霸诉苦运动，是个基本环节。必须肃清敌伪残余势力，职工才能得到解放。职工的解放，依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反奸反恶霸的斗争，是能够广泛组织自己力量的运动，不只是工人职员组织起来，开明的资本家也是赞助或同情的。因此，在反奸反恶霸运动中，由于斗争目标是奸霸的结果，极易在共同斗争中调解职工内部矛盾，密切职工团结，劳资关系也容易解决，从而改善劳资关系。

职工运动基本力量当然是工人，尤其是多年的长期工人，多



系出身于无产阶级，或农民无产者，又在工厂有多年的历史，这些工人是工厂生产中和工人中的骨干。我们曾经不了解这一点，更由于我们的干部多年农村工作，容易与半农半工或刚来的农村工人接近，而往往看不惯又不会接近多年的老工人，特别是有技术的机械工人，他们好吃好喝，好交朋友，强调技术等等，不了解这些是旧社会里工人被迫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应世方法，反而认为他们生活腐化，宗派，瞧不起人，不积极进行他们的工作。不知没有这些多年的工人积极参加以至领导职工运动，职工运动是搞不好的。峰峰因为机械工人发动迟和差，机工与矿工的矛盾得不到适当的解决（机工与矿工历史上有矛盾，机工发动起来很容易解决，不发动就不好办），大大影响运动的发展。

职员是职工运动里比起工人落后的，但是新区工厂解放后留下来的职员，大体上都是小职员，出身很多是贫寒的，靠作点事维持生活，在敌伪统治下，在旧社会里，处处是被压迫的。根据焦作煤矿的经验，只要我们不是把他们看成“汉奸八年”，不是瞧不起讨厌他们，不是单纯利用他们，不是用教训人整人的方法来企图改造他，而是确认他们是被压迫的群众，发动他们积极参加职工运动，启发他们诉苦复仇，职员是有苦可诉，并且敢于对旧社会恶势力反抗的，进而在自觉的基础上，逐渐教育、改造其思想，是能够跟着我们走的。这次工厂搬迁职员跟上山来，在工厂积极工作要求进步，到了职工训练班积极学习，都证明这一点。

职员同工人是有矛盾的，一般的可以用洗脸运动，内部调解方式解决。但是有的职员，有的技术职员，对工人有较严重的压迫行为，也有的就是恶霸，依靠敌伪势力欺压工人，工人要求清算，应该允许工人清算。这个清算已经不是一般工人斗争职员的问题，而是属于清算恶霸的问题。我们往往存有怕工人斗职员，影响对职员的团结，职工的团结，不了解团结职员，改造职员只靠

从上层拉拢迁就不行，必须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对极坏的恶霸进行有力斗争才行。至于有恶迹而又于我有大用的技术人员，只要我们同群众情绪一致，说服教育群众尊重技术，是会被群众接受的，并善于掌握分寸的。

家属好像不属于职工运动的范围，但是职工运动必须把家属发动起来。在敌伪统治时候，职工家属被欺压是不亚于职工的，因此在反奸诉苦运动中是积极的参加者（六河沟职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三分之一是妇女）。家属发动起来，工厂就全面发动起来了，就堵塞了坏分子的防空洞。同时家属发动起来，对职工减少了牵制的作用，增加了鼓励前进的力量，对巩固工人提高工人生产情绪关系是很大的。职工发动起来以后，应该深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自觉，进一步改善劳资关系，贯彻劳资合作两利，进而开展生产运动。

关于工人增资问题，选择时机，必须适当的解决，以改善工人生活。但是不应当过高或无止境的增加，同时解决工资问题应该掌握劳资两利政策，采取协商或调解方式解决。

再次，公营工厂管理中几个问题。在公营工厂中，为了强有力的领导职工运动和生产运动，生产经营和职工工作应统一于党的委员会领导。过去，公营工厂因为生产经营由工商局领导，党务归地方党，工会工作由总工会领导，往往各从各的片面出发，矛盾很多，闹成见，厂方与工人关系搞不好，后来，统一于党的委员会领导了，大问题大家讨论，决定之后，大家负责执行，认识逐渐一致，力量集中起来了，工作效率大大增强。

公营工厂，工厂与职工的关系，应该明确提出是公私关系。公私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问题好解决，容易一致，特别是解放区党政在群众中威望是非常之高。公营工厂，再加党的公开领导，对职工的教育意义很大，对职工的提高是有力

量的。在“和平”时我们把公营工厂隐蔽起来，用另一种面貌出现，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弄成劳资关系。劳资历史上的矛盾很深，虽然我们的政策是劳资合作两利政策，劳资之间依然存在阶级矛盾，由于阶级矛盾对立的情绪，烦麻很多，大大减低我们领导的作用。

工厂的管理，必须走群众路线。工厂管理我们没有经验，特别是管理集中的大规模的近代化的大工厂或矿山，我们就显得毫无知识。如何管理呢？有的干部到了工厂，不懂管理工厂，倒带了地方机关工作的那一套，于是搬出那一套来在工厂用起来，坐在办公室，搞编制，定制度，发号施令，把工厂机关化了，象个衙门，与生产无关了，甚至于妨碍生产。有的干部不懂想学，但学的方法不对，搬着书本念，不接触生产，当然这些都是失败了。

我们有些同志是走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放下架子，同工人打成一片，深入到生产单位，工作间，机器房里，同工人在一起埋头苦干，从实际中向工人学习。这种实事求是的实际精神是值得表扬的。领导应依靠群众，事事关心群众，启发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听取集中群众意见。群众有智慧有经验，依靠他们，领导就有办法。同时，技术人员只有领导与群众结合，才能有效的使用与改造他们，发挥他们的技能。这是开始摸着点学习的门径。今后，大生产运动里，要求我们要不断的提高技术。我们的技术是贫乏的，这就要求我们脚踏实地的，向实际向群众虚心学习技术，提高我们自己的生产技能。

## 晋察冀边区的财经概况

南 汉 宸

两点声明：(1) 在晋察冀工作虽有一年的时间了，但由于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经济部分的工作知道很少，就是财政部分的材料也了解的很不完全，很不深入。(2) 我区的财经工作，尚未作出总结和结论，我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情况，如有错误由个人负责。

下面从财政、经济、金融三部分来谈：

### 一、财 政 部 分

晋察冀边区的行政区划，在 1946 年包括冀晋、察哈尔、冀中、冀东、热河，两省府三行署，及一个直属市（张家口），退出张垣后，新划冀察热区（包括平北、察北、热西）。现有 22 个专区，166 个县，人口最多时达 3200 万，现略有减少。从出产上看冀东最富，冀中次之，察哈尔冀晋更次，热河最穷（有粮食、没衣穿，去年刚从敌人圈中解放出来，缺乏农具、牲口、籽种，大部用人耕地）。

#### （一）财务行政

边区现行的财务行政，6 个省区不完全相同，有的分三级（边区、省、村），如冀晋、冀东；有的将县财政划为一级，如冀中、

冀察，则成为四级财政了。

边区一级财政之收入，1946 年尚有出入口税，现已拨给各省，1947 年除冀中解上 50 万石小米及边区直属的企业营利外，便是银行透支。此外机关生产，虽不交边区，但在补助机关经费上还有一种收入。

边区负担野战军，边区级党、政、民、学的全部开支，及对各个战略区的补助。以不足全边区总收入的 10%，应付 40%。不同于地方的脱离生产人数的庞大开支，便是目前边区财政上最严重的问题。

省级财政之收入。包括各种税收（统累税、工商业税、出入口税、契税、交易费、产销税等），生产收入和边区补助（冀察 20 万石、冀察热 10 万石）。负担地方党政军民学的经费和地方事业费的开支，及解边区款（仅冀中上解 50 万石）。

县级。1947 年冀中将工商业税、契税、交易费及统累税附加划为县财政收入，县以下党、政、民、县大队、区小队之开支由县负担，有余与不足由专区调剂。冀晋除划出一小部分交易费作为各县教育费外，均归行署统筹。

察哈尔则由专区统筹，冀东对县级财政推行正在数县试验中。

村财政。1939、1940 年曾用大力进行整理，当时其负担量仅占统累税的 1/7。但大反攻后地区扩大，村财政甚紊乱。目前问题极为严重。负担量一般的均与统累税相等，甚至有数倍于统累税者。征收办法没统一规定，开支内容有动员新兵、村干薪金、募集慰劳、赔价、文化娱乐、村剧团、修地道、民兵弹药、办公、教育等项。目前的问题首先是人民负担很重，等于统累税则每年就有数百万石，浪费很大。根据去年的调查，冀中过去有的村动员新战士每人两套新衣服，村干开会每人每天菜金五十元，麦五斤；察哈尔的阳原县有的村开支中不当者占 85%；冀东村干大部有薪

金，每村至少三人，每人每月小米 40—120 斤之间，一般达六七十斤，伙食还由村负责，村长工农会主任开一等饭，其余开二等饭；今年过年时冀中有一个不到一百户的村子，路灯及点蜡共费数 10 万元。这样浪费的例子很多。现在冀中最好的村子开支中，应开支者占 93%，一般的占 60%，浪费的村庄正当开支仅占 28%。若加以很好整理，一般的都可减少一半乃至 2/3。其次是不平衡，这表现在新区、工作薄弱区、穷区接近战区者很重，老区、巩固区、富区则较轻。

减轻人民负担，应从此着手，整理办法去年在冀东我们曾提出如下三点：

第一，由县统筹，严格收支项目和数量。第二，发动群众监督，按月或按季公布帐目向村民报告。第三，有党的组织者由支部保证，支部负责检查村款收支。

去年一月财经会议决定整理村财政，各地也获得相当成绩，但与我们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应作为各地方最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减轻人民负担对群众负责的主要环节。

历年收支概况：

(1) 1938 年到 1940 年。当时的方针是取之于民，用之合理，量出为入，量入为出，以求得收支平衡。在财政管理上县保留田赋以外的一些地方税，边区负责军费，粮食由公粮征收中解决。采取合理负担办法，负担面仅 30%。经费开支除田赋税收解决一小部分外，不足者靠发行弥补。银行透支占经费的百分数，1938 年为 70%，1939 年为 85%，1940 年为 89%；占整个财政支出（包括公粮在内）的百分数，1938 年为 31%，1939 年为 28.6%，1940 年为 24%。

(2) 1941 年到 1944 年。从 1941 年起，区以上财政由边区统筹，征收统累税，除解决了粮食的需要外，加上其它税收，尚能

供给相当部分的经费。这时候银行透支在经费部分的比例，1941年为40%，1942年为40%，1943年为49%，1944年为62%；若加上粮食占全部支出的比例，1941年为16%，1942年为23%。

这时候厉行节约，生活很苦，在财政上看那是赤字最少的时候。财政上建立起一套很健全的制度而且能贯彻执行，战时财政作到很少依靠发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3) 1945年边区划为冀东、冀中、冀晋、冀察四个战略区，将各种税收全划给各省区。从那时起，三年以来边区级的财政支出，便一直是90%以上靠发行弥补，而银行总发行的80%以上均作了财政透支。

去年1月财经会议提出：“在财政工作上进一步切实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争取收支平衡，树立长期过日子的思想的精神下，努力发展公私生产，开辟财源，清查缴获物资，肃清浪费，厉行节约，整理村财政，在财政管理上实行统一掌握，分地区管理的原则，健全与坚持正常的财政制度”的方针。

开会时，各战略区已在年初三个月内用去征收之一半。除全部征收划归各区外，不包括边区一级开支，仅各区预算亏空即达100余万石，再三算帐最后确定以冀东剩余补助热河，边区补助冀晋10万石，冀察10万余石（内蒙政府在内），热河20万石，共40余万石。但截至去年9月底，边区对各战略区补助超过80万石。

节约的具体表现，是确定了新的供给标准。虽比抗战中提高不少，较之当时生活确有降低。但继财经会议结束召开的供给会议，又重新规定了供给标准。

在清理缴获上，当时每一小公家（部队、机关）都有缴获物资，但清理出来的归大公的却愈算愈少。收到大公的仅一小部分，如贸易公司的各种物资，就能对财政上、稳定物价上起很大的积

极作用；而归入小公部分，却大都变成游资，数目庞大，经常波动市场。

关于争取财政上的收支平衡，如野战军的开支仍归各区负责，缴获能归公，则争取平衡是很可能的，但并未照此执行。

在开源上，出入口税归边区，会议后各地相继建立，到 4 月方才开始就绪，收入还不少。企业收入当时不能立即在财政上起大的作用。

当时估计假若搞得好的话，7 月后即可逐渐翻身，要不，1947 年度可争取主动。但源未开而流节不住，许多措施大都没有实现，致今年困难仍然不减去年。去年曾企图从各自为政的基础上要求走向统一，今年 1 月的财经会议，又更走向分散，边区税局取消，银行、贸易公司、税收均划给各省区，边区现存的物资一时不能出售，所以目前我区财政尚未能摆脱困难、被动、危机的旋涡。

## （二）人民负担

从 1938 到 1941 年人民负担逐渐增加，1941 年为最高，每人平均负担统累税小米 1.6 大斗。1942 年后逐渐减轻，1944 年平均负担统累税小米 1.26 大斗，1945 年后由于部队扩大，人民负担又逐渐加重，去年平均每人负担统累税 1.5 斗（冀晋）至 2 斗（冀中），约占平均每人农业应税收入（冀晋 1 大石，冀中 1.2 大石）的 15% 至 16.5%。

村款负担从 1939 年起，曾用大力加以管理，很有成绩，当时仅占统累税的 1/7，平均每人仅负担小米 6 斤。自 1945 年大进军后，浪费很多，各地极不平衡，有占边区款的 50%—300% 者，一般的均与边区款相等。

若将统累税与村款加起来，那人民的财力负担就约占其农业应税收入的 30%。

抗战勤务。去年 2 月曾一度废除抗勤条例，以后由于战争需



要，又重新改订公布。负担情况，大进军前在交通路线作战区域，每一人畜力一月约服工四个，1945年每月每一人畜力服4—16个工，平均约达6.5个工。去年张坦撤退前后的四个月中，每一人畜力每月约服6—16个工，平均在10个左右，个别地区每人最高达23个工，畜力最高达33个工。这就部分的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和有不愿意喂牲口的现象。

负担办法。冀晋及冀察的大部分，均按有力出力原则将人力畜力加以组织，分别记工轮流服勤。规定一般基地服勤每月每人不超过5个工。冀中在1942年后曾采用人地合夫办法，除人力夫之外尚有富力夫，目前已有部分改变。冀察之徐水现行之办法是将统累税的分数与劳力折分（每人折5分，有牲口折10分，驴7分）统一计算，负担战勤。

目前的问题。是人民负担虽很重，但尚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劳力的浪费很大，人民的负担很重。表现在地区上不平衡，在战争区、边沿区、交通沿线区很重。时间上不平衡，战争的需要与农民生产季节性的矛盾。不守纪律违反制度的非法动员相严重。未能满足战争的需要表现在：需要是紧迫的、集中的、大规模的、流动性很大的，而交通运输工具是落后的，人民的供应是分散的、迟缓的、零星的、笨重的，同时又是不易保守秘密的。动员集中每个农户之一人一驴，由一条一条的山沟到战地执行任务，加上战争中很大的流动性，及我们的组织不好，空劳往返的事情很多，供需失调，脱节，劳力的浪费很大。改进的办法，目前是以粮食局运输队（现有胶轮大车100辆，尚须扩大），经常追随野战军保证战地供给。我们提议组织战勤司令部，由军区粮食局，地方党政共同组织，筹划一切战勤工作。此外并组织兵站强大运输力量，经常有几百辆大车，数百条牲口担负基地军需运输，以调剂人民战勤负担。

人民的负担如上述，虽较抗战中加了一些，但人民的生活确也改善了许多，如以阜平为例，过去一般均吃糠皮树叶，是河北最穷的地方，而现在糠皮树叶已经不再是人民的食品了，今年过年时，在我们政府附近的固镇广成村、槐树庄、广安等村，每村均杀猪五十口以上，每家均有肉 30 至 50 斤，人人着新衣，这表示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负担能力增高。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民多负担一些，还是可能的。

· 人民生活的提高与土地改革是分不开的，如槐树庄居民 110 户，抗战前每年佃农付地主上打租共需现洋 800 元，折合小米 120 担，现在全村出统累税 40 石，加上村款及小学等共 80 石，仅等于缴地租的 2/3，过去除地租外的负担现在等于完全没有了。抗战前全村只有耕牛 9 头，现在增加了驴 30 头，骡子 9 头，羊 4 群（约 300 只），人民的收入大大增加，所以生活大大提高，也能办起小学，儿童有读书的地方了。

### （三）粮食工作

八九年来我们的粮食来源，曾采用了征收、购买、借粮等方式，向群众借及战粮准备等各种方式，这当中征收是主要的，其它均占不大的比例，且带着不得已的临时性。筹划征集的机关，大体是由村而区、县、专区、边区，由下而上，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由分筹到集中统筹的过程。

抗战之初，部队的粮食供给是到那里吃那里，无标准无计划，粮食来源为逃亡大粮商，老财，每村多亦不超过 3、5 户。1938 年到 1940 年执行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当时北岳区的办法主要是将每家收入折米，以人口平均，每人收入 1 石 4 斗以下者免征，1.5 石至 2 石者征 2%，2.2 石至 3 石者征 5%，以上每增 1 石增税率 1%，至 20% 为止。冀中区执行的办法主要的是将土地分等折合，每人除 1 亩半（抗日军人 2 亩）负税点，超过部分，累进负担。税

等以 5 亩为一级，共分六级税率按二分累进，累进最高率为 2 亩，负担面在 30%至 50%间，实际执行的情况是在群众工作有基础的地区，上列办法成为中贫农。向地主富农的斗争武器，负担的绝大部分在上层。在地主富农掌握政权的村庄。则仍采按地亩平均摊派办法，中农以下的负担就较重。1941 年开始实行统累税，取消田赋、公粮、合理负担。1943 年曾一度加以修改。1946 年将工商业税分出另征，并另订在新解放区施行的统累税简易办法。目前为适应于土地改革后的新情况，正调查研究改订税则中。

去年统累税中，向人民征收的粮食；除足够供食用外尚有剩余。但收入在省，边区级十几万人的粮食，大部要购买，经常需要很大的一笔款项，受逼得很厉害，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粮食的保管，过去为适应战争环境曾一度采取轮交自存的办法。征收时各户认交立帐后，即算征收完结，所征公粮，依然分存原户，需要时再取，其优点是省事，耗损的责任在农户，战时不受损失，其缺点是当用时有支不到粮的危险，且时间久了，帐目无法清理，个别狡黠者，便可轮而不交。以后除少数地方如边缘区仍保留这一办法外，一般采用集中分存或集中村库的办法，将征收中各农户交来粮食，检查过秤后，另行分户保存，或集中村库。

去年由于和平思想，曾提出建立大仓库，逐渐裁撤村粮库，除平绥沿线的粮食，一度集中各车站便于及时调运拨付尚称便利外，大粮库大集中的办法，在军事情况急剧变化时损失一部（如冀东）。其它老区亦曾试行，但由战争情况，农村分散环境，运输困难，机关部队不太集中，经常的移动，粮库及干部一时设置不起来，以及干部习惯等原因，所以试行不久均已改变。

现在粮食之保管，在巩固区集中性较大，除村库外并正筹设子母库派专人负责。接近战区的集中性小，游击区则分散坚壁，矛

盾的是战区粮食的需要量很大，而保管又不能集中，这就加重了运输的责任。

在粮食的运输上，平时为节省民力，规定在机关部队住地附近 30 里以内者自运，必要时动员民力转运，群众往返以不超过 70 里为原则，如有超过则发给人吃马喂。目前的问题是运费太高，如从五台、繁峙一带运粮到阜平，将有 30%—40% 消耗于运费上，途程仅 150 里左右，平均每百里百斤约需运费小米 20 斤以上。从冀中调到平汉线 20 万石粮食，人民出了很大力量，公家出了 6 万石运费，损耗亦在万石以上。目前由于运动战需要的紧迫、量大、流动和机密，与粮食来源之分散、运输工具之缓慢和本身的笨重，便是我们战时粮食工作上的最大问题。我们正积极准备扩大自己的运输力量，用以保证供给，调剂群众负担。

粮食的分配，供给标准已印发。粮票制度远始于 1938 年，去年曾一度缩小使用范围，为小额的零星过往人员之用，其余 90% 均采取支付书制度。这在和平环境的陕甘宁边区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战时确有困难，现又改为粮票与支付书并用的办法。一般拨粮均发给有时间（一月或一季）限制的粮票，同时确定凡住扎二日以上，或百人以上者，均需经过县级以上政府签给支付书方能拨粮。预决算制度已初步建立，一般地方机关均采用照花名册人数拨粮的办法，但部队上不易实行，伤、俘、逃亡之难掌握是其客观原因。预算虽有，决算很差。

在缴获品的处理问题上，至今未能很好解决，有时虽缴获粮食物资很多，但不能使之很好的为财政使用。

去年一年在粮食工作上，尚能勉强做到保障供给，部队没有饿饭，在平绥线作战时能供给很多细粮，一次几万斤饼干也能做好送上去。但撤出张垣后，这一条件也就改变了。

#### （四）税务问题

这里讲的税务问题，包括出入口税和地方税两部分，主要的讲出入口税，地方税去年全归各省区，材料较少。

### 1. 组织过程和收入

出入口税的建立是去年—1946年1月底，边区财经会议根据“和平建设第一年”的形势估计，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在和平实现前造成既成事实而建立的。当时虽想到这是对国民党的一道税关，但由于和平幻想，提的很不明确。组织上是取消战争期间对敌斗争的贸易管理局，成立各级税务局。这个部门直到1946年12月底边区财经会议，在“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下取消了边区税局。各地亦先后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由工商部门、地方税收以及贸易公司合并成为工商管理或贸易管理局。

组织状况：9月份召开各省区局长第一次联席会议时，有省区局五个，另有张家口市局1个，县局96个，税所256，共374单位。干部2914名（原老干部只500名），另有税警队610人，共3524人，其中冀中占1500人左右。

税务系统的组织形式，曾有过改变，原计划的形式是海关式的，即撤消内线局所，加强外线局所，并打开行政区划，对准大城市，实行重点配备。但实际执行却并不统一。如：

冀晋的形式，基本上还是贸易管理局的一套，按行政上的专县区村的按行政区划和内外兼顾（冀晋代征地方税）的面的形式设立的。

冀中有三变，第一次（2至5月）面的设置（按行政），第二次（5至8月）线的设置（原计划），第三次（8至12月）面的设置（按行政），因而只有中间是海关式的线的设置。究竟那一个组织形式好？还没有作出结论，我们觉得各有优缺点。面的设置是领导一元化，从专县贯彻到村，内外兼顾不易走私，但是力量不均，对一定城市的斗争有空隙，容易使政策走样，干部随便调走。

线的设置是对准一个城市，力量集中，反映问题快，税款政策、干部保持独立性，但是与党政联系不好，力量单薄，缉私困难。

一年来财政任务完成情形。

原定 9 月底任务 12 亿。全年统计材料不全，只冀晋、冀中、冀东三个区，全年的收入是 68.6 亿(冀中 42 亿，冀晋 6.1 亿，冀东 20.5 亿)，加上张家口、察哈尔，热河只 6 月底的材料(41360 万)，已够 72.7 亿。因之去年全年收入当在 75 亿以上。如以实物计算，约在小米 60 万市石左右。

## 2. 一年来税收政策的变化

第一阶段(2 至 5 月)。从自卫战争时期对敌封锁政策转到自由出入和粮食解禁的政策。1 月底财经会议由于和平幻想，没有强调对敌经济斗争，强调了生产建设，贸易自由，因而税则精神偏重自由，税目采重点只几种主要物品有税，其余无税。除毒品赌具外，无禁出禁入。出口方面 2 月 14 日边委会解禁令，准许粮、棉出口，入口方面则允许洋烟、洋酒征税入口。全边区 2 至 5 月份，除冀晋区对粮、棉、牲口等禁出及奢侈品禁限入口外，其他各区都贯彻了自由精神。

我们对于粮食没有计划有组织的出口，使我经济上吃过亏。但当时也不能绝对封锁，因为我们粮食过剩，外汇困难，没法偿付许多入口外货的差额。同时封锁粮食，对敌增加的困难与我们自己的困难权衡轻重，以解禁为合适。

第二阶段(5 至 7 月)。由于战争逼近，洋货倾销，外汇困难，土著手工业的停滞，自下而上的逐渐放弃了出入口自由的政策，而转向保护和管理政策。边委会 5 月初电令各地禁粮出口，5 月中旬税务总局为制止粮食走私，有建立缉私带的指示，又为平衡外汇有按“奖出限入”原则全盘修改税则的指示；5 月下旬为抵制洋货倾销，曾在张家口、察哈尔实行紧急措施，除四种必需品外一律

禁入的措施（军用器材通讯，医药器材，模造纸，此为敌人禁出者，变成秘密交易税局放入而已）。在 6 月份各地根据战争的经验，开展了紧张的护麦斗争，到 7 月份冀晋将入口禁止货增到十种，冀中对纸烟、洋酒、奢侈品也下了决心禁入。这一阶段的政策转变是自下而上提出的，并且是很被动的，已经吃了很大的亏才转变的。

第三阶段（7 至 12 月）这一阶段出入口管理和对敌斗争的思想比前一段明确了，并最后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方针。7 月财经指示上提出了“自力更生”和“管理出口”的问题。经过三个月酝酿的出入口贸汇管理办法，也于 8 月份在各地实行起来。冀中区为了制止夏季的经济危机（比值下跌，手工业停滞）进行了“八月攻势”。

税务总局 9 月会议明确的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三大任务：

- （1）加强对外管理，大力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 （2）保护与发展根据地工商业，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 （3）增加财政收入，支持自卫战争。

根据此方针进行了税则的修改，主要精神有二：

（1）扩大禁入范围。规定除纳税、免税入口者外一律禁入（过去是除纳税禁止入口外，一律自由入口）；洋纱，煤油决定禁入。

（2）相对统一各省区税率。全边区性的物资统一税率，并取消活动税率。

此外冀中在 10 月份成立了统一采购商店。以后进行了抵制顽美货运动，修改了税率（火柴禁入等）。

直到 12 月份边区财经会议上检讨了一年来的和平思想，确定了在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方针。

### 3. 缉私工作

先说缉私工作上的群众路线问题。

我们初期工作上有过忽视与不相信群众缉私的措施和思想，我们在税务条例上曾规定：除带臂章符号之稽查员不准缉私，群众只有密报权无单独查获权。结果，是形成与群众对立，自己裸体跳舞，使严重的走私现象没办法制止。经过几个月的试验，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逐渐认识了群众路线在缉私工作上的重要性，5月份提出了群众缉私运动的问题，9月边区税局联席会上，更明确的提出正确的缉私政策，必须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三：

(1) 缉私工作不能违背群众的利益。不仅要照顾群众的长远利益，还要与群众当前的利益相结合。如果敌我两区必需品价格相差悬殊，如果群众的生产产品找不到销路，消费必需品缺乏或者没有代用品，群众必然走私。我们单纯用缉私方法消灭走私，既不可能又造成群众对立（在二分区和十分区都曾绝对禁止粮食出口，而不能解决群众的盐布必需品），这就必须从贸易政策上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2) 缉私工作搞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性。我们的政策虽然是为了群众，但当群众不了解时，他仍然会走私的，这就必须靠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经过党政把缉私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否则，如果缉私工作只会用“缉”“拿”“逮”的办法，也只会与群众对立，工作是搞不好的。从数量上看缉拿成绩不小，但与走私数量相比也许相差很远，我三分区有一句话叫“查住走私的多，不如没有走私的好”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

(3) 缉私工作的进行，必须依靠群众力量，造成群众运动。稽查员，税警队不应只是单独自己缉私，主要的，应是缉私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冀晋区按行政区由税局、武委会、公安局成立各级缉私指挥部，发动民兵、妇女、儿童、广大群众缉私造成一



个运动，是有成绩的。但有些地方怕发动群众后乱缉私，而不敢依靠群众的思想措施吃了很大的亏。

其次是人造海关和缉私带问题。我们的出入口税是海关性的，但实际上在晋察冀除冀东有很小的几个海口外，对敌斗争上既没海也没关，在一年的经验中使我们认识了要对敌斗争，必须建立人造海关和缉私带。到去年9月份，我们已在边区周围沿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北宁两侧和敌人盘踞的附近长达四五千里的边沿上，建立了3000里以上的缉私带和一二百个人造海关。我们起初只想到要建立封锁线，指定关口作出入口贸易，不了解只划一道线在分散的农村边沿，是封锁不住的，人造海关是造不成的。以后我们就发觉，必须用两道线造成一个带，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局所实行主要物资证照管理，才能真正建立人造海关。这一措施，自六七月份以来收到极大效果，特别在三、九分区真正起了作用。但我们发现还不够，因为带不能太宽，特别在冀中（是平原），一突即过，高阳、安国等地私货仍极多，我们才发现，冀晋内地配合的方法还必须普遍运用起来，使出口走私随地有人问，入口走私到内地也跑不了。这样，我们缉私带和人造海关的办法，就比较周密了。

缉私工作上还有一个罚没与提奖问题。我们普遍的存在过乱没收乱处罚的现象。一种是群众缉私运动搞起来后，群众不经过税务机关乱没收乱处理，一种是税务机关本身的重罚主义（曾有的群众称我们为“没收机关”。纠正方法：（1）群众缉私是对的，但不能让群众处理，（2）税务机关必须纠正重罚主义而改为以教育为主的政策（罚没也为教育），不能动辄没收，要分轻重，看对象来处理。

提奖问题也发生过两种偏向：一种是不愿给群众提奖（尽可能少给），使群众缉私情绪受到妨碍；另一种是重奖主义（一半以

上)，使很多人要以提奖为职业了，成了为提奖而缉私。发生许多违犯政策的现象，我们都纠正过但不彻底。

#### 4. 地方税问题

地方税过去除田房契税外无其他税，去年财经会议后才开始。当时干部思想由于“仁政观点”不愿从事，但经过半年的试行，群众已经了解，这是平衡农业负担的好办法。兹将现行各地地方税税目、税率列表于下：

类别	名称	冀晋税率	冀中税率	冀东税率	备 考
	工商业税				各战略区均已征收
产销税	纸烟产销税	20%			
	烧酒产销税	30%		15%	
交易税	土 布	5%	3%		冀晋区以前第一次征百分之五，二、三次百分之二，现只征一次
	牲 口	5%	5%	5%	
	猪 羊			5%	
	斗 秤	2%	2%	2%	冀中秤征百分之三

以上项目开始征收时间与方法是不一致的：

冀晋区的牲口交易税是7月份，斗秤是8月份实行的。冀东区10月份才开始在个别市场上试验施行。冀中11月份公布施行。

冀晋区在贸管局改组的基础上，即采取了管理市场改造与教育牙纪中，通过牙纪直接在市场上征收的方法。冀中开始时有个别市场采取了包征办法，现在改为直接征收。

其次在征收计算标准上也有不同，如冀东烧酒产销税是从量征收（以量折款交纳），冀晋区烧酒产销税是从价征收。纸烟是从价计算从量征收（20%以50元一盒）。其他交易税是从价征收。酒

税即按月直接向厂方征收。纸烟在厂内粘贴税票后才能出厂销售。

另外在牙佣分红与税佣负担上也不同：列下表：

区别	分 红	牲口税	土布税	斗 税	秤 税	
冀晋	政府	4%	4.0%	1.25%	1.15%	按原税率计算
	牙纪	1%	0.5%	0.15%	0.15%	同 上
冀中	政府	4%	6.1%	1%	6.1%	按全部收入计算
	牙纪	1%	3.3%	1%	3.3%	同 上
冀东	政府	4%		10%	10%	按全部收入计算
	牙纪	1%		30%	30%	同 上

在税佣负担上，冀晋区各种交易税全由买主一方负担，冀东区各种交易税由买卖双方负担，冀中区粮食交易税由买卖双方平均负担，土布棉花由买主一方负担。

地方税收的收获和一点经验：

(1) 在财政上的收获。冀晋区的材料，地方税到年底平均只半年共收入 18 亿元（烟酒从 4 月份起，牲口从 7 月份起，斗秤从 8 月份起），而进出口税从 4 月份到年底（平均 9 个月）才征收 6 亿元。再按 11、12 月份的统计，地方税占进出口税和地方税之全部的 80%而进出口税则为 15%。冀东区税的材料，地方税到年底平均只半年共收入 10 亿零 5000 万元（酒税从 3 月份起，牲口、斗、秤税从 10 月份起，鱼税从 4 月到年底）。而进出口税 9 个月（4—12 月）共收入 20 亿零 54 元。从以上数字看，地方税收入在去年的确是解决了很大的财政问题，特别冀晋地区。

(2) 地方税不能脱离市场管理。这在减少偷漏，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市场管理上是一举两得的。首先是从改造与教育牙纪着手，打破过去“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的说法。冀晋区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他们发现与揭穿了很多的牙纪贪污案件，取消

市场的黑暗，减轻对人民剥削，树立了牙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去年冀晋区牙纪献金 400 余万元，可见其本质上已发生了变化。

(3) 在市场上直接征收比包税不只是收入大，而且还能加强市场管理。包税是群众拿的多，政府收入少，牙纪中间剥削很多。如冀晋二专区一个集曾包出 3000 元，但牙纪却征收了 326000 元。

(4) 税收要裕国便民。收入不多而很细杂的切不可收，财政收入不大，而使人民感到不便甚至扰民者，都要取消。首先从人民着想，然后才能考虑财政收入。

## 二、经济部分

1946 年 1 月财经会议，对 1945 年经济工作曾作如下的检讨：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农业成绩是很大的，劳动互助的拨工增加了，且减少了形式的组织，按户计划，家庭会议也比较实际了；在精耕细作方面，大部作到耕二锄三，施肥较 1944 年增加 15% 以上。在兴修水利上共开渠 1136 道，可浇地 264348.5 亩，凿井 12217 眼，可浇地 10 万亩，档水栅 1328 个，可浇地 6627 亩，其它如挖河挖泄水井，修堤筑坝等，其成绩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植棉原定 140 万亩，实植 178 余万亩，超过计划近 40 万亩；放出农贷粮 92625 石，款 2 亿 9000 余万元，解决了群众生产上的部分困难，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全边区的合作社由 1944 年的 3841 社增至 7362 社，几达一倍，其生产业务有纺织，榨油，造纸，农具，医药，面粉，煤炭，熬盐，毛织等 20 余种。

在完成工业品自给自足的任务上成绩不大。

公营商业在采购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调剂民生，扶助生产与对敌经济斗争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地区扩大很多，当时已有城镇200多个，有一些较大规模的工厂和一条铁路，当时提出的方针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生产的第一年，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应该是在已有生产基础上，更加普遍深入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继续贯彻农业为主的方针，但同时必须努力发展工业与商业，在农业上大量增产粮食棉花与其它农产品，在工业上，用大力恢复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有重点的建立机器工业，矿业，在商业上应贯彻解放区贸易自由的方针，发展公私商业，发展交通运输，稳定物价金融，克服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形势，以达保护农产品与工业品之目的。

在交通工作上有所计划的修整保护现有公路，增修大车路，改良交通工具，执行中虽有成绩但开支很大（如铁路），其中有不少浪费。

金融贸易上提出密切结合，管理出入口贸易，通畅解放区物资交流，稳定物价，巩固银行，扩大边币市场驱逐伪币，掌握外汇。

根据以上方针，在实际工作上偏重工业，放松了农业，偏重城市，放松了乡村，但结果不管工业和城市工作，也并没有做好。虽然提出农业生产为主，但怎样贯彻，具体帮助很差，也没有很好检查作出总结。

1945年秋，反攻后，由于地区扩大，加上为准备进城发行胜利公债，紧缩一批货币，致物价大跌，谷贱伤农，没有掌握物资。1946年青黄不接时，物价大涨，又无力稳定物价。

去年提出大量发放农贷，原定23.8亿，粮10万石，截至8月银行报告，共贷出20亿（其中包括牲畜、水利、纺织、农村小型工矿、农具等）。当时牲畜在热察是极严重的问题，但不及工业上贷款多，加上发放方法之缺乏经验，收获是不大的。

在工业上提出重点建立，但究竟重点是什么，很不明确，如

当时张宣两处接收工厂 20 余处，如何处理，开工与否，迟迟不决，养着数千工人不生产，浪费很大。在工厂中还有一种更错的思想，认为美货将来不可抗拒，不必生产。

投资工业上的款比农贷多，但不是用于扶植乡村广大的手工业生产，完全用于城市是搞大工业的打算，其结果是大部分的工厂都丢了。

从各个战略区来看，冀东下了不少力量在渔业、纺织业、造纸业、草席业上，收到一些成绩；冀晋区由张垣运回数十部机器，正建设大工厂中，战争爆发，敌机轰炸，至今尚未起什么作用；冀中主要的去搞家务，工业没有大搞。

清查缴获成绩很差，取之于敌的大量物资，没有起应有的财政作用。供给标准之提高，及其它原因使财政亏空很大，被迫依靠发行，致物价不能稳定，波动很大。加之在贸易上缺乏明确方针，与组织上几经变动，在政协会后对外贸易自由，未加掌握，致成自流，5 月以后直至 8 月方才开始管理，但无充分力量收效不大，严重入超，外汇困难，币值一直下降，影响物价波动。

× × × ×

去年 7 月对下年度（1946 年 10 月至 1947 年 9 月）的财经工作方针提出：“在可能爆发的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自卫战争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力求自给自足，用大力发展农工生产，保障供给，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抵制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支援自卫战争的胜利”。为实现这一方针，在财政方面，必须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实现收支平衡；在生产方面，除发展必要的重工业外，必须大量的有重点的发放生产贷款，并用大力组织群众生产，增产粮布，发展民族工业，解决日用必需品（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与农村手工业作坊及副业生产），确定工业商业必须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在贸易方面，必须严格管理进出口贸

易，调剂境内物资交流，掌握物资，稳定物价；在金融方面，必须肃清境内杂钞，杜绝金融倒把，管理外汇，提高边币。

关于合作社工作，提出贯彻生产第一的方针，组织群众的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作坊生产。

曾先后公布民用工业奖励办法，管理出入口办法，外汇结汇办法。

上列方针于七月确定，继即战争紧张，张坦撤退，许多工作均未着手去做。6月26日备战会议后连续批准了备战预算，财政又被迫大量发行。

原定本年度农工业生产贷款65万大石小米，现交各战略区，能发多少尚不可知。管理出入口，外汇工作方才开始，尚缺乏经验，未见较大成效。

由于地区被分割，人口减少，开支未减及其它原因，本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不能实现，亏空很大，尚须依赖发行。加之去秋由于战争及地区的变化，财政困难未能及时掌握物资，无力稳定今夏物价，因之本年度财政依然十分困难。

× × × ×

为解决目前存在的财经问题，今年年初，中央局曾召集财经会议决定：

(1) 贯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将贸易、金融、税收的业务领导，资金调度均划归各战略区，边区只负责政策上的领导。

(2) 在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前方部队，充实野战军的原则下，重新确定编制，并依照后方照顾前方，地方军照顾野战军，以及财政困难，紧打窄用的精神，制定本年度供给标准。

(3) 开展今年大生产运动，切实整顿战勤，建立兵站运输，努力节省民力，解决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上农具、牲畜、籽种及资本缺乏的困难，广泛推进吴满有运动。

(4) 发展机关部队生产，以农业、工业、手工业为主，商业为辅。对机关部队的商店，采取限制管理的办法，并交纳一定生产任务，清理家务属大公者收回，以解决财政任务，对各机关部队家务之清理，不是抽调解决财政，而是使党委了解其家务状况。

(5) 银行与贸易工作要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稳定金融，调剂物资的任务。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外汇，贸易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调剂物资，稳定物价，发行统一于边区。

(6) 为贯彻财经政策，实行统一领导，决定在中央局、区党委两级成立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

(7) 整理村财政。

(8) 开展节约的群众运动，提倡土货不用外货，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本区经济逐渐走上自足自给。

此次财经会议，有关财政性问题讨论较多，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讨论较少，并变去年逐渐走向统一的方针为由集中到分散。

此一决定颁布后，为时尚短，现正贯彻中。

### 三、金融货币工作

关于这项工作，分为发行，打击伪币，与法币斗争及友邻区汇兑等四个问题。

#### (一) 发行问题

1. 发行情况。在大反攻以前发行不统一，那时各区被敌人分割，由各地自印自发。日寇投降后，各地需要货币，边区银行准备不足，冀中、热河、冀东都自行印刷，分别发行边币，热河尚有利民商店流通券，为数不多。冀东各专署各县商会都还发行地方流通券。所以市场上货币种类不一，也比较乱。主要原因，是准备的不够及市场急剧扩大所致。1946年1月财经会议，决定货



币发行统一于边区银行总行，把热河印刷厂合并到张家口印刷局，冀东的印刷厂改为民营印刷所。那时张家口有印刷局、冀晋分局、冀中分局，三地印刷，发行并没有真正统一。去年 12 月财经会议，决定各地银行由各地政府领导，边币发行则统一于边区，但由于战争的分划，承德及张家口撤退后，在热河已发行了热河省银行的流通券（每元约等于边币 20 元）与伪满币等值流通。冀东现印发带有“冀热辽”字样的边区银行钞票，还是过去的老版，所以就全边区来说，发行还没有完全统一。所谓统一，只是发行统一权的问题，不是印刷技术问题，即不准“随便印，随使用”“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而是各地发行必须经过总行批准，发行如不统一，就很难掌握。

2. 货币的流通情况是不平衡的。在张市未撤退前，就去年八月估计，在冀晋区边币流通量占发行总额 16.6%，冀中占 38.5%，冀东区占 14.4%，察哈尔占 27.7%，热河占 2.8%。在流通状况上来说，热河的边币向冀东、冀察流，察哈尔的边币向冀晋、冀中流，冀中成为边币汇集之区。如何使流到冀中的边币回来，想了很多办法，如组织回货，调剂外汇等，但没有收到很大效果。在流通不平衡的情况下，就产生有些地区票子多，有些地区票子少，这一方面由于经济情况不同所产生的商品流通不平衡，另一方面发行大部分用于财政，边币就跟着机关部队流动，从而又加重了它不平衡的程度。所以在某一地区、某一时间，容易形成货币的过度膨胀，如去年 5 月间，大小公家（主要是机关生产）向冀晋洪子店投入 30 亿边币争购土布，于是该地布价 1 月间上涨一倍多，影响所及，波动了冀晋冀察各地的布价。再如去年热河大小公家去冀东鸦鸿桥买布，就把汽车载上刚从银行领来的票子往大街上一放，看见布就往车上装，不管价钱多少，只往车上装布，往下卸票子。形成市场混乱。同时银行贸易公司没有物资力量，不能

在时间上、地区上加以调剂，也管不了机关商店，起不了决定物价的作用。如在张家口物价波动，通知机关商店不让买东西，他们还是去买，让他们卖出，却又不愿，这些小公家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是发行走了财政路线，经费又与生产（商业）结合，所以对市场非常不易管理。山东、晋冀鲁豫的经验都证明，非有物资就不能稳定物价，我们去年也证明了这个办法的有效，如去年五月把公家的东西往市场一抛即能停止上涨，再抛即落，但可惜我们的力量太小，结果还不能控制物价。

3. 发行路线，山东的经验主要是稳定物价，这是对的；晋冀鲁豫边区走的是发展生产路线，这也是对的，还有一条不对的财政路线，就是我们所走的。虽然过去中央局，边区一再商讨想法改变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摆脱这条路线，因此造成了很多的不好结果。如银行、贸易公司没有力量，即大公家无力稳定物价与汇价，在应该发行的时候不能发行，应该紧缩的时候不能紧缩，所以形成被动的盲目的发行，造成物价不断的高涨，财政更加困难。

4. 用发行货币去占领货币市场的工作做得不多，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发行上被动无力，不能去用力量开辟。去年冀东、冀中在驱伪以后都感边币缺乏，但发行陷于财政的漩窝，没有力量于驱逐伪币之后立即占领阵地。占领了阵地，如何巩固还是需要物资去支持，如果没有物资支持，往往还会把已占领的阵地退缩回来，同时还会因此地影响到别的地区。这就是说，没有经济力量，是无法作经济斗争的，或者说不能进行胜利的经济斗争。

## （二）打击伪币问题

我区曾有过三种伪币，即伪蒙币，伪联银币，伪满币。因为三种伪币的情况不同，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1. 对伪蒙币。蒙疆银行总行及分支行大都由我们接收了（张市另有满洲中央银行分行，正金银行，同和实业银行及各地分行，

信用组合),接收的主要东西:伪蒙币约一亿元,白洋 14 万元,资材一部。东西不少(特别是一些用具及物资),还没有什么破坏,我们开始时只去了一人接收,损失的也不多。

伪蒙币发行总额是 42 亿,大部分流通在我们区域,一小部流通于傅作义的地区。傅作义把他们区的打了“绥远”的字样,我们不允许通用。对在我区流通的蒙币所采取的方针是,开始承认它,逐渐压低,最后收回。因为蒙币是被我们俘虏了的“敌人”,当时应利用它作为市场暂时的交易媒介。因为那时我们也缺少边币,如不如此,就会发生商业停滞。所以不能立即采取“赶”的办法,它也是无处可走的,一律作废群众吃亏太大。以后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我们对它的流通区加以限制,即平绥线以南的地区不准流通,限期兑换,以免流往内地。

在执行上述方针中,曾发生一些偏差,其表现就是压低比值太猛、太快,多少影响蒙币多的地区的物价。如我们没到察哈尔以前,边蒙比值是 4—5:1,我们到了张家口是 1:1(这时没波动),以后逐渐提到 1:1.3 1:1.5—2. 2.5—3,一直到 1:1.5。在 1:5 时是以边府明令收兑的比值,直到收兑完毕都不变动,对金融物价的稳定上有些作用。从 4 月 1 日开始收兑,至 7 月初已全部(没有兑换的了)收回,政府已公布如再发现作为废纸。总数约 20 亿合边币四亿余元,对老百姓的影响很好,财政上损失也不大。我们要把收回的票子用作造纸原料,没有及早毁掉,张市撤退仓促,还有一大部分没烧完,听说傅作义又把它使用出来,使群众又一次证明了国民党的无耻。

2. 对伪联银币。我们采取的办法与蒙币不同,因为伪联银币是被国民党俘虏了,法币与伪联币合流了。他们一方面让伪联币替其维持市场,以便法币接替,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发行了为数很大的伪联币,而联银币在我区流通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因此我们的

政策是把伪联银币从我区驱逐出去。又因国民党决定 5 月 7 日停止兑换,我们必须在其规定期间以前肃清。在 1946 年 1 月财经会议上就决定肃清伪钞的方针,在各地执行上,冀中作的还好,虽边区给冀中的力量不足,冀中区流通的数量也不多,很快就肃清了。冀东差不多全区都是伪币,冀东的同志也很着急,当时预计在 4 月 15 至迟退到 4 月底必须肃清。但冀东在反攻后吃过亏,那时边伪比值,他们定为 1:20,看到有人兑换,又改为 1:30。这样的比值,因为没有照顾到市场情况,主观的提高,加上组织与力量均不足,经验也少,国民党又宣布了法币与伪联币的 1:5 的固定比率,结果那种主观的比值不能维持,几天之间跌为 1:1,形成金融与物价很大的波动,而吃亏的就是拥护我们的群众,因为在高比值时只有拥护我们的群众才去兑换,如有一个老乡在街上说:“我原卖的一条牛的票子,如今买不到一只牛腿了”当去年 3 月冀东大驱伪币时,时间很紧迫,我们赶到那里,当时冀东边币很缺乏,时间又紧迫,我就提出不能等着自己有了票子才驱逐伪钞,因为对伪联银币主要的是驱逐,银行收兑只是次要的配合作用,即先把伪币驱逐出市场,随后边币再占领市场。当时所用的办法,宣传动员一切力量,各村把伪币集中交一人或合作社去蒋占城市换东西,即合作社结合群众去买东西,用伪钞买东西回不上税(拿伪钞出去税局登记),银行只在内地收兑,牌价高于外线,以便诱其出境,不向内侵,因为当时如不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几十亿边币拿下去兑换,就时间上说是不容许的,即使能将 500 亿以上的伪联币收兑起来,送到天津去,国民党也不会给我们兑换,因为他们在平津给当地商民还不好好兑换。所以只有广泛的动员群众力量去买东西,结果是把伪币全部驱逐出去,我们预计要有几十亿驱逐不了的也全部驱逐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因我们边币缺乏,没有及时占领市场,不能满足当时市场的需要,所

以有些市场却被法币占领了,形成了后来不能不再去打击法币。在冀中作的也比较好,也没有吃什么亏,只是在开初收兑时有高比值思想,妨碍工作进展,以后纠正了这个缺点,就顺利完成了。

3. 对伪满币。满币至今尚盘据热河未逐出去。我们解放热河,票子刚到承德时,当地人不知道我们的票子值多少钱,有当 1·1 者,有当 1·5 者(由 1 比满 5)。当时承德小米 1 斤满币 5 元,而我们的票子值不了那样多,后来边币日增,特别是过往干部经过那里的很多,边币拥挤,物资跟随不上,以致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倒过来满币 1 比边币 30 至 50。当时除用大公家从各地拿物资去调剂外,并号召小公家生产单位拿物资到那里去卖,对他们有利,对稳定边币也有利。至去年 3 月间稳定到满 1 比边 8 至 10,4 月底到了 5 元多。当时银行的计划想从西面往东挤到赤峰,最后挤出境外,结果没来得及实施,就退出了承德。满币虽然没有了政权的依靠,但它的持有者仍对它有信用,总不愿将用物资换回来的票子完全作废,还想换回一些东西来,这也就变成了它的社会基础。而满币是在我与蒋两个地区流通,是当了两家的俘虏,谁也不愿对它负责,加上对东北各地贸易关系不正常,无什么交换,所以流来流去,总是有一部分在热河境内打圈子。当我们退出承德时边满比值在 15 至 20:1 之间,满币在热河的流通估计在 4、5 亿之间,总发行额据最初的公布是 40 亿,后来有说 60 亿者,3 月间国民党报纸披露为 81 亿,至 5 月又宣布为 131 亿,实际上是国民党增发的,热河是伪满经济落后的地区,所以旧伪满币流通是不多的。

### (三)对法币的斗争

去年一年对法币的斗争,所用的力量,超过了打击三种伪币所费的力量。当把伪联银币驱逐后,差不多各个区(热河除外)都与法币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情况,现分两个方面来说明:

1. 争夺市场（阵地斗争）的斗争。在货币的阵地斗争上，我们在力量的准备上与经验的积累上均不够，这方面化费力量比较大的是冀中区，斗争最剧烈的也是冀中区，从阵地斗争上说，怎么样才能胜利呢？胜利的条件：第一，是我们军政形势的优势，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没有枪杆子是没有货币市场的。第二，仅有军事政治的优势还不等于货币占优势，要货币占优势，必须有物资的支持与统一的正确的货币政策指导。在地区上可分两种来对待：一种是我们刚占领的新解放区，如何肃清法币使边币占领市场，就是我们用什么政策去兑换的问题，兑换的牌价上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有些同志以为军事上胜利了，就不问市场情况，任意压低法币比值，如市场价格是 1:1.5，挂牌就为 2 元，自然其效果是很小的，反之还会使法币转入黑市活动，或者是引起物价上涨。因此牌价规定的适当与否成为首要的条件。其次，是紧随着收兑以物资去开辟与巩固边币市场。如前年，在延安看到报上载着解放长子，我们有很多牲口驮着货物进城，老百姓非常欢迎，当时我们很注意这一问题，去年在有些地方，我们只进行了收兑，而没有物资支持，结果边币还会退缩回来。再次，是邻区的配合行动，如一个城镇与几个地区有关，在收兑这个工作上，各有关区必须步调一致互相配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如去年平汉北段解放徐水时，冀晋、冀中、冀察三个地区配合不好，比值规定不一致，效果就小。今年 1 月解放新乐、定县，冀中、冀晋步调一致效果就大。另一种地区是与敌人接壤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进行阵地斗争，首先要分析该地的经济关系，与敌我两方何者为多，假如在经济上与我们关系较多，那就应该在兑换上平价进出，加强内部市场管理，及边缘区缉私工作，我们就能占优势，或完全成为边币市场。若是与敌方经济关系较多的地区，我们开始先争取混合市场，再加上抵制美顽货的运动，减少其对敌人的依

赖，等站稳了脚以后再采取更进一步的办法，争取优势。在这样的地区，如开始时提出过高的要求，群众不会接受。其结果是不会成功的。

2. 在阵地斗争上，不仅要会进攻，而且还必须会退却。这和战争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我退却时，必须有退却的准备与组织，如去年张家口与察南撤退，因为没有很好组织，即没有主动的收缩货币，就丧失了一些不应丧失的地区。反之，如冀中固安撤退时因我有了准备，事先抛售了物资，收缩了货币，结果地方虽丧失而货币阵地却还保持着。

3. 比值上的斗争。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在物资流通上不能划一条长城隔绝，所以就要发生货币交换的问题，以图达到争夺物资有利交换的目的。但是如何进行斗争，就有个管理问题，去年我们提出掌握法币以打击法币的问题，有的同志以“清高”的态度来鄙视法币，以为只简单的拒绝法币就行，用不着掌握甚至认为兑换法币是我们的耻辱，或是认为法币一天一天跌价，掌握起来会吃亏。掌握法币多了是要吃些亏，但用法币打法币稳定了边币的比值，比法币吃亏的数目大得多。去年法币不足的压力却是很大，就以张家口与北平没有完全接轨的情况说，每天来往的商民有 3、4 千，不要说买卖货物，就是只兑换路费，一天没有几千万也不行。上半年各地没有实行管理，出入的数目字没有很好统计，银行本身除张家口一带经营的多些，其他各地亦不多，就以去年几个月银行银号经营的流水来看，也是惊人的。法币及汇票全行进出总流水是 458 亿，黄金 5 万 5 千两在外（均价约值 100 亿）。其中张家口（4 月—9 月）占 50 亿，连黄金 100 亿，共 150 亿；冀中区（9—12 月，9 月以前只 30 亿）340 亿；冀东（5—12 月）63 亿；冀晋（11、12 月）约 5 亿。这些并非全部，而只是全部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不能供给外汇，商人都从黑市购买外汇，其数

目比银行所供给的要大几倍。此外银号经营的有 68 亿(时间平均约三月),张家口银号占 30 亿,冀中占 38 亿。根据以上数目字,几个月间总计达 626 亿,如以五个月平均计算,每月约 125 亿多。但这并不是外汇全部,如以张家口来说银行经营的不过 1/5 至 1/4。冀中分行经营的比例也与此差不多,其余 4/5 或 3/4,是在黑市上买卖的,因此黑市的活动经常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正因为黑市的存在与活动,就成为金融、物价波动的因素之一。这样的情况,就不能不使我们进行管理了。我们外汇的来源,是银行吸收及贸易公司等经营部门交回来的,但都供给不上需要。

在比值上的变化,去年一年也是很大的。在粮食解禁后,平绥线由 1.6 上升到 2.5—3 元,冀晋区也由 1.6—7 上升至 3 元,冀中到 2.8—3.5 元。北平边币黑市到 4 元。5 月粮食停止出口后,比值逐渐下跌,至 7 月有跌到 1 元比 8 角至 8 角 5 者,个别地区比这还低。9 月间水果出口多了。又升到 1.5,10 月间张家口撤退后,一般的维持在 1 元上下,有的高些,有的低些。我们对比值斗争的要求,不是一定比法币高就好。主要的则是求其稳定,但因出入口在季节上变化很大,管理不好,银行无力调剂,所以总是稳不住,只有在冀中去年从 9 月至 11 月这一时期比较平稳。在掌握比值上一般的说是高比值思想,特别是去年刚开始的几个月,这种思想各地差不多都很严重。但有些个别地区过早的降低乃比一般的比值低的太多,也是不好的。比值的高低,主要是出入口的问题,对于出入口,去年 1 月财经会议上虽提出管理,但在去年开始的几个月并未认真执行。去年 8 月 1 日政府颁布了管理外汇及贸易的法令,张家口自 8 月实施后,情况比较好些,终因我们的力量不足,及国民党低汇政策的影响,内地交通困难等,有些能出口的东西出不去,如山货、皮毛等,花椒因无销路冀晋老百姓就把树砍了,粮食又采取绝对不准出,对外贸易成为入超的形



势。去年 1 月虽提出以法币打击法币的方针，但没有完全贯彻下去，凡是执行这个方针的地区成绩就好，反之成绩就差。从去年的工作中体验到，在比值斗争上有几点是值得注意：

第一，决定比值高低的因素：

(1) 在两种不同纸币进行交换，首先要视其对内购买力的高低，特别是两区互相交换的主要物资价格如何。

(2) 出入口的情况，贸易上是出超或入超，应随时掌握供求情况，并了解其具体变化。过去我们被自己有货物掩盖了出入口的不利情况，这也是高比值思想产生的一个原因。

(3) 上述两点是比值变化的基本因素。但两地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变化，往往在一个时间或一个地区甚至是全面的地区都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点也必须注意到。

第二，如何掌握比值呢？

(1) 掌握比值的基本要求在于稳定与主动。

(2) 牌价的规定必须遵循自然价格，以“接近市价，吸引市价”为原则，这样才能便于掌握控制。所谓照顾自然价格，在计算时必须把两地物价、税率、战时利润、运费及一些可能的损失都算在内，才能指导贸易。

(3) 各地牌价不一定一致，但差额要小，必须照顾到友邻区的牌价，以免商人套汇投机。

(4) 银行要掌握一些外汇，在地区上、季节上作灵活的调剂，以便各地汇价趋向平衡。

(5) 边缘区的口境兑换牌价，一般的是平价进出，当法币跌价太猛时，可以有差额，但差额亦不宜太大。

第三，要达到比值斗争上胜利，必须经常的进行敌我两方情况的调查研究，特别是情报要迅速及时。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不好，曾因此吃亏不小，这项工作必须加强。

第四，扶植与团结私人银号，是对敌斗争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为外汇工作不能公开的自由的进行，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才能保证安全。关于私人银号的工作，在张家口共有 6 家，在冀中区截止今年 2 月已发展到 31 家。他们除作外汇工作外，存放款也是其重要的业务，如去年 10 月份仅就冀中 19 家银号的调查，10 月份 1 个月，存款累积达 174 亿，放款累积 213 亿，与其资本相比，存款则超过其资本总额的 83 倍，而放款则恰为 100 倍。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小的。就存款来说，对我也极有利，对吸收游资，紧缩筹码，有着极大的作用。过去说在物价波动的情况下，不能吸收存款的说法，经过去年张家口及冀中的经验，都证明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如张家口总行营业处，每天存款余额达 18—22 亿，最多的到过 26 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进行这种业务，必须在工商业相当有基础的地方，不是任何地区都能作到这样成绩，但不管怎样这项业务在城市中是应当努力开展的：

在扶植银号的工作上，一方面固然要管理，但另一方面必须予银号以有利可图，我们在这方面采取过如下的办法：

(1) 在外汇管理上，银行只要几种主要出口货物进行结汇，其余归银号办理。

(2) 银号不准兼营商业，但可以用 30% 的资金经营出口。

(3) 存款保证金，过去规定缴存银行 10%，后减为 5%，此项存款银行照章付息。

(4) 代银行买外汇，每元给六厘手续费。

(5) 银行的外汇经过他们存放平津，所得利息以四六分，银行六成，银号四成。

(6) 给予一定的透支额，让其周转。

目前银号在冀中还在继续发展，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得利多些，但其作的事情对我却大有利，冀东也有条件开展这个工

作，如乐亭县每天黄金成交有 200 两—300 两，汇票也很多。

#### (四)友邻区汇兑问题

对晋绥、山东的渤海、晋冀鲁豫的冀南等银行，于去年先后通了汇，有的中断过，有的至现在仍在进行，但在物资交流上通汇所起的作用还不大。今后还应努力去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小组座谈会上已经比较详细的提到了，我这里不详细说。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检讨起来，我们是有些缺点。主要的是：把自己的困难看的重，对友区的困难照顾不够，在贯彻对友邻区的货币支持的精神上，下面做工作的同志体会的不深刻，因此在这个工作上做得也不够。

在今后的关系上，我们同意小组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即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交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换。

## 晋绥财经工作报告

陈希云

晋绥历年来的财经工作，由于过去未作全面总结，这次来开会，各部门负责同志未到，带来的材料很少，故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和我个人的一些回忆，作出这个报告，其中有些数字、时间、地点等，可能不大确实，某些问题的提法，叙述的重点，也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些偏差特别是银行贸易工作因我不熟悉，只能以晋绥去年高干会及生产供给会议，两次对金融贸易的检讨，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因此片面性更在所难免，均原由我个人负责。

### · 晋绥边区概况

晋绥地区，包括绥南、绥东、晋西北、晋西南诸部分，北至大青山，南至大宁蒲县，长约 1600 余里；东至同蒲，西至黄河，宽约 400 里，是一个带形的根据地。绥南绥东一带自敌去年东进后，已成为游击区域。这块区域人口约 300 万，其行政区划，在边区行署之下有 1 个绥蒙政府，8 个专署，41 个县，160 个区，2600 个行政村，1 万 2120 个自然村，辖区耕地 1946 年统计约 24362273 亩，产粮 1834499 大石（260 斤）。由于土地瘠瘦，每亩平均产量 7 升 5 合，每人平均收获量仅 6 斗 4 升，包括副业收入，每人全年

平均不过 9 斗。本区产物，北部多粮缺布，南部多布缺粮，可以南北互相调剂。布匹南部所产虽较多，但尚不能全区自给。其他特产，如宁武交城等县的木材，河曲煤炭、硫磺，岢岚之麻油，临县保德之煤炭、水烟，汾孝边山之果品等，都很丰富，目前因战争情况，销路不广，出口很少。

## 第一部分 财政工作报告

### 一、我政权未建立前的财政情况

抗战初期(1938—1939年),我军开入晋西北后,部队供给大部利用旧政权,粮食是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向当地借用(动委会,牺盟会帮助),经费的解决是除了总部发给的一小部分外,部队在红军时代节余的一些钱拿出来用了。当时经济来源非常困难,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发到 3 分钱。1938 年主力奉命调往冀中后,留晋西北部部队只有新八旅,此后我们受阎顽(编者注:指阎锡山)的经济压迫,日甚一日,阎顽公开叫嚣“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那时有钱都不易买到粮食,阎顽禁止群众卖给,谁卖谁受处罚。我们当时万分困难,我们为了求生存,在经济上不得不与反动派作激烈的斗争。当时的条件,作农工业生产很困难,只有从经营贸易上得到一些盈利,藉以勉强支持的活下去。我主力离晋以后,顽我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发展到顶点,终于爆发了晋西事变。反顽斗争胜利后,主力又奉命由冀中返晋,日寇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我们的地区从 7 个完整县被压缩到 4 个完整县。根据地遍受敌顽的烧杀、抢掠和破坏,特别感到困难的,便是粮食问题。部队经常处在行军作战的环境,吃不上饭,吃黑豆也有限度,有几个月时间只能每天每人吃四两,伤病员不过七两。由于没有一定限度的营养,害夜盲眼及肠胃病者数目很大。因此,发生违犯

群众纪律及大批减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深深体验到粮食对战争的影响是很大的，粮食供应不足是会影响到其他一切困难的，这于此后对粮食工作的重视，以至到 1940 年征粮过重是有连带关系。

## 二、我政权建立后的财政政策

自 1940 年起，开始建立新政权，财政工作毫无基础，当时为了供应抗战的需要，发动了全区的四大动员（献金、献粮、献鞋，扩兵）。虽然在动员中产生了强迫命令等过左的偏向，使人民受了些不应有的损失，但这一运动的发起还是非常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问题（自然在执行中的偏向还是不应该的），而且其他任何办法都是来不及采用的。

经四大动员后，解决了我们最低的需要，本年的冬季服装以及经费供给解决了，并建立了银行，设立了两个商店，并且为了恢复内地市场，我们的关（关向应）政治委员会亲自到临县动员商人组织贸易工作。从此，晋绥就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开始进行财经工作。

晋绥由于敌伪顽的连续扫荡，烧杀、抢掠、破坏，因而，我根据地是大大的伤了元气，在 1940 年晋绥不仅粮食大缺，即民间牲畜也快要光了，没有人敢出来做生意，群众没有心思种地，情绪非常低落。因此，我们在财政上采取恢复生产的方针，来增加财政收入，解决供给问题，其具体表现如下：

### （一）农副业方面

在 1940 年即提出奖励繁殖与饲养牲畜，奖励开荒，奖励种棉，藉以刺激生产发展。1942 年召开第一次劳英大会开展生产运动，1943 年 1944 年开展全面的大生产运动。虽然由于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邀功思想，使生产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还是有成绩的，特别在征收公粮中实行了奖励生产的各种方法：（1）开荒扩大耕地

面积，规定开生荒 3 年免征公粮，5 年免缴地租，熟荒免征公粮 1 年，免交地租 3 年，开河滩地免征公粮 5 年，免征地租 5 年至 20 年。(2) 兴水利，规定凡抗战以来从未灌溉之地，新近兴办水利者，其上水后第一年收入按旱地产量征收公粮，游地坝地者亦然。新修吊杆打水浇地，两年按旱地产量计征。(3) 发展特产，种棉折半计征公粮，试验区免征 2 年，种蓝奖励与种棉同，种麻 7 折计征公粮。(4) 奖励饲养牲畜，养羊一切收入（羊毛、羊羔、羊肉）不征公粮，饲养各种交配牲畜的资本及收入不征公粮，新生小畜不计收入。(5) 移民难民免征公粮 3 年。(6) 采制药、熬色叶均不征公粮。以上收效最大的是种棉、种蓝、熬色叶，增产了大批的棉花，打下了发展纺织的基础，增产了土蓝色叶，代替了大批的外来颜料（有 3 年未买外来颜料），牛驴猪羊也都年年增加。到 1946 年为了改进生产领导工作，克服过去缺点，专门召开了高干会，检讨思想作风，加强群众观点，1947 年又召开生产供给会议，决定了 90 万万元生产贷款。至于其他副业，1941 年即公布副产物超过正产 10% 者征超过部分，副业超过正业 20% 者征超过部分，1946 年则改为农暇经营的家庭副业一概免征。

## （二）工矿商业方面

首先是对纺织事业的重视，1943 年公布纺织收益免征公粮。这项工作晋绥边区是较有成绩的，比如 1942 年我们收买土布 2 万匹还收不到，而现在全区可以年产 50 万匹。抗战前没有一架快机，而现在竟发展到 6000 余架，目前土布虽尚不能完全自给（目前做到 60% 布匹可以自给），但也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穿衣问题。其次，1941 年公布公营商业及工业均免征公粮，1942 年各种工矿事业纯收益以 8 成计征，商业纯收益 9 成计征，小贩资本 3000 元以下者纯收益以 4 成计征，1943 年工资收入 2 成计征，薪俸收入 3 成计征，铁矿炼铁收入免征，其他工矿厂坊 7 成计征，商业收入

以 7 成计征,担挑小贩资本 1.5 石以下者纯收益 4 成计征,3 石米以下者 5 成计征,1946 年公布工人工资收入全部免征。

由上面情形可见,我们在取之于民中,如何为恢复生产是有过设想的,并收到了不少成绩。但由于我们在实际领导生产工作中,不少的同志忽视了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不采取群众自愿方式去组织生产,存在形式主义、锦标主义,在有些干部的邀功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在某些地区遗误生产是很大的。如在变工互助方面,群众自由组合的变工形式,我们有的同志就说人家是“私人集团”,自己硬拉群众搞花样,希望形式越复杂越新越好;不看时机领导工作,到夏锄时有的还强调开荒。再如,满足于甚至伪报成绩,只看表面,不顾内容,如 1944 年静乐五一大开荒,参加自然村百余个,人数 1 万 1391 人,牛 1774 头,驴 951 头,形式开荒 5962 亩,结果是开了荒地,荒了熟地;有的甚至还在搞集体农庄,结果是误时费工妨碍了生产,引起群众不满。另外,在发展合作社方面,1945 年 1 月统计全区即有合作社 1000 多个,在靠近大路的地方,差不多每个自然村都有,但到 1946 年年底,统计已不足 300 个,减了 2/3 有余,主要原因是思想上也是好大喜功和作法上盲目发展。不根据群众需要与生产结合起来,而大部分是为了搞消费赚钱;领导关系不明确(财、建、贸三管三不管),缺乏具体的指导,也是很大原因。以上这些缺点现正在克服中。

### 三、历年来的公粮工作

晋绥农业负担,除每年征公粮外,在 1940、1941、1942 年,3 年中还单独征田赋和村款粮,因征收手续麻烦,消耗人力太多,村中摊派村粮产生了不少的流弊。征田赋中对有粮无地,有地无粮,粮多地少,粮少地多者均同样征收亦不合理,故自 1943 年起即将田赋、村粮并于公粮中统一征收,村粮是由县统一掌握开支。



1946年村款粮不与公粮统一征收，又将村款粮放在县上，由县自己去掌握。虽规定了村款粮不准超过公粮的5%到11%的数字，但一般地区都超过了这一规定，特别新是解放区超过更多，如文水、汾阳、平川则达到公粮的90%到100%。因此今年生产供给会议决定，加紧整理与掌握村款是财政上重要工作之一。

### （一）负担政策

为使公粮征收中各阶层负担更加合理，在1943年增征“财产税”，1945年并增征“资产米”。征财产税不依土地价值计算，而依其生产量计算，即每产细粮五斗计一个财产富力，财产税与所得税之比例为1:5（所得税每一斗细粮计一个富力），并规定仅土地、林木、矿山、出租铺房等计财产税，其余存款、存粮、投资、住宅、用具、证券、畜养等均不计财产税，这对土地转移曾起很大作用。为了照顾贫苦农民，在财产税方面规定了不出租土地且自种的产量，每人平均在一石米以下者，免征财产税。“资产米”是对地主富有者的隐蔽资财估计折米征收，这对他们转移财产逃避负担，是一个打击。对他们掘发资财投资生产是一个刺激，对各阶层负担也有调剂作用。这虽然科学合理，但执行起来很容易发生毛病。由于调查困难，曾发生“冒记”等偏向，因此，又于1946年取消上年征“资产米”的办法，补充以“为求得各阶层负担公平合理起见，资产米取消后，凡力能负担之户应由县府酌情评议征收之”。因为还有些地主表面上土地转移变卖，实际上他们不从事生产，生活优裕，确有负担能力。

农业收入自1945年起，即开始按土地通常产量（即固定标准产量）计算征收，即根据土地之好坏固定其产量，按此产量逐年照比例征收不变。这对精耕细作，多施肥料，刺激努力生产的推动作用极为有效。通常产量评定工作因需时较长，故至今仍未普遍执行。

按农业收入的性质，对粗粮折米规定不同的折合率。如 1942 年定为出租地、伙租地收益，粗粮以 7 成折米计征，自种地收益以 6 成计征，租入地、伙入地收益以 5 成计征，出卖劳动力收益，以 4 成计征。至 1943 年以后，即进而改为租入与伙入地产粗粮以 4 成折米计征，自种地收益以 5 成计征，出租地收租与伙出地分益，均以 6 成折米计征。为照顾贫苦农民，规定了贫苦农民及抗属烈属及孤寡无劳力的收租与分益在一石米以下，同时该户每人平均亦在一石米以下者均以自种论。

为了扶持贫苦农民生产，1943 年起规定：贫苦农民在春耕前所借口粮籽种及贷款所出之利息，以及地租牛租房租等在计算时，从收入中扣除。为了活跃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借贷关系，调剂生产起见，特自 1946 年起，规定出贷现款现粮所得之利息一律免征。

历年来我们的公粮政策与人民的负担，虽然在作法上曾经产生过“冒记”、“抓大头”、“筷子中间选旗杆”等偏向，部分地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但一般对“富有者多出、贫苦者少出”的精神是基本上贯彻了的，从下列历年各阶层负担比例中可以看出：

#### 各阶层负担占其收入的百分比

年度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1940年	22	12	8	1
1941年	30	30	27	13
1942年	26.9	24.9	18.8	10.9
1943年	48.6	33.9	20.2	8.02
1944年	39.9	32.7	20.3	7.97
1945年	40.6	33.2	18.2	10.66
1946年	22.6	22.2	12.7	4.58

注：这是历年来几个县的典型调查，不是整个统计。工人雇农负担更少，如 1942 年雇农仅 6.4%，1946 年工人只占 2.53%。

至于历年公粮负担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典型调查）列表于后：

年度	实征粮数	负担占总收入数
1941 年	204.430	24.6%
1942 年	163.200	17.4%
1943 年	219.500	19.61%
1944 年	205.600	19.35%
1945 年	324.500	21%
1946 年	250.000	12.75%

注：（1）1940—1942年田赋负担尚不在内。

（2）1945—1946年村款负担尚不在内。

（3）大石以 260 斤计。

（4）1946年负担面 64%。

从上表看来，征粮数字并不很大，但对土地产量所占比例，就相当重了。即以 1946 年统计，全边区每人平均取获细粮仅 6 斗 4 升，如按上表 12.75% 扣除负担，仅余粮 5 斗有奇，如再扣除村款负担则更少，这还是以 1946 年为例。在 1946 年以前人民负担更为严重，尤其在 1942 年，敌人强化治安之后，边区人口缩减到 70 万左右，而我们脱离生产的人数，虽曾精简多次，但仍未少于人口的 5% 到 4%。根据这种情况以及抗战以来，人民对我们热忱的以人力、物力、财力的竭力支持，使我们渡过了抗战与自卫战争期间的财政困难，这是人民贡献的大功之一。因此今年公粮比往年特别减轻，且发放大量贷款以期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这是完全必要的。

## （二）公粮保管运输支付调剂问题

1. 保管。在 1944 年以前，在敌人继续不断的扫荡情况下，为了供给边区级及后方医院起见，在河西设大规模仓库；晋绥内地除在较安全地区设临时仓库外，一般可征公粮不脱离出粮户，随

用随取。这种好处是便于在战争环境中就地取粮，但由于敌人经常扫荡，有的是被敌人抢走，有的群众自己吃用了，藉口说是损失了。比如自 1940 年至 1945 年共拖欠公粮 41901 石，绝大部分是 1944 年以前欠的，同时很大部分是地主富农拖欠的。这主要因为我们在集中公粮工作中阶级路线不明确，对地主富农太宽（不怕他们把公粮用掉），对贫苦群众太苛刻（怕他们吃掉无粮可交）的原因。到 1944 年以后即改为安全区设少数仓库，边沿区不设仓库，在不设仓库地区将全村公粮采分散集中办法，由可靠的民户或干部负责保管（有仓库地区，交仓库以外的粮也是如此，先集中起来然后分为几处集中保管）。公粮保管工作由于过去有些干部责任心不强，缺乏及时的检查，以致沤坏、鼠吃等损失很大，一般的耗损在 3% 左右。但有保管好的如岚县一保管员，很负责任，做到损失仅占存粮 1%。2%。

2. 运输调剂。晋绥地区北部粮多，南部缺粮，为此对南部（即吕梁地区）粮食必须调剂，其办法是：一为河运，即装船沿黄河南流；一为陆运，即除粮食局以自己牲口运输外，组织群众牲口及机关部队的运输力量贩运或转运，必要时也向陕甘宁交涉调剂。

3. 支付。经过几年的摸索过程，对支付手续也创造了一套办法，自 1944 年起即规定统一使用标准秤，并严禁大秤入小秤出。在支领手续上必须经过仓库主任，无仓库地区，即经过区村粮秣助理员，领粮人必须携粮食局支粮证才能大批领到粮食，克服了过去领粮人直接向出粮户要粮，引起群众不满的现象。在零星支用方面，统一实行粮票制度。

为便利过往人员支领粮食，村公所或招待所可以按实际需要向仓库请领，但必须逐月将所收粮票交回仓库结算，不能长支短欠。严禁给招待所招待员大批拨粮，甚至给招待员划分招待粮范

围，随便索取的现象。

为了补救不设兵站地区的招待与供给，特规定排以下零星来往部队及工作人员，得按实有人马数发给粮草，不得超过一天；营以上来往部队或运输队，村只准按实有人马数发一天的粮草，三天以上者须经区批准，五天以上者须经县批准。其他边区因公来往人员未持本边区粮草票者，询得真实番号调查护照无讹者，留得证明，可凭他区的粮票依上述情况付给途中食粮。各级地方性工作团人员，负有战斗任务的部队，或别有工作任务或天雨与突然事件耽误者，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但均必须收得粮草票，按实情供给粮草。

各级支付公粮，确定逐级定期抵解报销。在执行中，内地区较好，边沿区在经常处于战争情况下的地区，则执行很困难，如文水、汾阳、平川部队吃粮开白条子的现象很严重，一年之内即查出番号不明不盖公章的条子有一万余张，主要原因是上面未及时发给粮票，下面未及时造报预算，区村粮秣工作不健全所致。这不仅混乱了支付制度，且造成了下面贪污浪费的空隙，经提起注意后，大体上是纠正了。

#### 四、税收工作

从 1940 年起开始建立税收工作，因成绩很小，未引起注意，一直到 1944 年这一段过程中都是很放松的，曾一度认为“收也收不到几个钱，不如干脆取消”到 1944 年以后检讨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认识了税收是财政来源的“长流水”是最靠得住的收入，只要加强领导与改进业务，是可以搞好的。这样引起注意之后，的确收入逐年增加起来，如 1944 年较 1943 年增加 3.4 倍，1945 年较 1944 年又增加 2.5 倍，1946 年又较 1945 年增加 1.9 倍（1944—1946 年均以银洋计），在解决财政问题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如 1946 年即占全部收入的 17.4%。因此这项收入，在今天仍应作为

开辟财源之路。

在货物税方面，1940、1941 两年中，对管理物资对敌经济斗争的政策还不明确（因没有经验），当时边区对布匹万分需要，一方面奖励进口，但另一方面又准许出口输往敌顽区（进口税率 5%，出敌区 10% 至 5%），在当时纺织未发展起来以前这样做是不对的。再如胡油当时产量不大，暂时还需进口，而我们却奖励出口，出敌区征 3%，非敌区 2%，而入口税则规定来自敌区者征 10%，非敌区者征 8%。这时的对外贸易是不适当的。

1942 年以后至 1944 年这一时期，对发展土产，管理物资及外汇，起了很大作用，严格禁止消耗品、奢侈品、迷信品等的入口。1944 年纺织业发展了，土布入口税即增征至 20%，这对纺织业发展更促进了一步。又如油入口 1942 年入口税增征至 20%，由此使内地油价提高（1942 年 3 角 5 银洋 1 斤，到 1944 年即提到 3 角 8 至 5 角），刺激了油业的发展。

由于 1945 年春未注意研究敌情，致使敌人盗取了我们的外汇，利用奸商以非必需品与假货向我大量倾销，如镜子、袜子、带子、扑克、假颜料等，当时公私争购以为很有利，但进来后都成了冷货，使我们吃亏不小。因此乃于本年 6 月间又下令禁止 48 种非必需品入口。

日本投降后因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忽而大肆开放，8 月开放 48 种非必需品入口。11 月宣布准予牲畜出口，企图争取绥包牲口进口未行通，又于 12 月命令禁止。这样对政策掌握摇摆不定，主要是由于不了解情况，缺乏调查研究。

政协会议后，对和平估计过高，对发展与保护土产信心不高，偏重于外货税收，认为我们存土产，贸易上要赔钱，对吃“过水面”希望太大；同时认为和平实现后，禁入货物太多，于政治影响不利，于是扩大开禁范围，除毒品严禁入口，粮棉适当管理外，

其余完全开禁，普遍降低税率，由最高 30% 降到最高 15%，这对我区损失是相当大的。如纸烟开禁后，碛口一地一个月即进口 25000 条，加以其他各口岸由河西入口者，每月至少 3 万条以上，约需外汇法币 4 万万元，纸烟入口仅次于布匹棉花。绥蒙地区由张家口来的联保、太阳、八达岭等纸烟，甚至还有英美纸烟不下数十种，运来兴县者 8 月份即有 1 万条。7 天的骡马大会上即在 4000 余条，这样就严重的打击了土产，如兴县卷烟业 30 余家 102 架盒子全部停了工，运贩土产烟的小商赔了本。仅兴县一地，估计每月少产 4800 多万元，折小米 2000 余小石。在这一严重的教训之下，为了马上扭转这一情况，一分局即号召全边区党政军民坚决不吸外烟。自 1946 年 10 月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着。这一个号召经验告诉了我们对外货的斗争，只凭禁止入口不易行通，因为过去越禁越贵，越贵越赚钱，越赚钱就越容易走私入口。只有从思想上动员全体不用外货，而且自上而下的作起，才能大收成效。

至于其他如毛巾、袜子等土产遭受洋货打击，亦甚严重。如兴县织袜业 23 家可年产 3100 余打，洋袜入口后只剩十架维持生产，另外土产受打击者亦甚多。总之这一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我们对保护土产，发展土产，抵制外货，是经济争斗上极其重要的一环，不争取独立自主便会在经济斗争上打败仗的。

营业税方面 1940、1941 两年实行按比例负担制，除征公粮外，另按“行业”征营业税，到 1942、1943 年取消了营业税，统一改为征收公粮，对商人大大增加了负担。如兴县一个中商 1942 年出公粮 12 石多，到 1943 年即增到 25 石多，因此，纷纷转业。1944 年后又改为单独征营业税，并以纯利按七成计征，由于营商有利以致商户又迅速增加起来，如兴县 1943 年商民 101 户，到 1945 年即增到 293 户。去年又发觉在执行征收中，人民负担农重商轻相

差甚远（如鲁峁村一个铁器铺按公粮征收需小米 2 斗，但如征收营业税款时折小米尚不到 1 斗，群众反映不公），因此，生产供给会议讨论决定，农商负担应相对平衡。

斗佣及畜税，过去对这两项税收很少重视，也曾引起很激烈的争论，有很多人认为是苛捐杂税主张不征，结果还是通过了征收。由于很多干部未注视这一工作，以致一般未贯彻。1945 年为了准备彻底推行，曾作了几个典型的试验，结果都很好。如临县深入农村整理了一下税收，10 个月共收了 23156 万元，可折米 3859.33 石，其中斗佣变款共 9122 万元，占总税收的 39.4%，畜税共 4.087 万元，占总税收的 17.66%，两项共占总税收的 57.06%。又如离石 9 个月统计，两项占全部税收的 6%；兴县全年统计，畜税占总税收的 43.5%，斗佣占 15.5%，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目前各地乡村漏税，隐瞒等现象很严重，应加以很好的整理。有的群众反映说“咱们有了粮，有了地，出税也是应该的，出了还是为自己！”这证明了这一工作并不难推行。

历年来各种税收的比例：

出境税	占总税收的 17.43%。
入境税	40.07%
营业税	23.05%
制售酒税	2.59%
畜税	8.5%
斗佣	3.67%
私货变价	2.7%
罚款	1.8%
售烟税	0.1%
票照费	0.09%



## 五、机关部队生产自给

在总的方面讲，各机关部队生产自给，成绩是很大的，没有这部分收入来弥补财政的不足，不仅民负更重，困难是会更难克服的。晋绥在党的号召下，1943年以后，普遍展开大规模生产运动，开荒地、搞农场、作商业、跑运销、开作坊以及手工业等，均异常活跃，一般机关部队自力更生的收入，平均占总开支的28%。全边区部队在1944年农工业收入，达29000余万元，可折细粮41900大石（每石260斤）。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边区一级各机关共收入22000余大石，一般的同志大部都完成了全年1石9斗的任务。本年全边区部队在农工商副等业的自力更生收益中，农业收入占1/4，有的单位如21团农业收入则占到本部收入的44.96%。在手工业生产上，发展亦甚普遍，所有各机关部队女同志可以说是绝大部分走上生产战线，男同志从事纺纱纺毛者亦甚广泛（如27团80%的人有纺车）。采取了多种多样生产方式，发挥一技之长，在生产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普遍的锻炼了同志们的劳动观念。各机关部队建立了家务，私人也建立了家务，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伙食调剂的很好。毛衣、毛袜、手套等大部是自己动手解决的，大小机关部队经营事业很大，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有些单位经营事业收入，竟占其全部自力更生的80%以上。

机关生产虽然有成绩，但也有很多毛病。如在农业生产上多调剂了农民的土地，这不仅使群众少产了粮食，而且有些是妨碍了土地改革工作。在规定生产任务方面，平均分配，不根据具体工作的情况，结果有些就妨害了工作，如兴县税局就曾经放开工作去到地里生产，造成了小公得利，大公吃亏。在商业方面，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掌握太差，以致领导没统一起来，分散也过于分散了，甚至某些连队也开起商店来，违犯政策法令，影响内

部团结，本位主义、剥削思想、与民争利以至贪污浪费等等现象相当严重。在去年冬即开始进行普遍深入的反贪污浪费运动，从思想上进行检查，特别在今年生产供给会议上，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揭发和斗争，也收到了很大成绩，并从此开始了由反贪污浪费走上献金献物运动。这对解决财政困难，支援战争是有补助的。

## 六、精简节约与供给问题

晋绥自 1943 年以来，财政上对供给问题一贯是采用补助办法（除自给部分外），或多或少按各单位家务大小酌情给以补助经费，统筹粮食。如 1944 年即规定除服装装备兵工粮食及公共事业费用外，各单位生产自给 47%，其余统筹。嗣后又因财政无力支付，又将统筹部分（53%）按现有收入给各单位折发统筹部分的 65%。到 1946 年亦同样因财政困难，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收入来补助各机关部队的经费，如某旅家务较大，则除棉衣统筹一半，鞋子统筹两双外，其余经费全部自给；其他部队则补助较多，但也很有限。至于伙食除粮食一律统筹外，1946 年野战军战时统筹，平时自给，全年只发过 7 个月菜金，地方军队、后方机关则规定全部自给 8 个月，全年财政上仅补助 4 个月菜金。

过去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及减少财政开支，也曾经有过几次的精简，但做的不够彻底，如 1942 年有一部分精简后，减到工厂中去生产，大部是个别精简，从这一机关减到另一机关，从这个地区减到那个地区，很难达到精简目的。到去年冬才从紧缩机构与机关着手，在动员参军的号召下，由后方走上前方的不少，如行署在两次号召下，即组织了两个连开往前线。

现在晋绥财政已很困难，人民负担已很重，全区脱离生产人数已超过正常比例一倍以上，所以今年生产供给会议乃决定统筹统支财政方针，坚决执行新的供给标准与精简节约方针。

确定全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民其家务由边区统一支配、调

动、使用，财政公开，严禁任何人私打埋伏，提倡节衣缩食，照顾前方，照顾战士，照顾群众，在这样的精神号召下，特决定取消中灶、小灶，取消干部服装，党政民学及部队的机关与后方，干部的被子、衣服、鞋袜、日用品等今年一律不发，取消一般的保健费，伙食标准的比例野战军最高，每人每月盐 1 斤、油 12 两、菜 30 斤、炭 45 斤，地方军比野战军减低 1/3，后方人员比野战军减低 40%，并限定各单位不足之数不得向群众设法解决。除战争情况外，一律禁止动员战勤。自己困难应由各单位自己动手生产解决，只准开荒种地，不能调剂或租种民田，以种菜喂猪开作坊搞手工业等为主。政民及部队后方机关自给解决菜、肉、鞋、袜、日用品等五项（以米价 9000 元 1 斗折米 1 石 6 斗 4 升），前方作战部队不定生产任务。商业上限制到旅以上才能设一个供给商店，过去所有公营企业一律取消或合并，或转为贸易公司系统。在精简方面，坚决执行编制，大量裁减牲口，决定警卫员取消乘马，地委书记、专员、团长只留公马一匹，县长公马取消，私人枪马一律取消，按编制发枪马证。私自买卖马匹者判二年徒刑，党员还要开除党籍，私自买卖枪支者枪决，以马送人者取消乘马资格，马没收，编余牲口组织运输队或送给群众生产。

## 第二部分 银行贸易工作报告

### 一、银行贸易局略历

晋西事变后，于 1940 年以兴县原地方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该行家务大部被顽固派搬去，所余仅几块印版，经整理后，以四大动员之献金 40% 以上充实了银行，并开始发行工作。1943 年以前银行与贸易局还是分立的，贸易局开始物资基础很差，只设立了两个供给性的商店，其主要任务还是采购

必需物资，供应机关部队，而用贸易来支持与配合金融工作，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 二、三位一体的形成

1943 年银行贸易局合而为一，由财政处统一领导，形成银行、贸易、财政的三位一体。银行发行款除以一部分充作财政开支外，一部分作为贸易资金。贸易局任务除以经营物资、对外贸易、调剂市场、支持金融外，仍采购必需物资供给机关部队。而财政处则一面借用发行款及贸易局某些物资作为财政开支，一面则用财政收入，粮食税收等，交由贸易局调剂物价，稳定市场，或以公粮变款维持金融，三者互相结合，作用很大。

## 三、发行工作的检讨

1. 历年来发行对财政上的支持和充实贸易资金是起了很大作用，计自 1940 年到 1946 年的 7 年中，平均财政用款占发行总额的 56.64%，用之于贸易投资上的发行款占发行总额的 31.55%

2. 对扶助生产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没有贯彻。1942 年提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一直到 1946 年都没有很好的贯彻，历年来的发行款用于生产贷款上的为数很少，如自 1940 年到 1946 年银行农业贷款只占发行总额的 8.73%，计 1942 年占 5.45%，1943 年占 17.68%，1944 年占 24.07，1945 年占 2.65%，1946 年占 2.55%。

3. 不敢发行的经验教训。从 1943 年到 1944 年约 1 年半之久，本币与银洋的比价稳定在 150—200 元之间，当时不但有稳定的条件，而且具备着发行贷款发展生产的条件，但由于过分保守高币值政策，只发行很少一点，而且没有用在生产上。当时有些人拿出赤金、法币、银洋到银行兑本币都不兑给，以致使生产品无销路，市场死滞，生产停顿，群众受到很大损失。

4. 大发行的经验教训。自保守观点、高币值政策纠正后，又

走向另一偏向——不怕金融波动。大发行之后，即大量收购物资，不用于生产（当然抓了物资也有不少的好处），以致引起金融的膨胀。在 1946 年 12 月到 1947 年 2 月两个月中间，银洋由 3000 涨到 7500 元，布由 5400 涨到 12500 元，棉花由 700 涨到 1400 元，平均涨了一倍以上。思想上以为落的多则银行基金更充实，银行赚钱更多，因此未积极的去稳定金融，对群众对大小公家的损失很大。

#### 四、货币斗争

##### 1. 与法币斗争

1942 年以前驱逐伪钞以后，当时本币的主要敌人是法币，法币对本币市场影响很大，因而对法币采取了严格的斗争。当时以经济力量为主，配合行政权力，政府颁发布告，教育群众，采取强硬态度，凡无行使手续者，一律没收。自 1942 年到日本投降前，可以说在内地市场上法币已经绝迹，巩固了我们本币的阵地，只有边沿农村极少数在黑市上活动。自法币禁用之后，本币市场扩大，虽有敌人几次扫荡，而本币并无波动，80% 的市场与农村均推行开本币。到日本投降后地区扩大，新收复区货币斗争复杂，接近国民党区域需法币增多，再加以和平思想一来，对法币管理放松，因此法币虽在内地没有流通，但边沿区及新收复区却大批行使法币，携带过境，管理手续曾一度废弛，致使本币与法币比价起了很大变化，如 1944 年 2 月法币 1 元兑本币 0.85 元，到 1945 年 6 月逐渐压低法币为 1 : 0.4 元，但到 1945 年年底即涨到 1 : 0.56 元，到 1946 年 11 月即涨到 1 : 1.43 元，这主要是由于管理不善，引起了法币提高，本币贬值。

根据我们以往经验，对法币斗争与军事政治斗争的配合有很重要的关系，如在绥包战役及崞忻大同战役时，由于形势开展，法币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当时在三个月内本币与法币比价最低到

1·3, 在这样机会下我们吸收了 12 万万余元法币, 并严禁法币在新区行使收获很大。

我们同法币的关系, 从来是处在“经常需要”和“经常吃亏”的情况下面, 因晋绥内地贫困, 出口物资较少, 许多必需物资如棉花、布匹、军工原料和器材等均非从外区购买不可, 而这些地区又多是敌顽区域, 非法币不能买到东西。因此, 我们土产出口不得不换得一部或大部的法币进来, 准备使用; 同时我们土产出口必须经过一定的地点和时间才能换回法币, 法币换回后又必须经过一定地点和时间才能出口换回必需物资, 这样运输一次最少需要两个月时间, 在这两个月时间中, 法币不断跌价, 以致使法币出口不能换回与土产等值的东西, 吃了亏。根据过去的规律, 法币每月平均要跌价 30%, 如此则使我们停留内地两个月的法币吃亏很大, 法币越多越久则吃亏越大。我们过去 1943 年、1945 年、1946 年以土产换回外汇及物资, 法币即占 33.5%, 在内地经常保存 1 个月至 3 个月的时间。其吃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其次在主观上, 我们往往过多的保存法币, 作为准备金融波动时放出之用, 而且是呆板的存起, 很少主动的积极的找法币销路, 藉以换回物资, 充实市场, 稳定金融, 结果金融波动全拿法币也不能稳定, 而且法币吃了亏。在绥包及大同战役时所吸收之 12 万万元法币, 亦未迅速争取出口, 以致法币跌价吃亏。

2. 对白洋的管理。晋绥在黄河沿岸及晋北一些农村, 存在着白洋或明或暗流通的现象, 主要原因是本币信用不高, 尤其在通货膨胀时白洋上涨更烈。如 1940 年白洋与本币比价是 1:10, 1941 年是 1:50, 1942 年 1:66, 1943 年 1:155, 1944 年 1:200, 1945 年 1:550, 1946 年 1:3550, 截至 1946 年底止历年来白洋上涨 777 倍。自 1944 年 5 月一直到 1945 年 9 月, 白洋与本币比价稳定在 155—200 之间, 这是晋绥币价与物价最稳定的时期。当

时我们实行了严格的管理，使白洋不敢露面，同时由于当时物价也稳定，我们白洋牌价变动很小，虽然只收进不兑出，但群众一般心理是只看牌价来估计市场物价的。当时人心非常平稳。到日本投降后，对白洋管理较松，农村中有少数白洋暗流，未采取强硬政策，在我们思想上总以为白洋有历史上的习惯，对农民影响深固，因之迁就了白洋的行使。如在 5、6 分区去年群众所得斗争果实白洋 70 万元，本应吸收回来，但因当时牌价不适当未能吸收，这是我们管理上的一个很大缺点。

3. 黄金的管理问题。1943 年到 1946 年，土产出口换回的金子虽然数量不大，但向来是由银行管理与掌握的，且无论作外汇或其他用处，均须经边区最高党政机关批准。因此在内地市场很少有金子的交易，到政协会后我们土产出口，大部分是换回的金子，为了回笼本币，将金子开放，准予公私商自由兑换，最高每日兑出曾超过 700 两。1946 年 3 月间在本法比价为 1:1 的时候，外面金价已经到了 20 万至 23 万元，而我们的牌价反从 20 万元降到 16 万 8000 元，故不到几天，即兑出黄金 2000 余两，银行吃亏七八千万元，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训。黄金在内地市场虽然与农民交易关系不大，但在较大的市场上，则黄金代替了本币交易的媒介，占住了相当数量的本币位置。如在临县碛口两地一次成交布匹，不用通过本币即可成交二三百两黄金，因此使本币市场缩小，信用降低，造成金融更易波动。据此今年 2 月又决定恢复黄金管制。

### 五、晋绥金融波动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

除了上述发行工作忽左忽右的偏向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本币没有建立在群众基础上。根据过去经验，本币不深入农村，不和群众发生密切关系，本币只在市场上流动，即不易稳定。而本币不稳，也会使本币不易深入农村，二者互为因果，但

主要还是如何设法深入农村求得稳定的问题。比如 1944 年 5 月到 1945 年 9 月,本币与银洋比价一直稳定在 155—200 元之间,而目前金融就经常波动。从去年 5 月到现在,白洋已经上涨 8—10 倍,究竟原因在那里?从以下几个问题上可以看出:

(1) 公粮收款问题。历年来以公粮收款收缩本币,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上是起着很有效的作用。过去每年都有以公粮收款稳定金融的准备,每逢波动时,便限期收公粮变款,因之群众不得不追求本币与出售粮食,以备以本币折交公粮,如此则可很快的提高本币,平抑了粮价,并影响其他物价下降。不过由于我们对“限期”和“定价”未加掌握,使群众在粮价下降时只有更多的卖粮,才能折交负担,吃了大亏。因市场很小,只有卖粮而没有买粮,则粮价更跌,这也是个缺乏群众观点的教训。目前由于人民负担过重,所征之粮尚不足食用,没有公粮变款,则票子不易回笼了。

(2) 食盐开放问题。反攻以前由陕西入口之食盐,是由贸易公司统购后批发内地,专收本币,没有本币很难买到盐。任何人每天都要吃盐,因此群众必须随时准备有本币在手,这样本币就和群众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但自反攻后因顾虑政治影响,乃与陕甘宁同时开放,取消了食盐的管理,这对支持本币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我们还准备在可能条件下恢复食盐管理政策。

2. 基本问题在于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与发行的矛盾。反攻以后地区扩大,而财政收入并未增加,脱离生产人员比反攻前突然增加一倍以上,因而财政预算加大,收入不敷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开支必须向银行借款,而银行为供应战争需要,只得发行本币,财政上取得发行款后,立即到市场上去用,因晋绥市场小,人民购买力很弱,市场上突然增加了本币的筹码,便会很快引起波动。如果为了避免波动不发行,则财政开支无法解决。另外在晋



缓财政收入中，所靠的主要出口物资，不能在内地为稳定金融而直接吸收本币。若以之稳定金融必须出口换得赤金、法币，再购成物资，才能回来回笼本币，这不仅困难。而且周转过程迟缓，赶不上市场发展的需要，这在目前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外，银行贸易公司本身有 200% 以上的基金，但仍然不免波动，我们认为主要也是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与发行存在着基本的矛盾。

#### 六、在稳定物价作法上的教训

1. 单纯的在内地收购物资。一般在物价稳定的时候，是死板的在内地收存物资，而且计划性不强，因各种原因未实现。自己内部也不一致，在思想上惟恐将来物资不多，所以往往用种种方法企图把物资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准备应付金融波动，因此也使得公私商不满而与银行贸易公司形成对立。同时公私商也摸到了我们的规律，看到贸易公司大买，就知道该货一定要涨价，因而就大家抢购，这也是促成金融波动的原因之一。如 1946 年 2、3 月间三分区粮价已经由 3800 涨到 4000 元的时候，三分区贸易公司存粮几千石，不但不卖，而且还到东村一带买粮，以致物价更加上涨。

2. 单纯的在市场抛售物资。在物价波动时，各方面力量配合不够，机械的大量抛售，如人家的布卖 3 万，贸易公司卖 2 万 8，人家的布卖不出去，只有贸易公司一家卖。我们的布原从陕西过来，由于贸易公司大量抛布之后，大批的布又从碛口向陕西倒流，以致内地市场布匹空虚（并没有因抛布使市场布价稳定、布量增加），潜伏了布价再涨的因素。商人也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专看我们有多大力量，能抛到什么程度。瞅到我们的布快要抛完的时候，就大胆吸收，你卖他买，你卖完了他买不到贸易公司的，就到市场上买，使布价提高甚至暴涨起来。我们这种只吐不吞或只吞不

吐的作法，使这些商人投了机，得了大利，我们大小公家和群众都吃了亏。

#### 七、在牌价与物价政策上的教训

过去挂牌和货物定价，多是与具体情况相差很远，所以有时便成为挨打政策。如 1946 年 2、3 月间，法币在外面涨价的时候，我们挂牌 6 毛 8 本币兑法币 1 元，致使法币供不应求，到法币低价兑完之后，我们又改为 9 毛 8 兑法币 1 元。又如 1946 年 5 月间形式地把金价定为 168000 元，而当时周围金价都在 20 万以上，因此不到一个月即兑出金子 2000 余两，以后又由于难以支持，把金价提到 22 万元。

内地各银行牌价不一致，相差甚远，如兴县 1946 年 7、8 月间金价经常低于临县金价 4 万至 5 万元一两（距临县只 240 里，一天多路程），由此造成商人投机。一个延安的客人到兴县以 1000 万元本币的存款，在银行买上金子，骑马到临县贸易公司卖成本币，赚了 200 多万元。

在物价上同样如此，如临县土布每捆布价 105 万，兴县市价 100 万，而兴县贸易公司定价 90 万元，企图以此稳定金融抛售物资，机械的主观的规定主要市镇的物价，并强令执行，结果总公司卖了 1300 捆布，赔本 400 捆。在压物价时不是从各该地物价的顶点逐渐压起，而是硬要低于市价若干若干，结果在市场上形成孤军奋战，谁也不跟我们的价格走。

## 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

薛 暮 桥

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是特别幼稚的。在 1942 年以前，可以说我们只作了些财政工作，在经济工作方面作的很少。1942 年才开始提倡生产，发展纺织，进行各种经济建设工作。自 1943 年秋到 1944 年春，工商管理局在全省各地区普遍建立起来以后，才开始进行工商管理及对敌经济斗争。此外就劳动互助，精耕细作来说，也是从 1944 年以后才开始全面搞起来的。这一切说明了山东财经工作的开展，不但比陕甘宁边区晚 2、3 年，即与其它兄弟解放区相比，我们也是落在后面的。所以我们只有很少一点经验，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 第一部分 抗战时期的经济工作

#### 一、当时情况（1942 年以后）

这时我们所处环境的主要特点，是战时的农村的。在这种落后的农村里，只有农业小手工业和流动的小商贩。同时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不断的扫荡、掠夺、破坏、我们的生产贸易工作，必然是极度分散的。在经济工作上，必须要求各个地方自给自足，独立自主解决问题。

1942 年以后，敌伪日益困难，而我军事政治斗争日益胜利，根

据地里广大群众开始翻身，因之我对敌经济斗争也易胜利。这时法币币值猛跌，一年之中物价要上涨五六倍之多。而伪钞自 1943 年秋后，亦开始猛跌，其速度且超过法币。因之我们必须脱离法币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 二、我们的经济建设方针及收获

### (一)货币斗争

1942 年以后法币币值猛跌，敌伪利用大批法币向我根据地掠夺物资。大批法币的流入我区，同时也就是我区大批物资的流出，致曾造成我根据地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摆脱此种危机，并取得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我们首先必须争取货币斗争上的胜利。我们于 1942 年开始发行本币（以前也发过但数目很少），排挤法币，进行货币斗争；但结果是只胶东区胜利了，而其它地区都失败了。直到 1943 年秋到 1944 年春，才在全省范围内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当时我货币斗争的方针是：排挤法币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以此争夺物资，稳定物价。方法是：利用行政力量禁用法币伪钞，建立本币市场；压低法币比价，提高本币币值；同时掌握重要物资，用以调节物价；管理对外贸易，以便打击法币伪钞。

1943 年秋货币斗争，排挤法币，建立本币市场，在滨海区取得胜利后，曾发生了一个困难，即我们要压低法币伪钞，保持本币币值稳定，必须大量掌握法币伪钞。于是工商局开始将食盐掌握起来，实行专卖，食盐输出均卖本币。这样一来，每天即有大批的法币兑进来，我们即将法币逐渐压价，在两月中即把法币压下去了。同时我们掌握花生油花生米输出，吸收伪钞，同样又将伪钞逐渐压价，半年中间即将法币和伪钞的比价压低了五六倍（这时伪钞开始狂跌，故这压价政策能够迅速收效，法币亦仍继续跌价）。货币斗争首先在滨海区取得胜利，接着鲁中、鲁南两区也

在滨海区的影响下胜利了，至 1944 年春在渤海区也取得了胜利。从货币斗争的胜利中，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种收获：

1. 物价相当稳定了。1943 年秋冬，滨海区物价平均跌落一半，鲁中、鲁南的物价也落下来了。1944 年全年各地物价亦是相当稳定的，1945 年稍提高。这可从以下的物价指数说明：

1937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100	6021	7002	19290

2. 由于物价的稳定，法币伪钞的比价也降落了。如 1943 年夏季，我本币与法币是等价使用，与伪钞的比例则为 8:1。1944 年春本币 1 元可兑法币 5 元，兑伪钞 8 角。到 1945 年敌人投降前，更变为本币 1 元兑法币 10 元，兑伪钞 8 元至 10 元。

3. 争夺物资也是相当成功的。在货币斗争胜利以前，每年有几万万元法币伪钞流入我根据地，我之宝贵物资亦即大批外流。货币斗争胜利后，我把几 10 万万元法币和伪钞排挤到敌占区去了，换回了大批的物资，这使我根据地的财富大大的增加了。过去由于我们保存大量法币伪钞，法币伪钞跌价我即忍受巨大损失，现在这项损失也完全避免了。

## (二) 贸易管理

1. 对外掌握重要输出物资，争取有利交换，支持货币斗争。工商局成立后，对外掌握重要物资，如食盐、花生油（在渤海区是粮食棉花）。目的：一是支持货币斗争，二是争取对外贸易的有利交换。由于我掌握了食盐，花生油等重要物资，不但货币斗争胜利了。而且使我对外贸易取得了较有利的地位，作到高价输出，低价输入。1943 年秋冬一般物价跌落了一半，而食盐价格则不但未下跌，并且还提高了。花生油在 1944 年秋我未管理以前，出口油价每斤跌到 3 元，内地 2 元 5 角上下。当我实行管理宣布花生油专卖后，油价几天之中即由 3 元涨至 5 元。这时我工商局即大量

在内地收买，待出口价涨到每斤七八元时，即大量组织出口。由于我掌握了食盐、花生油，所以换回了我们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这样不但我出口价提高了，而且进口价也降低了，使我对外贸易争取了主动的地位，这是成功的例子。当然失败的例子也有，如渤海区有一时期对粮食棉花的管理，我禁止粮棉出口，但又无力收买，结果大批粮棉走私外出，不但人民怨恨，公家的税收也损失了。

2. 对内提倡自由贸易，调剂供求，平衡物价。1943年以前，我根据地内地的贸易也实行管理，有些地区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也互相封锁，不能自由贸易，使我内地物资调剂受到了莫大的损失。1943年以后，对内取消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同时为发展纺织生产，工商局一方面吸收大量棉花，保证纺织原料的供给，一方面收购土布，保证纺工织工应得利益。至于粮食等物资的调剂，我们做得虽很不够，但在平衡物价上，也起了它一定的作用。

### 3. 贸易管理的收获。

(1) 扶助并发展了群众生产。我们对食盐花生油的管理，使盐价油价普遍提高了，销路也扩大了，因之也就刺激了晒盐打油的生产。如1943年滨海区柘汪盐滩，一年生产5000万斤食盐，而到1944年即增加至一万万斤。在纺织生产上，由于我们保证了原料与成品的供销，全省纺织业的发展也是很快的。

(2) 增加了公私收入。花生油管理提高油价，增加公私收入已如上述。食盐未管理前，在盐滩上盐民晒100斤盐的收入，能换到3至5斤高粮；管理后盐民晒100斤盐的收入，能换到15至20斤高粮，提高了四五倍。群众在食盐运输的收入上，管理前后亦有很显著的变化。未管理以前，群众运100斤盐一百里路所得的运费，只能换到5至8斤高粮，而管理后则能换到20斤以上，现在有些地区已增至30斤。

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同样的扩大了,开辟了新的财源。如 1944 年及 1945 上半年滨海区食盐的收入,约占该区全部工商收入的 1/4,烧酒专卖和花生油管理也获利很多(当时工商收入中、食盐、烧酒、进出口税及地方税、花生油等经营收入大约各占 1/4,工商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3/4。

这里附带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征收这样多的盐税(包括专卖利润)是否合理呢?这一问题过去我们也经过了反复的讨论。我们认为在抗战期间,盐税与其它负担相比,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政府收入虽大,而群众的负担并不重(在 1944 年每斤盐的盐税只有 3 角,每一个人的盐税负担一年至多不超过 3 元)。盐税的负担面特别大,不但我根据地每一个人都负担,而且当时敌区人民也负担着我们的盐税(如滨海区当时盐税的负担面,超过了本区的 10 倍)。同时由于食盐管理,过去盐商所得商业利润也就全归政府所有(这对食盐的生产运输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这样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大了,便可减少田赋等群众负担,这对扶助农业生产是很有利的。

如以我之盐税与国民党的盐税相比,则轻的很多,盐税向来是政府财政收入之一极重要的部分,战前在江浙一带,全部盐价中盐税占 70%,盐商利润占 20%,盐民收入只占 10%。在山东,战前 100 斤盐,盐民收入 3 角,政府盐税 7 元,盐税超过了盐价的 20 倍。敌人投降后,在胶州湾 100 斤盐,盐民收入 100 元法币,而国民党的盐税即收 1500 元至 2500 元。我们目前在盐滩上 100 斤盐盐民收入为 400 元,我政府之税收则为 200 元,只占 50%。在渤海区每斤盐一百里路的运费为 4 元,政府差额收 5 角;在大鲁南地区,运费为 6 元,政府差额收 1 元。我政府收入仅占盐价的 20% 上下(其中还包括着一部分的商业利润)。由此看来,我们的盐税并不算高。

(3) 完成了采购任务。管理食盐、花生油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使我对外贸易争取主动地位，获得有利交换，这使我们胜利的完成了采购任务，保障了军需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 (三) 生产建设(纺织生产)

生产工作在 1942 年以前我们作的很差,当时大部力量是集中在武装斗争上。从 1942 年起开始发展纺织,提倡开荒(渤海垦区在这时期开荒成绩很大)。1944 年才开始提倡劳动互助及精耕细作。这里所介绍的只是纺织生产部分,至于农业生产与组织合作社的经验,以后有机会时再行介绍。

1. 在方针上:是扶助群众生产,建立自由市场,争取自给。开始一个时期,有些地区在方针上是犯了错误,不是鼓励群众自由生产,而是由公家来开工厂,或者采用摊派方式,强制群众纺织。为着保证官定工资(定得较低),不准群众自由买卖,结果反而阻碍了纺织生产的发展。1943 年明确提出扶助群众生产,建立自由市场,争取自给,这些方针确定后,山东的纺织生产,就更快发展起来。

2. 在方法上:是由政府动员号召,通过合作社(山东全部合作社中,纺织合作社占 70% 以上)来组织发展群众的纺织生产,同时由合作社与工商局负责保证群众纺织生产的原料供给与成品推销,并且保证纺工织工的应得利润。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利益的保证(保持棉价、线价、布价间的一定比例),而不单纯依靠政治动员。

3. 采取以上各种方法收效很大,如胶东、滨海、鲁中、鲁南大部分地区,原来纺织生产都是不发达的,但经过我们组织领导后,很快的即普遍发展起来了。到敌人投降时,全省已有纺车 100 万辆,织机 16 万架,以当时我们所占之地区来计算,所产土布大体上已可自足自给。



从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中，我们体会一个基本问题，即生产建设是基本的，同时又必须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二者是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如生产建设搞不好，则不能争取出超，稳定物价，所谓货币斗争，贸易斗争这一切都是空的，失掉了物质基础。同样如不开展强有力的对敌经济斗争，即使生产的東西很多，但卖不出去或作不等价的交换，则生产果实不能利用或者部分的被人家攫夺去了，且将由于物价波动，市场混乱，而妨碍了生产事业的发展。

## 第二部分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工作方针检讨

抗战胜利后，这一年半中，整个情况变化很大很快。我山东的经济工作，因我主观领导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始终落在后面，所以也就犯了很多错误。兹特分别几个时期，加以检讨：

### 一、大进军到第一次自卫战争时期（1945年下半年）

当时情况是日本突然投降，我们向各大城市进军，因蒋敌伪合流及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我仅占领中小城市，10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向我进攻，我英勇反击取得第一次自卫战争的胜利，这时期在我整个领导方面发生了几个问题：

#### （一）进占城市与坚持乡村的问题

敌人投降后，我在整个工作的布置上是进占城市，把主要工商干部及大量资金集中起来，分配到几个大城市去，结果乡村工作大部垮台了。到8月底9月初情况变化了，蒋敌伪合流，许多大城市不易即刻收复，于是又发出指示：一方面进占城市，一方面坚持乡村，将干部与资金部分抽回（各用一半力量）。虽然指示发得很快，但机构拆散了，再恢复是很困难的。胶东在这时期并将工商局取消了，后来又在省令督促之下重新建立起来。

我们进占了许多中小城市，但无管理城市的经验，因此弄得相当混乱。有些地区把农民不需要的东西，统统认为奢侈品而禁售或者补税。对伪钞的处理也没有统一的办法，有些地区将比价压得太低（本币 1 元兑伪钞 100—200 元），致使商人吃亏很大，群众对我不满。威海卫在反奸诉苦中（1946 年春），群众把某些大商号分掉了。各大城市的战争缴获数目很大，但多未能成为财政收入，浪费和破坏的现象相当严重。此外城市中的贫民生活如何解决，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难题。直到 10 月以后，省政府在临沂办了一个“生产推进社”，从扶助群众生产中来解决城市贫民的生活困难，从中得出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去，才逐渐把这一问题解决了。

在干部思想上，这一时期也是很混乱的。开始时许多干部对进占城市无信心，认为自己是“土包子”吃不开。到进入城市以后，则又不愿再回乡村工作。总之因我们领导上对进占城市与坚持乡村工作，事先未能很好布置，防止各种思想偏向，结果工作上的损失很大。

## （二）法币伪钞回涨，思想混乱

法币伪钞的涨价也引起了我们工作上很大的混乱。当时我们估计敌人投降后，法币涨价是可能的，而伪钞则将狂跌。故决定吸收一部分法币，对伪钞则打击到成废纸为止。开始几天情况是如此，法币回涨，伪钞狂跌，但不过几天情况变化了，敌伪为延迟其投降时间，安定民心，即在其占领城市中大批抛售物资，提高伪钞币值。同时国民党为抵制我本币起见，在其“收复”城市中，宣布伪钞合法流通，是与法币等价使用（后来逐渐压价至 1:5）。蒋敌伪在经济上的这一合流，使伪钞稳定下来了，与我本币的比价由 2 分涨到 1、2 角，法币也由 5 分涨到 2 角 3 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许多同志思想上混乱了，认为这时期我们的军事斗

争虽然胜利，而货币斗争则失败了（伪钞法币回涨），于是采用主观主义的办法，强压法币伪钞，结果黑市活跃，我们更无力量掌握法币伪钞，且亦未能领导群众把大量伪钞及时排挤出去。

这一问题直到 9 月下旬召集工商干部会谈后，才算得到明确解决。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法币伪钞的物价波动很大，致使敌区许多工厂商号纷纷破产；而我本币物价则是相当稳定的，只有进口的棉花、洋布、纸张等价格跌落了一些，因此群众生产及合作社等均未受到多大影响。这表示了我们的本币是很稳固，不因法币伪钞的狂涨暴跌而受波动。另一方面，伪钞的回涨，当时在军事、政治上来说是对我不利的（相当安定了敌区的人心）；但在经济上来说，我们也可从中取利。因为假使当时伪钞一钱不值，无处使用，那么我广大新解放区群众手中的几百万万元伪钞均将白白损失了。伪钞回涨，我可以趁机将大量伪钞，排挤出去，换回大量物资，对我是有利的。故我 9 月工商会议后，决定重新布置排挤伪钞、法币的工作，一方面由各地工商局利用机会吸收伪钞，到敌区去换回物资。另一方面则用大力组织群众，将法币伪钞排挤出去换回物资。结果新解放区群众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办法，把大量的法币伪钞排挤出去了。

### （三）排挤伪钞与封锁敌占城市的困难

当时新解放区很大，我们的乡村行政机构未能普遍建立起来，我们只在几个城市中排挤伪钞，广大乡村还是伪钞市场。因之要将巨大数额的伪钞很快排挤出去，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到 9 月工商工作会谈以后，我们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分成数期逐渐向外排挤。此外一个困难，即是新解放区（尤为边沿地区）各种机构极不健全，这使我们对敌区的物资封锁很难发生实际效果。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才把这个困难逐渐克服。

## 二、所谓“和平建设”时期（1946 年上半年

当时的情况是：战争暂时停止了，我们占有了几十个中小城市，并且掌握了一部分近代化的工矿事业。因之在整个财经工作上，部分改变了抗战时期的方针方法。

### （一）货币政策

在抗战期间我们始终坚持着紧缩政策，保证了物价的相当稳定。到去年 2 月以后，因为估计联合政府快要成立，政治的统一必然促成经济的统一和货币的统一，因此采取及时大量发行货币，积蓄资财，准备今后和平建设的政策。当时对此问题，虽亦经过讨论，并考虑到大量发行后的物价高涨问题，但最后还是这样作了。结果到 5 月上旬发生了第一次的物价暴涨，在临沂城里，二三天中物价即上涨一倍多。这使我们手忙脚乱，立即通过工商局大量抛售物资，很快就将物价平抑下来了。因此，这次波动仍未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还是继续大量发行。到 7 月份物价再度上涨，并且比第一次上涨更猛。这时我们对于货币政策，意见不一，议论纷纷，直到 8 月初旬才下决心稳定物价。在 8 月华东局财经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才又明确决定了紧缩通货，稳定物价的政策。

从这一次货币政策的变更中，我们体验到，货币并不等于资财，一切资财是从生产中得来的，单靠发行货币是不能增加资财的。那种依靠发行货币来积蓄资财或解决财政困难的投机思想，是会遭到失败的。就是真正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也不应当轻率采用这种膨胀政策。

### （二）贸易政策

在第一次自卫战争中，我们对敌占城市，是采取封锁政策。政协会议以后，改为自由贸易。但估计国民党可能利用大量法币来掠夺我们的物资，这对我是不利的。因之当时我们在工作上的布置是：一方面公布取消对外封锁，实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则掌握

重要物资，以便争取较有利的交换条件，这可使我在对外贸易上仍操主动权。但各地对这一指示的执行，发生了两种偏差：一是自由放任，丝毫不加管理。许多干部认为既然“和平”了，今后敌我两区自由贸易了，何必还要管理呢！另一偏差是绝对封锁，这对我也是不利的。如我掌握了几十万吨煤炭，由于当时军事上的要求，没有及时出售，后来大多丧失，这在经济上的损失很大。

### （三）生产建设

在生产建设方面，由于和平思想，除以部分力量坚持乡村工作外，提出“管理城市、掌握机器”这一新的方针。当时曾抽调了很多重要干部去掌握金矿、煤矿，并支付了很多的资金。但这样多的干部和资金，对我财政经济未起多大实际效果。第二次自卫战争爆发后，由于许多矿区的丧失，这些大建设计划亦纷纷破产了。

由于这一时期我们过份重视“管理城市、掌握机器”，因之在领导上，对广大农村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放松了。当时对纺织生产的布置是“在新解放区继续发展，在老解放区着重提高质量，并曾指出“今后城市纺织工业恢复，乡村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将受限制”。因此多数地区把纺织生产放松了，有些生产干部还动员纺织合作社转变业务，认为“和平”到来后，手工纺织生产“吃不开”了。许多干部在这一情况下，思想上很混乱，厌恶乡村，厌恶农业，这使我们的纺织生产和农业生产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从这半年的生产建设工作中，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即在今天战争的情况下，城市和机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我们今天所有吃饭穿衣等等问题，仍然完全依靠乡村，依靠农业和手工业来解决的。我们这时期的建设方针太铺张了，缺乏中心，什么都想建设，“百废

俱兴”，结果必然弄得“一事无成”。因为我们现在的农村负担能力，是不能满足那种大规模的建设要求的。

### 三、第二次自卫战争时期（1946年下半年）

当时的情况是：从6月底7月初起，战争已在各地普遍爆发了。但此时我们在思想上，对战争的长期性仍认识不足，和平幻想仍然存在，认为打了几个胜仗，仍可进行和平谈判。直到9月解放日报“蒋军必败”的社论发表后，才开始准备长期艰苦战争，重新检讨过去的和平建设方针。

#### （一）精简节约，紧缩货币，稳定物价

1. 自8月华东局财经会议决定精简节约，紧缩货币，稳定物价的方针后，9月下旬又召集工商会议，具体检讨上半年的政策方针，布置今后工作。结果这一任务是胜利的完成了：自9月份起到年底全省各地物价是相当稳定的，这可从下列全年全省物价总指数中证明。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00	115	116	122	195	247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397	526	568	568	567	631

2. 在紧缩货币，稳定物价的具体办法上，除由工商局抛售物资，收缩货币外，并严格执行了精简节约，紧缩财政开支，收回各种贷款，增收田赋（征收货币）等重要措施。此外过去物价的上涨，固然工商局应首先负责，但各机关的公营商店抢购物资也应负责。故8月会议决定整理合并各机关的公营商店，不准依靠投机贸易解决机关“生产”任务。

3. 在这一工作的具体执行中。我们感到一个最大的矛盾是：我们货币政策与农业季节的矛盾。去年春夏需要紧缩通货时候，却因政治原因增加发行，到去年秋冬，按照季节规律可以增加发行

的时候，又非紧缩通货不可。当时我们估计，去年下半年物价的稳定，是有把握的（农村季节关系），但今年春天的物价能否稳定，却很少把握。这样就需要在去年秋冬继续发行一部分货币，吸收一部分物资，以备今春随时抛售，收缩通货，稳定物价；但这是与我们紧缩货币的政策相矛盾的。虽然这一时期工商局的资金亦部分的增加了，但因大部用以购存军衣布匹，其他物资吸收得很少，这就增加了我们今年工作中的困难。

### （二）封锁敌区，管理物资，管理对外贸易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对外贸易，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固然是错误，但绝对封锁的政策也是错误的。今天的情况与抗战时期有些不同，抗日战争中，敌人只有城市，没有乡村，故敌人对我们的依赖较深；今天的敌人，不但有城市，而且有乡村，并且还有一个美帝国主义在后撑腰。所以敌对我之依赖不大，而我对敌之依赖并未减少。因之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是绝对封锁而是争取有利交换，奖励土产出口，争取出超。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下，敌我物资交换亦改变了过去那种有利形势。过去我们的出口货利润很大（如花生油），进口货赚钱不多。而目前则正相反，是出口货物利润小，进口货物赚钱多。过去可以争取高价输出，低价输入，且易保持贸易出超；今天情形与此相反，困难更多。根据这一情况，这时期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确定为：奖励出口，限制入口、争取出超。对法币的比价应按市价规定，不要主观压价。同时我们号召开展一个抵制洋货、使用土货运动。

### （三）扶助群众生产，克服困难，争取自给

去年 8 月全省生产会议上，对今后我们的生产建设方针，作了深刻检讨，纠正了轻视农业和手工业的思想，认为手工纺织生产无前途，吃不开的思想，指出今天还要依靠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来解决军民吃饭穿衣等等困难，同时提倡自力更生，建

设自足自给经济，更进一步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思想上的转变，对于生产发展，特别是对纺织生产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 四、这一时期的收获

总括起来，去年一年中，在和平思想的支配下，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也收到了些成绩。这主要表现在：

（一）大量伪钞及时排挤出去了，法币也没有打进来，解放区已完全成为本币的独占市场。物价虽经过了两次大波动，但到去年秋冬是稳定下来了，相当的减轻了财政困难，安定了人民生活。去年全年物价上涨了五六倍，与发行情况比较不算很大，物价指数仍然落在发行指数后面。

（二）在贸易上掌握物资，争取有利交换，也有一些成绩。去年我们的食盐、花生油完全卖出去了，胶东渤海卖出了几年的存盐。至今我们对外贸易，仍可保持部分出超，在我对外贸易中，仍能部分保持主动地位。因此军工器材、印刷器材、交通器材等类采购，尚未感到严重困难。

（三）生产工作去年也有显著的发展，已有纺车 250 万辆，织机 52 万架，去年共产土布 500 万匹（每匹 1 码宽，40 码长）。就全省范围来讲，目前所产土布大体可以自足自给（在大鲁南地区，还不能完全自给，渤海胶东则有剩余）。全省已经有了 8000 个合作社，农业劳动互助和技术改进也有进展，去年粮食生产各地均能自给有余。

（四）在完成财政任务，保证战争供给上亦是有成绩的。工商总局去年下半年的财政任务原定 30 万万元，结果完成了 45 万万元，超过了一半，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69%。去冬的棉衣布匹，在 8 月底即大体完成了。今年的单衣布匹，在 2 月底亦已大体完成了。



### 第三部分 工作中的体验

#### ——我们对经济工作政策方针的认识

##### 一、对于货币政策的认识

(一) 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稳定物价，这就必须摆脱法币，求得本币的完全独立自主。物价的狂涨或猛跌，都会引起市场的混乱，生产的停滞，使我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因此我们

1. 反对低价高价政策，避免物价波动。过去在这一问题上，曾发生过两种不同的认识：有人主张提高币值，抑低物价。如在 1943 年滨海区货币斗争胜利后，曾经紧缩通货而使本币物价下跌一半。到过年以后我们来检讨这一问题时，发现提高币值压低物价这一政策并不适当，对我生产贸易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之物价亦曾一度下跌，结果各种工厂商店成百成千户的倒闭，这是又一证明。另一种思想则是认为增加发行，提高物价，没有什么危险，主张解放区的物价可以跟着法币伪钞的物价一同上涨。这一思想从 1944 年即提出讨论，经过去年上半年的试验，证明这一思想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物价稳定下来。但在今天我们以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来支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近代化的战争，要想使物价完全稳定，是有困难的。如果不能保持物价的完全稳定，我们应当保持物价的平稳上升，希望每年上涨不要超过一倍，而且逐渐上升，避免波动。根据我们几年来的经验，每年物价上涨如不超过一倍，市场上并不会发生什么震动，生产贸易事业也不会受到打击，相反的还有些刺激作用，所以并不怎样可怕。

2. 如何稳定物价？(1) 调节发行数量，要求作到能发能收，发行多少能够随时调节。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关键，是要作到财政

上的收支平衡。如发行货币来抵补财政赤字，则结果必然是只能发，不能收。在抗战期间，我们严格掌握了不作财政发行，直到去年上半年由于我们铺张浪费，财政亏空增加了，结果物价高涨，开支浩大，引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至去年下半年，我们采用一切办法，来平衡财政收支，结果物价又稳定下来。

此外货币的发行，还要适合于市场流通需要。如因战争关系市场扩大或缩小，便须随时增减货币流通数量。春夏货币流通需要减少，秋冬增加，也应当作有计划的调节。

(2) 要掌握重要物资来作发行的准备。过去有人认为发行货币必须要有金银来作保证，根据我们几年来的经验，在今天战时的农村的情况下，金银对货币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几种重要物资。法币准备也不需要很多（山东法币准备常常不到发行数的 5%），多了会在法币跌价中受巨大损失。在山东的规定是：发行货币最少应以一半作为工商资金（因山东的货币斗争，稳定物价，外汇管理皆由工商局负责）。在日本投降以前，我们的工商资金占总发行额的 60% 以上。目前由于财政亏空，工商资金比较小了，但仍占总发行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我们掌握了重要物资（如粮食、布棉、花生油、食盐等），对内可以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对外也可以同样用抛售或吸收物资的办法，来吞吐法币，调节法币价格，保证货币斗争的胜利。

过去的经验证明，今天我们货币的主要保证：首先是政权（如打胜仗或败仗），抗日战争的后几年，伪钞猛跌，而我本币始终稳定，其主要原因之一亦即在此。其次是物资，如只有政权（行政力量）而没有物资（经济力量）的支持，也是不行的。

(3) 统一领导。银行的发行必须统一，如各地区可自由发行，则币值便难保证。山东在抗战时期，银行也是统一领导的，各地区的发行额是由省统一规定的，当时各地币值高低不一，我们调

节各地发行数量，使各地物价逐渐走向一致，最后宣布全省各地货币自由流通。在目前的情况下，统一发行就更加重要了。

调节货币，稳定币值与物价，必须与贸易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山东掌握币值、物价和管理外汇等工作，主要由工商局负责，如将这几件工作分开来进行，则常常发生矛盾。即对外贸易需要外汇时，银行不一定有外汇；而银行需要大量外汇时，贸易机关不一定负责吸收。根据我们的经验，对外贸易与外汇管理工作，分开来进行是不利的。银行的发行工作，也必须与贸易上的需要（按照季节吸收或抛售物资）密切配合起来，过去山东在这方面配合得还不够密切，今后银行与贸易机关如何配合一致，统一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二）货币斗争的基本目的是：争夺物资，稳定物价

1. 过去许多同志往往把压低法币伪钞，作为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根据我们的体验，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应当是：争夺物资，稳定物价。敌人发行大量的伪钞法币来吸收我们的物资，我们则将伪钞法币排挤出去，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去吸收敌区的物资回来。在抗战中，我们货币斗争胜利以前，每年有几万万元法币伪钞深入我根据地，因而我区即大量物资外流。在我货币斗争胜利以后，我们把几十万万元法币和几百万万伪钞排挤出去了，并吸收了大量的物资回来。如果我们容忍法币伪钞在我们解放区内流通，那么在法币伪钞跌价时候，我们便须忍受巨大损失。

在我货币斗争胜利以前，我们本币是跟着法币跑的，不能独立自主，因此便无法把物价稳定下来。在货币斗争胜利以后，我本币独立自主，即可稳定物价，而不受法币伪币跌价的影响，保证了我解放区市场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如果我们容忍法币在我解放区内流通，物价也就无法稳定。

反之，如果我们能把法币完全排挤出去，建立本币独占市场，我们便有力量保持本币的独立自主，不受法币跌价影响。

根据这样认识，那末日本投降后的半年中，我们的货币斗争也是胜利的。有些同志仅仅根据法币伪钞的暂时回涨，认为这时期的货币斗争失败，这是不正确的。

2. 法币伪钞币值的跌落，主要是他们本身的通货膨胀，和军事政治上的失败所促成的，单靠我们压低法币伪钞比价，并不能把它们打击下去。有些同志适在法币伪钞跌价时候压价奏效，便把压价作用估计过大，认为这一压就真的把它压下去了，这是一种错觉。今天法币的流通是全国性的，法币的币值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当一致的，一个地区的单独压价，并不能起多大影响，亦不可能长久支持。假使法币本身不起什么变化（法币物价不变），而我压低法币比价，虽然可能暂时收到一点效果，但结果在贸易上会造成我之入超，外汇供不应求，最后还是法币涨价，本币回跌。所以我们如不根据市场的自然规律，而主观主义的来压低法币，对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应当认识提高本币兑换比价，并不等于提高本币币值。币值的高低，主要表现于物价的涨落上，如我希望提高本币币值，则应当从平抑物价做起，单从兑换比价上去用力是很难奏效的。

3. 如何规定比价（兑换比价）？决定兑换比率首先根据敌我两地区的物价比较，即根据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高低（这是主要的）；其次决定于输出输入的多少，即根据兑换市场上法币的供求状况来决定的。如我出超则本币涨价，入超则法币涨价。因此我要提高本币压低法币，主要是靠我区物价的稳定，其次则是争取贸易出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不压价，法币也会自然跌价的。

### （三）邻区货币调剂与货币统一问题

1. 固定牌价是不可能的，必须承认自然价格。在今天各友邻区之间的货币不统一，不能互相流通，在货币的兑换中经常发生一些困难。有人主张固定兑换比率，但经验证明，今天是无法固定的。因各区的物价在战争的情况下，是很难保证完全稳定的，而且各区变动又不一致（军事上的大踏步前进或大踏步后退，都将引起物价的变化）。所以只能根据自然价格兑换，参照双方物价及贸易供求情况来规定兑换比率。

2. 减少波动，减少差额，便利物资交流。为便利于我各友邻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我们亦应尽力减少比价的波动，及兑出兑入的差额。波动的发生，一般是由于某一方（或双方）物价的波动，与进出口情况的变化（一时出超，一时入超；或甲地出超，乙地入超），后者可从贸易上来适当调节，以期减少波动。假使由于投机商人兴风作浪，而造成比价的波动，这更可由我主观的掌握来克服之，在兑换中我们应采取自由兑出兑入的方针。假使我们主观规定牌价，不能保证自由兑出兑入，则黑市便会活跃起来，左右市场，这就难免发生波动。同时今后双方牌价，应尽可能作到互相接近，不要距离太大，以免商人投机，影响正常贸易。兑出兑入价格差额，也应尽量减少。

3. 发行统一货币，须先建立物资管理的统一机构。将来爱国自卫战争胜利了，我们是否能发行统一的货币，这是可能的，而且需要的。但今天的情况还很困难，今天提出发行统一货币似乎还嫌太早。将来如我发行统一货币，则各地原有货币均可按其币值高低，而与统一货币保持一定比价；更进一步可用统一货币把各地货币逐渐收兑回来。过去华中就曾采用这种办法，把华中各地区的货币统一起来了。但要发行统一货币，银行必须掌握物资，建立物资管理的统一机构，否则币值就很难稳固。恐将造成更大困难。

## 二、对贸易政策的认识

### （一）管理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争取有利交换

1. 主要照顾自己的利益，克服自己的困难。今天我们单以经济力量来打击敌人，将其打垮是不可能的；主要还在于我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今天国民党掌握全国各大经济中心，且有美国替他撑腰；而我处于经济落后地区，必须自己克服困难。所以我们对外贸易，首先就要照顾自己的利益，克服自己的困难。其次才是考虑怎样打击敌人，增加敌人的困难。假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增加了敌人的困难，但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困难，这就不大合算了。故我今天对外贸易，主要不在打击敌人，而在争取有利交换，所以自由放任与绝对封锁，同样都是不适当的。

2. 争取有利交换，必须掌握重要输出物资。如我们自己不能掌握重要输出物资，而任其自流的输出，则结果这些物资会被敌人掌握，或被投机商人掌握，使我处于不利地位。根据山东的经验，同样多的输出物资，能否掌握可以产生很不同的结果。如食盐输出，在未管理前往往成为大量法币侵入我解放区的一个缺口，而在管理以后，即成为货币斗争之一强有力的武器。在掌握物资中，根据山东的经验有两种办法：一是政治力量（如政府的统制、封锁等），一是经济力量（在市场上收购）。这两种办法须要密切的结合起来。

3. 争取出超才能取得贸易上的主动地位。如果贸易入超，就会使我处于被动地位，对我不利的。因之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一切消耗品及奢侈品应限制输入或者禁止输入，就连必需品的输入也应适当调节，奖励自己生产逐渐做到自给。只有这样，使我对外贸易取得主动地位，外汇不感困难，才能作到有利交换。山东今天对外采购比较方便，这也是个重要原因。

(二) 对内要扶助生产，保障供给。这就必须组织运输，调剂供求

1. 调剂供求，首先要掌握市场规律。这种市场规律，一是季节性的（掌握农产的季节性），一是地域性的（掌握某些物产的地域性）。在地域性的调剂中，组织运输是调剂供求中的一个重要关键。山东的运输工作做得很差，到今还没有象裕通公司这样一个运输机构。我们过去所采用的办法，是组织群众运输，如在食盐运输中，我们用掌握盐价，保证运盐利益（运费）的办法，而吸收了几万群众经常参加运盐工作。这是一个成功。

2. 调剂供求，掌握价格，又是扶助群众生产之一有效办法，过去山东扶助群众纺织生产，便主要在于保证原料和成品的供销，调节棉价，线价，布价，保证纺工和织工的应得利益，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三) 邻区物资交流，如何排除障碍

1. 相互了解情况，确定共同方针：独立自由，自力更生，力求自给，这是我们半个月的会议所确定的共同方针。根据这个共同方针，各地区应互相调剂，互相帮助，如用山东的食盐来调剂其他地区，限制长芦盐的销售，用冀南鲁西的棉花来调剂大鲁南地区等。必须排除各种障碍，便利友邻区的物资交流。

2. 互不征税，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限制。山东过去对各友邻区一般是进出不征税的，今天需要管理的只有烧酒食盐两种。烧酒管理各地均无意见，我们希望各地同样管理，增加财政收入。食盐今天我们还是需要管理，因为它在保证运销上还有必要。但把过去对敌斗争的一套经验，今天用以对付各友邻区，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同意对友邻区减低或取消差额（专卖利润），来照顾友邻区人民的利益。

3. 便利货币兑换，稳定比价减少差额。这也是便利物资交流

之一重要问题。过去兑进兑出商人损失很大，困难太多，致使物资交流大受阻碍。此问题在货币政策节中已经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 三、对生产建设方针的认识

#### （一）自力更生，力求自给，达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们经济上半封建性的一面，已大体上解决了；而半殖民地性的一面，依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自力更生，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建立自足自给的经济基础。在这一方针下，我们除应提倡土货抵制外货，并采用保护政策奖励土货生产以外，主要的还应在生产建设上下功夫。要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推广销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自足自给，减少对外货的依赖。保护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须有绝大决心用土货来代替洋货，以保护我幼稚的工业生产。

#### （二）主要依靠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在现有基础上把它逐渐提高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依然是战时的、农村的。因之我生产建设的另一方针，仍应当以发展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在客观条件具备时候，也可建设一些小型工厂，逐渐采用机器（或改良工具）生产。但不应当抱着过高希望，而把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放在次要地位。群众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是分散的，落后的，因此生产效率很低。我们必须逐渐克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分散性、落后性。其方法是以劳动互助、合作社等形式将其组织起来；同时改进生产技术，如精耕细作、改良工具等。经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以便从现有的基础上，将其提高一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还可以将公家的力量与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这不但可以扶助群众生产，而且能够掌握群众生产，掌握运输供销，建设我占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三) 改进生产与工厂建设, 我们的国营工厂, 在群众生产中应起带头作用, 而非与民争利

手工工厂要与群众生产相结合, 如纺织工厂尽可能多吸收厂外工人(家庭手工业者), 工具工厂可与群众的铁木工合作社相结合。同时我之国营工厂, 应大批吸收私人资金, 尤其要奖励职员和工人的投资, 使他们均成为工厂的主人。总之, 国营经济应当扶助群众生产, 且把公私资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的生产事业更迅速地发展。

关于生产建设部分, 这里仅仅提出一些原则, 至于具体办法我们也有一些经验, 尚未整理出来, 将来有机会时再来详谈。

## 第四部分 抗战胜利后的财政状况

### 一、目前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山东在抗战时期, 财政收支大体上能求得平衡, 没有多少亏空, 这主要是依靠精简节约, 发展生产及开辟新的财源(如食盐烧酒专卖等), 才能获得了这样的结果。抗战胜利以后, 财政亏空很大, 当时我们一般的都认为: 在抗战期间那样困难, 我们的财政尚能收支平衡, 抗战胜利以后, 更不会有什麼困难。但结果并不如此, 一年来的财政亏空很大, 财政困难超过抗战时期。

为什么我们的财政状况, 在抗战胜利以后反而更加困难呢? 其主要原因有:

#### (一) 工作上的铺张浪费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 我们大胆放手的开支, 但我们的财政收入, 还是依靠农村、农民、农业生产。所有城市和矿产, 不但不能赚钱, 解决财政困难, 相反的都是赔了钱。这就是说我们的收入没有多大增加, 但开支却大大的增加了, 这是财政困难的基

本原因。建设工作上的铺张浪费现象表现在：

1. 脱离生产的人员大大增加了。当时我们占领了广大的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因而决定大胆放手提拔干部、使用干部（这是对的）。但执行的结果，数量增加了，质量降低了，以数量代替了质量。至去年春天的统计，半年中只地方工作人员即增加了两三倍，许多机关团体的脱离生产人员，远超过了编制，一个区公所按编制只有 8 个干部，但有 10 余人到 20—23 人；县政府以上机关也是如此。人数这样多，但其中真正能工作的则很少，因之也就发生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有许多工作没有人做，积压在很少一部分负责干部身上；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员苦于没有工作，以致情绪低落思想波动。同时超过编制的人员，还在一天天的增加。如干部家属，附属机关等都增加了。去年春天，据省粮食局的统计，全省吃粮人数，只地方工作人员（不包括部队）即有 18 万人，而按当时的编制，则只有 8 万人，超过了编制一倍以上。

2. 各种建设好大喜功，不顾主观力量。各种工作都想迅速发展起来，其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如不考虑政府今天的财政负担能力，不从现实出发，就会造成严重错误。当时金矿、煤矿，城市工作，交通工作（邮政局、铁路局等），教育工作，各种建筑等，都花了很多钱。如邮政人员，当时全省即有 1 万 2000 人（精简后改为 4000 人），铁路人员最多时候也近万人，1 个月的开支即达几千万元。教育方面，大学中学学生是完全由公家供给的，全省 4 万小学教员也是由公家供给的；此外还有许多训练班，县学（一个县学即有二三百人到五六百人），抗属学校等均吃公粮。进了城市以后，各地在建筑上也花了很多钱，渤海有一个县建筑烈士祠的费用，竟超过了该县所收田赋总额。

3. 自动的提高了生活待遇，奢侈浪费空前增加。许多干部过

去用腿跑的，现在骑车子或牲口才能出发；原来骑牲口的则要改乘汽车。吃饭穿衣也比过去阔绰，许多干部以为抗战 8 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应当舒服些了。

### （二）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支出激增，财政赤字增加，可能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去年货币发行增加了，财政开支也增加了，因之也就必然引起物价的高涨。到去年七八月中，财政开支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了两三倍，而收入却不能按此比例增加。结果，上半年亏空了，下半年也亏空了，通货也就随之继续膨胀。如不及时挽救，必致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使我财政经济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 （三）战争消耗，空前巨大，财粮供给空前困难

1. 战争消耗和民兵民夫开支的浩大，是过去抗战 8 年来所没有的。象鲁南会战，这样空前大规模的战役，数十万人直接间接参加战斗，消耗之大是在中国历史上所少见的。

2. 因战争的关系，华中的野战军，边区政府及后方机关、家属等，都转移到山东来了。这使山东的脱离生产人员大大的增加了。现在山东脱离生产的人员超过了任何一个地区，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  $\times$ ，在大鲁南地区则占百分之  $\times$ 。这样大的数字，在今天的农村环境下，是很难维持的。

3. 战争地区与财粮供给互相矛盾，粮食供给空前困难。目前山东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大鲁南，这里大部分是山区穷地，胶东渤海比较富庶，则未打大仗。这样就使战争地区与财粮供给，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全省公粮收入，大鲁南地区只占 35%—40%，而吃粮人数，则占全省吃粮总人数的 2/3；在财政收入上也是同样。故大鲁南今春的财粮供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到 2 月底滨海鲁南两区的公粮已差不多吃完了，鲁中所存的也不多。

以上各种困难的来源，一部分是客观原因，一部分则是由于

我们主观领导上的薄弱所造成的。

## 二、如何克服财粮困难

### (一)精简。这是节省开支的最有效的办法

1. 重新审查编制，精减脱离生产人员。从去年 5 月我们即开始讨论精简问题，但因当时仍存在着和平幻想，故精简工作未能贯彻下去，有的机关讨论确定的新编制，反而比原来的人员增加了。直到去年 8 月财经会议以后，才把精简精神贯彻下去。华东局决定地方精简 10 万人，重新审查编制，调整机关人员。这工作首先在滨海区执行了，只政府系统即减少了 53% 的人员；此后鲁中、鲁南、胶东、渤海亦先后执行了。

在开会方面，过去是相当铺张浪费的。如鲁中劳模大会，1000 多人开会半个多月；各区公所也常常召集一揽子的工作会议，一来就是二三百人，完全要由公家供给。此外各种会议大多也是又大又长，花钱很多。到 8 月财经会议后，决定今后不开大会，所有超出编制的一切开支（如开会，训练等）不得超过编制人员的 20%，今年开会的报销已完全取消了。

在教育方面，县学取消了，大学缩小范围，还是由公家供给；中学学生自费，只有 20% 的公费学生（多系干部子弟），公家只管吃，不管穿。小学则全部改为民办公助，4 万小学教员从此不再需要政府供给了。

以上各项精简工作，如能贯彻下去，地方上减少 10 万吃粮人数还是可以做到的。但精简中的困难是很多的：一个是无家可归的干部家属人数很多，难于安插，有些家属特别多的干部，各机关都不愿接受，很感苦闷。一个是华中来的许多干部，本来都可参加工作，但因各机关正精简，超过编制难于安插，分配工作时也曾遇到一些困难。

### 2. 节省民夫，在今天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民夫是很大的一

个数字。过去到过一兵三夫，现在平时是一兵一夫，但打起大仗来就更多了。在这中间有很多是浪费的，如跑路时间多，工作时间少；不打仗时许多民夫闲着没有工作，打起仗来又感民夫不够；许多民夫到了前线后，又逃跑回来，以致不得不更多要民夫。直到去冬我们开始研究采用“常备民夫制”（3个月换1次），民夫的组织也较过去严密了一些，这样逃跑现象就减少了。但单单常备民夫也还不行，因为许多火线工作，他们不能胜任。故在鲁南战役中，我们又将地方上的子弟兵团调到前线去，专负最前线的战勤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些子弟兵团，一个人可代替两三个民夫的工作（因他们战争经验较多，政治觉悟程度较高，组织亦较严密）。胶东去年创造了胶轮的新担架，这也可以节省民力。此外各村的支援前线教育工作，现在作得也较好了，且已注意帮助他们家庭生产（民夫逃跑的主要原因：一是前线生活苦，一是顾虑家庭生产），今后逃跑现象可能大大减少。采用以上各种办法，我们一方面可以节省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又可节省民力，减少今年生产中的困难。

3. 再一办法是将我们一部分的后方机关人员转移到胶东渤海两地区去。胶济线切断后，这种转移更方便了，这也可以相当减轻大鲁南的粮食困难。

地方机关虽然一再精简，但部队还是继续扩大，最近几月又有10万青年参军，三次大捷俘虏也近10万，所以总的吃粮人数仍未减少。过去部队与地方机关人员是1与1之比，现在达到了5与1或6与1之比，这是适合战争环境的必要的改变。

（二）节约。这一工作去年下半年，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执行得很严格

1. 粮食节约：除吃饭以外，所有一切粮食开支都取消了，6两菜金粮也取消了。吃饭粮也减少了，主力部队由每人每日2斤4两

减为 2 斤 3 两，地方部队由 2 斤 4 两减为 2 斤 2 两，后勤机关由 2 斤 4 两减为 2 斤，政府由 2 斤减为 1 斤 13 两（均按高粱或谷子计算）。以上几项可以节约 6000 万斤粮食。

其次是改进粮食管理方法，成立粮食局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各地的公粮（渤海胶东除外），除去地方自用部分，统一交省总库分配调剂。保管的方法是在乡村中选择较坚固的房子，贮存公粮，把它封存起来，这样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2. 财政节约：去年下半年号召节约，决定在政府及各地方机关中，冬衣只发一半。执行的结果，大多数做到了补充 30%，比规定节约了 20%。今年的单衣，除主力部队发两套外，其他一切后方机关人员皆改发一套，鞋子减少一双，衬衣取消。菜金，主力部队由公家供给，地方部队公家供给一半，自己解决一半，地方机关的菜金则完全由自己解决。过去吃小灶的改为中灶，吃中灶的改为大灶，减少会餐请客等类不必要的开支。办公费，特别费，各单位自己解决。今年上半年的财政开支（仅指供给标准中规定的开支）中，整个计算起来，自己解决的占 20%。如单以地方来算（包括党政民），则自己解决的占 35%，政府供给的占 65%。

3. 动员节约：在减低后的供给标准中，还要动员节约，今年并将这一工作当作一个群众运动。省级各机关，今年上半年一般的作到了 2/3 以上的人员除吃饭外，其他全部不要公家供给；1/3 的人员作到了部分的节约，有的除全部节约外还献金。渤海区党委发起了“全年”、“全机关”、“全部”节约的“三全运动”。华中则发动了一个献金献物献粮运动，效果很好，献出来的财物据说可供主力部队 2、3 个月开支。目前山东亦在开展这一运动。

经过节约后，一般干部解决自己日常生活有两种办法：一是修补旧衣服旧鞋子，并将多余东西互相交换、务使物尽其用；一

是自己生产解决困难，如打毛线袜子等。今年准备打毛线袜子 30 万至 50 万双，发给部队及机关人员，单这一项，即可获得工资 1200 万至 2000 万元。

（三）开源。在不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及不妨碍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增加财粮收入

1. 预征下半年的公粮。在大鲁南地区，今年上半年至少还缺  $\times\times\times$  斤粮食，除节约 6000 万斤外还缺  $\times\times\times$  斤。这样大的数字，如果花钱购买，必然引起粮价涨飞，仍难完成任务。我们采用预征秋季公粮 50% 的办法，3 月份已开始征收，共能征收  $\times\times\times$  斤。在这春荒时期征粮，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但为保证军食，除此以外别无更好办法。

2. 增加各种收入。山东的税率现在比任何地区都高，这是由于财政困难，去年 9 月增加了一次，今年 1 月又增加了一次。田赋今年上半年每亩（标准亩）征 60 元，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22%。契税每亩按 30 元、50 元、70 元三级征收，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14%。在大鲁南地区，契税收入可以超过田赋。此外又增加进出口税，产销税，酒盐等工商收入。税收（包括进出口税和产销税等）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18%，烧酒专卖利润占 20%，盐税和盐的专卖利润占 12%，贸易收入占 12%，其它（营业税等）收入占 2%，工商税收仍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64%。

3. 胶东渤海两区节约上解。这两地区虽然比较富裕，但决定与大鲁南地区一样精简节约，开辟财源，今年上半年胶东渤海两区各上解款  $\times\times\times$  万万元，占其总收入的 1/2。

采用以上各种办法，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支，大体上可达到平衡。但实际执行起来，开支方面由于战争和物价上涨，恐将超过预算，多少亏空一点还是免不了的。

三、目前人民负担情况

### (一)公粮

这是最大的负担，去年全省共收入公粮×××斤，今年可能超过×××斤。关于人民公粮负担的情况，按全省地亩及公粮征收总数计算，则平均每标准亩负担18斤（每标准亩常年产量为150斤），占产量的12%（每人2标准亩平均负担36斤，其中1/3为小麦，2/3为秋粮）。去年山东是丰年，每标准亩平均产量在200斤以上，这样计算起来，则去年公粮负担大概不超过其收入的10%，今年估计必将加重负担，可能达到总收入的12%—14%。

### (二)田赋

一年征收两次，每亩共合5至10斤粮食，约占产量的4%；与公粮合计起来，则占16%（根据去年粮食局的调查，田赋公粮合计每标准亩平均负担22斤，占产量的15%，每人平均负担43斤）。契税估计也可能占到2%。这样今年的农业负担，将达到18%—20%，每人平均负担估计将在50斤以上。村财政的负担我们没有统计，数字很大，有些地区超过公粮田赋数额。

### (三)税收(包括专卖利润)

今年上半年全年省共收入×××万万元，平均每人约300元，其中有一部分（出口税等）加在外区人民身上，每人实际负担平均约200元。人民的各种副业生产收入（仅仅计算了十几项主要的收入，尚不完全），全年估计能达1000万万元以上，照此计算，则人民的税收负担，亦占其副业收入的10%到20%。山东的税率重于其它地区，全部税收（包括专卖利润）与公粮田赋合计约略相等。

(四)虽然人民负担很重，但因土地改革连年丰收和副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仍有显著改善

今春借征公粮再收田赋契税，人民负担更重，但据调查，一般人民尚有余粮，田赋契税可以副业收入解决，尚能勉强支持。为



着争取胜利必须动员人民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除上述各种负担外，目前，人民负担最重的还是出夫。山东现在农村的劳动力非常缺乏，已使农业生产感到严重困难。因为战争规模空前巨大，去秋山东有些地区麦子未能好好播种，今年的春耕将要受到更大的影响。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财政困难，已有办法克服；现在最担心的，便是生产问题。如果今年的春耕搞不好，则今冬明春即将遇到更严重的困难，必须预作准备。所以，我们今春正在动员一切力量，组织全体男女老幼参加生产，突击完成春耕；同时，号召一切后方机关人员帮助群众完成春耕。如果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将直接影响到今后战争的支持，必须引起我们全体同志的严重注意。（杨波记录）

## 山东的群众生产工作

### 第一部分 农业生产

#### 一、农业生产工作发展经过

山东的生产工作，在 1942 年以前作的很少，当时主要工作是开荒、打井、植树等。由于我们经验不够，只会模仿其它先进地区，未与山东群众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故成绩不大，如打井工作当时是普遍提倡的，但除部分地区收到了一些成绩外，大多是形式主义的。有些地区群众所要求的不是防旱，而是如何筑堤开河排水防涝，而我们却提倡打井防旱，结果群众是不积极参加这一工作的。在植树方面，因当时许多山是公山，或为地主恶霸所占据，山权问题未解决，群众对植树自然也是消极的，差不多种下

10棵就要死掉9棵。直到1945年秋冬，我们将许多公山分配给群众所有后，群众对植树才积极负责了。在开荒工作上虽收效不小，但因山东人多地少，所开荒地大多数是山荒，不但费力大收获小，且易冲下泥沙压毁山下好地。只有渤海垦区开荒数十万亩，收到很巨大的效果。

1944年我们才开始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变工，提倡精耕细作，结果变工组织在全省各地是相当普遍的发展起来了；但这时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不巩固的。但亦培养若干典型，创造许多经验，成为今后发展基础。到1945、1946年群众普遍翻身，同时领导上也深入了一步，各地的变工组织才逐渐走上了轨道。1946年1月全省生产会议后，我们感到农业生产工作应再提高一步，即将接收敌人的许多农场，有计划的加以整顿，明确决定今天我们的农场既不是经营农场，也不是试验农场，而是示范农场，规定每一农场的面积只要10亩到20亩地。集中力量从事于农业生产的示范推广工作，以便将群众的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经过去年一年，我们有一部分农场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如滨海区的群众过去对植棉因缺乏经验而无信心，经过农场示范推广后，该区群众的植棉技术是普遍的进步了；在浸种、锄麦等方面，也同样收到了一些效果。此外我们为了使农场与群众生产更好的结合起来，省政府实业厅还办了一个农业指导所，指导所与驻地的区村干部及劳动英雄，共同组成一个生产委员会，专门负责将农场所创造的经验，及时的向当地群众示范推广。经过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收效是相当大的。今后我们希望逐渐推广，达到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农场或农业指导所，以便不断的提高群众的农业生产。同时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中，“组织起来”与改进生产技术这两件工作，我们感到可以分工，在山东一般是“组织起来”主要由群众团体负责，而改进生产技术则

主要由政府负责。

## 二、劳动互助组织（组织起来）

（一）农业劳动互助组织的性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集体劳动

我们有些地区没有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去组织群众的农业生产，而是好高骛远，组织了许多农业合作社，把群众的土地合并起来共同生产，这样即超过了个体经济的范围，结果是因群众的消极怠工而失败了。如胶东区组织了许多农业合作社；把土地劳力都集中起来，农作收获是 40% 土地分红，60% 劳力分红。到 1945 年，在滨海区鲁中区也产生了类似的组织，并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在渤海区也同样组织了若干合并土地共同耕作的农业合作社，且在 1946 年 1 月该区的劳模大会上得到了表扬。这种大集体的组织形式，虽然我们领导上没有提倡，但实际上几年来是在各地不断的发展着。事实证明，这种超现实的组织形式，是脱离群众的，如许多群众参加农业合作社后，劳动消极，产量降低。这一问题直到 1946 年 1 月全省生产会议批评后，各地才逐渐纠正了。

其次，在集体养牛中，也发生过很多的偏差。根据地经过群众减租减息翻身运动后，土地分散了，耕牛也减少了。为了解决耕牛困难，1944 年滨海区有些村庄，群众自行组织集体养牛，并且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后经我们在劳模大会上提倡，1945 年即有很多村庄集体养牛，但发展结果，有些村庄把所有的牛都集体起来，不准私人养牛，甚至把驴子也集体起来，结果也是失败了。今天组织集体劳动，必须是在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去组织，否则必然遭到失败。

（二）组织形式应该是：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季节的到经常的逐步发展提高

大变工组由于山东人多地少(并且多是山地),今天是很难发展的。如几十个劳动力集中在一块土地上劳作,不但不能节省劳力,反而会浪费劳力。所以我们主张由小到大,并以小型的互助组织为主,由简单到复杂,今天我们只能将几种主要劳动如:耕种、锄草、收割等组织起来,如太复杂了,将一切劳动都组织起来,就不易被群众所接受。由季节性到经常性,过去我们在组织变工中,常常发生“春组织、夏疲塌、秋整理、冬垮台”的现象。其实这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造成的自然规律,不能算是失败。互助组织开始总是季节性的,一定要与农副业结合起来,农闲时期也能集体经营副业,这样才能经常保持。

(三)巩固劳动互助的关键是:自愿结合,公平交换(计工算帐)

这一问题我们虽然提出很早,但在执行中是常常发生偏差,我们许多同志在组织劳动互助中,往往不是从群众的经济利益出发,而是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完成上级任务”等)。群众没有认识互助组织对于自己有何好处,所以形式上是自愿,实际还是不自愿的。计工算帐不能公平合理,也常常是互助组织不能巩固之一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我们所得经验,与太行区的经验大致相仿,所以不再详谈。我们在去年一月全省生产会议上指出:今天我们组织劳动互助中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根据群众的经济利益及实际需要出发的,这样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都是巩固的。另一条路线是从干部的主观愿望出发,为争英雄模范,结果是好高骛远,脱离群众,不但没有好处,相反的还可能有害处。

### 三、改进生产技术,改进耕作方法

(一)吸收群众经验,在现有基础上把我们的生产技术提高一步

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模糊的，认为要改进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就必须有农业“专家”。但事实证明，我们只要能够虚心的向群众学习，及时吸收群众生产的经验，并把它研究总结起来，再来教育群众，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我们召开的劳模大会，在交流总结群众生产经验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我们也很重视农业专家，但专家的责任，并不是用他们自己的所谓“科学知识”去教育农民，或作脱离群众的所谓科学试验，而是收集农民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研究，再向农民普遍推广。要在现有基础之上，把我们的生产技术提高一步，这样才不致于脱离群众。

### （二）扶助群众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技术

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改进生产技术的主要方向，不是采用改良农具或者农业机器，而是扶助群众把现有的生产技术充分利用起来，然后再要求其逐渐提高，象用牲口拉犁这样古老的耕作方法，今天仍有许多农民由于缺乏牲口不能充分利用，如能保证全体农民都能利用牲口耕地，且能深耕细耕，及时耕作，便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今天许多农民的耕作方法是很高明的，同样也有许多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只要把那些高明的较进步的方法，在广大群众中普遍的推广起来，收效也是很大的。如胶东西海区的群众打井灌溉土地，产量很大；而东海区的群众则不习惯于打井灌溉。这样我们即将西海区的群众，请到东海区去教老百姓打井灌溉，精耕细作，结果很多地区的产量显著增加，有的增加到一倍以上。这些技术的充分利用，不单纯是一个知识经验问题，而是怎样保证全体农民都有力量来利用这些技术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帮助。

### （三）掌握中心，掌握重点

我们几年来在技术改进方面，主要是精耕细作，开展水利，浸种，选种及除虫等。山东近两年来水灾很多，故我们对水利工作

特别重视。渤海区剿灭蝗虫，功劳很大。在改良品种方面，我们做得太少，要向太行区来学习。

#### 四、农业生产的领导方法

#####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

关于这一点，中央虽早已有明确的指示，但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去是很慢的。在去年 8 月的生产会议中，我们听了各地报告，发现有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一种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一种是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如在去年一月全省生产会议后，各地布置工作时候，莒南县不是照抄省府的指示机械的搬下去，而是先召集地方上的生产干部及劳动模范，来开会检讨过去的生产工作，并研究今后的工作任务，提出办法，先吸收大家的意见，然后再将省府的指示结合起来布置下去，这样就会使我们的生产工作全面贯彻下去。相反的，也有些地区没有采取这种方法，依然是机械的搬运上级的指示，满足于文件的传达，结果是失败了。从这中间我们体验到，无论布置或总结工作，都应是从下而上的进行，而不应是从上而下的。如我们不随时随地的去向群众学习，向被领导的干部学习，则工作即会失败。培养干部也应是如此。领导者的责任，在于吸收群众的意见和群众的经验，加以整理研究，集中起来，然后贯彻坚持下去。

##### （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1943 年以前山东的生产工作，可以说只有一般号召，而无具体指导，结果收效很小。1944 年起我们开始注意培养典型，创造经验，以此经验来向群众示范教育。但又发生另一偏差，即我们的许多基点村，只有固守基点，而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及时总结起来，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去年有些地区在这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如滨海区的群众，过去都不懂得浸种，修整棉花、锄麦子等，去年我们一方面通过农场和劳英劳模创造经验，另一方面则

以他们所得经验，及时的向群众示范推广，普遍宣传，结果收效很大。有些地区为指导群众生产，在生产季节行署主任、专员、县长、参议长等都亲自进行集市宣传，进行修整棉枝的示范教育，并专门印发油印的生产快报，及时的传播交流生产经验。

（三）掌握季节分段布置总结工作，因时因地提出不同的号召

过去我们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大都是春天发出一个工作提示，即认为百事大吉了。营南县去年按农业季节（如春耕、夏收、秋收、秋耕等）分段布置总结工作，总结春耕同时布置夏收，总结夏收同时布置秋收，总结秋收及秋耕同时布置冬季生产，并从中来选举劳动模范，结果收效很大。今年我们在全省各地普遍的提倡按季节分段布置总结工作，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

## 第二部分 合作事业

### 一、合作社的发展经过

1940至1942年为山东合作社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曾到过1000多个。但那时合作社股金的募集大多是摊派的，当时差不多各系统（如青救会，妇救会等）都有合作社，经营上是干部包办的，业务上则不是为群众服务，而是为干部服务（如贩卖牙膏、牙刷、钢笔、墨水供给干部消费需要），为政府服务（如用摊派方式动员群众纺纱织布，供给政府军队需要），很少为群众需要服务。故一般群众对合作社不感兴趣，对自己所出的股金，认为是一种负担。合作社因没有群众基础，结果敌人一个大扫荡，大部合作社都垮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1943年提出了新的方针：不是普遍的发展，而是办一个巩固一个。将过去剩下的很少的一部分合作社加以整理，使其为群众服务。同时我们在滨海区臧家庄

创造了一个模范合作社，真正扶助群众生产。如该庄本来没有纺织基础，但经过合作社的扶助后，发展了一百多辆纺车，十几张织机，合作社并且推动了附近村庄的纺织生产。这样一来，群众对合作社的印象转变了，很多村庄自动要求组织合作社，到 1944 年合作社在各地又大量发展起来了。但这时的合作社还是不很巩固的，因群众当时还没有普遍翻身，真正为群众自己所掌握的合作社还很少，大多为小地主小商人所掌握。即便有些是为群众自己掌握的，但因不会经营，也多是赔本的。为小地主小商人所掌握的那些合作社，大多数是专作投机买卖，单纯的为赚钱，是脱离群众的。这样当时即发生了一个矛盾，即合作社为地主商人所掌握，多不能为群众服务；而由群众自己掌握的则又无经营的经验。这一问题直到 1944 年多数地区群众真正翻身以后，才开始得到了解决。这时基本群众经过几次斗争，已有经验来掌握合作社；那些小地主小商人出身的社干，在群众的监督和政府的奖励下，也得到了改造，知道要为群众服务才有发展前途。如滨海区崖子村模范合作社的社长，就是一个高利贷者。现在已转变得很好了。1945 年以后，在老解放区的多数合作社已能扶助群众生产，而且全由群众自己掌握，已是相当健全了。

日本投降以后，许多新解放区因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开始时我们没有提倡发展合作社。但事实上去年上半年，新解放区的合作社是大大地发展起来了，并且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发展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新解放区的许多群众，过去逃难到过老解放区，他们在老解放区里的生活，大都是由合作社帮助解决的，故他们对合作社的印象非常好，回家后他们即自动的组织了合作社（当然这些合作社还是不很巩固的）。山东的合作社，前年发展了一倍，去年上半年又发展了一倍，至去年下半年因战争关系垮了一些，我们着重巩固工作，没有大的发展。据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全省共



有 8000 个合作社，社员 200 万，股金 6 万万元。

合作社的业务也是一天天的复杂起来了，开始时我们单纯搞纺织合作(由原来的纺织小组发展起来的)，80%以上是纺织合作社。到去年其它合作社也开始发展起来了，特别是运输合作发展的较快，其它如打油、木工、铁工、渔盐、医药合作亦开始发展了，据去年统计全省合作社的业务已有 40 多种。合作社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着，开始时有些地区一个村有好几个合作社。1943 年以后均以村为单位来组织合作社，现在则有很多村社已超过了村的范围。如滨海区日照县的利民合作社和聚丰合作社，现在都有二三千辆纺车，几百张布机，推动了附近几十个村子的纺织生产。臧家庄合作社，帮助附近村庄组织了十几个村社，大家每月在一起开一次联席会议，共同讨论解决困难问题，这样臧家庄合作社，实际上即成了该区的中心社。有些地区现在已成立了区联社，也完全由群众自己掌握。区联社最早成立的是沂北县朱葛区，现该区(改称宿山区)65 个村庄，即有 65 个村合作社。

临沂解放以后，在临沂城里成立了一个“生产推进社”，当时组织推进社的原因，是为解决城市群众的生活困难。因为该城群众在敌伪统治时期，有 1/3 是伪属，还有 1/3 是专供汉奸、地主豪神的奢侈消费来维持生活的。我们收复后他们这些人即无事可做，生活无法维持。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开始时我们发放了一部分小商贩贷款，但因生意很少，这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办合作社，则因为过去敌伪曾用合作社来强征群众物资，故群众对合作社的印象很不好。而且当时群众不但没有发动，且对我们十分疑惧，号召群众自己来组织合作社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办了一个公营的“生产推进社”，该社一开始即组织群众纺织，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发展了二三百个纺户。纺户多了，织布还是一个问题，于是该社又在城北岔河区组织群众织

布，结果群众的织布业也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同时还发展了羊毛纺织业及运输事业。生产发展以后群众对合作社有了认识，我们即帮助其组织自己的合作社，至去年夏季已在临沂城内组织了 29 个各种性质的合作社，并在城北岔河区组织了 7 个职工合作社。在它扶持下有 4000 余辆纺车（城关）和三四千张布机（大多在岔河区），并有数千妇女参加羊毛纺织。我们很快把这经验推广到各地，不久在若干新解放的城市中都成立了生产推进社，采用公私结合办法来组织群众生产。

## 二、合作社的性质及发展方针

（一）我们的合作社是为群众服务的，首先是以扶助群众生产为其主要目的

这是它与股份公司不同之处。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针的认识掌握不够明确，致形成许多合作社的单纯营利观点，不去积极扶助群众生产，而是专为赚钱打算，结果便与普通商店工厂没有区别。如过去沂南县的久合成合作社，搞买卖，开油坊，赚钱很多；但是群众对它印象不好。营南县大店合作社自备铁机织布，而不扶助群众纺织生产，群众也就离开它了。这两个合作社因脱离群众几乎垮台，后经改造扶助群众生产，便在群众拥护之下巩固发展起来了。强调了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后，有些地区又发生了另一偏差，即有些合作社抱亏本主义，不能赚钱分红，群众不愿入股，这样也会影响合作社的发展。这一偏向很快的就纠正过来了。

## （二）合作社是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桥梁

因为我们还是手工生产，所以今天我们的合作社，一般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集体经营。在这方面过去我们也发生过两种偏向：一是没有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而把政府的合作贷款分给社员分散使用，这样对于扶助生产帮助不大。这样的合作社自然不能巩固，如胶东过去有很多合作社，是在政

府专卖棉花（卖给合作社的特别便宜）时为了买棉花而组织起来的，后来棉花解除专卖时，大多数合作社都垮台了。另一种偏向是否认个体经济，而过早的实行集体经济。如营南县劳动模范薛大娘，曾把她庄的一百几十张织布机都集体起来，把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变为一个大规模的织布工厂，结果引起了群众的普遍反对，消极怠工、生产停顿，最后完全垮台。所以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当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来发展合作社。除小作坊（如打油、木工、铁工等）外，一下就取消家庭手工业而实行集体生产，还是行不通的。

### （三）合作社是资金与劳力的结合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股份公司是资金的结合，以资金为主体，资金能分红而劳力则不能分红；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以劳力为主，只有劳力分红（如苏联今天的集体农场）。今天我们的合作社，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应是资金与劳力的结合，资金和劳力均能分红。在这方面我们也发生过偏向：一是强调劳力分红，如胶东开始时有些合作社资金不分红，只付六厘利息，结果谁都不愿入股。所以我们认为合作社开始时，必须保证赚钱分红，资金分红并可多一点。因在今天农村的环境中，如果不能扩大资金，合作社就不能发展。另一偏向则是有些合作社只有资金分红，没有劳力分红，甚至为想多赚钱多分红而降低工资，剥削劳动者的应得利益。现在各合作社大多是资金劳力都分红，其比例一般是资金分 50%，劳力分 30%到 40%，此外则为公积金和公益金。

### 三、合作社的业务和发展方向

（一）合作社的业务最主要的是生产合作，其中尤应以纺织为主

现在我们全部合作社中，纺织合作社仍占 60%以上，除纺织合作以外，即是打油、制粉、木工、铁工合作。这种生产合作，在

山东普通有三种形式：一是生产小组，如纺织小组、打油小组等，这是合作社的萌芽，而非它的成熟形式。二是供销合作，即供给原料推销成品，主要以此方法来扶助和组织群众生产。现在的纺织合作社，便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合作作坊，集体生产，如打油合作社和铁工、木工合作社等。这种合作大多规模很小，或者仅是合作社的兼营业务，还未发展而为大规模的合作工厂。

### （二）购买运销合作，信用合作

在今天农村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购买运销合作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它可帮助群众购买他们所必需的工具农具和生活必需品等，同时又可帮助群众运销粮食、棉花以至山果土产。但在购买和运销中，有些货物必须长途运输，有些货物必需从外面采购或者向外面推销，一个村社是无力克服困难的，就连区联社亦不一定能胜任。除由工商局来协助他们输入输出便利供销以外，现我们开始组织许多合作社的联合运销，并开始由许多合作社集资创办了几个联合运销站，便利土产运销，兼营采购业务。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感到运销合作发展前途很大，因为它不但赚钱很多，而且也确实帮助农民解决了很多生产中的困难。

信用合作山东作的很差，只有渔盐合作社的实物贷款，对于扶助渔盐民生产确实起了显著作用。怎样吸收群众存款，再来贷给群众，调剂活跃农村金融，这一问题我们未能很好的解决。因为一般群众只愿入股，而不愿存款（因利息很低）。同时政府的贷款也未与合作社结合起来，协助它们建立信用业务。今年我们开始强调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银行准备在各县设立贷款所，农贷尽可能的通过合作社来发放，真正建立起一个农村的金融体系来。

### （三）医药、教育合作

这几种合作在山东还很少，渤海区广饶县有一个全县的大医

药社,它对协助政府解决群众社会卫生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它地区亦陆续在各大合作社中兼营医药业务。教育合作我们去年开始创办,因过去我们的教育都是官办的,去年提出“民办公助”的方针后,有些地区的群众已开始来办教育合作,其办法是在全村(或几个村)一次捐募一部分教育款(或者利用公产公款),将此款存在合作社中,其盈利即作教育开支。

最近在讨论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时,发生了两个争论问题。一个是是否应当号召各合作社向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今天农村分工还不发达,所以一般农村合作社向综合性的方向发展,乃是必然趋势。但因目前多数合作社的资金、干部力量有限,我们也不过分强调办综合社,以免分散力量弄得一事无成。一个是合作社如何扶助农业生产。因我们今天以农业生产为主,所以有些合作社中成立了农业部,虽然有此机构,但又感到无事可做。我们认为合作社应当帮助农业生产,但不必要把互助组编到合作社来领导,合作社应当负责采购农具、肥料、举办信用借贷,帮助农民组织农产运销,吸收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去发展副业,这些工作对于农业生产均有极大帮助。

#### 四、合作社的组织领导问题

##### (一)村社是合作社的基本组织

山东过去有些地区创办大合作社。其范围包括一个区到一个县。这种合作社今天群众很难自己掌握,且因农村生活分散,这种大合作社最易脱离群众。现在我们在大合作社之下建立若干村社,并将大合作社改组为联合社。反之,过去也有一个村各系统办了好几个合作社,由于资金过份分散,加以干部薄弱,这种小合作社很难巩固。现在大多已经归并起来,一个村办一个合作社。当然这样一来,合作社与群众的联系可能不够密切。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村社以下划分许多生产小组和社员小组,通

过这些小组来加强群众与合作社的联系。社员小组是根据生产性质来划分的，如纺织小组，打油小组，运盐小组等。但这些小组并不是合作社的基本组织，合作社的基本组织仍是村社。在城市中这种组织形式即不适宜，因城市群众生活不同，职业不同，如将生活职业互不相同的群众，以街为单位组织一个综合性合作社就很困难。在城市中组织合作社，必须按生产性质来组织，不应按地区来组织。

（二）村社普遍发展起来以后，有许多问题非村社所能单独解决，因之即要求成立更高的区联社与县联社

1942年我们即普遍建立区联社，但这时村社尚未健全，这种区联社必然是干部包办，脱离群众的，因此完全失败了。到1944年以后，首先在沂北县朱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群众自己掌握，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在滨海区则开始产生中心社。于是去年春天我们又提出组织中心社和区联社。经过去年一年的发展，鲁中区成立了十几个区联社，滨海区成立了7个区联社和20多个中心社。区联社成立起来以后，方针不够明确，经营什么业务摸不着头绪。到今年一月全省生产会议，我们又明确提出：区联社是“合作社的合作社”，是为村社服务，其社员是村社。过去一个时期，在这方面曾发生了两种偏向：一是区联社统制村社，如规定村社所织土布必须交给区联社，否则便算“走私”。去年我们提出纠正，说明区联社不能统制村社，村社的业务、交易应当自由，区联社不应干涉。但纠正了这一偏向后，又产生了区联社不管村社，脱离村社独自经营某些业务的偏向。于是我们又提出：区联社应以帮助村社，解决村社困难为其主要任务。现在我们的区联社虽然是由群众自己掌握，但其工作还是不健全的，所以我们还未提倡建立县联社。

（三）生产推进社

虽然到今我们还没有举办县联社，但工作的发展今天却已有此需要，特别是在运销工作中，尤须有一个包括地区较广，并能结合各个合作社的机构，因此我们即以公家的力量组织了生产推进社。临沂生产推进社，在成立时候虽然是为发展城市生产，但是工作开展很快超过城市范围，它曾帮助城周围几十里的村庄，组织了纺织生产，扶助了铁业窑业等生产，并组织了滨海、鲁中、鲁南三地区的联合运销工作。由于临沂生产推进社的成功，我们感到合作社的组织领导值得再加研究。山东的合作社在 1944 年以前，是归工商局领导的，当时发展很快，其原因在于工商局能经常保证供给合作社所需要的棉花，而合作社所织的布，工商局亦负责收购，这样对合作社的业务发展帮助很大。1944 年秋冬合作社划归政府领导以后，政府只有行政领导，而对合作社的业务很少帮助。这样很多合作社都反映：政府领导不如工商局领导好。日本投降以前，日照县曾成立了一个“公营合作社”，由于它对纺织手工业的帮助很大，所以发展很快。当时对是否可以用公家力量来组织合作社的问题，曾发生过争论，结果认为可以用公家的力量来扶助和组织群众生产，但在群众生产发展以后，便应逐渐组织村社，并把自己改组为联合社。临沂生产推进社也是根据这一经验来举办的。去年秋冬我们又在滨海区成立了领导全区合作事业的“合作推进社”，虽然成立不久尚无成绩可言，但亦深得群众欢迎。现在我们的计划是普遍发展村社，在村社普遍发展且已相当巩固地区，开始组织联合社；同时有重点的以公家的力量来组织生产推进社，作为区联合社更上层的业务领导机关。这一种组织形式，在新解放区尤为适宜。

今后加强合作社的业务领导是很重要的，只要业务领导加强了，行政领导弱一点也还可以。政府合作科因不能为各合作社解决业务上的困难，所以各合作社很少跑到合作科来。但对推进社

则不然，整天你来我往，有了困难便来要求解决。今年我们的合作贷款，大部都用到了这一方面，大鲁南三个地区 6000 万元的合作贷款，即有 2/3 用作各地生产推进社的基金。这样集中使用的目的，亦即在于加强合作社的业务领导，具体帮助各地村社解决业务上的困难。

通过以上各种形式，我们便可以把公营经济与群众生产具体结合起来，而合作社便是这种结合的桥梁。由于公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结合，我们便能掌握群众生产，掌握运输供销，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势力能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

（杨波记录）



## 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财经工作决定

### 一

由于美国助蒋反共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中国内战将是长期的艰苦的，战争一时不能停止，明年将仍是全国大打的局面，且可能是最紧张最激烈的一年。因此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和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平。但由于我区经过 8 年抗战（内有三年灾荒），一年自卫战争及找到发展经济的道路较晚，农村经济枯竭，人民负担能力大大减低，所以在完成财政任务时，又必须照顾到人民生活及其负担能力。我区在财政工作上，历年来即存在有：必须大量养兵，必须保障部队一定生活水平，和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的三个基本矛盾。另外在财务行政上存在有：上级与下级、地方与军队间的矛盾，上级要求集中统一，下级要求独立自主，军队埋怨地方认为不能保障供给，地方埋怨军队有本位主义无群众观点，甚至认为把他看成供给部。在公营经济上，有公与私，大公与小公的矛盾。在区与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封锁，对敌斗争对内交流不协调的现象。这许多矛盾问题，从未得到妥善解决，以致财政供给困难，财务行政混乱，相互推诿相互埋怨，甚至造成党内不团结。今天又产生新的问题，即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生产加交通不便、与比较近代化的集中的大兵团作战、供求之间的矛盾，由这一矛盾所产生的困难应足够估计到，这在抗战期间是没有或不很严重的。日本投降后不久，

蒋介石向我区进攻，我们的口号是：把抗战 8 年中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不是保存力量，而是把力量使用到自卫战争中去，一时起过相当作用，但非长期打算。停战令和政协决议下达后，对和平估计过高，在财经工作部署上犯过错误，到 5 月间物价高涨本币跌落，预算不能维持，矛盾更加暴露。7 月中央局平稳物价巩固本币指示起了很大作用，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 二

人民负担能力，在 8 年抗战 1 年自卫战争，农村生产未大发展经济枯竭的情况下，究竟能有多大？究竟能支持多久？为了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最低限度需要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党政军民生活待遇标准、究应有多高始能维持？这三个问题互相制约，互相矛盾。根据具体的多方面的多量的材料研究结果，确认在现时农村经济及与蒋美进行战争的条件下，人民负担不能超过亦不能过少于小米  $\times$  斗到  $\times$  斗  $\times$  升。抗战期间我们曾宣布过战后负担可以减轻，现在反而增加了，这是为了保卫解放区，打败蒋介石，争取革命胜利，给人民谋永久幸福，增加负担是应该的。养兵不能少于亦不能过多于  $\times \times$  万人，不多养兵即不能支持自卫战争，争取胜利。一个兵的生活标准，以维持比中农生活水平相当为合理，不能超过亦不能过少于每年小米  $\times \times$  石。这一相互连系相互制约的比率，不能在一个问题上单独有所变动，否则，会牵动全局，结果，仍然会返到老问题上纠缠不已。明年度军费由  $\times \times$  万万斤小米核减到  $\times \times$  万万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万斤，地方费由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万斤，核减到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万斤（核减约三分之一），这是很大成绩。经验证明，只要采取民主方式、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部份了解全局、下级了解上级、上级照顾下级，再经过合理的精确计算，问题即可

迎刃而解。

### 三

一年来财政经济工作，保障了自卫战争的需要及党政军民的供给，是有成绩的；但因在 2 月以后对和平估计过高，对和平实质了解错误，对顽经济斗争松懈，重财政轻经济的观点抬头，普遍忽视生产节约，使财经工作受到一定损失。明年度财政将更加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完成明年度的财经任务，财经工作应依据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生产加交通不便，且生产一时不容易大发展起来，及比较近代化的集中的大兵团的作战所产生的严重困难的情况出发；反对不作长期打算，无统一计划无集中组织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因此：必须大量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财经工作最基本的一环。明年春耕前全区土地改革初步完成后，要用全力组织全区的大生产运动，如果没有全区的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增产粮食棉花布匹及其他日用品，就根本谈不到任何财政问题的解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或认为农村生产利润不大，而把重点放在商业投机，甚至贩卖美货或发票子的观点上。应明确树立不依靠蒋美并抵制美货，实行保护政策，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争取达到自给自足的方针。必须积极开辟财源、发展公营工商运输事业，加强对外贸易的指道、加强内地物资交流，各区间商业自由，不得自行征税，以便畅通贸易，发展经济。战争缴获物资归公，并进行清理后方，清出的物资缴公。这一开辟财源工作与生产运动同时进行；反对把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仅仅放在节约上（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开支则应充分保证），而应该把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增加人民财富及积极开辟财源上。必须提倡精确的科学的合理计算，一切财政收支实行

严格的审会计制度，一切公营工商业中实行成本会计制，严格整理村财政，建立计算人力物力并向村民定期报告收支情况的制度，加强一切后勤司令部的工作，实行支用民力的计算制，要十分爱惜民力物力财力，提高对人民无限负责的精神；反对仇视制度一切机动处理的有害观点，反对以为只要在前线作战，即可不顾一切的不加计算的使用民力的想法。如一个战役的作战兵员数与民力支付的比例，根据计算和经验证明一比一或一比一个半即够用，而某些部队某些地方往往用到四个甚至五六个等，浪费惊人。现在某些地方，民力的负担等于甚至超过其上解公粮数。提倡虽在战争紧张中间，亦能时刻计算节省民力；反对一把抓的现象，反对漫无计划，随要随给，要什么抓什么，1年不算账毛手毛脚的作风，提倡全面计划科学计算的作风。必须厉行节约，提倡艰苦奋斗，不浪费不枉用一文钱，力戒铺张浪费节省民力物力财力，坚决纠正以为抗战艰苦了8年，现在应宽一些享受一点的有害观点。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均应订出生产节约计划，节省财政开支，只有这样才能渡过明年度的严重困难。

财政经济建设，应完全服从战争要求，反对百废俱兴、平均主义的观点，应集中力量供应战争（在战争需求与供给上，亦应反对百废俱兴、平均主义的观点，因我们基本上是在财经困难条件下支持战争），只要能够保证了战争的基本供给，其他建设工作，照顾干部生活问题等等，即使做的差些坏些也应受到奖励。对战争以外的开支，只能限于必要的迫切的不可缺少的方面。

根据以上总方针，对几个具体问题作决定如下：

1. 关于收支总预算、供给原则等，根据人民负担能力及战争需要，明年我区向人民直接征收以每人不超过亦不能过少于×斗到×斗×升（县地方粮款可留1/5到1/4），全区以×千×百万负担人口计，加各种间接税收（工商营业税、出入境货物税、烟酒

税等等)全年收入××××××万石到××××××万石,公营工商业及其他事业中尚可有一部收益。人民负担标准各区不得自行增加。

各区经济条件不同,山地因粮食(价格低)与棉花布匹食盐(价格高)等物折价差额关系,负担虽同而生活较苦。在上解粮款中,平原较山地比例大,实际帮助山地。供给原则以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出发,某些基本生活,如野战军服装、菜金等必须按实物标准确实保障(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变动)。地方照顾军队(军队待遇比地方高),后方照顾前方(前方待遇比后方高),普通区照顾大作战区(大的作战区域动员民力牲畜及其它消耗损失由全区统一调剂)。适当减低干部待遇,改善士兵生活,在战争困难期间,使战士与干部生活相对趋于平衡,甘苦与共渡过困难,总预算军费占百分之×十点×,地方占百分之×十×点×(荣誉军人包括在地方预算内)。供给以小米为准,按实物领发。军队及地方预算,生活待遇标准,根据上述原则规定(另文颁发)。

在总预算中规定预备费小米×万万斤,以备不时之需,由中央局统一掌握。确定以90%用于战争动员,并弥补军费之不足,不得随便动用。如遇特殊重大事故预备费不足开支时,得另行召集中央局扩大会议(包括区党委负责代表在内)讨论决定。

军政费开支浩大,收支不平衡,为弥补赤字,必须从公营事业、战争缴获物资归公、清理财政、清理后方物资中增加收入,从发展机关生产节约运动中增加收入减低预算。

2. 关于财务行政方针,过去绝对集中统一与各自为政的办法,均不适合于现在我区情况。为适应长期战争需要,调剂并平衡全区人民负担,统一对外经济斗争,调剂内地物资交流,繁荣经济,并照顾我区土地广大、交通不便、经济条件不同、工作发展不平衡等条件,及照顾各区特殊情况,须给以独立自主机动处

理某些问题之权等等，决定财务行政方针：有关全区性的政策方针，负担标准，全区脱离生产人数，供给基本标准，对外贸易，银行管理票币发行，大宗收支等集中统一。而属于地方性的局部的政策方针，地方开支，政费全部支配，事业费之审计，在总人数内地方系统之编制，生活待遇之增减，非主要货物税则之变更（主要货物税则不得变更），贷款之具体分配，预备费之厘定等，各区机动处理。

3. 为克服战时财政困难，加强我区财经建设及对全区财经工作的领导，将全区财政供给、工商贸易银行等业务完全集中领导是必要的，这可以减少各系统间各区间的磨擦，并解决财政与经济、军队与地方、上级与下级、这一区与那一区，收入与开支、公营与私营等矛盾。因此决定成立中央局、区党委两级的财经委员会，对外设立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财办是一个权力机关，审核政府财政预决算收支，审核军队供给预决算收支，对工商贸易银行及各财经系统，均可直接发出指令，各财经系统均为其下级机关，有服从财办一切决定指令之义务。财办为全区最高财政经济领导机关，为掌握政策与制度的统一的工作系统，负责掌握并平稳预算，研究平衡物价巩固本币，指导全区工商贸易运输事业，设计推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并经常研究指导开源节流办法，研究指导科学计算办法等。

4. 为克服机关部队一般生产及商业经营的混乱现象，决定机关部队以农工业生产为主，野战部队一般生产及商业经营一律取消，后方部队机关的商业经营采限制办法，逐级统一管理及适当的集中经营，且一律不准做对外贸易。抗战以来机关部队进行一般生产及商业经营，在我财政经济困难情况下曾经解决过一些问题，补充部队机关经费的不足，改善部队机关人员的生活，减少了公家的支出，这是其功绩的一面。反攻以后，进入城市，普遍

闹和平思想，生活享受欲提高，一般生产及商业经营中有些则违禁贩卖军火及毒品；战争缴获物资、没收汉奸财产有些则投入自己商店变卖。营利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挪用公款，支用民夫，甚至包庇斗争对象，部分干部则腐化堕落甚至变节蜕化。它主要已不是改善群众生活，补助部队机关经费的不足的生产事业，而是为少数干部把持享受堕落逃避工作的场所，此种现象如不急于纠正，不仅失掉生产方向，将严重破坏政策制度，危害群众利益，继续腐化干部，加大财政困难。为此特决定：县以下党政民，军区部队团营连县大队(独立营团)，及机关个人的商业经营一律取消，由县(包括区)专署、行署、边府、军区各级分别成立统一的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领导，且不准做对外贸易。原有各单位的资本以及经营干部需全部缴出，按营业状况及股本多少分红。为使后方部队机关生产纳入正规，而不成为破坏政策、危害人民及腐化干部，不准在职干部或任何吃公粮的人担任经营人员，不准依靠特权谋利，不准贩卖军用品。财经机关的机关生产不准兼营商业，卫生机关的机关生产不准兼营药店医院等，不准支用民力，不准挪用公款等。

为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决定所有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干部的财产向党登记，不得隐瞒。

## 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经过去年 1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地主阶级及旧富农经济的封建部分，已基本上被消灭，在封建桎梏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已基本上被解放。农村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翻身农民成为今后国民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和军需民食的主要供给者。现在农民普遍的新的要求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以改善其当前不能满意的生活状况。没有这一步骤，农民还不能彻底翻身，我亦将不能把国民经济向前推进一步。因此，今年必须开展一个大生产运动。

为着开展大生产运动：（1）必须解决农民群众从事生产的顾虑，说明平均分配土地只搞这一次，只要分配的已经公平合理，即不再行继续清算。政府可依据土地改革情况，公布保障地权财权，并普行税契，巩固新的财产关系。提倡吴满有方向，说明党的政策是发展新资本主义，是帮助农民兴家立业，发财致富，只清算封建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受到奖励，以消除农民怕斗争，怕割韭菜、怕负担重而不愿生产的顾虑，和不事生产靠斗争吃饭的二流子思想等，以便农民专心致志发展生产。对被清算的地主及旧富农，奖励其参加生产，走张永泰道路，欢迎他们生产致富。（2）必须减轻人民支差负担，实行精确计算，节约民力。参战动员、民兵作战、担架运输尽量不违农时，要求做到每战役不超过一兵一夫。旧的战勤服务办法，应重新修正（包括战勤支差代耕



诸项目),支差应普及全面公平合理(工商业出支差款,村干部一律支差),实行全区战勤调剂办法,村区县专署大调剂,腹心区与战争区大调剂,腹心区协助边沿区,非战区协助战区办法,实行战勤与生产大变工,参战支差生产统一计工折工的办法,反对无计划和浪费民力的现象。(3)必须大量贷款,实行农贷政策,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农民现在的情况是有土地而耕牛农具不足,如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一困难,生产是发展不起来的。在发放贷款时,不应主观的指定农民买什么,而应依农民自己需要决定。同时,贷款应分别农民不同需要不同性质,适时的(不要太晚)并随时(农民通年需要贷款)放到农民手中。党的货币政策,主要在于刺激生产,某些死守教条而不力谋发展生产的理论和办法,是应该反对的。(4)必须开展新英雄主义立功运动,实行奖励政策。各级党应注意各种典型的创造和发明,培养并团结劳模及专门家;所有农工副业合作运输机关生产的劳模,均应给以奖励。(5)必须提倡自制、自用、自销、服用土货,实行保护政策,某些物品应抵制入口(如染料、纸烟等),以便发展我之生产。反对追逐超额利润,贩运美蒋货,而绞杀自己生产的办法。(6)各级政府、财经办事处、工商系统及所有公营事业,均应高度发扬群众观点,为人民生产财富而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不惜工本,支持农工业生产,支持群众运输合作事业,民富即国富,提倡化家为国。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生产,还应实行根据实际情况所必须的集中领导;但应反对不顾情况的一切集中,应相信下级放手分散经营。(7)必须解决与土地改革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土地已经按照数量质量平均分配,而且进行过填平补齐达到公平合理的地区(以县区为计算单位),须固定地权,及时的明确的转向生产;如果土地改革不彻底,地主阶级尚未全部消灭,或干部积极份子占有土地改革果实过多而尚须进行填平补齐,或因被蒋军侵占过

而尚须进行反倒算的地区，则应继续贯彻土地改革，不必强调生产，但须适当照顾生产季节，使土地不致荒芜；根本没有分配过土地的地区，则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主，不提生产运动。（8）在边沿地区，应使土地改革与劳武相结合，民兵组织活动与土地改革及生产相适应，发扬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并抓紧群众要求突击生产的办法。

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目标，是恢复战前生产水平，并进一步争取增产粮食增产口用必需品，达到自给自足与耕三余一。经验证明：达到耕三余一，在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的条件下，依靠散漫的各个劳动力进行耕作，劳动力浪费甚大。因此，就必须普遍实行劳动互助变工拨工，把一切劳动力（全劳动力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和畜力）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改变旧的生产形式，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劳动的生产形式。在组织集体劳动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注意等价交换、自愿结合、民主领导的原则，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经验又证明：达到耕三余一，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还必须提高农作技术与劳动效率，深耕细作，多耕多锄多上粪，选种优良品种，治河治水，兴修水利，垒堰修堤，造林植树，依具体情况定出要求和计划，达到增产目的。特种作物，则依人民需要和销路提倡，如棉花芋草蓝麻需要多种。为长期发展生产计，应发展畜牧事业。经验又证明：要达到耕三余一，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还必须充分利用剩余劳力，发展副业生产，实行农副业的互助变工，副业一般可通过小型合作社互助组、采取分红或劳力作股按股分红等办法。以生产财富为主（如纺织、淋盐、养猪、养鸡、养蚕、养蜂、种药材、编草帽辫等），结合农业进行。为刺激副业生产，各级政府、各级财办及工商系统，必须研究直接帮助县联社合作社小型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如投资合作社，供给工具，收买产品，提供技术，帮助计划组织

等），使各级政府及财经系统与群众生产相结合。

工业生产的目标，是达到全区自给自足并争取一部分成品出品。这在我区说来是有足够的条件的，除结合副业大大开展纺织运动外，应根据现有农村条件，着重淋盐、熬硝、榨油、火柴、造纸、皮革、开矿、炼铁、制矿及开办小型工具和机器工厂，反对离开现在农村条件，空谈建设机器工业，也反对不积极建设小的农村可以兴办的工业的倾向。工业建设，采取群众性的合作经营或私营公助或公私合营及公营办法。公营工厂，要做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军民兼顾，反对偏顾一面。各种工厂作坊、均实行劳资合作，职工合作，劳资两利的方针。公营工厂企业化，实行成本会计及经济核算制度，以求达到：“原料足、成本低、产量多、质量好、销路广”的要求。

合作事业（产销或混合合作社），须与群众生产相结合，组织农工副业，为生产社会财富、供应原料，运销产品、交流物资而服务。反对单纯营利观点，或从事商业投机的办法。经验证明：所有合作社，凡是为群众自己所组成，又为群众自己生产而服务，并能够给群众生利帮助其兴家立业的（反对单纯营利观点，但又必须给群众有利可图），均能欣欣向荣，没有一个失败的。凡是追逐近利，囤积居奇，或作商业投机的，没有一个不亏本，最后害了群众又害了自己。经验又证明：凡是建立了为群众所选举并依群众意见办事的领导机关，及建立了公平合理的及时入股定期分红制度的，均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并逐步发展。凡是不实行民主领导，少数人包办操纵，入股定份不公，不算帐不分红或分红不合理的，没有一个不为群众所反对，而陷于孤立的。公营商店合作社，则应十分强调为群众生产服务，反对单纯营利观点，但亦反对误解群众观点，对公家资本不负责任赔光了事的观点。

运输事业，亦必须与群众生产相结合，为群众生产而服务，反

对无计划的有甚运甚础甚运甚的办法。要经过调查研究，周密计划，去掉盲目性，群众需要输出什么，输入什么，按群众需要组织运输，这样的运输队合作社一定能有效发展。为发展运输事业，对内地的河道公路大路应补修兴建。

一切后方机关学校团体，均须无例外的首长负责大家动手，进行机关生产，着重农工副业和运输业，以解决本机关本单位伙食和经费不足，实行公私两利奖励分红办法。不积极从生产入手以改善生活，只讲求节约甚至取消了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供给部分，是不对的。也反对一提机关生产，就认为非搞商业不能完成任务的说法。

各区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并且在生产与节约的基础上，正确解决财政问题以保障供给。各级党政民（边沿区空白区在外）在贯彻全年领导生产时，一定要拿出其全力的 90% 来经常进行检查，及时注意解决生产当中所发生的困难、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生产。所有各级政府各级财经机关部门，均须参加生产运动。区党委并应组织工作队发家队等。分别到各地帮助工作，蓄集经验，要以进行土地改革的精神，来进行大生产运动。

## 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 平稳物价巩固本币的指示

半年来特别是近三月以来，我区物价暴涨 4 倍到 8 倍，本币与法币比值下跌，平均由 6:1 跌到 4:1。由于物价暴涨，币值下跌，给工农矿业及家庭副业生产以严重打击，并影响整个预算，使我党政军民学生生活遭受到极大困难。造成此种现象，除由于时局紧张、内战刺激及国民党区经济危机所加予我之影响外，也由于我在领导上过去某时期对和平估计过高，及对和平实质了解错误，对顽经济斗争松懈所致。

一、认定和平即将到来，本币与法币将要平行，银行亦可能统一（统一到国民党去）。因而一改紧缩方针为大量发行的办法，半年来的发行额超过已往总发行额的  $\times$  倍。近三月发行又超过前三个月的  $\times$  倍。发行用到工、农、矿、运输合作事业、家庭副业是小部分，大部分是财政透支与物资囤积。由于通货膨胀，使供求失去平衡，形成物价与币值反比例的发展。

二、认定和平实现后，美货不可低档，对外亦将实现自由贸易，因而放松了出入口与外汇的管理，货物税也不重视征收了。工商管理局机构一变再变，干部大批调动，由于这种盲目混乱，造成严重走私与消耗品渗入的现象。这就失去出入口的平衡，本币与法币之比值起了变化。

三、重财政轻经济的观点，始终没有很好的纠正，不是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解决财政问题，而是以印刷机解决困难；

不是以投资或贷款扶植农、工、矿、运输、合作、家庭副业等生产，而是单纯掌握物资（掌握物资应与抛出物资、巩固币值、平稳物价相结合）。机关部队生产，不是经营农、工、运输、合作、副业等生产事业，亲自动手，发财致富，而是用大部力量进行商业投机，巧取豪夺。结果形成生产消沉，操纵游资，捣乱市场的现象。

为克服目前财政困难，再重申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原则，发展并扶植农、工、矿业、家庭副业及运输合作事业，一切要从长期打算。为了发展我之经济，采取保护政策与组织管理方针；采取紧缩发行，巩固本币，压倒法币的方针；采取平稳物价，防止暴涨暴跌的方针。具体措施：

第一，紧缩通货，财政上努力争取收支平衡。今年后半年所增加的军政费，决不向银行透支；所有银行准备发行的本币，立即全部封存，准备购买物资款项未用出的一律缴回归库；所有机关部队及机关合作社，存放银行银号的款项暂行冻结，不准提取。各部队各机关各系统，预借经费、事业费未用者应缴回原领机关，归入金库，以后当按审计会计制度领发，不得预借。银行立即停止商业及机关生产贷款，已经贷出者，斟酌情况逐渐收回。今后贷款主要放在农、工、矿、运输合作及家庭副业上，以刺激生产。

第二，加强工商。税务管理机构，严格出入口与外汇管理。有计划的组织我之可出口及剩余物资出口，换回必需品。禁止某些奢侈品、消耗品进口。对于某些我可自造代替的物品，限制其入口，适当提高出入口税率，加强缉私工作，消灭走私现象。任何机关部队都要服从党的贸易政策及货物管理法令，不得藉故破坏经济设施。内地贸易自由，任何区域不得私自实行对内经济封锁，以免妨碍物资交流，死滞经济活动。

第三，改变公营商业方针（机关生产在内）建立正常的商业关系。一切公营商店，应根据当前市场情况，停止收购物资，并要抛出一部物资，以调剂市场供求。并要动员所有公私商店（主要是机关生产商店）从全面着眼，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不要再囤积居奇、投机取巧。只有建立正常商业交易行为，市场才能活动，商人才有正当利得。

第四，紧缩开支，保证供给。首先要清查核实党政军的人数。军队要进行一次彻底点验及登记武器、弹药、工具、服装等，坚决消灭吃空额的现象。要检查纠正已经发生的贪污及浪费现象。财政方面要贯彻统一集中的精神（但要更多照顾下面困难），进行一次清理，认真清查埋伏的财、粮、棉、布物资，为全区打算，撙节不必要开支。将清理出的与节省出的资财，作为下半年增加军费之用。原规定全年缴出生产任务 5%—15%，即将半年的交清。今后军政费开支，要严格遵守审、会、预、决算制度，禁止挪用公款，做私自活动。所有党政军民学的上半年决算，须于 9 月底报告各该上级机关，以备查核。各机关各部队所经营的合作社，其款项如何开支，亦须作出清单，报告上级党委，免生浪费。

第五，加强运输，沟通各地有无。内地某些经济上需要的公路，大车路、河道，要及时修理，妥加保护。要严格实行支差雇脚办法，节省民力畜力，以便从事商业运输。城乡群众合作社，运输互助组，运输队，须尽量发展。利用一切农闲，组织剩余劳动力从事运输，使货畅其流，脚费减轻，活泼各区经济。

第六，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各地经济、财政、工商、银行等各部门，应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各区党委之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策划财经工作。要把党的财经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各级党的财经委员会，应指导经济部，领导全区经济建设，以达到全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发展生产的目的。经济部不应仅仅成

为企业性的经营组织。

今天我们自力更生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好。全区有×千×百万人口，物产丰富，粮食、棉布、煤、铁、麻、皮毛、纸张、植物油等，可以自给而有余，食盐、洋火、烟草、药材等，可以自给一部分，需要外来物品很少。只要我们各级党、各军区、纵队均认识当前困难，及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善于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坚决执行上述方针，物价是可以平稳，财政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 晋冀鲁豫中央局并于厉行节约 渡过困难迎接光明的指示

我区生产节约克服困难的工作,历来做的很好,尤以 1942 年到 1943 年进行艰苦的对敌斗争和渡过严重的灾荒时期为更好。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但自击败日寇后,某些干部中即发生了追求提高生活享受,某些机关中即发生了铺张浪费的风气,享乐主义一时间得到抬头。爱国自卫战争开始以来,这种倾向曾经克服一些,但为了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全部胜利,还必须更进一步的发扬抗战以来的优良传统。党政军民干部,要深刻体会困难,厉行节约,以配合大生产运动,渡过黎明前的困难。为此,中央局特作如下的决定和号召:

一、财政开支以服从并保障前线胜利为原则,只要能够完满地保障了战争的供给,即使其他方面做得差些,也应受到奖励;不能百废俱兴、平均主义的分配。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力求节省,或完全取消,节省的粮款归公,作为公家收入,以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供给。

二、党政军民必须坚决实行新编制,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实行减少机关人员,紧缩上层机构,合并同性质的机关,大力裁减可以裁减的人员,以充实战斗部队,加强下层机构。部队方面,尤须核实人数,建立点验制度,以消除浪费,提高战斗力。

三、严格实行预决算审会计供给制度,一切粮、款、柴草、被服、枪械弹药的领发,均应依一定手续办理。不准挪用公款。实

行战时粮食支票制，消灭不记名的红白条子现象。旧棉衣棉絮及弹壳等按时交公兑换。

四、高度爱惜民力，节省物力，战勤代耕等均应从长期着眼，处处照顾人民利益。动员民力，应持科学态度，精确计算，做到每一战役不超过一兵一夫。使用民力，尽量做到不违农时，要重新制定战勤支差服务办法，支差要普及全面，工商业出支差款，村干部一律支差，非法要差派脚，严加禁止、取缔。

五、贯彻执行军区去年 8 月 4 号命令，作战缴获物资归公，以减轻人民一部分负担。

六、彻底进行清理财政，清出粮款资材，一半留各区自用，一半解上。中央局确定人民负担每人不得超过 4 斗到 4 斗 2 升，并不准进行损款增税等，为真正实现这一决定，必须大力整理村财政。

七、开展对敌粮食斗争，注意保护和保存粮食。要随时根据战争情况转移调动粮食，检查仓库，要求粮食亏损数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点五。保护保存粮食有功人员，记功奖励。不负责任而使粮食腐烂损坏者，予以处分。

八、军需工业进一步实行企业化、成本会计、核算制度，贯彻毛主席“节省原料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的指示。

九、肃清本位主义，过去所有埋伏粮款等，统限于今年 5 月 1 日为止，一律报告交公。严整组织纪律。决定脱离生产的干部党员，向党登记其本人财产，并鼓励其向党捐输，提倡廉洁奉公。

十、省吃俭用，厉行节约。提倡来自工农回至工农，与人民同甘苦，与士卒同甘苦的精神。干部津贴与战斗员同，一律改为小米六斤，小灶改为中灶，中灶取消，减低后方机关菜金、办公杂支及被服等。生产节约有成绩者，奖励。

我们的困难只是胜利前进中的一些困难，只要努力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 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 保证战时供给

黎 玉

### 一、半年来经济工作的胜利

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和半年来自卫战争胜利是不可分开的。半年来自卫战争取得很大胜利，半年来财政经济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如财政经济工作做不好，就使自卫战争缺少了物质基础，军需不足，民生困难，就只好打胜仗了。去年，我们经济工作上的胜利也是空前未有的。几十万套衣服，几百万担粮食，各种军工器材，办公杂支、战费消耗等等费用，数字都是惊人庞大的。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前线的需要，同时人民生活也改善了。回忆半年以前，物价飞涨，人员激增，预算庞大，相当表现了经济上的困难。但半年以来，我们克服了这个危机，这是我们财政经济上的一大胜利。

中央指示我们，当前财经工作一方面要满足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照顾人民生活，甚至还要改善人民生活。今天因为战争，群众的负担是相当的增加了，但因群众普遍得到土地，且因生产发展、不论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的收入，均有增加。因此，我们不但能够保证战时物资的供给，且使群众的负担亦未感到十分困难。这说明去年 8 月会议，华东局“九九指示”是正确的，是

有效的，克服了经济危机。虽然我们有部分亏空，但物价相当稳定，这是全体财经工作同志努力的结果，这是全党动员的结果。这种成绩是很重要的。

这些贡献中，当然还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能自满。战争还在发展，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任何麻痹、自满，对争取胜利都是有害的。去年的“九九指示”基本上仍然是有效的，要继续贯彻。诸如紧缩预算，紧缩开支，生产节约，开展根据地自足自给生产，稳定物价，健全财经机构，加强工商贸易对敌斗争等。为了保证战争需要，支持战争。还必须更进一步的贯彻这些方针。

## 二、今年财政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在那里？

今天在财政经济上还有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战争已更接近胜利。但在华东地区还有一段更残酷的局面。战争的供应不可否认是很大的，如果去年我们维持了稳定状态，那末今年如不万分努力，就不一定能达到十分稳定，这是由于我们人数增加了。现在的总人数比前年下半年总人数增加了一倍还多，这里包括华中转移来的，以及边沿扩大的地方武装、民兵、民夫、战时勤务、与俘虏人员等等，因此整个财经开支数字上就要增加一倍。尤其严重的表现在大鲁南（滨海、鲁中、鲁南）脱离生产的人数占全省总数的 65%。这三个地区总人数 1000 万，要养活脱离生产人数 2/3；另二个地区总人数 1800 万，而只养活脱离生产人数 1/3。何况这三个地区石头多，与胶东、渤海无论如何是不能比拟的。所以问题的焦点是在大鲁南。

目前整个脱离生产人数浩浩荡荡，打破历史上的纪录。要保证供给，就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粮食问题，按三地区粮食征收量，我们要亏空  $\times \times$  万斤以上；一个是财政问题，估计加上支

援其他解放区，财政赤字可能达到××××元（如果民兵、民夫超过限定数额，那这二项还要增加，而民兵、民夫又是很难掌握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战争就不好打，事情就不好办。如果财粮亏空不能克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那就非常危险。会使群众生产贸易不能进行，部队不能穿衣吃饭，其恶果就不难想像。

养兵和财政经济是矛盾的。我们今天处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之下，来进行近代化的战争，这不是一件小事。因此，我们的财经工作，甚至其他工作，必须动员起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把这两个问题看成平常的事，那是最危险的。要知道近百万人马吃粮、穿衣、打仗，是我们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不要以为我们8年抗战有吃有穿，今天更无问题。要知道今天困难超过以往8年，问题的严重在于今天不同于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时期分散活动，脱离生产人员才占人口总数1.7%，至多不超过2%，已经感到困难了，今天脱离生产人数与战时勤务人数激增，作战规模空前巨大，所以问题就与过去根本不同，必须认清这点，引起我们严重警惕。

### 三、一定要在财政经济上再打几个胜仗

8年来，我们财政经济上是胜利的。去年二次自卫战争财政经济也是胜利的。今后是否我们还能打胜仗？事在人为，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我们主观的努力还不够。因此，要进一步努力，再打几个胜仗，而且必须是打胜仗。财政经济上不打胜仗，军事上也就不能打胜仗。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按过去经验，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取之于己。二者的共同基础是发展经济省吃俭用。

取之于民必须照顾群众负担力量，同时照顾战争需要。取之于己，必须在思想上先搞通，如果我们不能取之于己，那是国民党观点。我们要首先取之于己，然后才对得起人民，取之于己，基本精神是“克己奉公”，生产节约，拿出 8 年的积蓄，拿出老本，发扬无产阶级整体思想，打破过去游击时代的保守观点，本位主义。如有些小公家往往粮食打些埋伏，多报些人数，多向公家要些东西，因此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不可胜数，这些都需拿出。提倡艰苦奋斗作风，省吃俭用，为大公家着想。只要我们全党动员起来，困难就可以渡过。

解放日报在新年献辞中指出：现在我们是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全国民主新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夜。为着迎接胜利，前方流血牺牲，后方就必须是省吃俭用，克己奉公。譬如：苏联今天的生活，有牛奶、面包、肉食，是很丰满的，但这种丰满的生活，也是经过艰苦才得来的。斗争最艰苦时，一个人一天只吃半磅黑面包（合中国六两），因之，十月革命和内战也就能够克服困难，达到了人类空前的胜利。这说明什么叫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就是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意思，他是顽强的，吃苦耐劳的，能克服任何艰难困苦的。

但是今天这思想在全党说还很脆弱。今天要有艰苦、艰苦、再艰苦的高度革命自觉，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自己要艰苦，要紧缩开支，然后取之于民，群众才不会叫苦、抱怨，而会更好的支援革命。为着紧缩开支，这次会议上预算修改了六次，麻烦是麻烦的，这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取得了很好成绩，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有很多问题，并不是这次会议上所能完全解决，还需要动员全党同志来解决。我们要保证自卫战争长期的供应，我们要争取经济的大胜利，我们全党全军所有大小机关，至少要努力执行以下十一个具体方针。

### (一)精细计算

计算要又精又细。山东俗语说：“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一世穷”特别是我们今天工作方法陈旧，没有科学基础，如果计算不到，粗枝大叶，或责任心不强，亏空就会更大，漏洞就会更多。因此，决不能怕麻烦。要知道百万人马，一人节省一百元，就是一万万元。所以计算一定要科学的精细的计算。不可否认现在小公家、小单位很多还有打埋伏的现象，还有混水摸鱼的坏意识、坏行为。任何单位要真能站在党的利益上进行思想反省、检讨，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会有一些。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同志存在有游击战争时期分散主义思想，不了解今天运动战战略集中性的要求，不了解整体，光从局部上看问题，因此每每使计算带上片面性、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财经工作中计算的精细，就带有更大的意义。精细计算，在表面上看就免不了要“克”。“克”似乎不太大方，但为了革命，“克”得客观，“克”得对，就对革命有好处，就是科学的大方。

核算。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先核对人数，把人数弄正确。同时还要计算单价（不能以低算高），原料的多寡、装具、尺寸都应在节约精神下一一计算。计算出标准，有增有减，这是很麻烦的事，但是一定要计算。如这次会议计算染一套衣服，过去用一两黄颜色，这次细密计算后，用五钱就够了。这样一套衣服染费就可节省 500 元，百万套衣服就可节省 5 万万元。又如胶东提出，每顶帽节省一方尺布（50 元），光帽子可节省 5000 万元。衣服由平均 34 方尺改为 32 方尺，节省 2 方尺布，又是数万万元。再如，变动某些服装供给标准，又节省数万万元。这些工作需要同志们下去实际掌握，这是一个精密的组织工作，从小处着眼，积少成多。这次初步计算共分节粮、节衣、省原料、减人数、降低标准五项 18 条，逐项逐条精细计算，结果就减少 40 万万元之多，这四十万

万元就是大家努力不怕麻烦的结果。当然，这种精细核算基本上要接近客观，决不是主观的，要能解决问题才算正确。

## （二）紧缩预算，减少开支

预算能紧缩之处要紧缩。紧缩预算原则，首先反对平均主义。我们是重点主义。所谓重点主义，就是要适应战时需要，停止或减少非战时的需要。比如这次预算中就还有许多平均倾向，如报纸一项目前就大多，有后勤报、卫生报，有大报、小报、有各种各样报，自然就要多用钱。这在文化事业发展上是很好现象，会起一定作用，但实际上如果用其他方法代替也还是可以的，节省这方面的开支，用在战争方面，这是重点主义。如果有些部门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紧！”那么告诉他：“为了要打仗、要打胜仗”。有些财粮工作同志认为：“不给人家批几个钱，情面上说不下。这也就是平均主义在作怪。

半年来精简临时吃粮人数，等于现有的编制人数。过去民兵、民夫、各种会议，村干几天一会，大会、小会都表现了两件事：一个要粮食，一个要经费。这是老一套的工作方法，要用政府的钱和粮来推动工作，不会把群众性的工作变成群众自己的工作，不用思想动员，单从物质着手，吃吃喝喝，或者包办代替，这都是老一套。事实证明：滨海在土地改革中，成千成万积极份子自带给养开会，工作开展得很快，工作效率较前提高。又如训练班，过去一动就要批给养，事实证明流动训练班同样可以完成训练任务。工商总局办了一次训练班，没支一文经费，也训练了。一切群众性的工作，给群众自己去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其他会议、会餐、纪念都不必要，能节省就节省。

今天我们的重点在于为战争服务，为伤病员服务。虽然今天卫生经费多一些，不要紧。现在打大规模运动战，打一个仗伤兵数千人，没有药是不行的，这方面我们不能吝啬，自然也反对浪



费。其他如兵工器材，炮弹、子弹、手榴弹也都需要大大生产充实。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前方需要，我们满足它。使之有地雷、炮弹、手榴弹，有吃，有穿，有医药，这就是新的经济观念——战时经济观念。打仗的人需要多，我们预算就加上，次要的人要减，这就叫做加强武装力量。今天要有一兵养一兵，不紧要的开支，均可减少。可以缓办的缓办，可以不办的不办，可以停止的停止。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停就停，取消就取消，分别审查，断然处理，一切为了战争。依照这个精神，把现在的预算与开始的预算相比，人数增加了 50%，经费总数反而减少了 12%。紧缩结果能够多养 1/2 的兵，这是很大的成绩。如加上华中部队机关，人数比去年多一倍，经费仅增 15.47%。当然这里面还有不合理之处，但总的说来是紧缩预算的结果。我们的预算一定要紧缩，平时紧缩，战时更要紧缩。

因为大家准备材料不够，我们还没有检查决算，我们今后不但要从预算上紧缩，而且要在执行预算中紧缩。领导上要善于及时了解情况，灵活运用、采取重点主义，反对平均主义，灵活调剂，而不是呆板的，机械的。

### （三）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是精细核算、紧缩预算的一个组织保证。精简已有很大成绩，临时吃粮人数一般减少了。如滨海去年下半年初次报告的临时吃粮人数是 10567 人，这次才几百人，鲁中政府系统也减去了 7898 人。滨海经常吃粮人数减 53%，很有成绩。各地回去可重新检查。小学教员这次供给完全取消了。我们并非不重视教育，更非取消教育，而是改变方式——民办公助。现在机构太多，平均主义，大有人满之患。人多是好事，但坐吃出空，势必要落到人财两空。所以要精简，要研究使机构更适合于战时需要，反对平均主义。精简之后，部分转到主力，部分企业化，使我们钱

粮有所保证，主力又能扩大，否则是不行的。这样减少临时吃粮人数，小学教员以及其他不必要人员转入急需方面，全省估计在10万人以上。

从数字上讲，军队与地方比例，过去是一与一之比，现在大体上是六与一之比。这说明地方人数相当减少，部队相当扩大。这是好现象，表现了战时特点，改变了历史上的规律。

我们的精简是否已经够了？不！我们的机构还是有毛病的，编制还大，还不能满足战时要求。有的机构紧缩了，但还有不紧缩的，还需要继续贯彻。工作要有重点，有直接配合战争的，间接配合战争的。目前满足战争需要的许多机构还要加强，一切为了战争。当然其他工作中人少了，工作会遇到困难，就要克服这个困难，分别轻重缓急。如目前在财粮工作上干部更要加强，硬要把一些比较负责的同志，投入这个工作，而且要能组织能指挥。支援前线工作要加强，后方医院也要加强，这是实际的要求。所以今后更需要大批干部离开次要方面，投入主要方面，在战争中学习。因此精简工作就要抓住这个特点，平均主义是错误的。

我们还需要加强主力，加强主力还缺少干部。今天要打仗，就要干部，所以必须投笔从戎。这样也就是在主要方面增加了人数，而在次要方面减少了人数，财粮也就可以省出一部，以满足战争需要。

（四）开展节约运动，堵住漏洞，彻底消灭贪污腐化浪费现象

几年来节约运动很有成绩，但是还要更加努力。去年全省初步统计生产总数16万万万余元，可见是动起来了。这说明“九九决定”引起了党内外的注意，生产节约经过大家努力，确实造成了运动，许多机关一件物运动，并没有奖金，没有分红，都是自觉、自愿、真心的节约。同时献金、献棉也都是很热烈的，各地都有很好例子。

地方经费少发，也可看出生产自给成绩。过去部队占 70% 强，地方占 25%—30%。现在军费增加，部队占总经费 90%，地方党、政、民占 10%。如再把增加的部队合起来计算，则军费为 92%，地方只占 8%。地方上一人平均经费从 10000 降到 8000，主力从 20000 降到 15000。而且地方上大部分费用还是内务费（如照顾荣誉军人费用和抚恤费），这说明其他的费用都是自给的，依靠生产解决问题。如营南生产节约所收入占经常、临时两数的 195%，临沭除自给之外，也余下 1029727 元。这都做得很好。章邱县节省冬衣布，三次动员成功。这说明那里有了思想上的自觉，那里生产节约就一定有效的。这些生产一般都合乎政策，由于收缩整理机关贸易，对于稳定物价起了相当作用。许多好的例子值得奖励，各地应该奖励。当然不可否认某些地方还是有漏洞的，鲁中、鲁南开展反贪污腐化斗争，这是很对的。此外还有自己赚自己，小家赚大家，这种种不正确的思想与行为都要纠正。

今后生产自给的任务还很大，平均部队供给经常费的 52.5%，自给 47.5%。地方供给 31%，自给 69%。这是根据初步估计所规定的任务，是有把握完成的任务。当然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必须善于组织一切力量进行生产。在正确遵守政策条件下善于经营，使公家支出经费减少，这个功劳就很大。今年我们亏空这么大，必须下决心搞好生产节约，才能更好的打胜仗。

今后节约是自动性加上鼓动性，省吃俭用。能用旧的就用旧的，能不用就不用。展开党内外讨论，贯彻下去，形成热潮，一件物、二件物，多多益善，发扬填漏洞人人有责的精神，组织保证，反对自流。各种工作要与填漏洞相结合，消灭贪污现象。特别要注意那些鞭长莫及的死角（如沿海一带，目前很乱，单纯经济观点没有政治头脑；因此特务抢船，现已损失 40 余只船，需要提出保卫沿海地区与敌人作斗争）。问题不是我们同志不愿填漏

洞，不愿节约，而是在于不了解这任务，不懂得这情况。去年财经会议以后，我们动员了几个地方，只要讲通问题，马上就行动起来。比如党校，动员了一二次，大家说鞋子穿不了，都自动送回来了。鲁中公学一经动员，被服由补充 85% 降为 70% 还不到。鲁中政府系统在分配预算时原来困难很多，但经说明之后，大家都无意见。可见财经工作加上宣传、组织保证，就有很大作用。

群众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在群众中要进行教育，提倡省吃俭用，耕三余一。事实上翻身后的群众，经过教育，大部都能做到省吃俭用的。

#### （五）清查旧有物资，战场缴获物资集中管理，以战养战

旧物资家当实在不少，能用的都要清出，如鲁中后勤清查旧物资作价值 3000 多万元、莒南查出过去机关个人存放物资值 400 余万元（还只是一部分）。许多物资不科学的分散在民间，有个人的，有公家的，无其数。有的没有登记，有的因经手人调动，有的因人已牺牲而致没有人去过问。我们现有的机关要登记保存物资，清查物资，鲁中现在建立仓库是值得仿效的。计价运用，这样就不会浪费，就不会一方弃之不用，一方又急需采购。

此外组织专门机构，收集战场缴获。统一打扫战场物资，统一调剂，可以增加我们财富，减少财政开支，克服我们困难。日寇曾经用以战养战克服其困难，我们今天更需要以战养战，集中战场缴获物资的管理。这种工作开始有其困难，但一经动员认识，我军自会拥护。

#### （六）展开献金、献物运动，克己奉公运动

这种运动主要是在公家大小机关、后方机关和单位中进行。在群众中亦可适当的推动，把睡眠的物资、资金给大公家支配，以弥补亏空。多领的粮食，今天不在纪律上追究，希望他们毅然决然去掉小单位的本位主义，对党自动的献出。此外，一切军需物

品自己用不了，或本身不需要，就要献给党。这些物资统要报告当地财委会或财政部门登记应用，并从所献多寡与其重要性上评定功劳。

#### （七）降低供给标准

这是在艰苦奋斗的实际意义上进行的，今天我们的供给标准比其他地区还是高。今后粮食供给地方工作人员减到 1 斤 13 两，部队主力基干机关递减一两至二两，今年新衣不发。这的确是降了一些。但搞好生产，还是有办法的，我们并不苦。太行有一年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许多部队绑腿不打。陕甘宁也是靠南泥湾政策提高了生活。按现在我们生活标准，已经是高高在上了。我们准备艰苦，只有艰苦才能换取幸福，只有长期打算，才能培养雄厚力量。要在党内动员，进行说服工作。某些方面还可以再降低，那就要供给工作同志具体检查切实负责，这种递减是优待主力，是后方省吃俭用保证前线，干部刻苦向下看齐。

#### （八）取之于民

增加征收数量，加强征收工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粮食按全省说可以够吃，渤海、胶东有余粮，但运输困难，不能调剂滨海、鲁中、鲁南，只有在可能条件下换取物资。淮海区是重要战场，大军云集，粮食问题不解决会造成恶果，这只能一方面就地供给，另一方面靠别地区运送，要很好的组织。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只有忍痛向群众要，并从各方面来节约（如减少优抗粮，从 10% 减为 3%，运输粮再减少一些）。估计大鲁南吃粮人数占全省 65%，而粮食收入仅占全省的 1/3，收支相差很大。决定再向群众预借 9000 万斤至 10000 万斤，如预借 9000 万斤按鲁南 2000 万亩地计算，平均负担每亩 3 斤，这已不算轻了，必须好好说服动员，全力以赴，才能突击完成！

今春田赋每亩征 60 元，商人献金，增加间接粮——纸烟税、

酒税、盐税、屠宰税，如果还不够，可以再加 25%。这些基本上不是苛捐杂税，根据地群众几年来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运输业收入很大，已经有了基础。应当军民兼顾，共同艰苦共同争取胜利。

#### （九）调剂工作

大鲁南三地区亏空大，需要胶东渤海调剂，所以这回也紧缩了胶东、渤海，使胶东渤海能够成为大鲁南三地区的后盾。统一收支，我们就能克服困难。国民党说胶东是我们的经济根据地，真不是错。胶、渤两区也曾给予不少帮助，但帮助还不够大，他们对决议贯彻还很不够，对统一调剂的战略意义还认识不够。今后需要党内彻底认识这种克己奉公是全山东问题，华东问题，全中国革命问题。要好好组织这个工作，进一步在党内外动员。战时坚决服从命令、整顿自己，加强自己。支援大鲁南是一件光荣伟大任务。务使全党克服自恃富足的观点。克服一切不良倾向，完成党对你们的要求。

#### （十）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组织群众生产

所谓单纯经济观点，实际就是忘了群众。因为经济没有群众作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没有群众性的生产发家，是解决不了许多问题的。因此，要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帮助群众生产（尤其是后方机关）。组织群众农业生产，纺织生产，副业生产，达到军民所需基本物资的自给自足。提倡精耕细作，争取布匹自给，提倡用土货，自制火柴、牙粉、牙刷，甚至部分医药，军工器材做到自制，以节省外汇。提倡多喂猪，二户一口，多产猪皮，保证军民需要，稳定物价。其他还要多种菜，多养鸡，大力开展群众生产，订发家计划，办好合作社，这都是为了保证战争供给，满足战争需要。

#### （十一）力求物价的相对稳定

以上所述种种，均有助于稳定物价。收入增加，物资生产充实，保证自给，减少开支，就减少了通货膨胀。半年来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如去年 8 月物价指数为 587，12 月增到 674，涨得不多。但胶东物价高涨，其原因：（1）没有坚决紧缩货币。（2）工商贸易太乱太多，不能很好掌握物资，调剂市场。（3）外地去买东西，增加胶东货币发行量（但为次要原因）。所以胶东本身要很好注意停止抢购，紧缩货币。至于其他地区去胶东买东西无证明文件者，胶东有权禁止，免得紊乱市场。胶东物价稳定，对支持全省财政有很大帮助。同时物价稳定，可以提高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提高，就有力量负担战争经费。今天我们亏空一些，假如调剂得好，再来一些起义部队，再来一些俘虏，还是可以解决，还不至影响市场引起物价波动，就是有些波动也不要紧。如再努力减少货币发行，就更有办法。

上述各项办法都是互相联系的，彼此影响的。此外，在国民党区域可以投机取巧，只要能赚钱，不吃亏，且不损害政治影响，可以打这方面的主意。但目前交通不便，危险太多，这是一个困难。

对于外汇必须保证不能浪费，提倡用土货，用代用品，保护根据地群众生产。所以下令停用牙膏，可以强制采用土纸以及其他土产。外汇节省，入超减少，对稳定物价是有很大作用的。

渡过今年的危机，真正在经济上打胜仗，办法就是这些。这几条都要老老实实坚决贯彻下去，动员下去，执行下去。如果能做到，我们就可以达到反攻、收复失地的阶段。即使再有意外，目前总还可以维持。如果这几条做不到，就成了问题。因此，今天必须全党动员起来，全军动员起来，一切人民总动员。动员必须环绕在这个问题上，逐条逐条的动员，逐条逐条的实行，把它当成严重政治任务，和战争任务紧密结合。把这问题做好，再做其

他工作。这里，凡是违背这些，有不良倾向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提出批评指责。我们反对旧的观点，非无产阶级的观点，轻视经济工作，不管经济工作，甚至有认为县委书记兼粮食局长是侮辱人格的思想，对这些歪曲的思想要做严厉的斗争。必须提倡首长新自动手，大家动手再打几个经济胜仗。

#### 四、在观点上思想上的几个问题

##### （一）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统一问题

我们把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真正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有的强调战争，忘掉了群众；同样有的强调群众，不管战争，都是不对的。基本任务是战争，是争取战争胜利。因此，我们的群众观念，如果忘了战争需要，战争对人民必需的负担，单纯仁政观点，怜恤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迁就群众落后。问题是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动员群众为战争服务。因之，今天增加群众负担，可能有部分人不愿意，采取消极抵抗，甚至反对的态度。对于这些现象，必须加以说服。要善于动员群众出粮、出钱、出力，保证战争供给，保卫家乡。“自己大门自己看！”“自己队伍自己干！”如果以单纯怜恤态度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对的，行不通的。我们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是一致的，我们必须使干部认识，为了战争胜利，就要适当增加群众负担。同时也要克己奉公取之于己，以减轻群众负担。两方面努力，就是战时经济的战争观念与群众观念，以保护群众永远的彻底的翻身。这是一个思想问题，必须弄通。

##### （二）战时与和平问题

抗战胜利以来“和平”了一时期，但是今天又是战时。所以一切工作机构、工作作风、工作规模、工作计划、言语行动、吃



饭、穿衣都要和战争情况结合起来，各人都要在战斗任务下考虑一下。如果因精简而引起某些部门的相互间不痛快、吵架，是不对的。要实事求是，为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战时和平时的观点要不同，以平时观点去看战时就一定有偏差。在战时就要用雷厉风行果断的作风解决问题，一切围绕战争去把握问题。这样处理，还是为了整个党的事业。

### （三）大公家与小公家问题

这问题上次会议已解决，但是贯彻不够。什么是小公家？小公家是维持一部分同志的革命家事的，而大公家是维持若干小公家的共同的革命家事的。这里本来没有严格区别，部分服从全体，小公家服从大公家是总的原则。所以小公家的本位主义必须取消，必须彻底粉碎。小公家的本位、自私，是中国社会基础的反映，农民意识的表现。今天战争打到头上了，为什么还要保持小公家的本位自私呢？没有必要。不要因小失大，要照顾大局，也就是要我们真正提高革命自觉。

### （四）一切工作与经济工作关系问题

这问题是党内几年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政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政治任务是人人有责的，但财经工作却从来是被忽视的。这是分割了工作联系，分割了党的政治任务。现在在战争的实际体会中，有些同志已经注意财经工作，这是好现象，但还不够。反映在有些单位只知道要钱花，而财经责任从来没有过问。今天要完成战争任务，就必须改变这观念，把财经工作和其它工作结合起来，密切结合起来，把财经工作当成自己的工作之一。我们人人要吃饭，要穿衣，谁也不能不吃不穿，因此谁也有注意财经工作的责任。要推动这工作，配合这工作，在观念上树立起来。尤其在战争供给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列宁在十月革命时亲任粮食局长，毛主席亲自总结财经工作之意义必须

引起我们体会。过去大家关心不够，因此使这工作变成一部分财经工作同志孤立的工作，而没有使之变成群众性的运动。我们知道任何工作只要变成群众性的工作，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如能把经济工作变成群众性的工作，人人自觉，个个自动，克己奉公，监督浪费，节省开支，爱惜物资，帮助征收，就能顺利的保证战时供应。

因之，作财政经济工作，也要善于鼓动、宣传、说明道理。当然，最主要是党内进一步纠正思想偏向，保证这个任务。

经济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经济工作同志是很辛苦，甚至受气。这些事都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在党内思想上还不是全部成熟，行动时就不能整齐。这里就要我们采取更宽大的风度，去对付这些同志，采取耐心说服的态度，科学计算的方法，认真负责的精神进行工作。工作中更要科学化，条理化，不是单纯的满足于数字，而是从数字中发现所包含的思想。善于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凡是变动不大的东西，更要规律化。变化快的东西，要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出一套有体系的学问。经济工作本来是最科学的，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而且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具体的问题。如果不善于把这些具体的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进步就慢、工作就容易碰钉子。因此作经济工作必须多研究，同时多学习。只有不断的学习、从实际知识中学习，才能得到好的理论。

会议半个月以来，收效很大。我希望各位同志回到各地好好传达。同时今后工作上的意见，不要等到开会才提，要随时写信、打电报反映，使上下密切联系。下面发现问题，就结合上面马上解决。同时动员全党，打通思想完成任务。我们的工作做好是华东的胜利，全党的胜利，对革命是有极大贡献的。